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博士論文

指導教授：宋興洲博士

中國大陸經濟崛起下的兩岸
互動——以胡錦濤時期為例

博士班研究生：吳健中

中華民國一〇五年六月二十日

摘要

近代不論從事國際關係研究、區域整合、兩岸關係研究或比較政治研究的學者們，如果忽略中國大陸的因素，就等於違背中國大陸崛起的事實。換言之，冷戰落幕，國際政治與理論分化重組，如何建構中國大陸崛起，以及轉變中的中國大陸外交政策與其自我定位建構，皆已成為進入 21 世紀國際關係研究領域的主流。據此事實與主流，本文研究動機或環境背景，主要來自於中國因素下的三個面向，一是大國崛起的影響力轉移；二是中國大陸是否能取代美國；三是兩岸關係的進展變化。

本文的研究目的與問題，包括：一、理解中國大陸崛起的內部因素的目標上，造成中國大陸崛起的國內因素是什麼？二、探究中國大陸經貿策略的外部因素上，促成中國大陸對外影響轉變的外部因素是什麼？三、在欲進一步理解兩岸關係的細緻變化上，什麼是造成兩岸關係變化背後的實質原因？為了理解上述的研究目的與問題，本文嘗試以新古典現實主義做為研究途徑。

最後，本文歸納出以下主要的研究發現與貢獻：一、整合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概念與變項，形成一種中國大陸對臺經貿政策的綜合性分析類型，並跳脫單向的理論途徑，提出一種雙向互動的理論架構，做為一種新的架構途徑；二、中國大陸政治精英階層的轉變與提升，造就胡錦濤時期領導階層的專業背景；三、從中國大陸對外不同區域的經貿政策看，發現由於經濟已為中國大陸發展的關鍵因素，此外，蘇聯垮臺後中國已成為美國在國際社會影響力最主要的挑戰者；四、在兩岸間的經貿發展與關聯性上，政治與經濟互為主客體，中國大陸與臺灣關係朝「促進兩岸經貿交流」的方向發展，然而，其目的是在「以經促統」或「以經為政」；五、中國大陸胡錦濤時期對臺經貿政策的結果，係以「有利」、「停利」為主，而尚未出現「不利或有害」的對臺經貿政策。

關鍵字：中國崛起、新古典現實主義、兩岸關係、經貿政策、胡錦濤時期

Abstract

Recently, researchers who study wheth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gional integrations, Cross Strait relations, or comparative politics will never neglect the China factor, because it shows a fact tha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has been rising. In other words, after the Cold War, the theory construct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narrating of China rising, the changing foreign policy of PRC, and the position constructing of PRC become the main trends in area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ying while into the 21th century. According the fact and trend, this dissertation includes the following three research motivations of China factors: 1. the power transition of great powers rising, 2. the question of PRC replacing USA, and 3.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Cross Strait relations.

By using the framework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this dissertation trie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three questions: 1. Regarding the China rising, what are reasons for the rise of China? 2. Considering the foreign policy of PRC, what are external reasons for PRC making different foreign policies? 3. In order to further understand Cross Strait relations, what are real reasons for the changing Cross Strait relations?

Finally, the research findings and contributions of this dissertation include the following items: 1. Integrating the concepts and variables, we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and interactive theory type to analyze PRC's economic and trade policy to Taiwan. 2. Because the PRC's political elite class is progressive, Hu Jintao's leadership class will be more professional. 3. Regarding the PRC's foreign policy in different region, the key elements of PRC's development are economics and trades and instead of Russia, PRC become a primary challenger to USA in the world after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 4. Regarding Cross Strait relations, politics and economics are inter-subjective. Although the trend of Cross Strait relations would promote economic and trade development, the PRC's purposes are political unification through economic tactics. 5. Regarding Hu Jintao's economic and trade policies to Taiwan, the outcome of the policies are advantaged and non-advantaged, instead of disadvantageous or harmful.

Keywords: China rising, neoclassical realism, Cross Strait relations, economic and trade policy, Hu Jintao's period

目 錄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5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9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分析層次.....	15
第五節 研究章節安排.....	19
第二章 相關理論文獻回顧.....	23
第一節 新古典現實主義一般概念.....	23
第二節 國家行為者與無政府狀態.....	25
第三節 結構限制與國內政治因素.....	32
第四節 國際結構和國內層次的互動.....	41
第五節 區域經濟整合與大國崛起.....	51
第三章 中國大陸國內發展歷程.....	61
第一節 國內發展的限制根源.....	61
第二節 國內發展的思想根源.....	71
第三節 鄧小平時期之政經體制改革.....	83
第四節 江澤民時期之中國市場經濟.....	93
第五節 胡錦濤時期之深化穩定政策.....	102
第四章 崛起後主要對外經貿政策作為.....	117
第一節 中國大陸的崛起.....	117
第二節 跨洲性區域經貿政策.....	123
第三節 亞太區域經貿政策.....	140
第四節 東亞區域經貿政策.....	150

第五章 中國大陸對臺經貿政策分析.....	159
第一節 胡錦濤時期之兩岸結構變化.....	159
第二節 兩岸國內政治的變化.....	165
第三節 美國因素的兩岸結構認知變化.....	173
第四節 兩岸經貿互動結果與分析.....	181
第六章 結 論.....	191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貢獻.....	191
第二節 臺灣之策略思維與作為.....	197
第三節 未來研究方向.....	199
參考書目.....	203

表目次

表 2-1：五種關於外交政策解釋途徑比較表.....	49
表 2-2：區域經濟整合的分類表.....	53
表 3-1：近代中國科技發明件數統計.....	62
表 4-1：RCEP 與 TPP 相關之經貿數據比較.....	148
表 5-1：胡錦濤時期兩岸國防預算對比表.....	164
表 5-2：臺灣執政黨在各屆國會席次中的比率.....	170
表 5-3：共產黨黨員代表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的比率.....	171
表 5-4：胡錦濤時期兩岸國內政權互動變化表.....	172
表 5-5：胡錦濤時期的美中臺關係變化表.....	177
表 5-6：兩岸領導人對結構認知變化對比表(中：臺).....	179
表 5-7：胡錦濤時期之兩岸經貿政策互動結果表.....	182
表 5-8：胡錦濤時期之兩岸經貿政策分析架構類型表.....	185
表 6-1：本研究分析架構類型表.....	192

圖目次

圖 1-1：研究架構圖.....	13
圖 1-2：研究步驟與流程圖.....	21
圖 2-1：A、B 兩國國際層次互動示意.....	44
圖 2-2：A 國國內獲勝集合曲線示意圖.....	44
圖 2-3：B 國國內獲勝集合曲線示意圖.....	45
圖 2-4：A、B 雙方國際國內雙層互動示意圖.....	45
圖 2-5：雙層次互動的大國合作解釋模式.....	46
圖 4-1：中國大陸 GDP 成長率圖.....	122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近代世界政治的研究學者，必然都會關注到至少二個突顯的變化因素，一是蘇聯的解體；另一是中國大陸的崛起。蘇聯的解體及東、西德的統一發生在 1989 年，而中國大陸的崛起可以追溯至 1979 年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依此二個時序看來，雖然我們不能說，因 1989 年蘇聯的解體造成 1979 年後中國大陸的取代地位，但從跨入二十一世紀的時序看來，中國大陸的崛起及取代蘇聯地位的現象，卻已是一個明顯的事實。因此，不論從事國際關係研究、區域整合研究、兩岸關係研究或比較政治研究的學者們，如果忽略中國大陸的因素，就等於違背中國大陸崛起的事實；換言之，冷戰落幕，國際政治與理論分化重組，如何建構中國大陸崛起，以及轉變中的中國大陸外交政策與其自我定位建構，¹ 皆已成為進入二十一世紀國際關係研究領域的主流。據此事實與主流，本文研究動機或環境背景，主要來自於中國因素下的三個面向，一是大國經濟崛起的影響力轉移；二是對中國大陸取代美國的質疑；三是兩岸關係的進展變化。茲進一步闡述如下：

壹、大國經濟崛起的影響力轉移

從東亞區域而言，改革開放政策前之中國大陸的對外影響力，由於受到強烈的意識形態與國內政權維護的影響，因此經常出現非理性或難以預測的行為，除了損害自身的利益外，實無餘

¹ 張登及，《建構中國：不確定世界中的大國定位與大國外交》（臺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頁 2-6。

力與其他東亞國家產生互動的影響。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大陸致力於經濟建設，並且逐漸加深與東亞區域社會的互動，以經濟為中心的國家利益成為制定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意識形態的作用已大為減低。20世紀末，東亞地區擁有比美國、歐洲與世界其他地區都高出甚多的經濟成長率；21世紀初，東亞地區，包括東南亞地區的經濟發展優勢仍將持續，甚至有可能成為本世紀世界經濟的中心。² 顯然，東亞區域經濟發展優勢之主角，即為中國大陸，此從日本學者 Kenichi Ohmae（大前研一）所謂的「中國的興起」，³ 及美國學者 Robert Gilpin 認為「亞洲區域主義—中國的崛起」即可獲得瞭解。⁴ 事實上，東亞地區大國角色的轉移，可以從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看出端倪。在 1997 年以前，東亞國家的政府官員總認為自己就像是飛行雁群中的一隻，全都以高速邁向富國行列前進，雁群中日本在最前端，新加坡、南韓、臺灣、馬來西亞、泰國隨之在後，甚至印度、中國大陸也在隊伍之中。由於領頭雁的日本在成長前進，隨後國家的經濟也會持續成長。只要還在倒 V 字形的編制行列中，數年之後所有國家都可以達到平均國民生產毛額一萬美元的水準。⁵ 然而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由於各國經濟發展程度不一，破壞了原本倒 V 字形的編制行列，更由於中國大陸的竄起，從 2009 年起逐漸取代了日本在雁行隊伍中最前導的地位。⁶ 同樣身處東亞地區的臺灣，也必然受到這種大國經

² 許介麟、蕭全政與李文志，《亞太經濟合作與美國的亞太戰略》（臺北：業強，1994），頁 4。

³ 許曉平譯，Kenichi Ohmae 著，《中國，出租中》（臺北：天下，2002），頁 178-183。

⁴ 楊宇光譯，Robert Gilpin 著，《全球資本主義的挑戰》（上海：上海人民，2001），頁 280-288。

⁵ 王德玲、蔣雪芬譯，Kenichi Ohmae 著，《看不見的新大陸》（臺北：天下，2001），頁 250-251。

⁶ 中、日兩國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的比較，雙方從 2001 年 1.18：4.07 兆美元的大幅差距到 2009 年約 5.0：5.0 兆美元首度追上之後，自此，中國大陸的 GDP 就一直領先日本，請參閱：中國評論通訊社，〈經濟規模世界第二，中國怎樣影響世界〉，2010 年 8 月 24 日，取自《中國評論新聞網》，

<http://w.chinareviewagency.com/doc/1014/2/4/2/101424279.html?coluid=59&kindid=0&docid=101424279&mdate=0824095949>，檢索日期：2015 年 8 月 24 日。

濟崛起結構所產生的影響力轉移所影響；因此，此為本文研究動機的主要來源之一。

貳、對中國大陸取代美國的質疑

近年來由於經濟快速發展，中國大陸已不只是「世界工廠」，更是「世界市場」，其影響力正日益擴大。如去(2015)年7月以來中國股市狂跌，寫下自2007年2月以來，時隔8年最大單日跌幅。導致世界多數國家股市應聲下跌，媒體形容為「中國打噴嚏、全球都感冒」，甚至有人對比於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前後狀態，而懷疑是否中國大陸的「雷曼時刻」(Lehman moment)已到來。⁷ 然而，對中國大陸而言，雖已成為區域大國，但相較於美國在實力上仍有段差距，故目前就全球性戰略觀點而言，中國大陸顯然尚未具備與美國抗衡的實力。如同前中國大陸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上將訪問美國後，在美國五角大廈舉行聯合記者會指出：「此次訪問美國，清楚瞭解到美軍實力大大超越中國，中國軍力落後美國20年，解放軍沒有能力挑戰美軍。」⁸ 此外，從以物質資源計算國力大小形塑而成的權力移轉(power transitions)理論中，⁹ 雖然可以看到中國大陸挑戰現有霸權國的影子，但如從霸權穩定論的觀點，¹⁰ 霸權國為了維持世界自由貿易，必須「有能力」

⁷ 鍾詠翔，〈憂政府出手仍難救市 滬股狂跌8.5%〉，2015年7月27日，取自《聯合新聞網》，<http://udn.com/news/story/4/1082027>，檢索日期：2015年8月24日；經濟日報社論，〈中國的雷曼時刻到了嗎〉，2016年1月27日，取自《聯合新聞網》，<http://udn.com/news/story/7338/1468959>，檢索日期：2016年1月27日。

⁸ 黎敏，〈陳炳德：中國無意挑戰美國軍力〉，2011年5月18日，取自《BBC 中文網》。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1/05/110519_us_china_military_taiwan.shtml，檢索日期：2012年5月21日。

⁹ 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p. 19-22; 權力的物質衡量包括：人口數、經濟成長和政治能力界定國力的大小，請參閱：Jacek Kugler, Douglas Kugler and Ronald L. Tammen, "Chapter 1: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Ronald L. Tammen et al. eds.,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p. 15-20.

¹⁰ 霸權穩定論主要由 Keohane (1984) 提出，請參閱：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和「有意願」負起絕大部份責任，而僅由中國大陸來提供全球穩定貿易體系的公共財(public goods)而言，¹¹ 這樣的時空環境似乎還沒有形成。因此，中國與美國之間的競合背景，以及中、美之間的互動影響到包括影響臺灣在內的其他亞洲國家的結構變化，是為本文的第二個研究動機與背景。

叁、兩岸關係的進展變化

兩岸關係，如果從衝突戰爭到合作談判的程度界定，概略可以分成三個時期，分別是 1950 年代的「軍事衝突時期」、1960 到 1970 年代冷戰體系的「僵持對峙時期」，以及 1980 年代末期以後，臺灣政府宣布解嚴和允許中國大陸探親，而同時也是中國大陸宣佈改革開放政策之後的「交流互動時期」。顯然，1970 年代以前的兩岸關係，不存在任何的經貿協商談判。然而，兩岸自 1990 年代以後，雖然在 1995、1996 年曾出現所謂台海危機，¹² 但我們看到兩岸之間愈來愈多經貿談判協議的出現，尤其自 2008 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由雙方政府授權之「海峽交流基金會」與「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協議簽署增長的現象，¹³ 驗證了兩岸關係朝向協商談判的趨勢之穩定進展。此外，兩岸關係的複雜在於不論是何種經貿議題的協商，只要將主權的爭議納入就無法獲得任何的協商成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後由 Snidal (1985) 提出「能力」與「意願」條件的完整修正，請參閱：Duncan Snidal, "The Limits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9, No. 4 (Autumn 1985), pp. 579-582.

¹¹ Charles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pp. 304-305.

¹² 1995 年 5 月李登輝總統赴美訪問，因兩個中國言論觸發中國大陸飛彈試射，造成兩岸緊張情勢，謂之台海危機。

¹³ 海峽交流基金會，〈兩岸協議〉，2011 年 1 月 5 日。取自《海峽交流基金會網站》，<http://www.sef.org.tw/lp.asp?CtNode=3810&CtUnit=2083&BaseDSD=7&mp=19&nowPage=1&pagesize=15>。檢索日期：2012 年 4 月 1 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10）。《臺灣地區與中國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暨施行細則》（臺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出版，2010 年）。

果，¹⁴ 畢竟主權的爭議是一種「零和賽局」；此外，兩岸關係的變化不但是歷經了國(民黨)、共(產黨)兩黨的衝突與對峙，¹⁵ 也歷經了國(民黨)、民(進黨)兩黨的政權輪替。雖然面對兩岸關係的複雜性與變化性，但根據兩岸關係發展的進程而言，預判未來兩岸之間協商談判趨勢的可能性將遠大於衝突戰爭的可能性。因此，兩岸關係的進展變化，或兩岸未來發展之趨勢，實也構成本文最主要的研究動機、背景之來源。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依據上述本文的研究動機，即大國經濟崛起的影響力轉移、對中國大陸取代美國的質疑與兩岸關係的進展變化的三項主要背景環境，本文嘗試從中界定出三個主要研究標的，一是闡述或理解中國大陸崛起的內部因素；二是探究或瞭解中國大陸對區域整合影響的外部動因；三是進一步理解兩岸經貿關係的細緻變化。而為了幫助獲得此研究目的所需要指引的研究問題，本文依據三項主要研究目的之分類，進一步提出以下問題意識的對應說明：

壹、闡述中國大陸崛起的內部因素

一般說來，中國大陸大幅改變的起點應在於 1979 年鄧小平所主導的改革開放政策。以現階段看來，若以 1979 年為分界點，剛好可以區分成前、後 30 年的不同時期對比。換言之，從 1979 年

¹⁴ 兩岸主權爭議，係指自 1949 年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隔著臺灣海峽與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所形成的一個中國問題迄今。

¹⁵ 兩岸關係概略可以分成三個時期，分別是 1950 年代的「軍事衝突時期」、1960 到 1970 年代冷戰體系的「僵持對峙時期」，以及 1980 年代末期以後，臺灣政府宣布解嚴和允許至中國大陸探親，而同時也是中國大陸宣布改革開放之後的「交流互動時期」。

往前追溯 30 年剛好是以毛澤東為領導的 1949 年中共建國之始，而往後推及 30 年也剛好是中國大陸 GDP 首度超越日本的 2009 年，確立從此之後中國經濟崛起地位的時間。然而，這種時間的劃分或許過於主觀，但欲比較或瞭解中國大陸崛起的內部因素，卻與本文之研究目的相符。基本上，自 1949 年中共建政後的變化具持續性與變革性二方面，在持續的一面，由於受到列強欺凌的歷史經驗影響，中國大陸的內政特別強調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的基本原則。另在變革性一方面，中國大陸為了亟欲脫離內部貧窮的羈絆，原本基於馬列共產主義根深蒂固的社會主義制度，有逐漸向資本主義市場制度方向傾斜的跡象。毛澤東當政時期，以人治為主，政策往往隨著領導人意志的轉移而改變，因此內部政策的起伏性較大。領導人的信念、價值體系及意識形態，就成為影響中國大陸崛起變化的主要內部因素。

然而，自 1979 年中國大陸實施改革開放之後，基於國內經濟建設的需要，以及逐漸加深與國際社會的互動，包括中國大陸領導人意識型態的國內因素就變成本研究目標所必須關注的問題。換言之，在欲理解中國大陸崛起的內部因素的目標上，造成中國大陸發展的國內因素是什麼？就成為本文第一個主要研究問題。

貳、探究中國大陸對區域整合影響的外部動因

單純就東亞區域安全議題而論，不論改革開放前或後，中國大陸憑藉著地緣政治的因素，一直對朝鮮半島、臺海兩岸、南海主權以及東南亞、南亞等地區的安全與穩定，發揮重大的區域影響。然而，就東亞區域經貿議題而言，中國大陸崛起前或後，卻

有著極大不同的影響力，這種不同的影響力可以從當中國大陸取代日本經貿地位時的想像一般。而嘗試理解中國大陸這種對外區域經濟影響的外部因素，亦為本文另一個研究目的。

進一步而言，中國大陸在建國之初為一「無區域政策的區域霸權國家」，但當其實施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及對外開放政策後，隨著其經濟實力增長，積極創造有利於中國大陸經濟現代化的國際環境，亦成為其重要戰略目標之一。¹⁶ 例如，2003年胡錦濤提出「和平崛起」經貿外交新思維，雖強調中國大陸堅持平等發展與不稱霸的對外政策，¹⁷ 以利營造一個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穩定環境，但底限則是中國大陸的重要戰略利益不會受到威脅。是以中國大陸雖將其努力焦點致力於區域經濟發展，但均在企圖形塑中國大陸成為一個維持全球現狀的理性成員，並視確保全球的穩定與經濟成長為其利益所在。自此，中國大陸總體戰略開始由主要為「加強自己發展利益的和平環境」戰略轉向為「與世界謀求和平、共同發展與安全」的全球戰略。此一戰略轉變係以區域整合和區域主義為基點，以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加強國際合作為途徑，以擴展國家戰略利益、發揮負責任大國為目標。¹⁸ 因此，探究中國大陸這種戰略轉換的外部因素雖然是本文的研究標的之一，但更重要的是這些促成中國大陸對區域經濟影響轉變的外部因素是什麼？才是本文主要的研究問題。

¹⁶ Steven I. Levine, *China in Asia: The PRC as a Regional Power*, in Harry Harding, e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107.

¹⁷ 楊帆，〈胡溫提出『和平崛起』外交新思維〉，《中國研究月刊》（香港），第38卷第5期（2004年5月），頁23。

¹⁸ 康紹邦、宮力，〈國際戰略新論〉（北京：解放軍，2006年），頁333。

叁、理解兩岸經貿關係的細緻變化

國際上鮮有分裂的政體如同兩岸關係的複雜程度，也因為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使得兩岸關係的研究逐漸成顯學並受到世人的關注，故嘗試理解兩岸關係的細緻變化，就成為本文的最主要研究目的。因此，本文以胡錦濤時期為觀察重點，在 2004 年確定仍由民進黨繼續執政後，對臺政策朝向軟硬兼施的方向發展，一方面推出「517 聲明」與《反分裂國家法》等強硬措施，¹⁹ 並加強武力的準備；另一方面採取柔性的措施，包括邀請臺灣政黨領袖赴中國會談，及推出一系列對臺灣有利的經貿政策等。兩岸的安全情勢雖因此可謂錯綜複雜，但基本上趨向穩定。此外，臺海兩岸間經貿互動與人員交流的質量持續提升，不但增加了臺灣的經濟能量，而且可以培養兩岸人民和諧相處的民意基礎，對於促進兩岸透過對話及和平的方式化解歧見，有正面的功能。而胡錦濤在主政期間，不斷試圖以加強兩岸經貿發展，謀求增進兩岸關係，以為其歷史定位。從其在 2004 年新春講話表示「積極推進兩岸人員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2005 年聲稱「促進兩岸人員往來和經濟文化等領域的交流，願意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儘早恢復兩岸對話和談判」；2006 年提及「推動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恢復兩岸對話和談判」；2007 年更強調「要擴大兩岸人員往來和經貿文化交流，促進兩岸直接三通」。迄 2008 年新年賀詞中指出：「在新的一年裡，要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和現階段發展兩

¹⁹ 新華社，〈國台辦就當前兩岸關係問題發表聲明〉，2004 年 5 月 17 日，取自《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taiwan/2004-05/17/content_1472605.htm，檢索日期：2014 年 8 月 24 日；中國大陸「反分裂國家法」於 2005 年 3 月 14 日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中制定施行，其中第一條明文規定：為了反對和遏制「台獨」分裂勢力分裂國家，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而制定本法。新華社，〈受權發佈：《反分裂國家法》全文〉，2005 年 3 月 14 日，取自《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3/14/content_2694168.htm，檢索日期：2014 年 8 月 24 日。

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決不動搖，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決不放棄，貫徹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的方針決不改變，反對臺獨分裂活動決不妥協，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此段發表清楚的表達其對臺理念，以胡四點為主軸，²⁰ 涵蓋了堅持一中、和平與發展、反對臺獨。

顯然，如何進一步理解兩岸經貿關係的細緻變化以及其背後的原因？就成為本文的第三個最主要研究問題。而事實上，在兩岸軍力不對稱的結構中，什麼是造成兩岸關係變化之背後原因？此一研究問題中，潛藏著中國大陸對臺政策是否會變化？如果有其實質原因是什麼？復為另一個深層的問題，這個深層問題雖然承接自上述的二個研究問題，但實為本文最核心的研究問題。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壹、研究方法

任何研究計畫的問題應該是在現實世界中具有重要性的，且必須是能透過解釋某些事實而明確發展成為學術性文章。此外，所有假定在成為可用知識之前，都必須經過某種程度的經驗評估。²¹ 本研究主要依據新古典現實主義，假定中國大陸對臺外交政策的選擇主要受到兩岸(含美國在內)的權力結構與兩岸國內政治互動的二項因素影響。為進一步檢視假定的正確性與適用性，經驗資料的文獻蒐集成為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此部分涉及到

²⁰ 胡四點指的是 2005 年 3 月 4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前任總書記江澤民發表的江八點之後，發表了新的對台工作的四點「絕不」，包括了：第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絕不動搖；第二，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絕不放棄；第三，貫徹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的方針絕不改變；第四，反對台獨活動絕不妥協。

²¹ Gary King,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5-16.

的就是研究方法的確立。因此，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採取對現有的文獻資料、數據進行研究推論的分析、檢證，以理解中國大陸的外交政策、中國大陸對臺經貿政策與兩岸細緻的動態變化。

社會科學資料都可被蒐集且可公開取得的，不論是採用哪種方式的研究者都可以從既存的資料中搜尋與分析，再以新的方式獲得研究問題的解答。²² 文獻分析是依據特定的研究目的或課題，透過蒐集相關之國際資訊等文獻資料，掌握所要研究問題的一種方式。蒐集的內容必須具備正確性且範圍廣泛，將蒐集而來的資料經過分析、歸納及整理，以了解事件的淵源、原因、背景、影響及其意義等，²³ 故文獻資料分析是一種次級資料(secondary data)的蒐集。²⁴ 研究者使用次級資料，主要在於可以不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金錢進行分析，因此容易將研究成果推論至整體國際社會，隨著科技進步與網際網路的發達，次級資料分析也成為目前最常見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為了檢視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推論，²⁵ 以及理解中國大陸對臺經貿政策，故在資料的取得上，將以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前後時期的兩岸互動作為主要基礎。而在研究方法的選定上，主要是針對次級資料進行蒐集與分析，例如，相關之研究報告、期刊、學位論文、專書、政府出版品、報章雜誌以及政府、媒體或學術網站等。對於任何研究來說，都存在各種與之相關並足堪參考的文獻與資料存在，這些都屬於次級資料的範疇。以這些資料為基礎，在面對所欲探究的主題時，研究者可以輕易獲得初步的發展。因

²² 王佳煌、潘中道、郭俊賢、黃瑋瑩譯，Lawrence Neuman 著，《當代社會研究法》(台北：學富文化，2002年)。

²³ 董旭英、黃儀娟譯，David W. Stewart & Michael A. Kamins 著，《次級資料研究法》(台北：弘智文化，2000年)，頁24。

²⁴ 周文欽，《研究方法概論》(台北：國立空中大學，2005年)。

²⁵ 本文之研究推論將於下節次研究架構中闡述說明。

此對於研究而言，次級資料最大的優點就是節省時間並降低研究成本，甚至在某些研究上，次級資料也將成為唯一的資料來源。²⁶ 因此，在研究過程的考量上，次級資料的取得與分析，必然成為本研究的一個資料來源，而在實際資料取得的過程中，將大量擷取國內外相關文獻、資料庫數據以及政府文件，藉以發展並佐證研究分析的過程與內容。

然而，各種不同的次級資料，在文獻上可能會出現相衝突的論點，在數據的擷取上甚至可能出現相反的結果，這些同時也是次級資料本身最大的問題。²⁷ 為避免此種情況出現，本研究主要選定之資料為兩岸的官方網站，儘可能整理出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政治、經貿與軍事發展之情形，以可避免多個資料庫交叉使用下所可能造成的資料衝突問題。

透過本研究的動機與背景、研究目的與問題，藉研究架構鋪陳出本研究的基本推論，而在具體的操作上，將在研究範圍與限制章節中，對本研究命題提出說明並聚焦形成研究假設。因此，透過研究方法的說明，可以連結本研究假設、理論架構之間關係的論述，接下來則是在研究架構之後提出研究涉及之範圍與限制，以及全文之研究流程與章節安排，並從下一章節開始，即整理理論文獻、相關事實與官方資料，而後實際應用研究架構，來對研究的問題進行回應。

貳、研究架構

為了回答上述研究問題以獲得本文的研究目標，本文嘗試採

²⁶ 潘明宏譯，Chava Frankfort Nachmias & David Nachmias 著，《社會科學研究法(上冊)》(台北：韋伯，1999)，頁 382。

²⁷ 董旭英、黃儀娟譯，前引書，頁 26。

取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做為本文的研究框架。²⁸ 本文依據新古典現實主義原始之「國際結構變項」與「國內因素變項」出發，選取中國大陸「胡錦濤時期對臺之經貿政策」為本研究之依變項。首先，從「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國際結構變化」與「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國內因素變化」的二個「中國大陸單向變項」中，其次，分別推論出「胡錦濤時期兩岸結構互動變化」與「胡錦濤時期兩岸國內互動變化」二項影響兩岸關係細緻變化的「兩岸雙向變項」；最後，從兩岸結構互動變化中產生「美國在兩岸結構中的影響變化」，而另從兩岸國內互動變化中提煉出「兩岸領導人對兩岸結構的認知變化」與「兩岸政府對國內資源運用能力的變化」等三個的「美中臺互動三向變項」，²⁹ 以解釋胡錦濤時期對臺經貿政策的變化。

此外，在理解中國大陸崛起的內部因素與探究中國大陸對區域整合影響的外部動因上，雖然涉及區域整合與大國崛起發展的相關理論，然而仔細觀察這種內、外部動因的探究，事實上與國內、國際因素相呼應，而不脫離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架構。故本文對於理解兩岸經貿關係細緻變化的主要研究問題，所形成之研究架構圖，如下圖 1-1 所示：

依據圖 1-1 的研究架構，本文從「中國大陸單向變項」、「兩岸雙向變項」和「美中臺的互動變項」分類中，嘗試分別提出以下研究推論。

²⁸ 新古典現實主義係主張以國際層次的權力結構與國內層次的國內政治因素，解釋國家的外交政策，其進一步的重要論點，將於第二章中闡述。

²⁹ 文內從單向、雙向到三向的變項，係為研究架構推論順序所產生的變項分類，非屬於一般所謂層次分析中的變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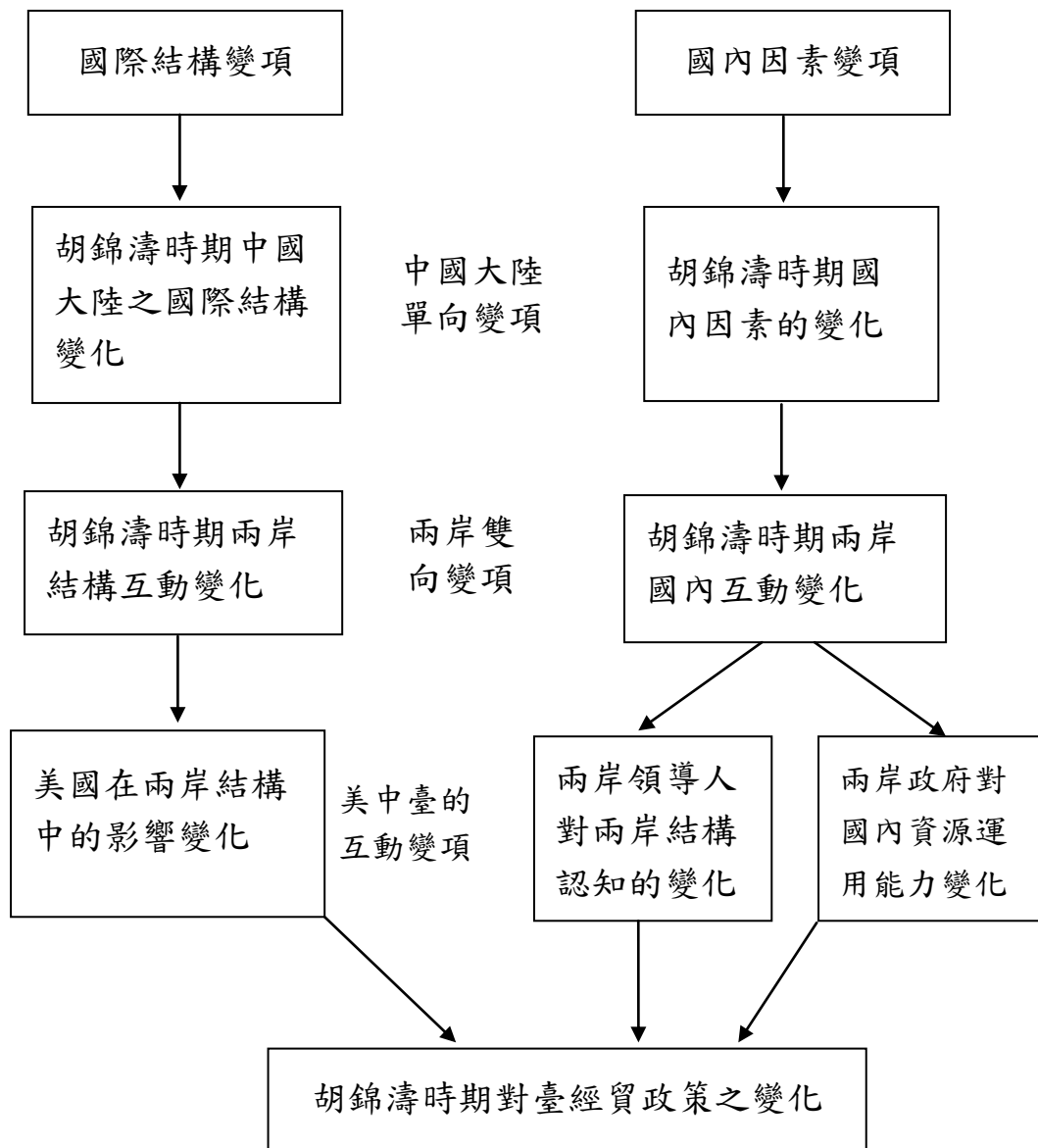


圖 1-1：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一、中國大陸單向變項

推論一：中國大陸權力結構地位愈高，兩岸愈不穩定，使中國大陸對臺經貿政策愈不利於臺灣。反之，則愈有利於臺灣。

推論二：中國大陸國內政治愈不穩定，兩岸愈不穩定，使中國大陸對臺經貿政策愈不利於臺灣。反之，則愈有利於臺灣。

二、兩岸雙向變項

推論三：兩岸權力結構之差異愈大，兩岸愈不穩定，使中國大陸對臺經貿政策愈不利於臺灣。反之，則愈有利於臺灣。

推論四：兩岸國內政治交集愈小，兩岸愈不穩定，使中國大陸對臺經貿政策愈不利於臺灣。反之，則愈有利於臺灣。

三、美中臺的互動變項

推論五：中國大陸對美(國)臺(灣)之權力結構之差異愈大，兩岸愈不穩定，使中國大陸對臺經貿政策愈不利於臺灣。反之，則愈有利於臺灣。

推論六：兩岸領導人對兩岸權力結構認知差異愈大，兩岸愈不穩定，使中國大陸對臺經貿政策愈不利於臺灣。反之，則愈有利於臺灣。

推論七：兩岸執政黨之國內政治交集愈小，兩岸愈不穩定，使中國大陸對臺經貿政策愈不利於臺灣。反之，則愈有利於臺灣。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分析層次

壹、研究範圍

研究的主題決定研究的範圍，而透過範圍的確認，再進一步建立整體的研究架構。本研究希望透過資料的蒐集與文獻分析，獲得對兩岸關係的細緻理解，並且推演出中國大陸對臺的經貿政策，由此而限縮本研究之範圍包括：

一、資料蒐集範圍

國際政治(包括兩岸關係)涉及的議題範圍廣泛，舉凡安全、經濟、文化、科技、環境等都能夠成為國與國之間、區域或全球議題。但議題之間的重要性畢竟存在先後次序，而在認定上，一般又以安全與經濟最為攸關國家之發展。因此，在資料的蒐集上，礙於時間與能力的限制，主要以經貿議題為主，其他部分則在本研究的次要討論範圍內。

二、時間範圍

本文研究時間點起自於 2002 年胡錦濤擔任中國大陸領導者，對臺灣的政策有巨大轉變，除邀請臺灣泛藍陣營訪問中國大陸，同時提出比先前政策更加開放的「胡四點」。經 2005 年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應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的邀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56 年後率領國民黨代表團第一次訪問中國大陸，2005 年中國國民黨和平之旅指出兩黨達成的五點共識：(一)在認同「九二共識」的基礎上促進恢復兩岸談判；(二)促進終止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三)促進兩岸在經貿交流和共同打擊犯罪等方面建立

合作機制，推進雙向直航、三通和農業交流；(四)促進擴大臺灣國際空間的談判；(五)建立國、共兩黨定期溝通平臺。自此延伸至 2012 年對臺灣經貿外交政策演變為止。

三、區域範圍

本文主要探討中國大陸對臺灣之經貿政策，雖然兩岸區域包含於東亞區域內，但涉及中國大陸經貿政策的東亞的其他區域，為本文的次要研究區域範圍。此外，2003 年至 2012 年胡錦濤主政期間，雖然歐洲、俄羅斯、中東、非洲與拉丁美洲均為中國大陸經貿外交對象之一，但鑑於研究能力所限，對於中國大陸對歐洲、俄羅斯、中東、非洲的經貿外交異同，將有所忽略，而僅置重點對拉丁美洲外交與經貿政策分析，藉此凸顯中國大陸對跨洲性之全球經貿外交政策的獨特性或重要性所在。

貳、分析層次

依據上述本文陳列之研究範圍的限制下，針對本文研究架構所提出的七個推論，為了分析、檢證與操作性考量，實有必要進一步予以各別檢視，並嘗試分別提出精鍊或修正的部分。

一、中國大陸單向層次

對推論一：「中國大陸權力結構地位愈高，兩岸愈不穩定，使中國大陸對臺經貿政策愈不利於臺灣。反之，則愈有利於臺灣。」而言，因為權力結構通常係指相對性的權力關係，此外，基於兩岸區域的研究範圍與相對互動的限制下，因此，絕對性的「中國大陸權力結構地位愈高」不易定義，故需予以修正，推論一才有操作性的可能。

對推論二：「中國大陸國內政治愈不穩定，兩岸愈不穩定，使中國大陸對臺經貿政策愈不利於臺灣。反之，則愈有利於臺灣。」而言，在資料蒐集與研究能力限制下，因為國內政治因素定義過於複雜與多元，因此「中國大陸國內政治」需予以進一步定義，推論二才有可能形成命題。

二、兩岸互動層次

對推論三：「兩岸權力結構之差異愈大，兩岸愈不穩定，使中國大陸對臺經貿政策愈不利於臺灣。反之，則愈有利於臺灣。」而言，雖然此命題以指出兩岸權力結構的相對性定義，但從實際上初步觀察，可能會因為兩岸權力結構的相對差異過大，而形成給定的固定因素，因此，單純的考慮推論三，並不足以形成完整的有效研究命題。

對推論四：「兩岸國內政治交集愈小，兩岸愈不穩定，使中國大陸對臺經貿政策愈不利於臺灣。反之，則愈有利於臺灣。」而言，因與命題二具同樣的限制，因此「兩岸國內政治交集」同樣需予以進一步重新定義，顯然，推論四的操作可能性亦不高。

三、美中臺的互動層次

對推論五：「中國大陸對美(國)臺(灣)之權力結構之差異愈大，兩岸愈不穩定，使中國大陸對臺經貿政策愈不利於臺灣。反之，則愈有利於臺灣。」而言，相較於上述推論三，推論五因為美國的加入，雖然可能使兩岸權力結構的相對差異不會過大，不會造成給定情況，但物質權力結構的內容必須進一步修正，例如，以各方的國防預算予以精鍊後，推論五具有操作的可能而形成命題。

對推論六：「兩岸領導人對兩岸權力結構認知差異愈大，兩岸愈不穩定，使中國大陸對臺經貿政策愈不利於臺灣。反之，則愈有利於臺灣。」而言，因為兩岸領導人的認知差異標的不清，需要進一步澄清，推論六才有精煉的可能。例如，對美國權力是否加入兩岸計算，做為兩岸領導人認知差異的評判標準。因此，推論六亦具有操作的可能而形成命題。

對推論七：「兩岸執政黨之國內政治交集愈小，兩岸愈不穩定，使中國大陸對臺經貿政策愈不利於臺灣。反之，則愈有利於臺灣。」而言，推論七係政府基於國內資源運用能力所導出，故為了提升命題的操作性，兩岸執政黨之國內政治交集應指兩岸國會議員所佔比率的加成。

最後，關於命題中中國大陸對臺經貿政策的利或不利，即中國大陸對臺經貿政策的依變項，可以指中國大陸對臺經貿利益的讓與程度，或以中國大陸同意與臺灣經貿合作之協議項數、互動次數，以進一步精煉推論五、六、七。

第五節 研究章節安排

本研究基於內容鋪陳與撰寫需要計分成六章、二十六節，各章節安排與概要說明，除第一章緒論如前所述外，餘各章節次概述如下：

第二章：相關理論文獻探討，本文的研究架構雖然源自於新古典現實主義的邏輯，但其中部分重要的概念並非新古典現實主義所專屬。因此，實有必要對這些核心概念作綜合性的理論文獻探討，如此除了能彰顯學術研究的積累效果外，並可再綜整和強調這些理論文獻的重要性。這些核心概念至少包括：第一節「新古典現實主義一般概念」；第二節「單一國家行為者與無政府狀態」；第三節「結構限制與國內政治因素」；第四節「國際結構和國內層次的動態作用」和第五節「區域經濟整合與大國崛起」等五個節次部份。本章除了說明本文新古典現實主義研究架構的根源外，亦嘗試鋪陳第三章「中國大陸國內發展歷程」與第四章「中國大陸崛起後對外經貿政策」的立論依據。

第三章：中國大陸國內發展歷程，本章係針對近代以來中國大陸國內政經發展的概況做進一步的文獻回顧與資料探索，除了可以進一步理解中國大陸發展的歷程外，並逐步建立起本文研究資料文獻的基礎。節次包括：第一節，國內發展的限制根源；第二節，國內發展的思想根源；第三節，鄧小平時期之政經體制改革；第四節，江澤民時期之中國市場經濟；第五節，胡錦濤時期之深化穩定政經政策等五個節次。

第四章：中國大陸崛起後對外經貿政策，本章係針對中國大陸崛起後對外經貿政策的概況，並從跨洲性的區域範圍，逐漸縮

小至亞太區域和東亞區域，做進一步的文獻回顧與資料探索，以做為本研究主題的基礎，即中國大陸胡錦濤時期對臺經貿政策研究的背景環境。節次包括：第一節，中國大陸的崛起；第二節，對跨洲區域經貿政策；第三節，對亞太區域經貿政策；以及第四節，東亞區域經貿政策等四個節次。

第五章：中國大陸對臺經貿政策分析，為了分析和理解中國大陸胡錦濤時期的十年間對臺經貿政策的作為，本文在此十年間劃分為三個時期，其中第一分析時期為胡錦濤剛上任初期的前二年，此一時期約是臺灣第一次政黨輪替民進黨陳水扁政府第一任期的後二年；第二分析時期約為臺灣陳水扁政府第二任期的四年；第三分析時期約為臺灣第二次政黨輪替國民黨馬英九政府第一任期的四年。本章節次依據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架構分析，概分包括：第一節，胡錦濤時期之兩岸結構變化；第二節，兩岸國內政治的變化；第三節，美國因素的兩岸結構認知變化；以及第四節，兩岸經貿互動結果與分析，因本節次為本文分析的核心，故歸納出小結論，以利讀者閱讀理解與彰顯節次的重要性。

最後第六章：結論，本研究的核心邏輯在於從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架構建立，到對胡錦濤時期對臺經貿政策結果的檢證，進而期望對新古典現實主義能得到進一步理解，此外，對於理解中國大陸崛起的內部因素與探究中國大陸對區域整合影響的外部動因上，也得到進一步印證。這樣的思維脈絡事實上係從理論層面貫穿到實務層面，因此，對於本研究的結論，將從理論層面、實務層面提出本研究的發現與貢獻。另外，在臺灣面對中國大陸的經貿政策作為上，從國內政治層面與國際結構層面提出臺灣應有之策略思維與作為。最後，總結本論文與提出後續努力與未來研究方向。綜整本研究步驟與流程，如下圖 1-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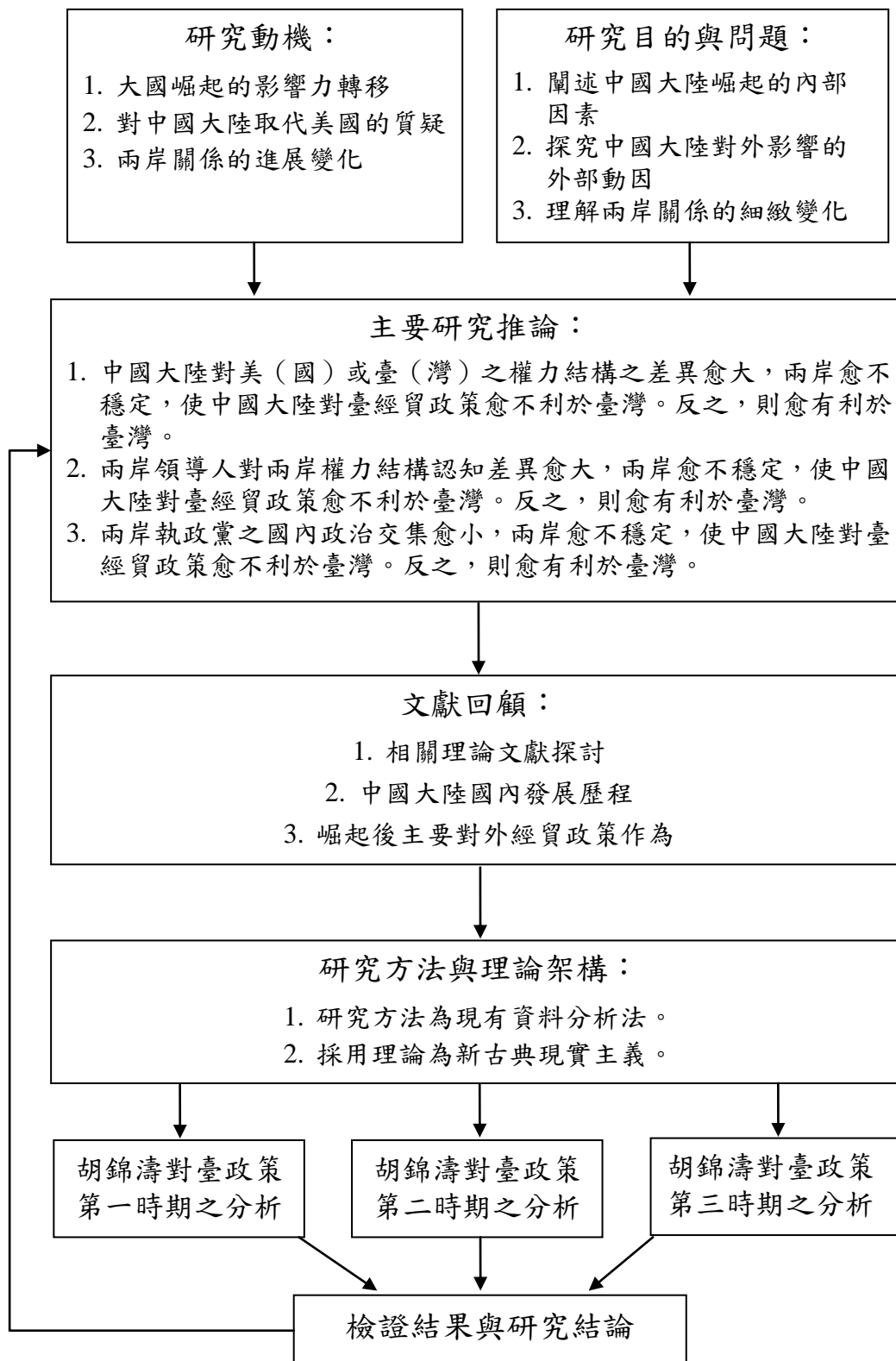


圖 1-2：研究步驟與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第二章 相關理論文獻回顧

第一節 新古典現實主義一般概念

新古典現實主義是現實主義後期衍伸出的理論，其主要是積極的為現實主義辯護，所以它在現實主義的理論中，極具包容性和採取中間路線的特色，因此能和現實主義學派下的諸理論，及後冷戰時期多變的國際外交環境共存。³⁰ 新古典現實主義強調單位行為體的層次分析，但是並不否認國際體系結構的重要性，同時也接受無政府狀態的假設，但認為屬於不確定的狀態，是否會形成衝突或是合作，需視當時國家間關係與外交政策行為而定，³¹ 更希望透過研究國家內部因素來解釋國家行為。

新古典現實主義分析外交政策亦是以權力為基礎，權力是決定國家行動的基礎，但卻認為權力本身並無法直接及於外交政策行為，必須透過決策者與國內政治的「承接傳送」，所以外交政策行為並無法排除決策者與國內政治的影響力。³² 因此，除了國際權力的分配、國家相對能力的改變因素外，決策者的認知、單一事件的衝擊影響、國內政黨、政府能力及國家經濟等，均為新古典現實主義所注意的關鍵要項。

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國際權力分配是影響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權力分配是主導國際關係運作的核心力量，但是新古典現實主義不會特別強調國際體系的權力分配，較關切的是「相對權力」

³⁰ 鄭端耀，〈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問題與研究》，第44卷第1期（2005年1、2月），頁124。

³¹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October 1998), p. 171.

³² 鄭端耀，前引文，頁125。

一國家之間的權力分配關係。³³ 當一國的相對權力增加時，該國的外交活動與企圖心也會隨之增加；反之，則會減少。若一國執意以決策者自我價值與國內政治因素來決定外交政策而不管國際權力結構的話，則會造成國家災難。³⁴

新古典現實主義亦強調外交政策是由決策者制定，決策者對國際權力分配的認知(perception)可決定國家外交政策。³⁵ 當國家相對權力增加時，對外行動能力也會增加，但這並非是自動化過程，國家權力能否轉化為國際行動力量，取決於國內政治結構，特別是政府能力(state power)方面，³⁶ 即國家權力增長並不代表政府能力增強，如果政府的能力有所限制，無法運用國家權力於對外政策行動，則無法反映出國際權力分配的影響力，但是卻能夠反映出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作用。

根據上述，我們可以看出新古典現實主義強調國家外交政策行動同時受到國際體系與國內政治的影響，而國內因素包含決策者認知、國內政治結構與國家利益等。就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觀點而言：首先，國際權力分配是影響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國家之間的「相對權力」是主導國際關係運作的核心力量。權力分配雖然是決定外交政策行為的最主要力量，但卻存在相當的限制，無法有效解釋實際的外交政策行為。其次，外交政策是由決策者制定，決策者的國際權力分配之認知(perception)可決定國家外交政

³³ Randall Schweller, "The Progressiveness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ppraising the Fiel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2003), pp. 317-318.

³⁴ Gideon Rose, *op. cit.*, p. 167.

³⁵ Randal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2 (Fall 2004), pp. 168-173; Daniel L. Byman and Kenneth M. Pollack, "Let Us Praise Great Man: Bringing the Statesman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 (Spring 2001), pp. 107-146.

³⁶ national power 與 state power 是不同的，前者是指國家整體的權力或能力，而後者則是指政府能力，是指政府所代表擁有的國家政治權力或能力，且為新古典現實主義常使用的概念。

策。因此，本文採取新古典現實主義做為本文的研究途徑，從國際層次的國際權力結構以及屬國內層次的領導人認知、觀點與政策主張兩個面向來分析中國大陸在和平崛起後，對臺灣政策的發展與變遷。

此外，本文的研究架構雖然源自於新古典現實主義的邏輯，但其中部分重要的概念並非新古典現實主義所專屬。因此，實有必要對這些核心概念作綜合性的理論文獻探討，如此除了能彰顯學術研究的積累效果外，並可再綜整和強調這些理論文獻的重要性。這些核心概念至少包括：「單一國家行為者與無政府狀態」、「國際結構的限制」、「國內政治的因素」和「國際結構和國內層次的動態作用」，各分列節次闡述如下。

第二節 國家行為者與無政府狀態

西元 1648 年歐洲「西發里亞合約」(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之後，世界上至少確立了二個原則，一是結束了自古希臘以來的城邦政治，取而代之的是民族國家的出現；二是國際體系缺乏世界最高權威下，無政府狀態的形成。近代以來各不同派別國際關係理論都承認這二項基本原則，當然也包括新古典現實主義在內，可以說單一國家行為者(state-as-unitary-actor)與無政府狀態(anarchy)，是所有國際關係理論的最大公約數。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對此二項原則有所不同意者，主要在於對其內容成份的爭辯。³⁷ 例如，在 Waltz 的國際政治理論中，就是將國家視為具有同類功能能動性(agency)之單元特徵的能動者(agent)，而無政府狀

³⁷ 莫大華，〈國際關係理論大辯論研究的評析〉，《問題與研究》，第 30 卷第 12 期（2000 年 12 月），頁 65-90。

態就是一種通稱的國際體系(system)。³⁸ 本文為了能充分運用此二者概念於分析架構中，有必要進一步說明如下。

壹、單一國家行為者

一般對單一國家行為者常將其視為理性行為者。依據早期結構現實主義理論者對「理性概念」區分為二派：一派認為一個理性的國家不會去發動戰爭，美國總統 Woodrow Wilson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建立的國際聯盟，就是因為當時人們不瞭解現實，失去理性而造成國家間殘酷戰爭。另一派則認為一個理性的國家，會先去衡量計算偏好，戰爭對我之利弊得失影響。³⁹ 很明顯的，第二派理性的選擇較符合當代結構現實主義者所講的理性，也接近以利益為核心考量並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economic man)定義。⁴⁰ 是以國家利益應從完全「理性」角度思考，而國家在制定經貿外交政策時必然以利益為主要考慮，然後國家在制定經貿外交政策時才不會發生偏差，⁴¹ 但如從權力政治或安全秩序的面向來看，其角度思考卻不完全相同。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者基本上同意國家的目標是追求國家利益與國際影響力，在無政府狀態的不確定環境下，國家應塑造有利於本身的環境，但國家是否均為完全理性的單一國家則有待商榷。

這種因為經濟人的完全理性假定，類推在國際關係領域，使得結構現實主義者將單一國家行為者，視為「同一」國家行為者，這種「同一」的國家行為體，就如同「撞球模式」(snooker-ball model) 中的各球體一般，各國家行為者就像在撞球檯上的每一顆小球，

³⁸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Press, 1979), pp. 93-97.

³⁹ 石之瑜，〈結構現實主義國際政治學的知識脈絡〉，《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7 期（2000 年 7 月），頁 43-44。

⁴⁰ Waltz, 1979, op. cit., pp. 89-90.

⁴¹ 林碧炤，〈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3），頁 295。

從外表上看來每顆小球體的重量、形狀相同，⁴² 所不同的只是每顆小球的不同顏色代表著每個不同國家的名稱而已。然而，這種僅從客觀不變性考量的理性國家行為者，仍受到部分學者的批評而再提出國家主觀偏好不定性的考量予以補充。

一、國家客觀偏好的不變性

依據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的觀點，⁴³ 國家行為者的偏好皆須遵循三個定理，分別是「完全性」(completeness)、「遞移性」(transitiveness)和「反身性」(reflexiveness)。⁴⁴ 換言之，在某一客觀標準或情境下，所有國家行為者的偏好都是給定的，然後各國家行為者在給定的偏好下，進行各自利益最大化的策略互動，就如同每一種賽局形式都有特定給定的情境故事。⁴⁵ 因此，當國家行為者的偏好給定時，就已經決定了策略均衡(equilibrium)或策略互動的結果。⁴⁶ 事實上，這種觀點是理性主義的產物，Ruggie(1998)稱理性主義是結合了物質利益與偏好結構的新功利主義

⁴² 撞球模式另隱喻每顆小球背後都有個政府代理人的玩家，在施展某種自主性的行動力量，但自主性的運作受限於他球，即其他國家行為者的位置與行動力。依此模式延伸，白球即代表行動力最大的強權國家。請參閱：John W. Burton, *World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27-31.

⁴³ 一般在政治、經濟領域中也將賽局理論、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社會選擇理論(social choice theory)和實證政治理論(positive political choice theory)類稱為理性抉擇理論，惟其指涉有限範圍的研究領域或研究方法，請參閱：謝復生，〈理性抉擇理論的回顧與前瞻〉，收錄於何思因、吳玉山編，《邁入廿一世紀的政治學》，(臺北：中國政治學會出版，2000年)，頁141-148；鄧方，《賽局理論與經濟模型》(David M. Kreps 原著)(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頁3-4。

⁴⁴ James D. Morrow, *Game Theory for Political Scientist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7-23.

⁴⁵ Carol M. Rose, "Game Stories," *Faculty Scholarship Series*, Paper 1728(2010), retrieved 22 December 2012, from http://digitalcommons.law.yale.edu/fss_papers/172.

⁴⁶ 這種策略均衡就是一種「納許均衡」(Nash equilibrium)，其定義如下：若某一賽局收益結構中存在一組策略組合，如果某一行為體策略不改變下，其他行為體也都不改變的理性最適反應的策略組合，即稱之為納許均衡(Nash equilibrium)，其數學表示如下：A pair of strategies S_i and s_j forms a Nash equilibrium iff the strategies are best replies to each other. Alternatively, a pair of strategies forms a Nash equilibrium iff $M_1(S_i; s_j) \geq M_1(S; s_j)$ for all $S \neq S_i$ and $M_2(S_i; s_j) \geq M_2(S_i; s)$ for all $s \neq s_j$. Cf.: James D. Morrow, *Game Theory for Political Scientist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79-80; Joel Watson, *Strategy: An Introduction to Game Theory*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 Press, 2002), pp. 82-83.

(neo-utilitarianism)，⁴⁷ 其所強調的就是對物質利益的客觀偏好的給定性。

二、國家主觀偏好的不定性

在國際關係領域研究的部分學者甚至認為，對於理性選擇的主要假定過於單薄。⁴⁸ 因此，相對於客觀偏好的給定原則，採納認知途徑者認為理性有限(bounded rationality)，⁴⁹ 因此，國家主觀偏好的不定性主要表現在認知或知識的轉化，著重在不完全理性的理念因素。⁵⁰ 這種強調理念變項的研究，在知識導向的建制理論中已嘗試運用，他們採弱認知(weak cognition)變項的「觀念、學習或知識社群」或以強認知(strong cognition)變項的「合法／嵌入規範」，對合作需求提出解釋。⁵¹ 理念的部分概念也來自於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的哲學思想，主張非價值中立，強調外在於國家個體的國際社會因素，例如，共同規範、共同價值以維繫國際秩序。因此，英國學派學者就認為，國家應該具備某種信任度，使國際無政府狀態中能維持最基本的國際秩序。⁵² 換言之，主觀上影響國際合作的理念認知，來自開放性國際社會跨國精英網絡的

⁴⁷ John Gerard Ruggie,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Autumn 1998), pp. 862-865.

⁴⁸ Miles Kahler, "Rationa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Peter J. Katzenstein, Robert O. Keohane, and Stephen D. Krasner eds., *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9), pp. 284-286.

⁴⁹ Herbert A. Simon, "A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 *The Quarterly of Economics*, Vol. 9, No. 1 (February 1955), pp. 106-110; 岳超源，〈《決策理論與方法》〉(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140-143。

⁵⁰ 本文對非理性、非完全理性的定義，一般係指對效用最大化的任何偏離，請參閱：姚震宇，〈《理性、權力與經濟繁榮：奧爾森經濟增長思想研究》〉(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127-132。

⁵¹ Andreas Hasenclever, 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39-157. 袁易，〈《中國遵循國際導彈建制的解析：一個社會建構論的觀點》〉(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頁46-54。另外「利益與身份」變項的分析，亦可視為一種「利益與認知」變項相結合的分析途徑，請參閱：袁易，〈「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之再審視」：一個權力政治與身份政治的解析〉，《問題與研究》，第44卷第4期(2005年8月)，頁114-117。

⁵² 陳志端等，〈《開放的國際社會：國際關係研究中的英國學派》〉(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7-18。

散佈，形塑了行為者的知覺、信任、期望和偏好，⁵³ 決策者透過簡單學習和複雜學習的兩種過程，為了獲得認知一貫性會重新界定國家利益、確立新目標，並選擇適合的策略，最後形成新的偏好與均衡，⁵⁴ 此即為國家主觀偏好不定性的意涵。因此，本文的研究架構，對於國家行為者的概念，除了包含國家客觀偏好的不變性，尚含有國家主觀偏好不定性的意涵。

貳、無政府狀態邏輯

無政府狀態邏輯係對世界上尚無存在任一最高權威事實的承認，對 Waltz 的國際政治理論而言，他認為目前國際政治體系就是無政府狀態，它是由結構以及互動單位所組成，結構涵蓋整個體系，並使體系能被視為整體。⁵⁵ 要撼動國際政治體系的運作，其變遷必須發生在體系本身，體系之內的變遷都只是結構或單位層面的改變。例如，傳播工具與戰爭方式的改變，其影響的是單位層面；冷戰後從二極轉變為單極，則是結構層面的轉變，這些都不是體系本身的變遷。如果是體系本身出現變化，意謂我們所認知的國際政治將不再是國際政治，而過去的國際政治發展也不再能延伸到未來。⁵⁶ 因此，體系本身雖然可能發生改變，但其影響甚鉅，且發生條件與機會有限，而截至目前可見的變化，都屬體系內部層面，也就是結構或單元層次的變遷。

此外，無政府狀態並非表示國際始終處於混亂衝突的局面，

⁵³ Peter M. Haas,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the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in Volker Rittberger and Peter Mayer, eds.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78-179.

⁵⁴ Joseph S. Nye, "Nuclear Learning and U.S.-Soviet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3(Summer 1987), pp. 378-382; John T. Rourk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n the World Stage* (New York: McGraw-Hill Companies Press, 2003), pp. 132-135.

⁵⁵ Waltz, 1979, op. cit., p. 79.

⁵⁶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Summer 2000), pp. 5-6.

故結構現實主義提出權力平衡的重要概念，但對於此概念的理解，卻衍生至少二種不同類別的認識，而且都是源自 Waltz 的論述當中。其一是將權力平衡視為一種狀態(balance)，另一個則是一種動作(balancing)。從狀態的層面來看，權力平衡的出現條件是國際秩序的無政府狀態，以及國家對於生存的慾望。⁵⁷ 這種權力平衡的狀態會重複形成，各國傾向於模仿其他行為者的成功政策。⁵⁸ 權力平衡並非出現後就將持續存在，但平衡一旦打破，將再透過其他方式恢復，並不斷重複出現。⁵⁹ 而這種權力平衡的狀態，可進一步用來解釋國家在既定條件下的行動結果。⁶⁰ 甚至於，權力平衡也會影響到國家對於國際體系變遷的認知。國家想要改變國際結構的動機，強烈受到分配內部成本與效益的社會機制所影響，另一個就是組織上、經濟上、軍事上或科技上較其他國家具有相對優勢，也就是權力平衡狀況是有利的情況下，國家才會試圖改變結構。⁶¹ 從這些論述中可以瞭解，權力平衡是一種狀態，並影響到單位，也就是國家的行為。對於新古典現實主義者而言，雖然接受國際無政府狀態存在的客觀事實，卻對於 Waltz 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自助原則(self-help)和聯盟原則(ally)的特徵，實有再補充的必要並簡述如下。

一、客觀事實的不同特徵

結構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研究起點都是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承認無政府狀態是國際體系的基本特徵。這個特徵又衍伸出三個基本假定。首先，無政府狀態是給定因素，「客觀存在」於國際體系之中，是凌駕於體系中行為體之上的無形之手。其次，

⁵⁷ Waltz, 1979, op. cit., p. 121.

⁵⁸ Waltz, 1979, op. cit., p. 124.

⁵⁹ Waltz, 1979, op. cit., p. 128.

⁶⁰ Waltz, 1979, op. cit., p. 117.

⁶¹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53-55.

由於無政府狀態是國際體系恆久的基本特徵，所以，國際關係的研究，尤其是國際關係體系理論，必然要以無政府狀態為研究起點。然而，Waltz 討論的權力平衡和兩極結構係強調無政府狀態的制衡作用，而 Robert O. Keohane 探討的是國際制度對無政府狀態的削弱作用，⁶² 強調無政府狀態國家行為者之間合作的可能。兩種國際關係研究雖然都以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特徵為切入點，卻存在不同的客觀事實特徵。⁶³

二、主觀文化認同的差異

建構主義者認為無政府狀態是這樣建構起來的一種文化，實際上，無政府狀態是一種國際體系，是國際體系中能動者互動的結果。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將不會存在一個單一的、以每個人反對每個人的戰爭為基本特徵的無政府邏輯。根據國家之間互動性質的不同，可能存在多種無政府文化。Alexander Wendt 歸納了三種不同的國際體系無政府文化，即霍布斯無政府文化(Hobbesian anarchy culture)、洛克無政府文化(Lockean anarchy culture)、康德無政府文化(Kantian anarchy culture)。⁶⁴ 首先，霍布斯無政府文化的邏輯，即以相互敵視、相互殘殺為特徵的無政府狀態，這是國家互存敵意、互為敵人的無政府文化。如果國家間關係的目的就是摧毀和吞併對方，國家之間的行為特徵是各方力圖改變現狀，那麼這些國家之間的實踐活動必然會導致霍布斯文化，例如，冷戰期間的美、蘇敵對的深層對抗。其次，在洛克文化中，國家不再相互視為仇敵，不以消滅敵人為基本目的，它們承認相互的生

⁶²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9), pp. 6-9.

⁶³ 秦亞青，〈國際政治的社會建構—溫特及其建構主義國際政治理論〉，《美歐季刊》，第 15 卷第 2 期（2001 年夏季號），頁 231-264。

⁶⁴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46-307.

存權利和財產權利，國家之間的主要關係是競爭者之間的關係，例如，從 1648 年至今，典型的標誌就是西發里亞體系對國家主權的相互確認。國家，尤其是弱小國家的低死亡率說明洛克文化是當今無政府狀態的主導文化。最後，康德文化則是以國家之間互為朋友為基本特徵的體系文化，在這樣的文化體系中，國家不會使用暴力解決利益衝突，如果作為朋友的一方受到威脅，另一方會鼎力相助，並不計較自己的得失，這實際上是安全共同體的形式，例如，日本和西歐很多國家願意把安全保衛的任務委託給美國及其領導的北約。顯然，雖然霍布斯、洛克、康德文化都是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的文化形態，但其文化內涵截然不同，故不存在一個單一特徵的無政府邏輯。至於哪一種文化佔據主導地位則要看國家怎樣通過自己進行的文化認同建構了。這就是溫特著名的論斷：「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就的(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⁶⁵因此，在本文之研究架構中，雖然也採用兩岸關係中無最高權威政府的事實存在，但對於雙方的國內政治文化也將有所考量。

第三節 結構限制與國內政治因素

壹、國際結構的限制

如果說無政府狀態是一種國際體系的通稱，那國際結構就是不同時間下國際體系的狀態，換言之，國際結構就是不同時間下的國際環境狀態。這樣說來，人們必然進一步想追問，國際結構的內涵是什麼？而其作用為何？依據 Waltz 國際政治理論對結構

⁶⁵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No.2 (Spring 1992), pp. 391-425.

定義如下：第一，根據體系是一種秩序原則，如果秩序原則改變，則體系就被轉換，從無政府狀態變成等級結構時，就是一種體系轉換；第二，如果單元(國家)的功能被不同定義和配置，等級結構就會改變；第三，當單元(國家)的能力(capabilities)配置改變時，就是結構的改變，不論這時的體系是無政府狀態還是等級結構。⁶⁶ 據此，國際結構的核心內涵和作用，就是國家能力或權力產生的結果。

為了進一步說明體系或結構的變遷，Robert Gilpin 以結構現實主義為基礎，將國家的權力具體化為物質實力，並界定為國家的軍事、經濟與科技能力。⁶⁷ 在解釋結構的變遷上，則是從成本與效益的概念出發，將國際結構的變遷視為是利益考量的結果。認為在國家發展的進程中，面對潛在的獲利與損失，都將出現試圖改變國際結構的可能性。因為獲利一方會考量到長期利益將超越短期成本，而長期損失的一方則是面臨持續發展所造成的損失將威脅到現況所帶來的利益，當中衡量的依據，就是經濟、軍事及科技這些實際能力。⁶⁸ 因此，國家之間權力的變化，對結構現實主義而言是影響國際結構穩定的決定因素。

然而，對於結構現實主義關於體系或結構的論點，仍存有爭議。例如從 Robert Keohane 的解讀來看，結構現實主義中的每個政治體系，都有其各自的結構，而結構的性質取決於單位對利益的認知，因此在諸如軍事力量等利益不再是絕對優先的情況下，政治體系將隨著議題與影響的結果，出現各種不同的結構。⁶⁹ 類

⁶⁶ Waltz, 1979, op. cit., pp. 100-101.

⁶⁷ Gilpin, 1981, op. cit., p. 13.

⁶⁸ Gilpin, 1981, op. cit., pp. 52-54.

⁶⁹ Robert O. Keohane,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Structural Realism and Beyond," in Paul R. Viotti and Mark V. Kauppi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Pluralism, Globalism, and Beyond*

似的觀點，Buzan 認為結構現實主義只關注於國際政治的結構部分，並欠缺對於結構的明確定義，也無法說明國際體系當中各種結構因素與其所稱結構之關係。⁷⁰ 此外，Ruggieu 也認為 Waltz 對於結構的認知過於狹隘，且過於突顯結構對國家行為者單向的影響，而忽視到國家行為者改變結構的可能。⁷¹ 因此，對於上述的國際結構概念，新古典現實主義雖然同意國家的權力在國際層次上發揮最重要的影響，但對於國家權力所形塑而成國際結構的限制因素，則需要做進一步的補充說明。因此，「大國領導的結構」與「集體行動的能動者」係本文增加說明的二個要項，其中「大國領導的結構」的部分將併入本章第五節中補充說明。

貳、集體行動的能動者特質

不同於霸權領導或宰制的觀點，部分學者認為霸權作用的兩個基本條件是不易維持的，不論是「能力」或「意願」，任一條件的不存在都將使霸權的影響消退。Duncan Snidal 對 Robert Keohane 「霸權穩定理論」(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提出不同的觀點，⁷² 他認為依據「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的困境，大國提供公共財有其限制，並認為當霸權消退之後，大國在經過「成本」—「效益」的計算之後，⁷³ 仍會主張互惠降低關稅的自由貿易體系，繼續維持國際體系的平衡。顯然，在國際體系中，霸權消退之後將由集體行動所取代。Robert Keohane 進一步指出，如果霸權消退

(Boston, MA: Prentice Hall Press, 1988), pp. 169-170.

⁷⁰ Barry Buzan,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5.

⁷¹ John Gerard Ruggie,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Polity,"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49-151.

⁷² 霸權穩定論主要由 Keohane 提出。請參閱：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而 Snidal 對霸權穩定論修正的完整觀點，請參見：Duncan Snidal, "The Limits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9, No. 4 (Autumn 1985), pp. 579-582.

⁷³ Arthur A. Stein, "The Hegemony's Dilemma: Great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8, No. 2 (Spring 1984), pp. 383-386.

後而沒有大國出來維持國際體系的穩定或均衡，就需要某種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的運作維持。⁷⁴ 另外，他還認為國際秩序的構建、維持所應遵循的制度，主要受到規則和國際建制因素的制約，一旦規則、規範的結構獲得確認，即形成社會結構，可對國際之間國家行為者產生集體制約功能的作用。⁷⁵ 綜合言之，集體合作的作用在以「協作」(collaboration)獲得「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s)，或以「協調」(coordination)避開「共同厭惡」(common aversions)。⁷⁶ 不論是協作或協調，其所強調的都是各個單元或能動者之間具有同類功能的「能動性」特徵。換言之，霸權消退之後的集體行動，其所面臨預期不一致的「協調」和「協作」問題，⁷⁷ 已不再完全由霸權國領導或權力宰制的結構，取而代之的是強調國家行為者之間的策略互動。

參、國內政治因素

對於結構現實主義而言，即所謂新現實主義者(neorealism)視角，⁷⁸ 以及由現實主義所衍生的學派，包括：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等的觀點中，⁷⁹

⁷⁴ Robert O. Keohane, *op. cit.*, pp. 49-60.

⁷⁵ *Ibid.*, pp. 75-77.

⁷⁶ Arthur A. Stein, "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 Regimes in an Anarchic Wor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International Regimes (Spring 1982), pp. 304-312; Robert Keohane,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Toward a European-American Research Programme," in Volker Rittberger and Peter Mayer eds.,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38-41.

⁷⁷ 張維迎，《博弈與社會》(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1-12。

⁷⁸ 結構現實主義或新現實主義的重要讀本是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ress, 1979)，對其批判的著作包括：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Barry Buzan et al.,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⁷⁹ 有學者將攻勢現實主義替換為悲觀結構，將守勢現實主義替換為樂觀結構，請參閱：Robert G. Kaufman, "A Two-Level Interaction: Structure, Stable Liberal Democracy, and U.S. Grand Strategy," *Security Studies*, Vol. 3, No. 4 (Summer 1994), p. 683; 攻勢和守勢現實主義皆嘗試解釋外交政策行為，請參閱：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1-12; John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Michael E. Brown,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The Perils of*

他們幾乎將國內政治因素視為一種黑盒子。這些現實主義的學派們，一方面認為國際結構已足以決定國際政治的結果，一方面認為國內政治因素包括政黨、民意、媒體、官僚政治、立法和行政部門關係、政治文化、利益團體、政府和政治形式，以及政府強弱的區分等，⁸⁰ 因涉及較複雜、較廣泛的解釋因素，故將國內政治因素視為給定的。

依據國內政治(*Innenpolitik*)理論的觀點，他們強調在外交政策上國內因素的影響，⁸¹ 並認為如果像攻勢現實主義(或謂侵略性現實主義)完全捨棄國內政治的邏輯，僅主張結構因素的主導地位，或如守勢現實主義的國內、外因素界線不明顯，而忽略國內政治因素，明顯上均與事實不符。然而，在強調理論簡約的原則上，本文架構認為在遵循結構現實主義以「結構」和「單元」的分類邏輯上，在國內層次上也應至少包括「國內政治結構」與「領導人認知」二項因素，進一步說明如下：

一、國內政治結構因素

國內政治結構意義在說明國內政府運用資源的能力，這種運用能力程度代表國內政府權力的大小，即所謂強政府和弱政府的區分。從真實的世界上看來，國際結構權力的分佈僅能解釋國際政治最後結果，對於個別國家的行為差異的解釋是欠缺的，因此，國際結構權力的分析觀點尚須考慮政府吸取和主導其社會資源的能力，事實上，這種觀點常包含於國際關係理論的變項中，使國

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5), pp. 332-376.

⁸⁰ Jennifer Sterling-Folker, "Realist Environment, Liberal Process, and Domestic-Level Variable," Vol. 41, No. 1,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March 1997), pp. 1-25.

⁸¹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Vol. 51, No. 1, *World Politics* (October 1998), pp. 146-147.

內政治結構變項也慣常性的出現在其他政治科學的次領域中。⁸²

例如，以美國為例，美國內戰後幾十年開始出現了一段很長時間的物質資源成長。但國家權力在弱政府，即去中央化、擴散和分權之下蟄伏著。美國總統與其政府幕僚一直嘗試著取扭轉國家權力以提升對外影響，但在大聯邦政府結構和小中央組織下主政，廣泛說來卻不易從聯邦政府或社會獲得人才與資金。在 1880 年代和 1890 年代標示著現代美國政府的開始，主要結合由工業化產生的國內壓力。這種政府結構的轉換與國家權力的繼續增長相輔相成，在 1890 年代中期，執政團隊能夠疏通國會或壓迫國會以擴展美國對外利益。⁸³ 而即使美國變成可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後，美國擴大影響力的部分機會仍受限於國內政治的權力結構，甚至當這種影響力後來變得有效之際，其影響力仍落後於歐洲的對手。因此，對於一個政治科學家而言，從相對比較的觀點，觀察國家的權力和擴張，就會出現一個令人更困惑的問題是為什麼美國不能擴張更大。⁸⁴

此外，國內政治結構概念亦可比照 Christensen 所提出的「國家政治權力」的概念，他定義為「在安全政策倡議之後，政府領導人動員國家人力和物質資源的能力」。⁸⁵ Christensen 認為，因為美、中政治家缺乏足夠的「國家政治權力」去做他們喜歡做的，

⁸² 如同 Zakaria 指出 Charles Tilly 的警語：「戰爭成就國內政府，國內政府造成戰爭」，請參閱：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9-40; Charles Tilly,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42; 一些國內政治理論的特性也同樣強調在政府結構的角色，請參閱：Matthew Evangelista, "Domestic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Change," in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ed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7), pp. 166-167.

⁸³ Zakaria, 1998, op. cit., pp. 10-11.

⁸⁴ Zakaria, 1998, op. cit., p. 5.

⁸⁵ Thomas J.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44-245.

所以他們必須在次要領域(與對方衝突)運用國內具民意卻不必要的政策，以掩護在主要領域(對抗蘇聯的動員)使用不具民意卻必要的政策。例如，美國杜魯門總統在 1947 年和中共毛澤東在 1958 年，都決定圍繞著長期戰略動員國家以回應這些變化。在此二案例中，發現和平時期，因為策略採取需要明顯的民眾犧牲，所以領導者在推介策略給各自民眾時將會遇到困難。與其他國家短期衝突的運作或擴展，雖然不是在滿意的國際和國內基礎上，但在獲取和維持公眾支持，以支持大戰略核心將變得更有效用。⁸⁶

二、領導人認知因素

國內政治因素除了國內政治結構的權力影響外，尚應包含最基本單元因素的國家領導人的認知因素。簡言之，國家領導人的認知意義在於對國家內、外權力大小的認知，以至於產生國家對外交政策影響的變化，畢竟，國家領導人對國際結構認知的不同，將造成他是否改變現狀的意願。事實上，學術界、理論界較少學者討論個性、心理或廣義上人性對外交或國際關係的影響，然而，國際關係中的個人卻確實存在。包括領導人的個性和一般人的心理，對各國外交的形塑和國際政治的形成，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國際關係初看混沌不清、充滿偶然性與不確定性的表象，實際上很大程度是受政治家、外交家的個性所決定。⁸⁷ 因此，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基於人的認知的變化世界。

從實務面而言，國家領導人的個人認知因素的影響，在經濟議題或其他在安全戰略議題方面，亦可得到理解。例如：中國大陸的政治精英和國家領導人的認知，也會隨著時期的不同，受到

⁸⁶ Christensen, 1996, op. cit., p. 6.

⁸⁷ 王逸舟，《全球政治與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2003 年），頁 53-54。

國際外在體系結構不同的影響而發生認知在改變，⁸⁸ 這亦等於說明了一個國家的外交策略，反應了這個國家統治菁英所界定的國家利益。⁸⁹ 再例如：美國在小布希政府(George W. Bush)期間，認知伊拉克(Iraq)屬於邪惡軸心國之一員(axis of evil)，⁹⁰ 並以其新保守主義(new conservatism)思想意識形塑成布希主義(the Bush doctrine)，⁹¹ 進而發動兩次美伊戰爭，此同樣解釋國家領導人的個人認知影響國家決策的結果。

此外，大部分區域貿易競合的分析變項，可以從「國際結構」、「國內政治」和「精英認知與觀念」等三個面向導入，雖然各種案例分析並不一定全部包括此三個構面，卻是一種必要條件。以制度性的議價賽局途徑(institutional bargaining-game approach)為例，就統合此三種要素，分析理解國家在所加入的「優惠貿易協定」(preferential trading arrangements, PTAs)中，如何談判與策略選擇。⁹² 再者，在西元 1985 至 1988 年美、日兩國半導體貿易的談判案例中，學者 Ellis S. Krauss 雖然從雙方的國內政治因素分析，先提出美、日兩國可分別接受的貿易條件(terms of trade)，但其中已涉及談判代理人認知的轉變。美國方面以開放日本市場、停止對美國及第三國的傾銷等為訴求，而日本方面則避談傾銷與智財權議題、避免美國報復和持續擴大美國市場等為訴求，⁹³ 兩國經過

⁸⁸ 陳牧民，〈當和平崛起遇上臺灣問題：精英認知下的中國安全戰略〉，《中國大陸研究》，第 49 卷第 4 期（2006 年 12 月），頁 9-13。

⁸⁹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8-19.

⁹⁰ 美國小布希總統於 2002 年 1 月在一次國情咨文中演說提到邪惡軸心的危險國家（包括伊拉克、伊朗和北韓），因此必須採取「先發制人」的行動（pre-emptive actions）。請參閱 G. John Ikenberry, “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2), pp. 50-51.

⁹¹ Francois Heisbourg, “A Work in Progress: The Bush Doctrine and Its Consequence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6, No. 2 (Spring 2003), pp. 77-80; Christine Gray,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Use of For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75; Jonathan Monten, “The Roots of the Bush Doctrine: Power, Nationalism, and Democracy Promotion in U.S.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4 (Spring 2005), pp. 140-145.

⁹² Vinod K. Aggarwal and Min Gyo Koo, “Beyond Network Power? The Dynamics of Form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8, No. 2 (June 2005), pp. 198-201.

⁹³ Ellis S. Krauss, “U.S.-Japan Negotiations on Construction and Semiconductors, 1985-1955,” in Peter

談判策略攻防後達成協議簽署。顯見，國內政治因素、國家元首個人(statesman or chief of government, COG)認知因素對國際談判結果的影響。⁹⁴ 這種包括國內決策者對責任和義務的認知、國內立法系統中精英們的支持和決策者的學習過程，對決策的影響也都獲得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研究學者的證實。⁹⁵ 換言之，國家領導人的社會屬性意謂著，個人選擇或決策並非完全由自己可決定的事情，個人的選擇將受到社會價值觀和文化因素的影響。因此，國內政治制度、文化宗教與國家領導精英的思想信仰確實已對外交政策與策略選擇產生重要影響。

本研究架構採用國家領導人認知轉化的變項，此概念源自於國際關係理論的第三種主流學派是強調認知變化的建構主義視角，有別於將結構制度視為外生既定的(exogenous givens)，⁹⁶ 它認為認知將產生文化認知、價值認知，並主張認知趨同的過程有助彼此的信任和接受程度，而認知落差則易產生猜疑和衝突，認知的培養和強化有助於建構和平、穩定的國際秩序。顯然，包含著領導人認知轉化的認知途徑認為以反射途徑(reflective approaches)的視角彌補人類理性的限制。⁹⁷

B. Evans, Harold K. Jacobson, and Robert D. Putnam, eds., *Double-Edged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 (California: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67-273.

⁹⁴ Andrew Moravcsik, "Integrating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in Peter B. Evans, Harold K. Jacobson, and Robert D. Putnam eds., *Double-Edged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 (London: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0-32; Peter B. Evans, "Building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olitics: Reflections and Projections," in Peter B. Evans, Harold K. Jacobson, and Robert D. Putnam eds., *Double-Edged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 (London: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405-408.

⁹⁵ Andrew Hurrell,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Study of Regimes: A Reflective Approach," in Volker Rittberger and Peter Mayer eds.,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69-71; Andreas Hasenclever, 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45-149; Michael Zurn, "Bringing the Image (Back) in About the Domestic Source of Regime Formation," in Volker Rittberger and Peter Mayer eds.,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84-292.

⁹⁶ Andreas Hasenclever, 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 "Integrat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6, No. 1 (January 2000), p. 10.

⁹⁷ Christer Jonsson, "Cognitive Factors in Explaining Regime Dynamics," in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 eds. Volker Rittberger and Peter May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02-204;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No. 4 (December 1988), pp. 386-393.

第四節 國際結構和國內層次的互動

本文的研究架構係先以單一國家行為者在國際體系中的環境背景，再從「國際政治結構」到「國內政治因素」，推論出所需的變項。雖然這些變項的產出係立基於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脈絡，但還面臨到二個待澄清問題，一是國家對外行為是以哪一個層次做為優先分析的層次？二是對於國際關係的分析是否存在跨層次的分析方式？對於第一個待澄清問題的回答，David Singer 認為，Waltz 的分析層級的分類，即第三層次是國際體系，行為者主要是國家；第二層次是國內結構，行為者主要是次國家行為體，例如，行政機構、立法部門、政黨及利益團體等單元；第一層次是個人層次，⁹⁸ 只是為了理論簡約之目的。Singer 對分析層次的三分法提出評論，他指出以分析層次研究國際關係或探究國際衝突和戰爭的根源，不能僅從單一的優先層次分析瞭解，應進一步在三個層次之間做好結合與修正。⁹⁹ 而對於第二個待澄清問題的初步回答，目前國際關係研究涉及跨層次分析的，概分為三者：第一，從國際層次到國內層次，即所謂「由外到內」(outside in)，但決定的層次僅在於國際體系層次；第二，從國內層次到國際體系層次，即所謂「由內到外」(inside out)，惟決定的層次僅在於國內單元層次；¹⁰⁰ 第三，雙層賽局模式。顯然，只有雙層賽局模式基本上屬於一種跨層次分析的動態方式，¹⁰¹ 為了歸納出本文之整合式分析途徑，進一步闡述如下：

⁹⁸ Kenner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159-186, 230-238.

⁹⁹ David J. Singer, "International Conflict: Three Levels of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 12, No. 3 (April 1960), pp. 460-461; David J. Singer, "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14, No. 1 (October 1961), pp. 82-87.

¹⁰⁰ 徐永明、黃紀，《政治分析的層次》（臺北：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2001年），頁81-116。

¹⁰¹ 本文認為跨層次的分析模式，不僅是層次之間單向的分析，而應是一種雙向的動態分析。

壹、雙層賽局模式

長期以來，國與國之間利用互動協商的方式解決具爭議性的跨國事務已成為國際間普遍的法則。雖然相較於國內事務的處理，主權國家對於涉外爭議的處理具有較高的自主性，但是隨著民主化浪潮及公民社會的崛起，涉外事務談判受國內因素影響的程度已逐漸擴大。當國內與國際之間的疆界變得逐漸模糊之際，國際紛爭究竟是「國內影響國際」或「國際影響國內」已不再重要，¹⁰² 因為國際與國內因素的彼此互動才是探究國際談判成敗與否的主要框架。

依據 Oran Young 的觀點國際建制的建立就是一種雙方外交政策互動的結果，就像市場經濟機制中「看不見的手」導引自利 (self-interests) 行為所造成的集體結果一樣，並不需要做多餘的解釋。¹⁰³ 如果以此概念對照於 Robert Putnam「雙層賽局」(two-level game) 的觀點，¹⁰⁴ 將發現國際談判具有外交政策互動的核心意義，¹⁰⁵ 據此推論，外交政策互動必然與國內政治因素存在某種相關性。1988 年 Putnam 提出雙層賽局的國際談判分析框架，而打破「國內」、「國際」二元論的結構，¹⁰⁶ 這一方面提供給外交政策互動研究者新的視角，另一方面也使外交政策的研究朝更動態性的方向前進。Putnam 雙層賽局最大的貢獻，在於他提出「獲勝集合」(win-sets) 的概念。這個集合是國內利害關係人透過一種民主機制

¹⁰² 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2, No. 4 (Autumn 1978), pp. 881-882; Robert O. Keohane and Helen V. Milner,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Introduction," in Robert O. Keohane and Helen V. Milner, ed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7; Helen V. Milner, *Interests, Institutions, and Informati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9-14.

¹⁰³ Oran R. You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uilding Regimes f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2.

¹⁰⁴ Robert D.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Summer 1988), pp. 427-460.

¹⁰⁵ Oran R. Young, *Creating Regimes: Arctic Accords and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1-15.

¹⁰⁶ Robert D. Putnam, 1988, op. cit..

的運作，對國際談判協議獲致一組國內所有利害關係人透過民主機制的運作所形成的議價範圍，並依此形成與它國談判時可能獲致協議的範圍(zone of potential agreement)，進而對國際談判的結果提出解釋。此外，Putnam 的另一項主要貢獻乃在於他所提的「政治無異曲線」(political indifference curve for two-issue negotiation)，這國際談判模式也可運用於當今大多數外交政策互動的現狀。依據「獲勝集合」與「無異曲線」二大概念，本研究嘗試以圖形套疊方式，進一步申論 Putnam 雙層賽局的動態要義。

假定 A、B 兩國的外交政策互動曲線比照兩國的國內政治無異曲線的形式呈現，¹⁰⁷ 則從兩國國際層次互動曲線 A*B*形式（如圖 2-1 所示），結合 A、B 兩國各自的國內獲勝集合曲線形式（如圖 2-2、圖 2-3 所示），到最後形成兩國外交政策互動的可能結果（如圖 2-4 所示）。這種雙層賽局的外交政策互動曲線，提供了國際層次與國內政治因素互動的邏輯關係。

再者，本文認為影響外交政策互動的國內政治因素，不應該僅限於國內利害關係人透過民主機制的運作所影響的因素，不應僅限於「國際」與「國內」層次的互動，換言之，Putnam 的獲勝集合尚應包括國家領導人的認知或理念的影響因素，使得「國際」、「國內」與「個人」三個層次形成一種動態賽局。因此，國際層次與國內層次的互動結構，尚應包括國家領導人認知因素所增加的個人層次，以形成外交政策的互動模式。

¹⁰⁷ 國際談判曲線圖形式，請參閱：H. Peyton Young, *Negotiating Analysis* (Ann Arbor, Minnesota: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p. 3.

Y 軸 (B 國利益總和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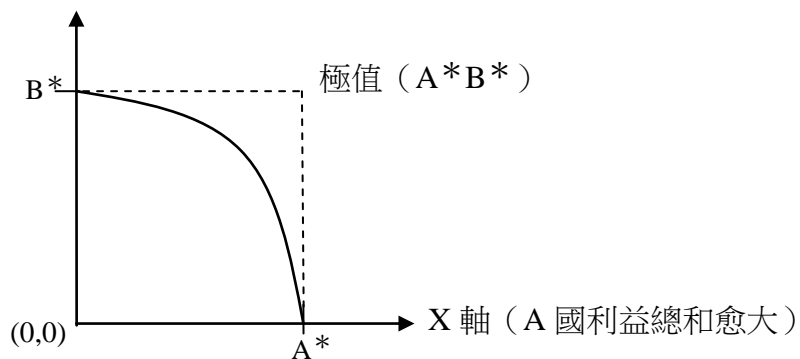


圖 2-1：A、B 兩國國際層次互動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Y 軸 (A 方獲利愈小或 B 方獲利益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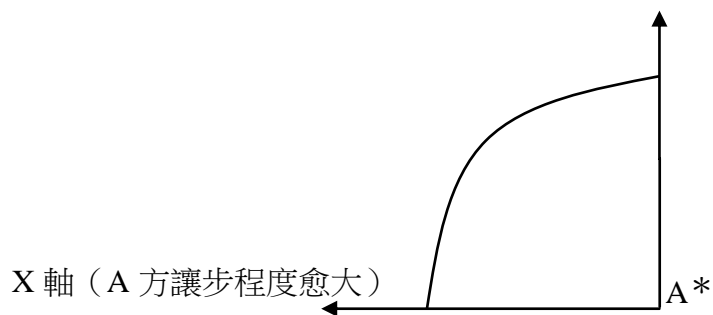


圖 2-2：A 國國內獲勝集合曲線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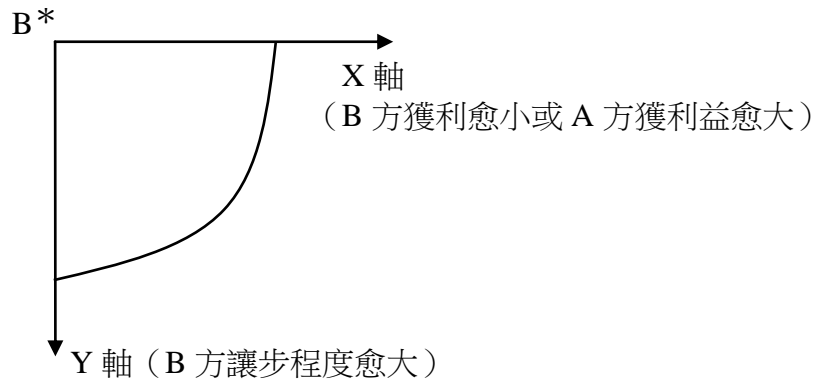


圖 2-3：B 國國內獲勝集合曲線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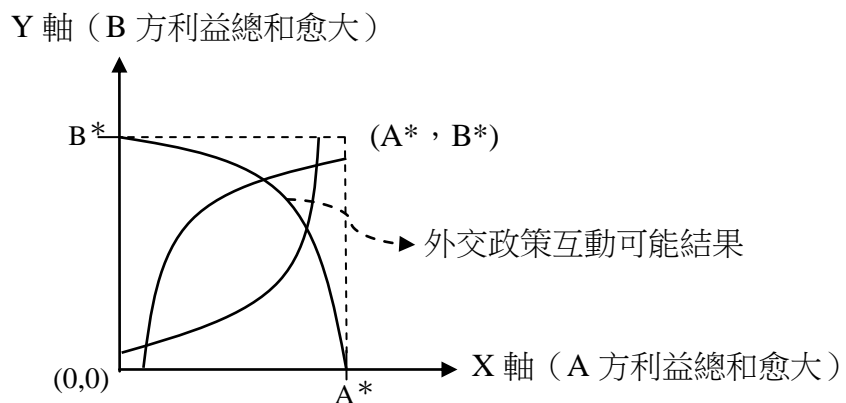


圖 2-4：A、B 雙方國際國內雙層互動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事實上，這種國內層次與國際層次互動的解釋模式，已經跳脫單一的「由內而外」或「由外而內」途徑的限制，因此，其適用範圍也不再僅限於對國家外交政策的解釋，對國際間合作的解釋亦可適用。例如，在體系層次上，以大國數量的多寡區分為「雙極」或「多極」；而在國內層次上，以相似調和的程度區分為意識

形態的「一致」或「多元」。¹⁰⁸ 如此，即可從雙層次互動中為四種大國間是否合作的世界狀態，即分別是 1914 年前約 19 世紀末的「歐洲和諧時代(concert of Europe)」、1930 年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戰(world war I)」、「冷戰緩和時期(detente)」與「冷戰衝突時期(cold war)」等四種世界提出解釋，如下圖 2-5 所示。

		國內層次	
		意識形態一致	意識形態多元
體系層次	多極	歐洲和諧時代 (concert of Europe)	第一次世界大戰 (world war I)
	雙極	冷戰緩和時期 (detente)	冷戰衝突時期 (cold war)

圖 2-5：雙層次互動的大國合作解釋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貳、整合新古典現實主義分析架構

本文整合式分析架構係以新古典現實主義鑑借雙層賽局的動態概念而形成。首先，對「國內政治理論」、「攻勢現實主義」和「守勢現實主義」之外交政策解釋不足之處，其次，在新古典現實主義提供補充後，提出本文之整合式分析架構比較。

¹⁰⁸ Benjamin Miller, "Explaining Great Power Cooperation in Conflict Management," *World Politics*, Vol. 45, No. 1 (October 1992), pp. 10-12.

一、國內政治理論的不足

國內政治理論主張國內因素，例如，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國家性質、政黨政治或社經結構等，以決定國家如何對外行為。即便是最普遍的國內政治理論觀點，即民主和平論，認為民主國家行為是不同於非民主國家行為的，民主國家之間係不容易戰爭的。然而，修正的民主和平論認為民主國家之間的相處，各民主行為是不同的。顯然，國內政治具有多種不同的途徑，即每一種途徑都選擇不同的國內自變項。因此，為了瞭解為什麼一個國家行為的特殊方式，國家應該解開其黑盒子的內部並檢驗其偏好和國內主要行為者的組成，惟當黑盒子解開之際，國內政治的理論模式即消失。¹⁰⁹

二、攻勢現實主義的不足

攻勢現實主義假設國際無政府狀態就是「霍布斯(Hobbesian)」，它不同於兩極狀態或核武威嚇，攻勢現實主義主張安全是稀缺的，國家只好藉極大化本身的相對優勢才能獲得。¹¹⁰在攻勢現實主義的世界，理性國家以追求安全為其行動導向，而與其他國家造成衝突。常常的狀況是，國家雖起於防禦動機，但被迫思考攻擊性的行為，此乃因國際體系的結構使然。因為國際體系壓力的直接與強烈，足以讓體系內的國家行為一致，所以國家之間的國內差異通常被認為較不重要，而忽略了國內的特性。依據這樣的觀點，在給定體系權力配置的架構中，外交政策的活

¹⁰⁹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Vol. 51, No. 1, *World Politics* (October 1998), pp. 148-149.

¹¹⁰ 攻勢現實主義的案例分析，請參閱：John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 Michal E. Brown et al., eds., *The Perils of 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MIT Press, 1995), pp. 79-129; Eric J. Labs, "Beyond Victory: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Expansion of War Arm,"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4 (Summer 1997), pp. 1-49.

動僅是不安國家要手段爭取地位的結果而已。¹¹¹

三、守勢現實主義的不足

守勢現實主義假設國際無政府狀態是較為良善的，而且一般正常國家可以了解或從經驗上經過時間的學習獲得，換言之，安全通常是充足而非稀缺的。在守勢現實主義的世界裡，理性國家追求安全通常能輕鬆的承擔，只是為了回應外部威脅，反而汲汲努力的情形相當少見。因此，國家回應外部威脅，唯一的作為就是以權力平衡避免實際的衝突。守勢現實主義的解釋瓶頸是面對好戰佔優勢狀態且偏愛攻擊性的國家時，權力平衡觀點很難以勝任，例如，面對流氓國家或恐怖主義國家時，守勢現實主義常會失去解釋效力。¹¹²

四、整合式分析架構比較

在新古典現實主義對上述對外交政策解釋的不足，提出補充後，本文嘗試結合雙層賽局的動態概念，包括：結構互動因素、國內政治權力互動因素與領導人認知差異，進而提出一種整合新古典現實主義分析架構。其對外交政策之解釋途徑與國內政治理論、守勢現實主義、攻勢現實主義比較如下表 2-1 所示。

綜合言之，新古典現實主義在古典現實主義強調「權力」與「人性」等六大原則下，¹¹³ 主張三個重要變項影響外交政策，即外交政策行為，除了受到權力結構影響外，並無法排除決策者與

¹¹¹ Gideon Rose, 1998, op. cit., p. 149.

¹¹² Gideon Rose, 1998, op. cit., p. 149-150.

¹¹³ Hans Joachim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5th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Press, 1973), pp. 4-15.

表 2-1：五種關於外交政策解釋途徑比較表

理論區分 / 觀點項目	國際體系的觀點	國內層次的觀點	因果邏輯
國內政治理論	結構不重要	高度區分	國內因素→外交政策
守勢現實主義	結構偶而重要；無政府狀態是隱喻的變項	區分	結構因素或國內因素→外交政策（二個自變項操作，分別造成自然和非自然的行為）
攻勢現實主義	體系非常重要；無政府狀態是 Hobbesian 的	無	結構因素→外交政策
新古典現實主義	體系重要；無政府狀態是含糊的	區分	結構因素（自變項）→國內因素（干擾變項）→外交政策
整合新古典現實主義分析架構	體系重要；國際權力結構的相對互動	區分	結構互動因素→國內政治權力互動因素（含領導人認知差異）→外交政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¹¹⁴ 鄭端耀，〈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1 期（2005 年 1、2 月），頁 124。

第一，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國際權力分配是影響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權力分配是主導國際關係運作的核心力量，但是新古典現實主義不會特別強調國際體系的權力分配，較關切的是「相對權力」—國家之間的權力分配關係。¹¹⁵ 當一國的相對權力增加時，該國的外交活動與企圖心也會隨之增加；反之，則會減少。

第二，除了國際權力的分配、國家相對能力的改變因素外，決策者對國際權力分配的認知(perception)變化亦可決定國家外交政策。¹¹⁶ 若一國執意以決策者自我價值或認知來決定外交政策而不管國際權力結構的話，則會造成國家災難。¹¹⁷

第三，國內政權能力，當國家相對權力增加時，對外行動能力也會增加，但這並非是自動化過程，國家權力能否轉化為國際行動力量，取決於國內政治結構，特別是政府能力(state power)方面，即國家權力增長並不代表政府能力增強，如果政府的能力有所限制，無法運用國家權力於對外政策行動，則無法反映出國際權力分配的影響力，但是卻能夠反映出國內政治因素影響國內資源運用的能力。

¹¹⁵ Randall L. Schweller, "The Progressiveness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ppraising the Fiel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2003), pp.317-318.

¹¹⁶ 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2 (Fall 2004), pp.168-173; Daniel Byman and Kenneth Pollack, "Let Us Now Praise Great Man: Bringing the Statesman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 (Spring 2001), pp. 107-146.

¹¹⁷ Rose, op. cit., 167.

第五節 區域經濟整合與大國崛起

壹、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

研究區域經濟整合，當然包括兩岸經濟面向的競合關係，均避不開區域主義的探討。因此，依據傳統新功能主義(neo-functionalist approach)的擴溢(spill over)觀點，¹¹⁸ 歐洲區域整合(regional integration)的過程，從「優惠貿易協定」(preferential trading arrangements, PTAs)對貿易伙伴產品的優惠，到「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s, FTAs)對消除關稅、數量配額和非關稅障礙，再到「共同關稅」(common external tariff, CET)對非會員國的同等關稅，再到「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對生產要素之自由移動，最後再到「經濟同盟」(economical union)的貨幣與經濟政策整合的過程進行。¹¹⁹ 但這種「義大利麵碗現象(spaghetti bowl phenomenon)」有效整合的案例，¹²⁰ 只見於歐洲整合案例的特定結構與趨勢，對於其他區域的整合，尤其是東亞區域經濟整合方面，卻只見剪不斷、理還亂的東亞麵條現象(noodle bowl phenomenon)。因此，受到包括新區域主義觀點的許多批評。¹²¹

¹¹⁸ Ernst B. Haas,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1950-57*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¹¹⁹ Dilip K. Das, *Regionalism in Global Trade*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Press, 2004), pp. 15-18.

¹²⁰ 「義大利麵碗現象」(spaghetti bowl phenomenon) 又稱「義大利麵碗效應」(spaghetti bowl effect)，係指在目前自由貿易區激增的情況下，區域貿易結盟的現象如義大利麵般相互糾結，其中貿易規則複雜的程度與部分具有保護色彩的措施，對於多邊貿易體系可能有負面的影響。請參閱：J. Bhagwati, “U.S. Trade Policy: The Infatuation with Free Trade Areas,” in J. Bhagwati and A. O. Krueger eds., *The Dangerous Drift to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Washington, D.C.: The AEI Press, 1995), pp. 1-18.

¹²¹ 區域主義具複雜的概念，一般廣義的定義是指國家間經濟政策的合作與協調進程。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區域主義稱舊區域主義(old regionalism)或第一波區域主義，自1980年代中期以後的區域主義稱新區域主義(new regionalism)或新一波區域主義，自此新區域主義更形多元化的新區域主義(new regionalisms)。請參閱比較：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3, No. 3 (Summer 1999), pp. 601-602; Marianne H. Marchand, Morten Boas and Timothy M. Shaw,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ew Regionalisms,” *The World Quarterly*, Vol. 20, No. 5 (October 1999), pp. 905-908.

一般對新區域主義的定義，已不僅是指地理性的經濟流動或政治性的活動，¹²² 它也強調包含其他非國家行為者(non-state actors)與由國家行為者所引導的整合，且具備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對時間與空間的壓縮特性。¹²³ 因此，區域整合的進程應符合新區域主義的解釋觀點，即一種所有行為體之間協調與合作的進程。依據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統計，截至 2016 年 1 月底止，全球簽訂生效的區域貿易協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RTAs)已經超過 625 個。¹²⁴ 學者們雖然把這種 RTAs 的大量出現，視為是從優惠性貿易協議(Preferential Trading Arrangements, PTAs)的歧視性原則，¹²⁵ 到區域整合協定(Regional Integration Agreements, RIAs)的擴散與重疊，¹²⁶ 但本文認為這是一連串雙邊貿易到多邊貿易之區域競合的過程。¹²⁷ 此外，PTAs 的形成及其優勢並不僅存在於經貿面向，從政治及社會建構的面向亦能予以分析解釋。¹²⁸ 依據最基本的區域整合動機(經濟性或政治性)和區域組織結構模式(單邊制或多邊制)的分類，可以把區域整合模式分類為四種，如下表 2-2：區域整合的分類所示。這

¹²²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An Overview," in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4.

¹²³ Marianne H. Marchand, Morten Boas and Timothy M. Shaw,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s," *The World Quarterly*, Vol. 20, No. 5 (October 1999), pp. 898-902.

¹²⁴ 根據 WTO 之區域貿易協議委員會(Committee o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CRTA)統計，截至 2016 年 2 月 1 日止，提交的 RTAs 共有 625 個，其中 419 個強制生效執行中，該數量仍在不斷地增加中。請參閱：WTO,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retrieved 15 September 2013, from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region_e/region_e.htm.

¹²⁵ Duncan Snidal, "The Gam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Kenneth A. Oye, ed.,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52-54. Stephan Haggar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Americas," in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5-30.

¹²⁶ Dilip K. Das, *Regionalism in Global Trade*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Press, 2004), 15-18.

¹²⁷ Lisa L. Martin, "Interest, Power, and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4 (Autumn 1992), pp. 767-768.

¹²⁸ Vinod K. Aggarwal and Min Gyo Koo, "Beyond Network Power? The Dynamics of Form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8, No. 2 (June 2005), pp. 192-194.

種區域整合的分類趨勢，雖然可以視為從「單邊、經濟性」的北美自由貿易區結構的轉變，但這並不表示「多邊、政治性」的類似歐盟組織是區域整合的最後終點。

因此，區域經濟整合的進程應包含於新區域主義的觀點，一種所有行為者之間協調與合作的進程並持續進展著。綜合上述對新區域主義者的觀點，至少可以歸納出以下兩點區域經濟整合的結構趨勢：

表 2-2：區域經濟整合的分類表

		區域整合動機	
		經濟性的	政治性的
區域組織結構	單邊等級制	例如： 北美自由貿易區	例如： 1930年代日本 東亞共榮區域
	多邊去中央化	例如： 亞太經合組織	例如： 歐洲聯盟

資料來源：Dilip K. Das, *Regionalism in Global Trade*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Press, 2004), p. 14.

從上表分類觀察，除了在「歐洲聯盟」，大國領導的角色較不明顯外，其餘不論是在「北美自由貿易區」（美國領導）、「東亞共榮區域」（日本領導）或「亞太經合組織」（美國、中國領導）都具有大國作用的因素。因此，大國的作用在區域經濟整合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外，本文認為區域經濟整合還具有以下二項趨勢。

第一，本研究認為歐洲區域整合的過程是一種特例，它強調的單一區域的合作，然而，其他區域的整合過程卻明顯發現到是一種區域之間(inter-regional)的合作整合趨勢，例如，東亞區域整合過程就是如此，¹²⁹ 而且這種進程與結構的趨勢受到政治骨牌效應(political domino effect)的影響而變得愈來愈明顯。¹³⁰ 這種現象也發生在「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區域(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融合「東南亞國家協」區域(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的整合過程，或東南亞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融合 ASEAN 區域的整合過程。隨著區域逐漸擴大的現象，區域整合的過程已經超越國與國的互動關係，尚包含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和私部門與公部門之間的互動關係。¹³¹ 這種發展進程指出了新區域主義的新趨勢，故與其稱作是多樣不同的新區域主義(new regionalisms)，¹³² 倒不如稱作「開放式區域主義」(open regionalism)、「軟式的區域主義」(soft regionalism)。¹³³

第二，本研究認為歐洲的區域整合過程，不只包括舊區域主義(old regionalism)的簡單複製，或至少包括霸權式的區域主義(hegemonic regionalism)。相對於新區域主義而言，認為歐洲區域

¹²⁹ Charles Harvie and Hyun-Hoo Lee, "New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How Does It Relate to the 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Vol. 19, No. 2 (August 2002), pp. 123-124.

¹³⁰ John Ravenhill, "The 'New East Asian Regionalism': A Political Domino Effec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7, No. 2 (May 2010), pp. 178-179.

¹³¹ Joseph A. Camilleri, *Regionalism in the New Asia-Pacific Order* (Northampton,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 Press, 2003), pp. 137-166.

¹³² 多種不同的新區域主義(new regionalisms)一詞較之舊區域主義(old regionalism)或新區域主義(new regionalism)，它更強調區域化過程的多面向、複雜性與差異性。請參閱：Marianne H. Marchand, Morten Boas and Timothy M. Shaw,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ew Regionalisms," *The World Quarterly*, Vol. 20, No. 5 (October 1999), p. 901.

¹³³ 開放式區域主義強調的是指不歧視區域外的其他區域體，而具有包容的特徵，而軟式的區域主義是指尚未形成正式制度前，市場與企業等非國家行為體扮演的驅動力量。請參閱：Kevin G. Ca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in Northeast Asia: A Unique and Dynamic Pattern," *East Asia: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Vol. 17, No. 2 (Summer 1999), pp. 23-26.

整合只是新區域主義進程中的一個特例，顯然，歐洲區域整合是一種進行式而非完成式。因此，在全球一體化的終極理想未達成前，¹³⁴ 區域整合與新區域主義將繼續不斷的進展著，而且同時發生在全球體系的層次、區域間的層次和區域內的層次中。¹³⁵

從上述兩點對歐洲區域整合進程與結構趨勢的觀點，發現區域整合不僅僅是歐洲單一區域的整合，它更朝向「擴大性」（地理區域擴大）和「包容性(inclusive)」（成員數的增加與非國家行為者出現）的結構趨勢進展，¹³⁶ 且同時呼應著新區域主義逐漸朝向「異質性」（非單一型式的新區域主義）和「多樣性」（包括經濟性、政治性或環境性等跨議題領域分析途徑）的進程發展。顯然，隨著區域整合的結構趨勢與新區域主義的發展進程，區域合作的研究方法也將益形多元與不同。這種區域整合所面臨的複雜性，如果把它想像成國家在沒有政府治理的國際體系中，¹³⁷ 則國際政治經濟所遭遇的問題，¹³⁸ 就如同市場失靈，不僅是單純表面上的完全競爭形式的失效，還包括協調（或協作）失敗所形成分配不均的問題、不理性所造成認知或偏好改變的問題、資訊不完全和資訊不對稱所引發交易風險與無效率的問題，¹³⁹ 以及政治關係因素

¹³⁴ 即使歐盟與美國於 2013 年 7 月 8 日至 12 日完成第一回合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談判，也只被視為一種區域性的雙邊 FTA。請參閱：The European Commission,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

European Commission, retrieved 29 October 2013, from http://ec.europa.eu/trade/policy/in-focus/ttip/#what_is_ttip.

¹³⁵ 區域內的層次包括國家、次國家組織和微型區域。請參閱：Björn Hettne and Fredrik Söderbaum, “The new regionalism approach,” *Politeia*, Vol. 17, No. 3 (1998), retrieved 22 December 2011, from <http://www.unisa.ac.za/default.asp?Cmd=ViewContent&ContentID=7194>.

¹³⁶ Elena Ianchovichina and Susanna Lundstrom, “Inclusive Growth Analytics: Framework and Application.”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4851 (March 1, 2009), retrieved 22 December 2012, from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410472##.

¹³⁷ 張勝軍、劉小林，《沒有政府的治理》(James N. Rosenau 原著)(南昌市：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34-59。

¹³⁸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7-11.

¹³⁹ 陳琇玲，《市場的真相：富國恆富窮人如何翻身》(John Kay 原著)(臺北：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頁 241-331。

所可能造成區域整合的脆弱性問題。觀察中國大陸所參與之區域經濟整合，明顯符合上述所描述的新區域主義的特徵。

貳、大國領導角色的特徵

依據結構現實主義的觀點，國際結構來自於國家間權力的分配。¹⁴⁰ 因為每個國家的權力大小不同，故國際結構可能隨著權力差距的加大而形成單極結構。不論是在十九世紀「英國盛世」(Pax Britannica)的英國，或二十世紀中葉以後「美國盛世」(Pax Americana)的美國，因為兩大國的權力與當時其他國家的差距極大，於是形成霸權宰制(power over)。¹⁴¹ Robert Gilpin 和 Stephen Krasner 均認為霸權國家會運用權力不對稱的關係，以其政治權力(political power)迫使弱國屈服而採取開放貿易政策，¹⁴² 以追求安全與財富的目標。¹⁴³ 然而，這種霸權直接宰制的觀點，經過 Kindleberger(1974)的修正，他認為霸權國並不必然需要採取權力宰制的作法，亦能提供穩定貿易體系的公共財，¹⁴⁴ 霸權國可將自己視為是「良善霸君」(benevolent despot)。依據公共財具有「非獨占性」(non-rival)及「非排他性」(non-excludable)的特性，從理性選擇的觀點，自然存在著「搭便車」(free-riding)的行為。¹⁴⁵ 因此，這種修正係嘗試對大國的影響區分為自由主義式「領導理論」(leadership theory)的觀點和現實主義式大國「宰制理論」(hegemony

¹⁴⁰ Waltz, 1979, op. cit., pp. 129-131.

¹⁴¹ 不像“power to”所強調一種間接影響的權力，“power over”強調的是一種直接宰制的權力。請參閱：Susan Strange,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1-27.

¹⁴² Stephen D. Krasner,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Vol. 28, No. 3 (April 1976), pp. 322-323.

¹⁴³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s of Trans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5, No. 3,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Summer 1971), pp. 405-406.

¹⁴⁴ Charles Kindleberger, op. cit., p. 303.

¹⁴⁵ 對自利的個別行為者而言，最佳的行為是自己不貢獻任何勞力或財力的搭便車行為，而坐享公共財或集體財(collective goods)。請參閱：董安琪，《集體行動的邏輯》(Mancur Olson 原著)(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頁5-6；葉家興，《經濟學與社會的對話》(Todd Sandler 原著)(臺北：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頁95-97。

theory)的觀點，¹⁴⁶ 雖然前者嘗試將霸權大國意願的概念予以修正，但仍主張霸權大國須具備承擔搭便車行為的能力，故不論是良善霸君的「霸權大國領導」或高壓統治的「霸權大國宰制」都仍然存在不對稱權力結構的特徵。換言之，不論是強調積極和善意的公共財，或是以利用和剝削為主的公共財，¹⁴⁷ 均為大國主導所提供。觀察中國大陸對外經貿影響力，至少在東亞區域經濟組織中，具有發揮大國領導作用的角色。

參、大國現代化發展

一、現代化理論概念

「現代化理論」發展於 1950 年代，該理論假定傳統社會一旦現代化，則將會朝著西方發展的模式推進。此理論認為現代化的結果必使社會與社會之間的距離縮短而相近，即現代化的結果會使社會與社會之間的距離縮短，使彼此擁有類似的特質。現代社會強調的是西方社會組織架構，因此，無論任何社會只要往現代化的路上邁進，就必定是朝西方社會的路上走。基本上現代化理論建立在兩個主要的假定上：(一)不論社會的現代化起點為何，所採取的途徑為何，每個社會必朝同一終點變遷；(二)不論社會在其現代化過程中遭遇什麼樣的挫折或衝突，其最終的成功幾乎是可以確定的。¹⁴⁸ 在現代化理論派別中，第二次現代化理論認為，

¹⁴⁶ David A. Lake, "Leadership, Hegemony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Naked Emperor or Tattered Monarch with Potential?"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7 (December 1993), p. 460.

¹⁴⁷ 公共財模式區分四種：1.善意霸權的純粹性公共財；2.重商霸權的非純粹性私公共財；3.強迫性霸權的非純粹性公共財；4.植入性霸權的非純粹性私公共財，前二者強調積極和善意，後二者強調利用和剝削。請參閱：Anthony Tuo-kofi Gadze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wer: Hegemony Liberaliz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Ltd., 1994), pp. 38-49.

¹⁴⁸ 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現代化理論〉，2004年2月23日，取自《中國網》，http://big5.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4-02/23/content_5503322.htm，檢索日期：2015年4月30日。

人類文明的發展可以分為工具時代、農業時代、工業時代和知識時代等四個時代，每一個時代都包括起步期、發展期、成熟期和過渡期等四個階段，人類文明進程包括四個時代十六個階段：從農業時代向工業時代、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變過程是第一次現代化；從工業時代向知識時代、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工業社會向知識社會、工業文明向知識文明的轉變過程是第二次現代化；文明發展具有週期性和加速性，知識時代不是文明進程的終結，而是中點站，將來還會有新的現代化等。

對於主要發展大國而言，第一次現代化大致經歷 210 年（1763～1970 年），第二次現代化將大致經歷 130 年（1971～2100 年）。第二次現代化的時間分界，係把 1970 年作為發達國家後現代化的起點基本一致。第二次現代化理論是一種新現代化理論，在第二次現代化理論中，現代化被賦予新涵義。¹⁴⁹

二、現代化理論區分

現代化涉及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國家發展進入大國的現代化理論主要可區分為政治現代化、經濟現代化、社會現代化、文化現代化等四項：

（一）政治現代化理論

政治現代化理論認為，現代化過程應該要約束新團體參與政治，以避免全民過度熱衷政治而造成不平衡。¹⁵⁰ 政治現代化者將

¹⁴⁹ 北京現代化學術研究中心，〈現代化理論〉，取自《中國現代化網》，<http://www.modernization.com.cn/lilun.htm>，檢索日期：2015 年 5 月 30 日。

¹⁵⁰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 *World Politics*, Vol. 17, No. 3 (April 1965), pp. 386-430;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現代」與「傳統」的概念運用於政治分析中，把已開發、未開發和發展中的政治體制加以劃分，而把高度發展的政治體制為現代化社會的特徵。現代化最顯著的特徵是國家政治制度現代化，國家政治體制、民主制度演化和變遷是政治學研究現代化的核心，他們主張政治民主化、自由化、分權化與秩序化，¹⁵¹ 最重要的是強調政府權威的合理性與政府能力的課責性(accountability)。¹⁵²

(二) 經濟現代化理論

經濟現代化理論係以研究英國經濟起飛論為基礎，主要將英國工業化過程劃分經濟成長階段，起飛論的五個階段主要分為：1.傳統社會階段；2.起飛前的潛伏階段；3.起飛階段；4.成熟階段；5.高消費階段。起飛論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最為遵循的途徑，並認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產業與就業結構會發生改變。¹⁵³ 經濟現代化的主要內容是工業化與城市化，他們認為持續性的經濟成長是實現現代化的關鍵因素。經濟現代化研究也具有不同的面向，例如，著重於經濟成長與政治、文化變遷之間的規律性研究，或偏向於不同經濟現代化的成長模式研究，或側重於經濟現代化成長的各階段研究。

(三) 社會現代化理論

社會現代化理論是依據行為所建立起的社會系統理論，他們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¹⁵¹ 馬崇明，《中國現代化進程》（北京市：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年），頁28-30。

¹⁵² 周育仁、詹富堯，2008年10月8日，〈從課責觀點探討內閣制下政府負責機制的設計與運作〉，取自《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http://www.npf.org.tw/post/2/4789>，檢索日期：2015年5月30日。

¹⁵³ Walt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將現代化區分為三個階段：1.第一階段是以歐洲英國、法國及荷蘭為主導，例如，英國的工業革命、法國的民主革命；2.第二階段是以歐洲德國的工業化為主導；3.第三階段則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為主導，顯然美國的現代化結合了歐洲個別的工業化和民主化。¹⁵⁴ 社會現代化理論者認為現代化是工業化的結果，而社會結構特徵的轉變才是現代化初始條件。¹⁵⁵ 此外，西方現代化模式其所包含的要素與結果是全球性的，而且相同的模式會再度出現於所有進行現代化的國家。¹⁵⁶ 換言之，社會現代化的研究方向源自於社會進化思想，認為工業化僅是現代化的結果，並且強調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之間的不同。

(四) 文化現代化理論

文化現代化者主要以人文面向研究為主。關於人文範疇的現代化研究主要著重於現代化核心是人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係實現由傳統社會向現代化社會轉變的根本保證，並認為人的現代化是現代化社會穩定、持續和健康發展的基礎。一個國家現代化進程就是人的價值觀、心理素質、進取精神、創新精神和獨立自主等的改變。¹⁵⁷

很明顯的，中國大陸國內經濟發展過程並不完全符合上述所區分的任一現代化理論區分，但仔細觀察中國大陸經濟發展進程，又符合現代化發展階段的基本劃分，這是中國大陸國內經濟發展的最主要特徵。

¹⁵⁴ 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¹⁵⁵ Marion J. Levy Jr., *Moderniz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Societies: A Setting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¹⁵⁶ Daniel 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England: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Press, 1958), p. 67.

¹⁵⁷ 周穗明，《現代化：歷史、理論與反思：兼論西方左翼的現代化批判》（北京市：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年），頁221-223。

第三章 中國大陸國內發展歷程

第一節 國內發展的限制根源

中國大陸經濟學者林毅夫對「李約瑟難題」所提出的新觀點，進一步指出切合近代中國所面臨的發展的限制根源。

壹、近代中國在落後於歐洲的原因

在前現代社會，歐洲與中國比較起來，人口少是一個劣勢，所以歐洲技術變遷的速度一直慢於中國。中國在技術上領先於西方，新的技術以及產品，透過絲綢之路和海洋航線上的商貿往來不斷傳往西方，引起了西方人的羨慕。西元 18 世紀以後，歐洲出現了工業革命。工業革命的特徵包括紡織機器、蒸汽機以及鋼鐵的使用，但最重要的特徵是技術變遷的速度加快。技術變遷的速度能夠不斷加快，是因為經驗的重要性已為實驗所取代。¹⁵⁸ 在前現代社會，經驗主要是生產的副產品，農民透過偶然的嘗試錯誤的發明新技術。到了 18 世紀，試誤變為透過主動的實驗來進行，一個科學家在實驗室裡一年所能做的嘗試錯誤數量，可能是幾千個工人和農民一輩子嘗試錯誤的總和。在這種情況下，人口的數量就變得不再重要。如果有意去支援實驗，即使人口很少，也可以透過密集的實驗來增加發明技術的可能性。從下表 3-1 中國近代科技發明件數統計顯示，西元 15 世紀以前中國科學水準還處於領先地位，而在 16 世紀以後，才開始呈現大幅落後。其落後的原因概分有：社會轉型遲滯，影響近代科技發展；政府對科技的重視程度不夠；落後的教育體制制約科技的發展與社會動盪影響科技

¹⁵⁸ 林毅夫，《解讀中國經濟》（臺北市：時報文化出版社，2009 年），頁 61-68。

發展等。¹⁵⁹

表 3-1：近代中國科技發明件數統計

年代 (西元)	件數 比例	發明 總件數	近代中國		世界其他國家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1~400 年		45	28	62%	17	38%
401~1000 年		45	32	71%	13	29%
1001~1500 年		67	38	57%	29	43%
1501~1840 年		472	19	4%	453	96%

資料來源：魏寶強，2012年10月31日，〈探析近代中國科技落後的原因〉，取自《人民教育出版社》，

http://www.pep.com.cn/rjwk/bmls/bmls2012/068/lshz_1_1/201210/t20121031_1142195.htm，檢索日期：2013年6月3日。

在工業革命的前後，由於經驗的技術發明轉為實驗型的技術發明，歐洲嘗試錯誤的數量突然開始迅猛增加，技術發明的速度也就隨之不斷加快，遠遠超過了中國和其他地區的技术進步水準。但是依照上面科技技術等比進展的假設說法，在技術發明的速度加快到一定程度之後，由於技術進步水準不斷提高，就會造成發明可能的空間愈來愈小，從而出現發明新技術的瓶頸。但是歐洲人在遭遇到發明瓶頸後，能夠在基礎科學上大力投資，增加了對自然界的瞭解，於是技術分佈曲線右移，¹⁶⁰ 技術發明的可能空間又再度擴大。如此循環往復，加速的技術發明就得以持續下

¹⁵⁹ 魏寶強，2012年10月31日，〈探析近代中國科技落後的原因〉，取自《人民教育出版社》，http://www.pep.com.cn/rjwk/bmls/bmls2012/068/lshz_1_1/201210/t20121031_1142195.htm，檢索日期：2013年6月3日。

¹⁶⁰ 林毅夫，〈解釋李約瑟之謎的新理論〉，取自《和訊圖書網》，<http://data.book.hexun.com/chapter-3073-3-12.shtml>，檢索日期：2014年3月24日。

去。在18世紀，科學對於技術進步的作用曾引起過科技史上的爭論，例如瓦特發明了蒸氣機，但瓦特並不是知識份子，而只是在實驗室裡幫教授做實驗的工人。到了19世紀以後，科學對於技術進步的作用才有了定論，幾乎所有的新技術發明都要依靠科學知識進步。科學增進了人們對自然界特性的理解，給新技術的發明創造了很大空間。

中國會在很短的時間內落後於西方，最直接的原因是西方的工業革命，但更為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在18世紀和19世紀以後，每當遇到技術發明瓶頸的時候，可以透過對基礎科學進行投資的方式來克服這種瓶頸，使技術發明可能曲線不斷右移，開發出新的科技發明空間。這一切之所以成為可能，前提就是西方在15、16世紀的時候出現了科學革命。因此要尋找中國為什麼沒有出現工業革命的原因，關鍵不在於瞭解中國為什麼沒有出現工業革命這一問題本身，而是要回答中國為什麼沒有出現科學革命。

貳、科舉制度阻礙中國發生科學革命

在前現代的中國，有好奇心的人因為科舉制度，沒有積極去學習數學與可控制實驗，從而導致在學與可控制實驗上的人力資本投資不足，科學革命就無法產生。相對而言，歐洲有好奇心的人，對於學與可控制實驗比較積極，因為歐洲的政治體制和官僚選拔體系，與中國不同。歐洲的封建貴族採用的是繼承制，如果父親是貴族，兒子就是貴族，所以歐洲有好奇心的人數，可能比中國少，但是，有好奇心又學習了可控制實驗的人，反而比中國多得多，從而導致了科學革命在歐洲發生而沒有在中國發生。¹⁶¹

¹⁶¹ 高策、李志紅，〈楊振寧論中國傳統文化與科學技術〉，取自《國際在線》，<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3601/2004/09/14/342@299618.htm>，檢索日期：2014年3月24日。

在秦朝以前，中國和歐洲國家一樣是封建社會，但從秦朝開始廢除封建貴族，設立郡縣，地方官員都由中央政府委派，以後的朝代都是沿用秦朝的制度。隋唐以來，官員透過科舉制度進行選拔。宋朝以後，科舉考試的教科書指定為「四書五經」。在古代，對於科舉的評價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因為當時做官的投資報酬率最高，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鐘粟』，而且還可以光宗耀祖。在這種情況下，任何有聰明才智的人，都會為科舉的物質回報所吸引，熱中參加科舉考試。聰明的人不一定有好奇心，但是有好奇心、懂得去觀察發現並能總結出科學理論的人，卻一定是聰明的人。人的行為方式會受到激勵機制的高度影響，對於這些有著聰明才智的人才說，參加科舉考試獲得加官晉爵，無疑是投資報酬率最高的行為，因此當然會被科舉考試所吸引。對於科學技術，即使他們有心研究也不會有多少時間。

叁、缺乏數學工具導致發展不出科學體系

在科考制度實行初期，考試的科目也曾包括數學。但是皇帝很快發現，考數學對於維持自己的統治沒有什麼幫助，所以就在後來把數學考試取消了。明代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是中國科技史上非常重要的著作。在《天工開物》的序言中，¹⁶² 提到聰明而又有抱負的人是不應該讀這本書的，因為讀這本書對於科舉沒有幫助。每個人的時間有限，在學四書五經的同時難以兼顧數學和可控制實驗。即使有一些聰明的人，可能分心進行科學觀察，但由於缺乏數學工具，也難以產生科學革命。

一個在特定技術和物質條件下顯得優越的制度，在其他條件

¹⁶² 《天工開物》古書作者為明代科學家宋應星。請參閱：新餘市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2010年4月29日，〈明代著名科學家宋應星《天工開物》〉，《華夏經緯網》
<http://big5.huaxia.com/jxxy/zjxy/whmr/2010/04/1865036.html>，檢索日期：2013年6月1日。

下可能會成為社會進步的障礙。這也就是經濟學理所說的制度障礙。當然，在資訊手段非常有限、監測成本非常高的年代，科舉制度本身是一項非常卓越的制度安排，讓那些有野心、有抱負的人，可以透過自己的努力進入官場。科舉制度有一項考核的客觀標準，因此相對來說是公平的，是客觀的，並能讓有能力的人不斷進入到官僚體系，維持官僚體系的活力。如果有能力的人不造反，那麼國家就很安定，就能維持大一統。這與過去中國的繁榮和中華文明的鼎盛有很大的關係。但是，科舉的優越性，只侷限在技術創新，都是依靠經驗來發明的時後，到了需要科學實驗發揮作用時，科舉制度便開始妨礙新發明的產生和科學技術的進步。

肆、沒有科學革命就沒有工業革命

還有一個相關的命題，因為是韋伯提出的，所以叫做韋伯疑問，¹⁶³ 與前文分析的李約瑟之謎有共通之處。按照韋伯的研究，中國在明朝就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於是他就問：「為什麼資本主義在中國早就萌芽了，但是中國最終沒有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其實仔細思考以後就會發現，問題的關鍵還是在於沒有科學革命，沒有科學革命就不會出現工業革命。中國在8世紀到12世紀期間，技術變遷速度非常快，但之後技術就基本處於停滯狀態。在技術處於停滯狀態的狀況下，資本就沒有辦法深化，當然也就不會出現全面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含意是，資本不斷深化，在此基礎上，資本與勞動的雇傭關係也不斷深化。在中國傳統的技术之下，資本能夠雇用的工人非常少，沒有辦法進行現代的機械化大生產，也就不會出現與機械化大量生產相伴隨的資本主義。回答韋伯疑問，追根溯源還是在於中國沒有工業革命。沒有工業革命，就沒有技術不斷創新和資本不斷深化，所以雖然中國

¹⁶³ 林毅夫，《李約瑟之謎、韋伯疑問和中國的奇蹟—自宋以來的長期經濟發展》（北京市：北京大學學報出版，2007年），頁5-22。

的資本主義型態已經出現，但是只能停留在萌芽的階段。

中國在前現代社會科技、經濟發展程度領先於西方，到了現代社會卻遠遠落後於西方之原因，認為科技不斷創新、升級，是一個國家經濟長期發展的基礎，在前現代社會技術的發明以農民、工匠的經驗為主，中國人多，農民、工匠多，所以，在技術發明上具有優勢。到了工業革命以後，技術發明的方式變為，以科學家在實驗室裡進行以科學為指導的實驗為主，中國人多的優勢消失。工業革命產生的前提，是要能發生並普及以數學和可控制實驗為主要特徵的科學革命，中國由於科舉制度所產生的激勵機制，妨礙了中國人對數學和可控制實驗這種後天能力的學習，使得科學革命無法在中國產生，因此也就無法自發地從以經驗為主的技術變遷方式，向以科學為指導的實驗方式進行轉變。在西方完成了這個轉變以後，中國的科技與經濟發展水準和國際地位，也就迅速從領先變為落後。然而，中國人並非先天就不能進行科學與工業革命，在現代社會，中國人學習數學、可控制實驗的激勵已發生變化，中國人在將來一樣能對科學與科技的進步做出貢獻。清代以前以儒家哲學為主要內容的科舉制度，給中國知識份子培養了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屢遭列強侵略，使整個社會瀰漫著一種很大的挫折感。可以說，中國近代的政治和社會史，就是中國知識份子的責任感和挫折感，這兩種心態相互交融所推動的過程。¹⁶⁴

伍、毛澤東的意識形態

一、明確的意識形態(prominence of ideology)

¹⁶⁴ 林毅夫，《解讀中國經濟》（臺北市：時報文化出版社，2009年），頁77-93。

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忠實信徒，可以確認的是他的意識形態屬於反右的左派思想，毛澤東的一項權力來源是從建構左派中國意識形態中獲得，但要確認毛澤東意識形態的範圍卻不容易，大體而言，與其簡單的描述他是專制、獨裁，倒不如說他是狡猾而悲劇。

毛澤東寧死不屈的自大，認為只有他能了解中國的危險，知道需要什麼方法可以使國家從失敗中取得勝利。毛澤東相信，只用正常的行政管理是不可能指揮一個全世界最多人口的國家。漸進式原則灌輸和實施某種特殊型態的權威，不但可以保留他的權力，而且可依此而重塑其國家。政治系統的限制使其資訊獲得不易，影響其政策選項的分析，因此，意識形態成為他掌控低階官員的有效工具。

二、唯心主義(voluntarism)

毛澤東雖然聲稱自己是物質主義者，但他的一生之中都是在鼓動民眾克服物質的差異，實現革命目的。他相信動員群眾的意志力量，可以解決當時所面對的社會問題。這些群眾意志力量的來源，包括下列幾種途徑：(一)聯合陣線(mass line)：毛澤東反對儒家思想傳統教條，教化控制絕大多數沒受教育的廣大群眾，這種消極的民眾和保守的領導方式，不符合革命成功所需的行動主義社會和動態領導的方式。¹⁶⁵ 毛澤東自認為是一位民粹主義者(populist)，他相信人民故有的智慧和權力，認為沒有人比他更瞭解80%人口的中國農民。(二)運動(campaign)：運動係透過民眾的大量動員，集中在某項特殊議題，目的在社會政治的改造或經濟的發展。第一類運動首先必須改變民眾對議題和社會關係的思

¹⁶⁵ 朱言明，《共產主義在中國及其變革》(臺北：黎明文化，2000年)，頁73-86。

想，例如，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首先引起民眾的憎恨感，把既存制度視為一種階級敵人。第二類運動被利用於改變基本生產型態，例如，利用運動把農業集體化，把工業和商業社會化，使民眾能全心全力奉獻，以改善經濟發展。綜觀毛澤東時代(1949-1976)的民眾運動，很多後來都證實造成重大傷害，其動員運動之頻繁，使得當時和後來中國歷史事件的紀錄，都以主要的政治運動為發生的時間軸。運動的型態標示著毛澤東的核心信仰，使其能充分動員群眾完成他所設定的目標。(三)鬥爭(struggle)：¹⁶⁶ 毛澤東認為儒家思想過於穩定、和諧和保守，否認和諧的社會價值，他認為保守的菁英領導，使國家無法站在的20世紀世界舞台的最前端。鬥爭是直接面對的方式，透過暴力與暴行打破前規，他相信也覺得，鬥爭可以為那些過於被動和安於現狀的民眾建立勇氣和骨氣。透過鬥爭，中國可以瞭解其潛力掌握自己的命運。屢次的事件表明毛澤東把個人的鬥爭含括到群眾鬥爭之中，這是他人生命冒險性格使然。全世界大部分政治的領導者，都會想盡辦法確保其民眾生存安全，毛澤東卻常常攪動社會的茶壺作為他行事原則的一部分，事實上，鬥爭是毛澤東唯心主義的關鍵。鬥爭促成社會認同的改變，鬥爭的目的主要在相同社會關係網絡之中，產生政治和社會的裂痕。例如，1950-1952年的土地改革，許多農人以鬥爭反抗原來是他們親戚的地主。事實上，鬥爭本身係透過暴力和透過違反社會禁忌弱化社會網絡，毛澤東希望藉此在參與者的心中創造一種新的社會認同。(四)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一個毛澤東政治進程中最持久的主題是平等主義的美德，這種美德對毛澤東而言主要是簡樸生活。像中國這樣極度貧窮的國家，實在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提升大部分人的生活水準，因此只能使大家維持在較貧窮的水平。毛澤東時常讚美貧窮

¹⁶⁶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Press, 1991), 541-573.

和簡約，因為窮人很少擁有既得利益，所以他相信貧窮的天性，更有意願建立一個新的社會。他常常規勸其他共產黨員生活要簡單，既因為這樣可以降低彼此間的距離，也因為他覺的貧窮可以創造更多有道德正直的人，進而上行下效。另外毛澤東利用平等主義結合聯合陣線，以更能動員群眾力量。沒有毛澤東的這些唯心主義，政治改革與經濟發展是很難成功的。

三、反唯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

在 1910 和 1920 年代的中國，毛澤東是屬於最低程度的知識份子。雖然他接受了既傳統又現代的完整教育，卻沒有獲得高知識分子的身分地位。他曾經在北大圖書館工作，雖然從那裏他獲得了引導當時政治思想的知識，卻不具學生或教授的身份。綜觀一生，毛澤東參加許多傳統知識份子的活動，他寫詩、臨摹和批判同事的作品。他常在其演講和教科書中，引用古代歷史、哲學和當代國內及外交思想。一般而言，毛澤東所厭惡的知識分子，包括醫生、科學家、工程師、記者、學者和創作家。毛澤東認為知識份子含括傳統中國的方法，基本上他鄙視那些只會念書、空想的知識分子，這些知識份子違反了毛澤東政治領域的三個過失：第一，他們從不沾手與其他份子學習真實的情況；第二，他們是一群指出技術限制的反對者，認為毛澤東的群眾行動的限制；他們藉由優越感強調社會的不平等。總之，知識份子帝國主義的一份子，非除之無以革命成功。

四、矛盾與統一戰線(contradictions and the united front)

毛澤東認為世界是複雜、緊張和衝突的，作為一位有效的領導者應當瞭解到衝突所強調的是矛盾，因此策略的選擇也應從矛盾中而來。毛澤東認為所有的努力應該先針對解決主要矛盾，一

一旦主要矛盾獲解決，就開始針對下一個新的次要矛盾。對付每一個主要矛盾，必須動員其所能匯集的力量應付，對於次要矛盾雖然也要注意和分析，但關鍵還是在瞭解和有效處理主要矛盾。基於此，就需要採行統一戰線的戰略，例如先提出國家主義統合國民黨部隊對日抗戰，抗戰勝利後再全力對付國民黨。統一戰線的戰略，是毛澤東思想中的一項強烈的哲學基礎。

五、階級與階級鬥爭(class and class struggle)

毛澤東的矛盾概念，一部分來自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另一部分來自中國傳統哲學思想，這種矛盾概念所關心的是階級。階級分析形成毛澤東鬥爭、矛盾統一戰線和群眾政治運動理論的基礎，毛澤東階級思想的結果是階級社會的 PRC 出現；換言之，社會階級是持久固定的，嚴格區分了民眾的生活經驗和觀點。中國人很少會允許其小孩與階級背景較差的人結婚，因為階級差代表較易受到政治和人身攻擊，因此階級差者必須不間斷的與其反對者永遠的鬥爭。這裡的反對者通常代表知識份子、商人、農場主等。階級鬥爭通常會毀了政治精英，例如毛澤東時期的文化大革命，目標在一些黨內同志，汙名其為資本主義階級。¹⁶⁷

六、自立更新(self-reliance)

毛澤東思想的另一項特徵是自立更新，這並非意謂完全靠自己的努力，而是自我掌握自主權之意。這種自立更新對中國而言在 1949 年到 1958 年大躍進前的時期是唯一例外，當時中國極度依賴著蘇聯。1958 年前中國與蘇聯維持極親密關係並從中獲得極大利益，然而 1958 年後中、蘇關係開始變淡，1960 年夏天蘇聯還突然撤回在中國的協助；蘇聯的轉向，造成可怕大躍進的經濟後

¹⁶⁷ 朱言明，前引書，頁 90-98。

果。對蘇聯這種背信和造成中國損失的反應，毛澤東認為未來中國堅持國家自立更新的策略，這使得中國後來外交政策盡量不依賴任何國外單一國家。例如，儘可能多管道從國外獲得物資來源，即使物資價格升高或惡化了國內的物資也一樣。¹⁶⁸

第二節 國內發展的思想根源

壹、中國共產黨民主專政

一、中國共產黨對其政府之影響

中國共產黨（簡稱中共）具有雙重的身份，它包含部份在政府機構中的人，而這些人也具備在黨中管理的地位。雖然這種雙重身分的人粗估只有 50 萬人，但我們所討論的中共而關心的也就是這些少數。中共大部分包括的黨員在黨中都是沒有職位的。大部分政府官員或軍官都是黨員，而很多的國營企業勞工、農民、大學行政人員等等也都是黨員。至 2014 年底中共黨員總數為 8779.3 萬人，較 2013 年底增加 110.7 萬人，增幅 1.3%。¹⁶⁹ 雖然中共是國家的政治菁英，但並非黨員人人都是政治菁英。

1942 年，當中共領導階層在延安面對日益複雜的問題而首先處理的議題時，中共協商要保證中共掌控所有機構，包括：政府、軍事和其他大量的機構。1949 年中共對此保證途徑仍然維持，到了 1950 年代中期，當時中共最高領導階層，在中央政治局決定透過三個單位徹底履行：即為黨和大量工作的鄧小平總書記、中央

¹⁶⁸ Kenneth 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Press, 2003), 59-83.

¹⁶⁹ 中央社，〈中共黨員人數〉，2015 年 6 月 29 日，取自《中央通訊社》，<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506290457-1.aspx>，檢索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

軍委會和經濟和外交事務委員會。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委員會建立，至此中共權力開始掌控所有政府官僚機構。

大躍進期間中共進一步進化，擴大中共的角色，其中總書記在中共中央藉透過篡奪政府的工作，而權力大幅提升。1960年代初期，因為大躍進的失敗，中共的權力有些退縮，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也受到紅衛兵批判。1960年代末期，新的政府權力組織（簡稱改革委員會），把中共和政府溶合成單一單位。1970年代中共權力逐漸復甦，毛澤東死後，改革委員會被轉入政府組織內。1980年代雖然政府官員企圖分隔黨與政府使雙方更獨立，但這種努力也在天安門運動鎮壓和趙紫陽清算之後完全消失。

中共保存的權力可以決定所有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政策議題，而且可以指定所有公共部門的領導者，包括：政府機關、公共機構和國營企業。中共採用四種基本方法以能繼續控制所有的官僚：當權者指定與連鎖指揮、小團體領導、黨核心團體和黨的活力。這四種方法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或更早以前。這四種全部方式把政府官員鎖入在由黨所操控的權力網路中，使得面對今天中國政治系統的主要議題是如何建立一個有效黨、政功能分離的系統。¹⁷⁰

二、當權派任命與連鎖指揮型態

當權者字義來自前蘇聯的用法，它包括領導職位的清單、黨單位任命或免職的權力使用，和管理任命或免職過程的規則。透過中共當權派系統，中共可以管控不只是黨內所有的領導職位，還有政府部門、司法系統、學校和大學、企業、研究機構、宗教

¹⁷⁰ 朱光磊，《中國政府與政治》（台北市：揚智文化出版社，2004年）。

組織、博物館、圖書館、醫院等等，所有重要職位都在中國共產黨當權者的掌控，即便是像國家人民代表大會的主席，規定由國家憲法選出的官員，也都由中共當權派任命。透過這種黨獨裁手段的權力，以決定所有領域誰能加入國家的精英團隊。

掌控當權者模式的規則隨時期而有不同，而且對它的範圍和運作方式的公開資訊並不多。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共中央委員會明顯地運用當權者權力負責不同的經濟部門。這種當權者運作模式在文革期間停止，也沒有在毛澤東死後由改革者恢復，取而代之的是由中央委員會的組織部門負責承擔。從 1950 年代中期到 1984 年，當權者模式一般允許下授二階，因此中央委員會直接把握的當權者名單，不只在部會、省的層級，也在局和處的部門階層，這些部門數量仍超過數千個。因為下授二級的系統，使當權者模式的名單不同。

透過當權者任命的領導方式是有所不同的，政治局常委決定中共總書記和各省的領導者。在有些例子中，領導小團體在其轄區內扮演對任命批判的角色。例如，在 2002 年，所有最高銀行職位雖然都在當權者的名單中，但事實上受到金融工作委員會所掌控，直到 2002 年 11 月中共 16 屆中央委員會才轉由溫家寶為領導，當時他是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一員和副總理的身份。

從 1990 年代中期之後，中共尋求改善領導的階層，並且在不放棄控制最後結果下增加透明度與任命過程。在 2002 年 7 月 23 日，這種結果瀰漫著規範的提升並公布黨和政府領導幹部的任用。規則設定需要教育水準、訓練和對不同種類職位的工作經驗，並且要認同職位的升級一次一階的理念。他們開始鼓勵提名比可

用職位更多的幹部，提供更多的諮商，甚而從被選出的許多單位領導人中票選。但也有例外，第 17 條規定：雖然民主任命方式最重要的應該考量一種最接近考選的方式，但禁止單只依賴票選方式。

總之，中國共產黨除了在私部門外，非常緊密地控制所有精英的職業調動。基於從 1970 年代末期改革開始，雖然中共已經很努力注意到許多活動的細節部分，但幾乎完全保留控制對精英任命和免職的權力。到 1980 年代末期，在中共當權者領導統治下，任命職位名單大約超過 800 萬個，在這 800 萬個名單之外，中共仍然極大干涉著指派決定和影響職業機會。因此，除了外資聯合企業或私人公司外，任何黨職均不可能轉讓。依此觀點，在改革氛圍下，全體決策的地方分權模式，將增加那些無法進入私部門的地方專制的機會。¹⁷¹

三、中國共產黨核心組織與黨的活力

中共當權者系統掌握在任何階層，決定誰可加入中共精英體系的有力武器，而連鎖指揮利用在黨委員會中，藉由掌握政府關鍵職位，以管理所轄區域，更進一步鞏固中共控制權力。然而這些措施係低調運用黨的權力掌控政府的組織機構。從這樣的觀點而言，中共權力核心組織是被隱藏的，因為它被形塑成一系列的秘密組織，也就是小團體領導和黨的核心團體，這並沒有出現在政府單位的組織章程中。

除了使用任命和免職權力，以控制國家機構的領導之外，中共還實施連鎖指揮的槓桿手段，所謂連鎖指揮係指黨的關鍵幹部

¹⁷¹ Kenneth 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Press, 2003), pp. 171-242.

本身仍可掌控政府機構。1950年代，連鎖指揮部分反映出當時受信賴的高層領導幹部的不足，因此不得不一人身兼兩職，既為黨的最高總書記，又為所轄區域的最高政府領導。對中共而言，連鎖指揮的重要性，主要原因是在每一司法管轄區的政府最高領導階層，也都掌握黨司法委員會的職位。

中共在不同的政府部門，正式構成黨的核心團體，這種組織形式明顯的不用在最高政府階層以下的部門。在那些較低層級的政府單位，黨員與下級部門形成一個黨委員會，委員數量由黨員所決定，而最高政府層級同時有黨的核心團體和黨委員會，其中黨的核心團體才是權力實體。

中共的核心團體可以追溯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最初的想法是要提供高層黨員有另外一個討論的論壇，使當時中國共產黨的願景是可以招來許多非黨員份子進入當權職位。在1950年代政治運動之後，不再有這種最初理性的想法，也沒有非黨員者進入高層職位，然而，這種黨的核心團體方式仍然在持續運作。

中共的核心團體包括在各政府部門中最高階層的黨員，這些個別的黨員會議決定部門重大處理議題並修正方向，然後帶著政府的帽子變成部長或副部長指導或履行之，黨核心團體的真正人員是秘密的。1980年代末期，改革派企圖淘汰黨的核心團體運作，而主張不要有區別目的，對非黨員的優秀份子也應允許有高層職位，雖然1987年這種概念被採用，但實行不完全，尤其在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廣場鎮壓之後，改革就嘎然而止。

除了中共的核心團體外，每一政府可以有依黨員人數多少，

代表參加黨委員會或進入黨核心團體之中，沒有黨核心團體的地方，黨委員會就執行所有黨核心團體該有的功能。此外黨委員會也實行黨的活動，一系列的活動目的都是要普及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執行黨的政策並維持紀律和黨員間的團隊精神。黨的活動一般包括黨員的定期會議，會議中有資料閱讀和議題討論。雖然有這些管道，中共仍然認為需要在非黨員同志瞭解之前，學習認識新的政策或問題。

1966 年以前，雖然中共的黨活力是非常重要的，但其活力在文革期間和剛結束時期有消退現象，並在改革下遭受更大侵蝕。目前黨員身分仍包括參加會議活動的義務，並也強調服從中共領導，要求對議題一致的黨紀。在中國共產黨控制整個政府和其他組織中，儘管有缺口和剝落，黨活力是這種控制機制中的另一塊磚。¹⁷²

貳、領導菁英權力互動

一、傳統權力平衡模式

中共在 2002 年 11 月舉行第 16 屆中共中央委員會時，發生了政治繼承，令人覺得此次會議既神奇又有趣，神奇的是因為本屆中央委會進行得如此平順、和平和不意外，相較於前幾次中共的政治繼承，本次是第一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中國共產黨經歷一次制度性的高層政治領導人移轉。而有趣的是因為中國政治學者們對有關第 16 屆中央委員會所透露的訊息和有關發生在中共政治精英上的這些事件的涵義，產生很大不同的結論。有些學者認為政治繼承不會在第 16 屆中共中央委員會，而另外一些學者

¹⁷² Kenneth Lieberthal, *op. cit.*, pp. 315-336.

建議雖然人治體系仍然是中共精英政治的主要角色，但政治繼承確實可以在制度化的條件下發生。

基本上，這些第 16 屆中共中央委員會結果的評論，自覺地或潛意識地反映出中共政治的不同理論觀點。不論其中哪一種評論都認為是一種零和賽局模式，它傾向勝者全拿（相反的，輸者可能全輸）。更客觀地說，這種結果可被視為在主要領導人中政治權力平衡的條件。再者，系統途徑可超越單位層次的分析，而且會考慮到在個體行為層次上政治制度化的限制。

部分學者從 1949 年到 1978 年分析中國政治所發展出來的兩個理論模式，一是傳統權力的平衡(balance of power)，另一種是扈從政治模式(bandwagon politics model)。權力的平衡假設政治結構是一種無政府的狀態，而扈從政治模式，強調國內單元功能相似的結構，以解釋中共權力菁英的互動。¹⁷³

二、新權力平衡模式

新權力平衡(power balancing)是研究中共精英繼承政治中的一種新的理論模式，它改變傳統的勝者全拿的賽局模式。新權力平衡模式，主要在說明解釋與傳統勝者全拿的賽局模式、傳統平衡理論和扈從政治模式之間的不同。新權力平衡模式的主要論點認為，21 世紀中共精英政治因為政治的制度化，基本上已不同於早期年代。政治制度化表示一種雙重的過程，它的過程包括地位權威在政治正確權威的代價下被恢復，和專家權威在紅色（共黨）權威的代價下被恢復等兩種過程。當下級接受職責，而只因為是上級就服從他時，等級體系就出現。另外一方面，當不同部門被

¹⁷³ Zheng Yongnian, "The Politics of Power Succession in Post-Deng China,"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8 No. 1 (June 2000), pp. 13-32.

專業化，而且部門主管被尊敬是因為他們支配知識主體和操控技術能力時，功能差異的結構就出現。¹⁷⁴

政治制度化導致一種政治結構，這種結構中正式制度所扮演的角色比非正式的網絡還重要。中共的政治結構包含正式和非正式的兩種次結構，而這兩種次結構都是等級性的組織，正式次結構，因為表明上、下級從屬關係，所以很清楚被金字塔頂端的核心所展現，而非正式次結構，因為不規則的連結，所以被各核心所構成的蜘蛛網絡所展現。在毛澤東時期，因為他是兩種結構的結合化身，所以正式次結構的核心與非正式網絡的核心相通一致。然而兩相比較，通常非正式網絡結構所扮演政治角色的重要性，明顯比正式次結構的還高。毛澤東時期，它可以很容易改變正式次結構，非正式網絡結構的優勢一直持續到鄧小平時代，當時鄧小平是非正式網絡結構的核心，但不是政治系統中正式次結構的核心，它可以從其所擁有的地位，運用權力影響到正式次結構。在江澤民時代，正式次結構所扮演的角色才開始比非正式網絡的結構還重要。這種根本性的改變發生在1992年，當時鄧小平決定完全退出政治並且廢除中央政治局的影子——中央顧問委員會。因此，雖然非正式網絡結構仍然扮演輔助性的角色，但正式制度已經開始宰治整個中國政治。如同政治制度化的結果，中共精英政治特性已完全改變。首先，因為地位的權威性，所以最高政治部門從一個政治領導者轉移到另一個政治領導者是具備很高的政治意義的；第二，政治賽局中可以有多位贏家；第三，因為功能的差異性，所以可以得到政治行為體之間的權力平衡。¹⁷⁵

¹⁷⁴ Zhiyue Bo, "Political Succession and Elite Politics in Twenty-First Century China: Toward a Perspective of Power Balancing," *Issues and Studies*, Vol. 41 No. 1 (March 2005), pp. 162-217.

¹⁷⁵ Kenneth 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Press, 2003), pp. 171-242.

新權力平衡的模式與傳統勝者全拿的賽局模式之間的不同，主要有如下兩項，第一，不像勝者全拿的零和賽局模式，新權力平衡的模式允許非零和政治賽局的可能，勝者全拿的零和賽局模式，認為中共精英政治把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力視為不可分割，一個政治領導者不是完全握有絕對權力就是完全失去權力，其間沒有任何其他選擇的餘地。另外一方面，新權力平衡的模式主張政治權力的可分割性，是因為功能差異性所造成，並且還認為權力運用的空間可以再擴大。第二項不同是，不像勝者全拿的賽局模式可以不斷預測未來全贏或全輸的情況，新權力平衡的模式想表明的是，就政治結果而言，多位贏家的存在可能性。依據學者鄒讜先生的分析，中國菁英政治最明顯的特色是，精英間權力的爭奪處於不規則的間隔時間，不論是爭奪最高權力或次高權力，始終都是一方全贏或者另一方全輸，他還認為這種特色不只在中共精英政治發生，也出現在整個 20 世紀的世界諸國政治，他還要求中國學者學習接受這種中國政治的特色。然而，新權力平衡的模式，主張功能差異性的原因，政治領導者並不需要一個全勝的贏家。

新權力平衡的模式，基本上不同於權力的平衡和扈從政治模式。新權力平衡模式與傳統權力平衡的差異，主要在它明顯假設政治結構是一種等級的組織；而也不同于扈從政治模式，因為它強調單元功能差異的結構，而這卻是新權力平衡模式的主要特徵之一。顯然，在 21 世紀中共精英政治中，新權力平衡模式能夠提供較佳的選擇觀點，因為它已經考慮到 1990 年代政治制度化的這種基本政治結構的改變，也因為這種政治制度化改變的結果，所以地位權威被重新恢復，正式的次結構成為主宰，單元的功能差

異性變得更重要。這都是新權力平衡模式的優勢所在。¹⁷⁶

叁、影響中共政權之因素

一、領導階層的認知差異

中共領導階層已從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學習到教訓，中共中央政權若不能同心協力，將會被各個擊破。然而中共高層政治人物各有私心，若有機會取得更多權力時，他們有可能鋌而走險，直接訴諸動員群眾。六四天安門事件時，趙紫陽就曾試圖放手一搏，大規模抗爭增加領導階層分裂的風險，因為這向領導人展現追隨者已經就緒，迫使領導人站在群眾這一邊，其危險性並不在於個別領導人的人格特質，而是共黨結構使然。

表面上，中共領導集體階層的關係風平浪靜，然而在一團和氣的表面下，黨內分裂可謂山雨欲來，經過 20 餘年市場改革的政策共識後，批判西方經濟學和市場的馬克思主義者大力譴責改革，造成中國的不平等、社會動盪和貪污腐敗，顯然這股批評聲浪的背後有幹部在撐腰。領導班子的分裂將使中共政權瀕臨危機，因經濟改革而出現了不平等與貪腐等社會問題，但中共黨中央領導人對於發生的原因和救濟之道，目前仍然莫衷一是。

中共處在劇烈動盪的社會，政治的結果常因政治遊戲規則的變化而難以預料。在中國大陸，有野心的政治人物每天都會面臨新的機運和挑戰。不過，隨著大眾媒體和網路為求吸引人閱讀，時時在測試他們報導新聞的底線，領導階層權力的角逐勢必會攤在陽光下。對於有野心的政治人物而言，民族主義自然就是他們

¹⁷⁶ Kenneth Lieberthal, *op. cit.*, pp. 246-272.

樹立聲望的舞台，我們必須預判未來幾年，中國內、外危機的各種可能，包括有使權力角逐訴諸群眾情緒，而讓共產黨窮於應付的危機。¹⁷⁷

二、大規模的社會不穩定

中共領導人非常注意所謂社會穩定的問題，換言之，就是防範可能瓦解共黨政權的大規模社會動亂，他們用社會穩定這個委婉說辭來說服民眾，共產黨統治是維持秩序與繁榮的基石，若無此基石，像中國幅員如此廣大的國家必定會陷於內戰和失序，影響中共內部動亂的原因，主要分述如下：

(一)示威抗議：從北京來看中國社會，彷彿是在騷動上沸騰的熱鍋，抗議的頻率、規模和暴力與日俱增，讓領導人密切注意，在領導人指示下，社會學家和公安幹部已著手針對社會抗議發生頻率和根源加以研究，這無非就是要終結社會的抗議聲浪。

(二)族群騷亂：某些最暴力的集體行動是由中國新疆少數民族和宗教團體所推動，這些少數民族散居在關鍵邊疆的戰略地位，如西藏、蒙古和新疆等，其激進的民族主義運動，使中共倍感壓力。

(三)工人騷亂：共產黨領導人把工人騷亂視為最具威脅形式的示威抗議，到目前為止示威者多屬下崗工人，而非在職工人，他們主要是不滿離職的補償條件，他們常利用有壓制就有反抗，有剝削就有鬥爭為口號進行騷亂。

(四)農村騷亂：獨裁者很少把農民視為嚴重的政治威脅，因為他們

¹⁷⁷ Minxin Pei, "The Dark Side of China's Rise," *Foreign Policy* (March/April 2006), pp. 32-40.

散居鄉間，組織不易，而新聞記者們也不太會注意到農民的抗議。不過農民揭竿而起的歷史悠久，因此毛澤東證明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也能奏效。

(五)學生騷亂：一般大學生深知明哲保身之道，一心以前途為念，避免政治紛擾，他們之所以小心謹慎，與其說是畏懼鎮壓六四天安門事件重演，不如說是對政治不抱希望以及對物質成就的強烈渴望。然而能量是蓄積式的，一旦學生發動示威，通常在表達對國內政局的不滿，進而容易形成人民對政府不滿的情緒。

(六)民族主義的騷亂：中國領導人不吝在人民前面展示中國的拳頭，因為他們覺得有必要疏導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中國領導人最怕的民族主義運動與失業工人、農民、學生異議團體匯集在民族主義的大旗下，就像國民政府推翻滿清政府一樣深植人心。中國不管是誰統制，一旦在外國壓力下屈服，其政府就有可能被推翻。¹⁷⁸

三、中共的軍權弱化

西元 1949 年中共建國之前，解放軍就是政治要角，文化大革命期間，解放軍與共產黨就合為一體，毛澤東和幾位中共領導人曾領兵作戰，而解放軍的高級將領也是政治局的成員，1949 年之後，解放軍的每個單位都有政委，而解放軍則被推為意識形態鐵衛的模範，黨與軍幾乎溶合成一體。2002 年，江澤民卸下黨總書記，卻仍握有軍委會主席之職，總書記兼中央軍委會主席的角色一旦分裂，軍方高層領導就無所適從，而開始出現一邊是總書記胡錦濤，一邊是軍委會主席江澤民的雙重權威路線的局面。當時

¹⁷⁸ 陳佳棟，《中國農民調查》（臺北：大地出版社，2005 年）。

江澤民本來有意做滿中央軍委會主席的五年任期，但聽到解放軍將領的議論紛紛之後，做了兩年的中央軍委會主席即卸職。任何有意角逐中共中央大位領導者都必須克服的最大障礙，就是爭取軍方的支持，確保解放軍對他個人的效忠，是為第一要務。

中共領導人透過委由準軍事角色的人民—武裝警察，職司國內治安第一線的功能，也降低解放軍在未來如同天安門事件中不願對百姓開槍，或將槍口轉向文官領導人的風險。解放軍自然樂見加重人民武警的角色功能，因為天安門事件軍事鎮壓，摧毀了軍方的專業形象和戰鬥力。中共都知道，1989年12月羅馬尼亞的獨裁者西奧塞古，命令軍隊向示威者開火，結果軍隊叛變，反而逮捕了西奧塞古，這讓中共當局高層非常重視，也學到了確保黨、軍同心的重要性。¹⁷⁹

第三節 鄧小平時期之政經體制改革

壹、從馬克思到自由主義之間的過渡

一、重商主義(經濟民族主義)的特點

重商主義的形成與市場的固有傾向有某種聯繫，因為市場總是趨於聚集財富，並在經濟強國與弱國之間建立起一種依附的或強權政治的關係。較溫和的即為防守性的重商主義，試圖保護本國經濟免遭外來經濟及政治力量的影響。這種溫和式重商主義通常出現在低度開發的國家或那些經濟已開始走下坡的開發國家，以保護其新建或衰弱的工業。而強硬的重商主義則是經濟戰爭的

¹⁷⁹ 溫哈溢，Susan Shrik 原著，《脆弱的強權：在中國崛起的背後》(台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頁46-97。

產物，這種重商主義最崇尚權力擴張。¹⁸⁰

重商主義認為，在一個充滿國家間競爭的世界上，相對獲益比絕對獲益更為重要，因此各個國家都在試圖改變國際經濟關係法則或規律，以獲取比其他國家更多的相對利潤。不同於經濟自由主義強調國際貿易的互惠互利上，重商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認為這種貿易關係，本質上是相互衝突的，儘管自由主義強調相互依賴，但這種互賴關係在重商主義看來是不對稱的，它是持續衝突與威脅的根源。

重商主義者工業化作為其首要的目標，首先因為重商主義者相信工業對經濟具有溢出效應，會導致經濟總體發展。其次，重商主義把工業與經濟上自給自足和政治上的自主權聯繫在一起。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由於工業在現代世界上是軍事力量的基礎和國家安全的核心，所以工業受到格外的重視。¹⁸¹

二、1980 年代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理論

(一) 從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過渡

鄧小平打破了中共過去盛行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信仰，解開了極左派意識形態的思潮和「兩個凡是」的束縛，並推翻了林彪、「四人幫」的思想，使中共大部份人否定了「四人幫」以馬克思主義為主的極左路線，啟發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型態的重新思

¹⁸⁰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Press, 1991), 627-681.

¹⁸¹ Kenneth 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Press, 2003), 123-167.

考，並推動人們糾正毛澤東晚年左傾的思想。¹⁸²

(二) 從農村改革到工業改革的過渡

依據中共國民經濟調整部署，經濟調整主要採取以下措施：
1. 調整農業政策，調動農民生產方式，加快農業發展，國家大幅度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同時減免部份稅收，降低農用工業品價格，加強對農業支援。2. 調整輕重工業比例關係，加快輕紡工業發展，支持集體企業和小商品生產，放慢重工業發展速度，增加產量、改善質量，允許一部份產品自產自銷。3. 提高國民收入中，消費基金的比重，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4. 壓縮基本建設的規模。1980年，中共從農村改革到工業改革的過渡，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度增長10.9%，國民收入增加6.4%，工業總產值比重從43.1%上升至47.2%，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增加。

(三) 從經濟特區到對外開放的過渡

中共11屆3中全會前，鄧小平等一些國家領導人頻頻出訪，先後訪問日本、東南亞各國和西歐等國。3中全會結束不久，鄧小平於1979年1月出訪剛與中共建交的美國。9月，他明確提出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吸收國際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擴大與資本主義國家經濟貿易關係，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他並強調在當代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發展，孤立起來、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強國際交往，不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先進技術和資金，是不可能的。」此一論述，奠定了中共對外開放政策的理論基礎。1980年8月26日，5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會議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4個經濟特區，並公布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標誌經濟特區正式

¹⁸² 馬立誠、凌志軍，《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台北市：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

誕生。之後國務院相繼調整特區擴大面積，增長了特區的實際功能。1981年5月至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京都召開廣東、福建兩省和特區工作會議，為特區制定了政策措施，包括關稅優惠、簡化出入境手續、實行新的工資制度和金融政策、引進外資、制定特區法規、特區行政體制和管理機構等設置。1984年1月至2月，鄧小平等視察深圳、珠海和廈門等3個特區，指出，「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需要「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快更好些。」他進一步認為，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同年5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開放從大連到北海計14個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再決定分兩步開放沿海經濟特區，第一步先開放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第二步，將遼東半島、膠東半島開闢為沿海經濟開放特區。鄧小平之對外開放的理論於是形成。¹⁸³

貳、國內農經發展改革

一、對人民公社的態度

就鄧小平對人民公社的態度而言，在1961年4月，鄧小平和彭真到北京郊區順義進行調查研究。通過調查研究，鄧小平認為，農業減產的原因是政策問題，人民公社的一些政策，影響了群眾生產積極性，人民公社不是一個成功的試驗。他充分肯定了當時尚有爭議的「三包」（包工、包產、包成本）、「一獎懲」（超額有獎，減產受罰）、「四固定」（土地、勞力、耕畜、農具固定到生產隊使用）的責任制，指出「一定要實行定額包工，多勞多得是天

¹⁸³ 張豈之、楊先材，《中國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頁323-438。

經地義的事，是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¹⁸⁴

對此當鄧小平成為了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因為自身親歷了人民公社之形成與解體的全部過程，對人民公社反覆的思考，最終對人民公社的解體起了重要的決策作用。1983年5月22日鄧小平會見非洲模里西斯共和國總理賈格納特(Anerood Jugnauth)時說道：「我們農村過去十分貧困，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搞『以糧為綱』，人民公社制度的試驗也不那麼理想。」同年9月，鄧小平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在談到農村政策時再次說，我們過去的失誤都是由於走得太快。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指出，隨著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現行農村政社合一的體制顯得很不適應。當前的首要任務是把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通知要求這項工作要與選舉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工作結合進行，大體上在1984年底前完成。因此，人民公社的體制到1984年最終結束了。

二、家庭聯產承包制

家庭聯產承包，意味著對「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的徹底否定。當時黨內許多黨員認為，仍然必須注意保持人民公社體制的穩定。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討論生產責任制問題時，只有少數省委書記明確表態支持。同年6月，中共在五屆人大二次會議期間，擔任中共安徽省委書記的陳雲，陳雲對安徽的包產到戶做法表示雙手贊成。鄧小平在聽取會報後說：「你就這麼幹下去，實事求是地幹下去。」關鍵時刻，鄧小平對生產責任制表明了支持的態度，支援包產到戶，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¹⁸⁵

¹⁸⁴ 楊東海，2013年7月8日，〈鄧小平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3)〉，取自《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n/2013/0708/c85037-22119887-3.html>，檢索日期：2014年4月30日。

¹⁸⁵ 龔建文，2013年11月19日，〈中國農村改革30年：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新農村建設〉，取自《鳳凰網圖書》，

1979年9月，中央召開了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討論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會後中央發出通知，第一次鄭重地肯定了大包產到戶的改革行動。1982年12月五屆人大五次會議修改憲法，決定改變農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體制，重新設立鄉政權。人民公社宣告退出歷史舞臺。12月31日，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了《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指出：「人民公社的體制，要從兩方面進行改革。這就是，實行生產責任制，特別是聯產承包制；實行政社分設。」政社合一的體制要有準備、有步驟地改為政社分設，準備好一批改一批。人民公社原來的的基本核算單位即生產隊或大隊，在實行聯產承包以後，有的以統一經營為主，有的以分戶經營為主。它們仍然是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的合作經濟。原來的公社以及和非基本核算單位的大隊，是取消還是作為經濟聯合組織保留下來，應根據具體情況與群眾商定。¹⁸⁶

三、支持鄉鎮企業

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不僅成為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而且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也佔有相當比重。鄧小平時期以來，中國鄉鎮企業經歷了1984至1988年、1992至1997年兩個超常規快速發展階段。在1984至1988年期間，鄉鎮企業增加值從633億元增加到1,742億元，增長175%。1987年鄉鎮企業產值首次超過農業產值。1990年全國鄉鎮企業增加值為2,504億元，2000年增加到27,156億元，10年來增加9.8倍，平均每年遞增26.9%。此後21世紀中國鄉鎮企業依然對經濟和「三農」發揮著重要作用。¹⁸⁷

http://book.ifeng.com/shupingzhoukan/special/duyao113/wenzhang/detail_2013_11/19/31388757_0.shtml，檢索日期：2014年4月24日。

¹⁸⁶ 人民日報，2008年10月6日，〈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取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135439/8134114.html>，檢索日期：2014年4月30日。

¹⁸⁷ 同前註。

家庭承包制解放出來的農村富餘勞動力要找出路，鄉鎮企業的興起為這些勞動力的就近轉移開闢了途徑，但鄉鎮企業在地區之間的發展也不平衡。在一個時期內，鄉鎮企業主要在東部沿海地區和城市周圍得到發展。沿海發達地區和城市不僅迅速解決了本地富餘勞動力就業的問題，而且出現勞動力資源短缺的現象，產生了對勞動力新的需求。鄧小平時期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給農村帶來的變化是廣泛而深入的。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生產力，農村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後最徹底的變化是，混淆了20多年的集體與個人權益的關係，第一次得到了符合實際情況的劃分。由於經營成果與生產者的利益緊密掛勾，吃「大鍋飯」的弊病得到克服。因此，在農村產生了一種新的經濟動力，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得到充分發揮，農業產量得到迅速提高。廣大農民廣開生產門路，發展多種經營，生產力獲得大解放，生產率得到明顯提高。¹⁸⁸

叁、政治民主化之衝擊

一、1989年天安門事件

西元1989年前4月8日，胡耀邦在政治局會議中強調應給予教育更多的支援時，心臟病突發，延至4月15日過世。4月16日、20、22、27及5月4日，北京各校學生由於悼念胡耀邦引發了民主遊行，多次徒步前往天安門廣場。5月13日，有2,000名大學生組成了絕食團，5月19日以後，遊行人數逐漸超過50萬人。參加的人由大學生擴及高級知識份子、新聞從業人員，再擴及工人、農民、個體戶等。遊行示威群眾主要訴求是民主、制止官僚

¹⁸⁸ 吳允和，2009年08月27日，〈鄧小平頂壓力堅決支持包產到戶〉，取自《sina全球新聞網》，http://news.sina.com/c/sd/2009-08-27/180718525224_5.shtml，檢索日期：2013年6月30日。

貪污並與領導人對話。由於學生們喊出李鵬下臺、鄧小平退休，使民主運動很快捲入中共內部派系鬥爭的漩渦。

同年5月17日，趙紫陽發表書面談話，肯定學生要求民主與法制、反腐敗、推進改革的愛國情操。5月19日，趙紫陽到天安門探視學生，含淚勸學生停止絕食。同日，李鵬在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上，指責有人要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揚言要揭露「極少數人」政治陰謀、反對動亂。是日，楊尚崑在同一會議上說：為了維護首都治安，已從外地調來軍隊。5月20日，北京宣佈戒嚴。6月3日凌晨2時，解放軍開始鞭炮示眾、是日晚20時以槍托擊打民眾、6月4日凌晨1時清場天安門、當日0249時最後廣播、0425時開始全面鎮壓，依據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的報告：最後造成軍人受傷6,000人、死亡數十人，市民及學生受傷3,000人、死亡270餘人，惟據後續的研析，實際死亡人數超過3,000人。6月5日，各地學生轉趨激烈，武漢、上海、南京、杭州、長沙等地發生學生臥軌抗議事件，仍有學生與其他群眾上街遊行，哀悼北京死難學生。6月7日，上海學生及其他群眾截堵火車，被輾死6人。6月10日有9名「上海工人自治聯合會」的負責人被逮捕。於此期間，貴州、蘭陽、鄭州、成都、哈爾濱等地均傳出武警逮捕示威群眾事件。¹⁸⁹

二、對民主化之影響

64事件之後，中共一面將民運領袖逮捕下獄，或加安撫，或放逐海外，以避免再生動亂；另一方面提高民主小黨派的地位，以製造民主假象。在鎮壓和安撫民運人士的過程中，中共對民主

¹⁸⁹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Press, 1991), pp. 683-747.

小黨派也加以攏絡。民主小黨派原與中共合作良好，但在六四民運中卻支持大學生的抗議行動。江澤民自 1989 年 6 月在十三屆四中全會中被選為總書記後，乃特別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協協商制度」。其後迄於 1997 年的 8 年間，中共與民主小黨派中央級的協商會、座談會、通報會共舉行了 100 餘次。中共攏絡民主小黨派並鎮壓和安撫民運人士，僅能緩和民運於一時，民運火花仍然隨時迸發。1993 年上半年，全國發生群眾性上訴、請願、遊行、罷工、罷課、罷市等事件計 4,921 起，參加人員 28 萬人。同年 11 月，一批民運人士聚集西安，簽署「和平憲章」，確立以「理性和非暴力的手段」，向有關機構上書，推動民主運動。

大陸民運的火花閃爍到 1998 年有新的光芒。首先，在當年 1 月，一個題名「中國需要新的轉變－民主派的綱領性意見」的文件，透過不同的管道，送到中共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員們手中，並儘可能送到知名人士、政府官員和大公司主管手中。文件的內容包括啟動民主進程、加大經濟自由、承認多元文化、調整對外政策及修正統一方針等 5 部分。1998 年 6 月至 9 月間，大陸各地掀起籌組「中國民主黨」運動，時機是在美國總統柯林頓訪華及以後數月。6 月 25 日，柯林頓訪華當日，64 民運學生領袖之一的王有才（北大物研所學生）等宣佈成立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備委員會。7 月 10 日中共逮捕王有才等 13 人，大陸民運人士上書江澤民要求放人，美國及海外華人士加以聲援，王有才等才獲釋放。其後，中共仍繼續逮捕在各地從事組黨活動的民運人士，並於 12 月 21、22 日，將在北京從事活動的徐利文、浙江從事活動的王有才、湖北從事活動的秦永敏等判處 11 至 13 年徒刑，至此，大陸民主運動又受到挫折。¹⁹⁰

¹⁹⁰ Andrew J. Nathan, *China's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71-192.

三、對經濟自由化之影響

六四事件當時，如果仔細觀察這場民主運動的現場報導，就會發現，嚴格意義上爭取民主訴求只是該運動的其中一個層面，另一個甚至可能比民主訴求更重要的層面，它是平等的訴求，他當時反應在「反腐敗」、「反官倒」和「反特權」的這類口號中，雖然中共 64 民主運動的起因，由於過分複雜，目前尚難達到一致的結論，但有一點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若無 1980 年代以來因經濟改革開放，引發中共城市居民分配差距擴大，和社會地位相對變動（如勞心者與勞力者收入比例倒掛相反，小商販生活水平超越無特權的幹部階層等），由大學生率先發起的爭民主運動，決不會蔓延、席捲成是各階層的全民抗議運動。

經比較 1986 年中共城市中發生的學生運動，與 1989 年六四民運不同的是，之前的民運學生們並沒有提出與普通市民日常經濟生活有關的訴求，其原因之一是大學生們想使自己的行動顯得更加高尚，不是為了爭物質利益而上街抗議，只是為了民主自由這樣的高價值，其二是大學生們不想給改革開放幫倒忙，因為當時出現收入差距擴大與物價高漲的，正是推行經濟市場化取向的改革開放所引發的。六四事件前，大學生們主觀願望式通過街頭示威運動，推動政治領域的民主化改革和經濟領域的市場化改革，大學生們在這一點上非常體諒中共黨內的改革派（當時以胡耀邦和趙紫陽為代表），為了邁向一個新的經濟體制，大學生們在轉型期間願意承受物質利益方面的損失。中國大學生的理想主義當時並沒有和普通市民的現實主義相聯結，結果是 1986 年以前的民運自始至終均侷限在學生的範圍之內，規模並不夠大。¹⁹¹

¹⁹¹ 丁學良，《共產主義後與中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年）。

然而 1989 年春運動初期時，雖然北京的大學生們仍然想把運動的目標限制在爭民主、爭自由，但一些更成熟的青年知識份子，他們大都是經歷過上山下鄉、經歷過 1976 年的「四五運動」和 10 年改革的民意調查的洗練，他們建議在爭民主示威運動的口號中，增加與普通市民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的相關內容，於是純粹的學生運動，立即演變成聲勢浩大的民眾運動，使得民主運動與民眾的現實需求相結合。六四民運事件對中共市場經濟的影響，可以從當時天安門廣場的遊行隊伍中發現，毛澤東的畫像不斷的出現，其實這種意象具雙重含義，其一是老百姓用鄧小平的宿敵和剋星來諷刺鄧小平。其二是對鄧小平體制下官僚的腐敗和貧富日益不均的極度不滿，民眾們反倒覺得毛澤東時代統治下的中國，較為清廉、較為社會平等，無所謂的巨富、暴發戶而較為可取。然而，中國大陸人民都知道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遠比鄧小平統治下的更不民主、更是貧窮。這顯然印證了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過程，必然會面臨到社會公平性所造成的不穩定問題。

第四節 江澤民時期之中國市場經濟

壹、江澤民的農經政策思想

以中共中央總書記以及國家主席身份的江澤民，於 2001 年 3 月 17 日參加中共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湖南代表團審議「十五」（第十個五年規劃）計畫綱要時說，中共中央在考慮制定「十五」計畫的時候，始終明確一個重要的指導思想，就是要鞏固和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加快農村經濟的發展，把加強農業和增加農民收入放到整個經濟工作的重點位置。江澤民認為近來，農民收入增長越趨緩慢，這是農村經濟發展面臨的突出矛盾，也是事關國民經濟全域的重大問題。在這樣一個偌大國家，發展經濟、擴大內

需是基本的立足點。十來億的人口，九億是在農村，擴大內需關鍵又是在於開拓農村的市場，所以必須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把農村潛在購買力變為實質的購買力。只有農民變富裕了，農村繁榮了，城鄉經濟協調發展了，人民日子才好過，「十五」計畫和第三步戰略目標才能真正實現。江澤民指出，「十五」期間，一定必須要站在全域的高度，繼續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這是增加農民收入的根本途徑。要著眼提高品質以及競爭力，加大實施「科教興農戰略」的力度，加快農業科技創新的步伐，提高農產品品質，提高農業的素質以及效益，努力使中國大陸的農業科技和生產力有一個更大的發展，因此，國家要加大對農業的支持保護力度。¹⁹²

除此之外，江澤民認為，在農業發展新階段，仍然是需要靠政策的，把農民的積極性調動好，保護好，發揮好。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農村最基本的經營制度，是農村政策的基石，要長期穩定不變。在穩定政策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當前要著重抓好兩件事，一是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二是推進農村稅費改革。這是理順國家、集體和農民之間的分配關係，是減輕農民負擔的治本之策。

再者，特別強調要確實維護農村社會穩定。農村穩定是對於中國大陸，全國穩定的基礎，也是農民群眾安居樂業，順利推進新階段農村改革和發展的前提條件。對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江澤民的態度則為：「最根本的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經濟建設和改革的

¹⁹² 周新橋、朱益上，2010年11月5日，〈淺談江澤民對鄧小平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思想的豐富和發展〉，取自《論文下載中心》，<http://big.hi138.com/zhengzhi/zhengzhiqita/201011/263672.asp#.U7ezXvmSyCc>，檢索日期：2014年4月25日。

主要任務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基本實現工業化，大力推進資訊化，加快建設現代化，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準。

為此，江澤民認為必須抓好關係全域的八個方面的任務：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大力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全面繁榮農村經濟，加快城鎮化進程；積極推進西部大開發，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健全現代市場體系，加強和完善宏觀調控；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準。千方百計擴大就業，不斷改善人民生活。實現工業化仍然是中國大陸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頗具艱巨的歷史性任務。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則是對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¹⁹³

加強農業基礎地位，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保護和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增強農業的市場競爭力，成為必需的過程。積極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開拓農村市場。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走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發展小城鎮要以現有的縣城和有條件的建制鎮為基礎，科學規劃、合理佈局，與發展鄉鎮企業和農村服務業結合起來。能夠長期穩定並不斷完善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有條件的地方可按照依法、自願、有償的原則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逐步發展規模經營，推動農村經營體制創新。增強集體經濟實力。繼續推進農村稅費改革，減輕農民負擔，保護農民利益。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國人民的生活水準和品質。要隨著經濟發

¹⁹³ 中新社，2001年3月7日，〈江澤民在人大湖南團談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取自《中國網》，<http://www.china.com.cn/chinese/lianghui/23526.htm>，檢索日期：2014年4月30日。

展，不斷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滿足人們多樣化的物質文化需求。繼續大力推進扶貧開發，鞏固扶貧成果，儘快使尚未脫貧的農村人口解決溫飽問題，並逐步邁入小康生活。¹⁹⁴

而為何江澤民提出了減輕農民負擔的原因在於，「三農」問題在中國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農民負擔不斷加重、農業的脆弱性和農民普遍貧困。而其減輕農民負擔之思想的主要內容，包括闡述了做好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深刻分析了造成農民負擔過重的原因，提出了確實減輕農民負擔的措施。江澤民減輕農民負擔思想對於促進農民增收、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貳、中共加入 WTO 的經貿限制性

一、對 WTO 的經濟信賴

中國大陸成為 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的會員係處於江澤民當政時期，其所必須執行的經貿責任和信任，詳細制定在長達 900 頁的法律文件中，基本上，中國大陸的保證包括：(一)對所有 WTO 會員提供非歧視性的待遇；(二)對輸入和輸出中共的同樣產品，消除其雙重價格和不同待遇；(三)取消對保護國內工業或服務商的價格控制；(四)藉修正國內法律和實施新的法規，符合 WTO 協議的承諾，以有效和公平的方式履行 WTO 的協議；(五)在加入三年之內，中共必須允許所有的企業都能進出口所有產品，並在有限的例外條件下，透過關稅領域而能相互貿易；(六)停止在農產品部份提供出口補貼。現今國外公司所面對的中共，是已經在三年轉型期間之後，許多限制條件的消除或鬆綁。在其

¹⁹⁴ 新華社，2002 年 11 月 8 日，〈江澤民報告第四部分：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取自《中國網》<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archive/229783.htm>，檢索日期：2014 年 4 月 30 日。

他領域，像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方面，中共將履行 TRIPs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中共必須採用非歧視的方式並根據 WTO 規則，增加在商業交易方面的透明度。

如何評估中共身為 WTO 會員的信賴度？信賴度在個人事務方面並非新的概念，從久遠之前在人類關係上，信賴度的重要性就始終被強調。在國際關係研究上，信賴度也一直被世界主義和國際社會的思想學派所吸引注意，這種思想學派與所謂的英國學派緊密結合，主流的國際關係途徑，例如，現實主義學派或自由主義學派，並不關注信賴度的概念，因此相對於其他全球政治的大量文獻，英國學派在國際事務上所稱的信賴度概念，並不多見。這種概念尚未完成發展，它被權力政治和關係的思想所掩蓋。例如，英國學派的大師 Hedley Bull 就認為，強權大國應該要有一種特別的信賴度，使在極度無政府狀態的世界中，獲得一點點秩序，畢竟相對於國內政府，世界政治中的中央威權機制是不存在的。換言之，強權大國必須扮演管理世界事務的角色，設定管理規則，維持其所喜歡的現狀。這種觀點當然是由權力政治所支持，卻被自由主義者所爭論，也被結構主義或馬克思主義所強烈挑戰，後兩者並不強調權力本身的運作，而是強調在不平等和非正義結果的基礎。因此，信賴度的概念是一種不同於以往國際關係解釋的爭辯。

信賴度可在三個面向進一步予以概念化：分別是國家的信賴度，國際信賴度和人道信賴度等三個分類維度，其中國家信賴度代表一種直接對人民的信賴度，例如國家負有保護國家和人民安全的信任，國際信賴度指的是國家間的信任，例如維持國際間的秩序與安全，而人道信賴度代表一種全體人類間普世的信任，例如人權議題等。這樣的分類明顯是西方取向，許多第三世界國家

並不同意這樣的分類，例如，中共認為人權是屬於國內事務，它不屬於普世的特性而屬於個別國家的國內發展的階段，再者，個人權利與自由被包括在集體或社會需求之下。¹⁹⁵

二、對 WTO 的經濟承諾

承諾是對協定履約的行動，是行動和規則之間的協調一致，一般認為是一種法律的概念，在政治科學中，它顯得愈來愈重要。全球化和一種在國家行為體與非國家行為體之間互動增加的結果，造就更大的國際行為規範和規則的交集。有些國家是法律協議和正式的關係，其他愈來愈多的國家是非正式的關係。一些學者主張國家絕對的主權將被國際機制檢驗，因為國家愈來愈發現受制於國際機制規則，這些規則限制他們之間的互賴。另一些學者主張承諾的概念，存在於更深層的承諾和更大強制力之間的一致性。換言之，機制形成的強制力，所導出的國家承諾在整合和合作領域是必須的，因為國內行為體通常有破壞承諾的貿易保護傾向。總之，評估承諾是一個困難的工作，就像國家爭論什麼構成承諾一樣，特別是當規則不是很明確和不同解釋的開放。一些國家選擇某些時期、某些議題遵守規則，有些國家則不然，因此國家透過時間和議題影響，行為是不同的。這就是學者們爭論國家承諾的內容。因此，有些學者強調國家承諾的一面，有些則強調不承諾的一面。顯然全球承諾的意象是複雜的，這就是國際政治無政府狀態的給定事實，對某些國家是承諾，對其他國家卻不必然如此。

為什麼國家會選擇遵守？一般而言，國家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正向動機的情境高於負向制裁。這根基於整體的理性選擇，理性的概念在於國家能冷靜的計算成本和利益，根基於決策者所能獲

¹⁹⁵ Gerald Chan, "China and the W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pli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ume. 4 (2004), pp. 47-72.

得的資訊。而有限理性，受到建構主義要求的影響，被視作和認同為遵守法律的國家，而且基於功能主義者的要求以社會化和學習。當觀念改變或決策者獲得新的資訊，選擇會隨時間改變。決定遵守或不遵守，通常根基於國內和國際因素的結合。國內因素包括政府的民主形式、領導者對國際協議的執行力和行政與經濟的能力，國際因素包括國家的涉入數、國家之間的權力分配和機制對國家的影響。事實上，中共決定加入 WTO 展現出，至少準備好接受承諾的挑戰。

儘管中國大陸已準備好遵守 WTO 的規範，但它有能力去遵守嗎？這個問題一樣存在於許多中共貿易夥伴的心中，學者 Peter M. Haas 就指出，一個國家有意願遵守卻缺乏能力去遵守，其他國家所能做的就只有監視，一方面評估並強迫承諾實行，另一方面幫助此一國家建立需要的能力去執行。很清楚地，中共最大貿易夥伴——美國，就是以這種方式促使中共履行承諾。從理論的觀點而言，美國的途徑基本上是新現實主義，結合自由制度主義和社會建構主義的要素，新現實主義的觀點認為，國家的行為根基於物質的能力，美國準備使用權力以確保中共的遵守，而且美國為了這樣的結果不會退縮施加壓力，這種途徑在提升美國國家利益為目標，特別是貿易利益。而自由制度主義的觀點，主張國家的行為為受到國際機制所形塑，這種機制包括規則、規範和國際制度的原則。從此觀點，美國計畫運用 WTO 的機制，和其他相同心態的貿易國家，監視和評估中國大陸承諾的行為。¹⁹⁶

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

¹⁹⁶ David M. Lampton,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1978 – 2000*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92-229. 溫哈溢，Susan Shrik 原著，*《脆弱的強權：在中國崛起的背後》*（台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

中國大陸十三屆四中全會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佈置研究計畫經濟與市場調節，支持進行資本市場（股份制）的試點。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後，江澤民積極推動黨內思想統一，明確表示傾向於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說法，並在十四大報告中正式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3年，江澤民主持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表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已經具體化。

1989年六四事件後，是否堅持經濟體制改革的市場取向，中共黨內和國內理論界存在著重大分歧，市場經濟和市場取向的改革，一度成為某些理論家批評和批判的對象。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認為應對改革的方向等重大問題進行研究，並對此進行部署，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為決策作充分的準備。1990年7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邀請搞經濟工作的負責同志研究經濟問題。7月16日，江澤民再次主持經濟工作座談會，專門討論經濟問題。9月13日至19日，江澤民又一次主持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負責同志以及省、直轄市、自治區負責人等，參加的經濟工作座談會，他要求與會人員「大家要齊心協力找到一條計畫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具體化的路子」。¹⁹⁷ 這可以看出江澤民在著重研究計畫與市場的問題。

在以江澤民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研究計畫與市場關係的背景下，整理了兩份資料，一個是國內關於計畫與市場關係的爭論資料，一個是國外關於計畫與市場的綜合資料。這些資料表明，最先提出用中央計畫機關取代市場來配置資源的學者是

¹⁹⁷ 李鵬，《市場與調控—李鵬經濟日記（中）》（北京市：新華出版社，2007年），頁837。

義大利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帕累托，他和他的追隨者都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更不是共產黨員，而是西方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的學者。在這個問題的爭論初期，社會主義制度還沒有誕生，主張計畫經濟或市場經濟，與堅持或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根本沒有關聯。資本主義可以用計畫，社會主義應當用市場。¹⁹⁸ 因此，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雖然只是在對計畫與市場關係進行研究，但對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的傾向還是明顯的。

1990年11月，江澤民在參加深圳、珠海特區建立10周年慶祝活動中，明確表示：「可以把上海、深圳這兩個實驗點保留下來，繼續試驗不能撤。但是暫不擴大，謹慎進行，摸索經驗。¹⁹⁹」隨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作出了實行股份制改革並建立證券交易所的決策。1990年11月26日，經國務院授權、由中國人民銀行批准建立的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宣佈成立。這是中共建政以來，中國大陸出現的第一家證券交易所。12月1日，深圳證券交易所敲響了試營業的鐘聲，標誌著這項市場化的改革，在爭論中堅持下來。1992年1月15日至18日，江澤民在上海考察工作時，到上海證券交易所，再次對這項改革確立表示支持。

1992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提出十四大在計畫與市場的關係上要前進一步，這是關係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域的一個重大問題。同年5月28日的政治局常委會議正式決定，在十四大上要對計畫與市場的關係作出新的論述，並決定在中共中央黨校召開幹部會議。之後，江澤民決定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說法，他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從一開始就是有計畫的，這在人們頭腦裡和認識上一直是很清楚的，這表明江澤民

¹⁹⁸ 陳錦華，《國事憶述》（北京市：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頁215。

¹⁹⁹ 魏禮群，《改革開放三十年見證與回顧》（北京市：中國言實出版社，2005年），頁393。

的態度更加明確。²⁰⁰ 同年6月12日，江澤民去看望鄧小平，鄧小平表示，贊成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說法。事實上，深圳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至此，中共認為不以市場經濟，沒有競爭，沒有比較，連科學技術都發展不起來。產品總是落後，也影響到消費，影響到對外貿易和出口。

1993年3月15日至31日，中共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議，同意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寫進《憲法》修正案的第七條中，這標誌著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被確定下來。為了貫徹中共十四大精神，1993年5月，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決定，下半年召開十四屆三中全會，專題討論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問題。199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召開了十四屆三中全會。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把十四大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和基本原則加以具體化，構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並制定了總體實施規劃。這表明中國大陸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已經具體化。²⁰¹

第五節 胡錦濤時期之深化穩定政策

壹、從「十一五」到「十二五」規劃

胡錦濤曾公開指出：「十一五」（第十一個五年規劃）時期，我們面臨的仍將是一個機遇和挑戰並存、機遇大於挑戰的環境，

²⁰⁰ 同前註，頁74。

²⁰¹ 陳述，〈江澤民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2013年9月6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http://www.wxyjs.org.cn/dhgjzyldryj_558/201207/t20120712_17005.htm，檢索日期：2015年12月6日。

一個總體上有利於我們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但不利因素可能增多的環境。顯見，中國大陸在胡錦濤主政期間，為了深化穩定發展所面臨的挑戰，其中十一五和十二五規劃（第十二個五年規劃），就是在胡、溫體制時期，面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所規劃的產物。

一、「十一五」規劃重點

中國大陸制定「第十一個五年規劃」（十一五規劃），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其規劃原則為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加強和諧社會建設與不斷深化改革開放。據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會議公報披露，「十一五」規劃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包括：（一）實現 2010 年人均 GDP 比 2000 年翻一番，由 850 美元提高達到 1,600~1,700 美元；（二）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單位 GDP 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 20% 左右；（三）扶植一批擁有自主智識產權和知名品牌、國際競爭力較強的企業；（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比較完善，開放型經濟達到新水準，國際收支基本平衡；（五）普及和鞏固九年義務教育，城鎮就業機會持續增加，社會保障體系比較健全，貧困人口繼續減少；（六）城鄉居民收入水準和生活品質普遍提高，物價水準基本穩定，社會貧富差距控制在一定水準；（七）提高城鎮化水準，國民的居住、交通、教育、文化、衛生和環境等方面的條件，有較大的改善。該規劃建議，確立了未來五年中國大陸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方向，是胡錦濤、溫家寶主政以來提出的第一個五年經濟和社會發展建設規劃，特別強調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堅持

以人為本，建構和諧社會」等理念，突顯胡、溫體制的施政特色。

²⁰² 以下為中國大陸十一五的規劃重點：

(一) 以人為本建構和諧社會

綜觀中國大陸提出的十一五規劃，與過去歷次五年期經濟計畫比較，具有顯著的不同，首先，在整個規劃內容中，特別突出了「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除了強調經濟成長，更強調要「讓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有關就業、教育、衛生、公共安全等人文和社會指標，未來勢將受到更多的關注。其次，加強和諧社會建設是十一五規劃的重要項目之一，其中的重點，主要包括：改善「三農」（即農民、農村、農業）問題，統籌城鄉發展，一方面要加快推進城市化，轉移農業勞動力和農村人口，提高農業勞動生產力；另一方面要加強規劃建設農村的水、電、路等基礎設施和教育、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注重人民生活 and 群眾切身利益問題，擴大就業機會，積極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及城鄉差距擴大的問題。

根據相關研究，大陸社會的貧富差距，隨著經濟持續發展，呈現惡化的跡象，社會貧富差距懸殊且有持續擴大的趨勢，已影響到大陸社會安定。根據中共官方的記錄，大陸在 2004 年至少發生 7 萬次抗議活動，至少 300 萬人參加了這些抗議活動。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的現象，與改革開放以來，實施「沿海地區先富起來」

²⁰² 高長，〈從中共「『十一五規劃』建議」看大陸經濟發展政策方向〉，2005 年 12 月 1 日，取自《大陸台商經貿網》，http://www.chinabiz.org.tw/News/GetJournalShow?pid=162&cat_id=174&gid=97&id=1429，檢索日期：2015 年 12 月 1 日；新華社，〈十一五規劃綱要〉，2005 年 10 月 18 日，取自《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6-01/16/content_4057926.htm，檢索日期：2015 年 11 月 1 日。

的傾斜政策有關，為改善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問題，「十一五規劃」的規劃理念已由「先富論」轉為「共同富裕」，過去一直倡導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之理念，可能由效率與公平並重所取代，或甚至更加注重公平。

(二) 改善區域失衡持續改革

按十一五規劃內容，中共引入功能區概念，重新劃分經濟區域版圖，考慮的區域規劃重點是跨省之間的經濟合作。長江三角洲、京津冀地區、成渝地區以及東北老工業基地等四個區域成為重點關照的對象。這些地區成為「十一五規劃」區域發展的重點區，對於加快西部開發、建設和諧社會的政策，具有重大的宣示意義。未來這些地區將是繼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環渤海灣經濟圈後的另一個經濟成長區，如此發展將有助於改善區域發展失衡問題。

此外，十一五規劃強調持續改革對促進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十一五規劃與以前的經建計畫相比，似乎特別強調深化改革。其中，大的、全局性的改革主要在於如何轉換經濟成長方式、改變對官員的考核體系（強調社會發展、環保、就業、教育等）、建構協調區域平衡發展機制等方面；在局部改革上，主要在農村稅費、壟斷行業、股權配置、匯率形成機制、投融資體制、財政稅收體制、國有企業等方面。落實這些構面的各項改革，對於大陸經濟結構之調整，必將造成影響。

(三) 轉變經濟成長方式

十一五規劃的另一項重點是要「加快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其目標包括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形成一批擁有自主智財權和知名品牌、國際競爭力較強的優良企業等。過去三十多年來，大陸政府刻意追求經濟成長，有意或無意地選擇了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的發展模式，在資源消耗、生態環境破壞方面，可說是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換言之，投資率不斷提高，顯示其投資效率在不斷下降，也就是說，為了取得同一個百分比的經濟成長，所需投入的資源愈來愈多，這對於大陸經濟可持續成長相當不利。

轉變經濟成長的方式，在於追求較高的資源運用效率，這意謂著大陸試圖從過去過度依賴資金、自然資源和環境投入，以量的擴張實現成長，轉向更多依靠高素質人力和技術進步，藉由提高效率達成經濟成長。有關產業發展的規劃，強調要強化自主創新能力，努力開發具有自主智財權的核心技術，改善關鍵技術依賴國外進口的問題，增強產業國際競爭力。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可說是轉變經濟成長方式的關鍵配套因素。

(四)改善經濟結構提高效率

儘管十一五規劃的發展戰略思維，仍然依循鄧小平「發展是硬道理」的論點，但是特別強調，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全局，提出轉變經濟成長方式、強化自主創新能力、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加強和諧社會建設等戰略工作重點，凸顯未來中共的經濟發展模式，已較過去有所不同。

十一五規劃執行期間，中共預期達到的經濟成長目標為：「實現 2010 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 2000 年翻一番」。客觀地說，以目前大陸經濟成長的速度推估，2005 年已較 2000 年成長 51%，在下一個五年期間，平均每年的 GDP 成長率只要達到 6%，就已完成目標。換言之，中共十一五規劃訂定的經濟成長目標傾向保守，其背後的意圖，可能是在凸顯追求改善經濟結構、提高質量和效率的決心。²⁰³

二、「十二五」規劃重點

(一) 經濟結構調整是十二五規劃的核心

十二五規劃依循解決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問題做為出發點，提出 14 篇 62 章內容，並提出 2011 至 2015 五年經濟社會發展的七大目標為：「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結構調整取得重大進展、科技教育水準明顯提升、資源節約環境保護成效顯著、人民生活持續改善、社會建設明顯加強、改革開放不斷深化。」並以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前提下，提出十大重大政策導向為：「1.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2.建立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3.調整優化投資結構；4.同步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5.依靠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升級；6.促進區域協調互動發展；7.健全節能減排激勵約束機制；8.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9.加快城鄉居民收入增長；10.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檢視上述目標及政策導向，十二五規劃的重點是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在全球節能減碳的氛圍下，「十二五規劃」調整以往追求高度經濟

²⁰³ 高長，〈從中共「『十一五規劃』建議」看大陸經濟發展政策方向〉，2005 年 12 月 1 日，取自《大陸台商經貿網》，
http://www.chinabiz.org.tw/News/GetJournalShow?pid=162&cat_id=174&gid=97&id=1429，檢索日期：2015 年 12 月 1 日

成長的目標，而以調整產業結構為先，追求穩定成長，並希望透過消費增長擴大內需。其具體細項目標包括居民消費率上升、進一步鞏固與優化農業與工業、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縮短城鄉區域差距等。²⁰⁴

換言之，大陸經濟結構必須有所調整，不管未來外需是否仍扮演重要的經濟成長動能，但是內需帶動成長的模式是這一波經濟結構調整的重點。擴大內需政策，可以緩和長期以外需為主要成長動能後，易受國際景氣波動影響的情況，以解決大陸長期過於依賴出口及投資做為經濟成長動能、易受到國際景氣影響的負面因素衝擊。

(二) 十二五規劃以城鎮化與區域均衡發展提振消費

大陸在實踐擴大內需帶動成長的策略，主要仍是在鼓勵投資及提振消費。由於大陸擁有十三億人口，潛在的內需市場商機驚人，因此在實踐內需帶動成長的重點，主要在於如何誘發並滿足內需市場的需求。審視大陸的十二五規劃，便可以瞭解提出城鎮和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成長7%以上的用意。此成長幅度與每年GDP平均成長幅度相同，便是希望透過所得增長的同時，促進消費成長。「十二五規劃」提出的方法包括：1.進一步釋放城鄉居民消費潛力；2.推進城鎮化，大力發展服務業和中小企業；3.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提高城鄉中低收入居民收入；4.擴大社會保障制度覆蓋面；5.加強市場流通體系建設，發展新型消費業態；6.發展節能環保型消費品等。

²⁰⁴ 新華社，〈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2011年3月8日，取自《新華網》，
http://big5.news.cn/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11-03/28/c_121239866.htm，檢索日期：2016年1月15日。

近十餘年來，雖然大陸人口有迅速集中於城市的趨勢，然而居住在鄉村的人口比重，仍占五成三，達七億人，如能釋放鄉村居民消費潛力，龐大商機可期。然而要提振鄉村居民的消費，除了積極推進城鎮化政策、加快農業現代化及農村建設的腳步，也要逐步做到區域協調發展，才有可能藉由可支配所得提升而增加消費能力。因此，「十二五規劃」中特列第五篇提出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及城鎮化健康發展的戰略，其中在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上，便強調推進新一輪西部大開發、全面振興東北地區老工業基地、大力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積極支持東部地區率先發展等，可以看出大陸積極推動區域協調的決心。其中又以西部大開發為主，放在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的優先位置，對於重慶、成都等相鄰的經濟區，包括成渝經濟區、滇中經濟區等區，進行快速發展，以生產要素成本相對低廉、資源豐富、市場潛力等吸引外資進駐，並進一步藉由所得提升，來提振當地消費。

(三)「十二五規劃」以優化投資結構調整產業結構

另在鼓勵投資、促進內需方面，大陸已擁有豐沛的外資流入，因此在促進投資方面，重點不是吸引外資，而是藉由優化投資結構調整產業結構。透過明確界定政府投資範圍、規範國有企業投資行為，以及鼓勵擴大民間投資等方式，將擴大投資和增加就業、改善民生結合，優化投資結構，並進一步調整產業結構，協助產業轉型升級。

首先，工業結構的優化，仍以轉型升級、提高產業的核心競爭力為不二法則，而在「十二五規劃」中，進一步提出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為發展重點。在培育發展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方

面，將積極發展節能環保、新一代資訊技術、生物、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並希望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可以達到 8% 左右，若真能達成此目標，「十二五規劃」將可提升大陸技術，改善以往技術掌握在歐美先進國家手中的情況。

在服務業方面，中國大陸雖已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及第二大貿易國，但服務業比重仍較一般先進國家近七成的比例低很多。「十二五規劃」明確訂立服務業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重要提高 4 個百分點，亦即是要將服務業比重提升到占 GDP 的 47%，以營造環境推動服務業大發展為題，營造有利於服務業發展的政策和體制環境，並以拓展新領域，發展新業態，培育新熱點，推進服務業規模化、品牌化、網路化經營，不斷提高服務業比重和水準為其重點，其中提出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生活性服務業。在生產性服務業方面，包括拓展金融服務業、現代物流業、高技術服務業、商務服務業等，生活性服務業則包括商貿服務業、旅遊業、家庭服務業及體育產業等。²⁰⁵

三、國內經貿發展策略的繼承與延續

從胡錦濤時期的「十一五」、「十二五」的國內經貿發展策略中，可以看到中國大陸國內發展的繼承性。此外，在 2016 年 3 月 5 日，中國大陸全國第十二屆人大四次會議中公布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2016-2020 年）規劃」綱要草案，提出 2020 年 GDP（國內生產總值）超越人民幣 92.7 兆（約新台幣 463.5 兆

²⁰⁵ 林祖嘉、譚瑾瑜，〈大陸「十二五規劃」與兩岸經貿合作契機〉，2011 年 11 月 4 日，取自《財團法人國家政策基金會》，<http://www.npf.org.tw/2/9931>，檢索日期：2016 年 1 月 15 日。

元)，人均勞動生產率達人民幣 12 萬元。未來二十年，如以當前經濟態勢發展，世界經濟版圖將發生驚人變化，其中，中國經濟規模將急劇擴張，最終將在 2041 年超過美國。十三五規劃中，將透過科技創新、人才培育、消費升級、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加快財稅和金融體制改革、推動農業現代化、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拓展網路經濟空間、推進新型城鎮化等方式，確保每年 GDP 增速超過 6.5%，四年後達 92.7 兆元。²⁰⁶ 換言之，在十三五規劃中，亦可看到中國大陸國內發展的延續性。

貳、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十七大）會議期間，正值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不斷上升時召開，決定了從現在到 2022 年之間，中國大陸領導階層的接班梯隊，和國家政策的主要方向，就如同大會文件所說的，「面向未來，我們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吸引全球政經界關注。十七大兩大工作重點，一是人事，二是政策。政策路線集中在胡錦濤向大會提出的政治報告和黨章修正案，決定未來的執政方針。人事方面，則選出新一代政治局常委和委員，以及為數約 370 人左右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形成中共黨、政、軍兩代傳承的領導人。

十七大通過胡錦濤的政治報告，並把胡錦濤提出的「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等主張寫入黨章，確立了中國大陸經濟和社會轉型的主要方向。「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有如一體兩面，強調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均衡發展，以達到和諧社

²⁰⁶ 藍孝威、陳柏廷，〈陸十三五規畫二十年翻五倍 GDP 上看 90 兆〉，2016 年 3 月 6 日，取自《中時電子報》，<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306000258-260102>，檢索日期：2016 年 3 月 6 日。

會的實現。這兩個觀念都是針對近30年來，中國大陸不計代價追求經濟成長，忽略公平正義和相應的制度建設，導致貧富差距嚴重惡化，貪污浪費，流血輸出，環境生態遭到嚴重破壞。

中國大陸現在是全球排放二氧化碳第一大國，四分之一的河水甚至髒到不能用於灌溉，各地不斷爆發徵地衝突。胡錦濤在十七大政治報告中，提到懲治和預防貪污腐敗問題，已關係到「人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此係對鄧小平經濟路線的一大修正。唯經濟發展論背後的指導思想出自鄧小平，他讓中國實行市場經濟的同時，主張「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在經濟發展的初期允許貧富差距擴大），「發展是硬道理」（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優先於社會公平和環境平衡）。雖然中國大陸當局並沒有公開承認，實際上，「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寫入黨章，十七大報告主張「全面、持續和可協調發展」，強調加強環境保護和教育、醫療、社會福利和農村建設，平衡區域差距等，但有針對鄧小平、江澤民時期，經濟路線的一次重大修正的影子。

胡錦濤時期之國內經濟政策方面。十七大報告強調幾個重要經濟戰略，主要包括：建設創新型國家，淘汰落後生產力，發展各類金融市場等。這幾方面，對臺灣經濟及臺商投資，既是機會，也是挑戰。此外，十七大政治報告強調，今後促進經濟增長，將更重視國內消費，但在「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的原則下，大陸各地也將加強對勞動、環境、土地、稅務的執法，外商在分享大陸市場同時，在大陸的營運成本也會相應增加。即使如此，十七大對國民所得成長速度的評估，仍高於五年前的十六大。預

計從 2000 年至 2020 年，平均每人國民生產要「翻兩番」，也就是成長四倍。

至於政治改革，十七大提出了若干動聽的口號，例如「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但具體內容只侷限於行政革新，並未放寬對社會政治的嚴格控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旗下，把取捨的彈性牢牢掌握在黨的手上，是典型的胡錦濤務實政治路線。²⁰⁷胡錦濤在卸任前的中共十八大報告中強調，要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要，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在當代中國，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本質要求就是堅持科學發展。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是關係中共發展全域的戰略抉擇。因此，必須做到「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準」和「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²⁰⁸

叁、深化農經發展政策

一、加強農村經濟建設

中共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十一五規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歷史任務，胡錦濤非常重視新農村建設，對此他說新農村建設要堅持因地制宜、講求時效，防止形式主義。

²⁰⁷ 文現深，〈胡錦濤時代全面開啟〉，2011年4月13日，取自《天下雜誌383期》，<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03387>，檢索日期：2015年3月10日。

²⁰⁸ 胡錦濤，〈胡錦濤強調市場經濟體制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2012年11月8日，取自《新華社》，http://news.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08/c_113637808.htm，檢索日期：2015年12月8日。

另外他說到，必須要尊重農民之意願，確切的解決農民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努力地使農業基礎地位更加鞏固，才可使農民生活水準提高。²⁰⁹

在2005年的一號檔案中，要求要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各項任務落實，統籌城鄉經濟發展，加快農村全面小康建設，當中強調要按照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新格局要求，需要加強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以推動農業穩定持續發展。另外，對農業工作做出來具體的部署，要求要嚴謹的加強耕地保護與土壤改良，更提出要加快農業機械化的發展，開始著手於農業生態的建設。

2007年時的一號文件又提出，認為發展現代化農業是當前新農村建設的首要目標，以現代化農業發展來推進新農村建設工作，既是科學發展的要求，又是可以造成社會的進步。其中更特別提到要統籌經濟發展，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方針，確切的加大農業投入，深化農業改革，積極推進現代農業之建設，來建立健全的農業公共服務體系，以實現農村更加和諧，確保農村建設可以得到新進展。

二、保障農民社會權益

保障農民權益，首先要關注農民，明確的瞭解農民所需之權益何在，在2004年的一號檔案中提出對農民給予「多與、少取、放活」，以保障農民的經濟利益，亦為加大對農村與農業的投入力度，為農民增收創造條件，為提高農民科技品質創造好的環境，

²⁰⁹ 新華社，2005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取自《中國共產黨》，<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9/65414/4429220.html>，檢索日期：2014年4月30日。

並擴大農民利益，對農民、農業以及農村的經濟都能夠體現。免除農村九年義務教育學雜費，建立農村合作醫療體系，加快建設農村基礎建設，可在工業反哺農業的基礎上，加大農業技術，擴大農業補貼範圍，同時建立以工促進農的長效支柱，使得農民間接地可以受益於國家對農民的惠農政策。

2007年的一號檔案，則強調要健全農業支持補貼制度，建立農業風險防範機制，鼓勵社會力量投資農業，而現在也已經取消了農業稅，對糧農實行直接補貼，其他部分地區則給予農機具購置補貼等等，都是屬於多予的政策內容，以不對縮小工農收益的差距，來擴大農民經濟利益所少取的部分，就是加快農村稅費改革，適時的縮小甚至消除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以減輕農民負擔，盡快清理各種收費、亂罰款等等行為，保護農產品收購價格。學雜費、課桌費、書本費等，在2006年因為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形成了真正的落實少取的政策，而醫療改革與合作醫療的展開，都是直接幫助農民並間接少取的體現放活，則是給予農民更多的經濟自主權，激發農民創造性，透過消除體制與政策的障礙，鼓勵多種農業經營方式，活絡農村經濟，並尊重農民的意願，尊重他們的手創精神，只要是有利於農村經濟發展與農民增收，都要想辦法給予幫助，並給予立法的保護。

三、積極促進農民工就業

在2010年的一號文件中提到，加大農民外出務工就業指導和服務力度，確實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促進農村勞動力平穩有序轉移，農民工進城就業，就是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有效途徑，為農民工創造良好的就業條件，與平等的就業待遇，也是推進農民

工重要的行為。

對於農民工權益，溫家寶曾經指出，以流入地方政府和公辦學校為主，確實保障農民工隨遷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不能因為地域原因或戶籍的原因而剝奪農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權利，在政策引導與宣傳上也要注意向企業宣傳，使企業可以將農民工與其他人視之平等，同等對待。另外胡錦濤對於農民工權益，還特別提出，國家將在就業、社會保障、醫療、子女上學、保障性住房等方面，充分考慮農民工需要，注重在制度上解決好農民工權益保護問題。

第四章 崛起後主要對外經貿政策作為

第一節 中國大陸的崛起

對於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儘管不是所有人都樂觀，但有這種看法的人卻非少數。許多媒體紛紛引述拿破崙的古老警語：「讓中國沉睡吧，因為當中國醒來之時，將憾動世界」，甚至有著名的研究智庫指出，「21世紀初的中國的地位就好比19世紀的英國」。²¹⁰ 有關「上升的巨龍」或「世界工廠」的說法已逐漸形成。2003年11月3日，前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鄭必堅在當年度「博鰲亞洲論壇」上，發表了題為「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未來」的演講，這是首次出現了「中國崛起」這一個名詞概念。然而，因為中國崛起是一種持續進行的事實現象，故探究中國崛起的真確時間點，並非本文的研究內容也非研究中國大陸崛起意涵的重點。基本上，以中國大陸的綜合國力計算，包含不論是在人口、土地、資源的總合而言，它一直都是世界上的大國，實不存在何時崛起的意義。因此，指中國大陸崛起，應代表它的影響力發生較大的變化，本文認為這種權力的大變化，至少發生在「軍事力量的改變」、「經濟影響力的改變」和「領導人認知的改變」等三個面向，尤其是在改革開放政策之後，世紀交換之際，中國大陸崛起的現象更為明顯。

壹、領導人認知的改變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對中國大陸來說，具有相當深遠的歷史意義，這次會議在鄧小平的主導下，決定拋棄持續多年的

²¹⁰ 袁易、嚴震生、彭慧鑾，《中國崛起之再省思：現實與認知》（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4年），頁43-44。

「階級鬥爭」及「世界革命」路線，從根本上衝破了長期「左」傾錯誤和「兩個凡是」的束縛，並從「實事求是」的角度詮釋毛澤東思想，重新確立了黨的馬克思主義路線，從此將工作重點轉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面。²¹¹ 中國大陸此時也正式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在第二代領導集體的領導下，中國大陸走向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道路，進入鄧小平在這個背景下提出的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²¹² 為核心的改革開放時代。這使得中國大陸改變其原有的經濟制度，從計畫走向市場，使得經濟實力在這段期間內快速累積，奠定了往後中國崛起的厚實基礎。在 198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初，當時正值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社會主義運動受到嚴重挫折。在此極大壓力和險惡的形勢下，鄧小平在堅持獨立自主之餘，繼續改革開放，並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沈著應付、韜光養晦」這十六字方針，強調要韜光養晦，埋頭苦幹，不扛大旗不當頭，過頭的話不說，過頭的事不做。

1990 年代之後，江澤民繼承了鄧小平的路線，同樣以經濟建設為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但這個時期的國際環境卻大不相同，因為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單一強國，對於中共國力的提升逐漸有所警戒；而中國大陸也深知在軍力上絕非美國的對手，因此江澤民仍將經濟建設擺在第一優先，不願去挑戰美國的霸權。並且只要美國不挑戰中國大陸的根本利益，中共基本上是願意與美國配合的，因為可藉此獲得其國內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資金和技術，也能夠突破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成見，逐漸融入國際社會。²¹³ 因此，

²¹¹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臺北：聯經，2001 年），頁 905。

²¹² 一個中心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兩個基本點則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

²¹³ 高朗，〈後冷戰時期中共外交政策之變與不變〉，《政治科學論叢》，第 21 期（2004 年 9 月），頁 29-31。

江澤民時代的外交，不論在口頭上或實際行動上，和平與發展成為對外關係的主軸，試圖讓國際社會相信，中國大陸是負責任的，並且是遵守國際規則的國家。之後，1997年3月，中國大陸在與菲律賓共同舉辦的「東協區域論壇」信心建立措施會議上，首次正式提出了適合冷戰後亞太地區各國維護安全的「新安全觀」。在此之後，中國大陸領導人不管在「東協區域論壇」或其他國際場合，都不斷強調和倡議此一「新安全觀」。²¹⁴

2003年12月10日，中共總理溫家寶在哈佛大學以「把目光投向中國」為題發表演說，闡述了「中國和平崛起」的思想。溫家寶表示，今天的中國大陸，是一個改革開放與和平崛起的大國，並把中國大陸選擇的發展道路稱作「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他說，「中國是個發展中的大國。我們的發展，不應當也不可能依賴外國，必須也只能把事情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這就是說，我們要在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更加充分和自覺地依靠自身的體制創新，依靠開發越來越大的國內市場，依靠把龐大的居民儲蓄轉化為投資，依靠國民素質的提高和科技進步來解決資源和環境問題。中國和平崛起發展道路的要義就在於此。」²¹⁵ 接著，在2003年12月26日紀念毛澤東誕辰110週年座談會上，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則強調，要堅持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他指出，「堅持走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各國友好相處，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同各國的交流和合作，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做出貢獻。」²¹⁶

²¹⁴ 楚樹龍，〈冷戰後中國安全戰略思想的發展〉，《世界經濟與政治》，第9期（1999年），頁1-15。

²¹⁵ 溫家寶，〈把目光投向中國〉，2003年12月11日，取自《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BIG5/shehui/1061/2241298.html>，檢索日期：2013年10月11日。

²¹⁶ 胡錦濤，〈胡錦濤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10週年座談會的講話〉，2003年12月26日，取自

貳、軍事能力的改變

隨著經濟的成長，中共軍事能力也同時獲得了改善，逐漸從陸權國家，走向海洋國家。建軍思想從「小米加步槍」走向科技戰爭。太空科技方面的成就也引人注目，不僅發射載人的太空船，且準備設立太空站。由於軍事力量的提升，美國常批評中國大陸的國防預算不斷增加，而且不夠透明。按照美國的說法，中共官方公布的國防預算如果是 300 億美元，實際上大概只有公布金額的三分之一，北京當然否認公布之國防預算不實，惟西方關注的是，中國大陸經濟實力不斷擴大，將有更多餘力可供投入軍事經費，因而造成區域軍事平衡的改變。

隨著中國大陸軍事現代化的程度提升，包括傳統武器及核子武器的質量都獲得大幅的加強。根據美國發佈的「2006 年中國軍力報告書」(Military Power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6)顯示，中國大陸正在對其戰略飛彈部隊進行質與量的改進，裝備可打擊到美國本土、日本、印度、俄羅斯、亞洲其他國家及世界各地區；未來的戰略力量可由發射井發射的 CSS-4 洲際飛彈機動型固態燃料的東風 31 型、東風 31A 型及海基 JL-2 潛射彈道飛彈；中國大陸還將維持一支 CSS-5 中程彈道核子飛彈部隊，以應付地區危機。²¹⁷ 中國大陸認為，軍隊是中國大陸總體國家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大陸需要建設一支強大的軍隊保護經濟成果，認為「軍隊在確保國家安全時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軍隊在保衛國家安全時起著關鍵的作用」。²¹⁸

《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12/26/content_1250092.htm，檢索日期：2013 年 10 月 11 日。

²¹⁷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6," 23 May 2006,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trieved 29 July 2015, from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pdfs/China%20Report%202006.pdf>, pp. 26-27.

²¹⁸ 新華社，《2004 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2004 年 12 月 1 日。

1992年9月，美國海軍上將Derwelt Lassen，在夏威夷就亞洲安全發表談話，首先提出「中國威脅論」，南海為亞洲下一個戰爭熱點。此論點在國際社會激起極大的反應，其軍事上的主要因素：(一)西方國家對中國大陸發展國防力量，欲取代美、蘇退出亞太地區所留下的權力真空心存芥蒂；(二)中國大陸近年來致力經濟改革，因而獲致的成就挹注國防經費，改良武器和國防工業，使西方及周邊國家感到不安；(三)中國大陸改變防禦戰略，積極地研發新一代艦艇、航母、戰機、擴建軍港，強烈宣示對南海主權的強硬立場，使南海周邊國家感受到來自中共的壓力。²¹⁹ 此外，中國崛起的威脅論將會刺激亞太地區的軍備競賽，以及鼓勵亞太國家牽制中國大陸，迫使東亞國家依賴美國以抗衡中國大陸，這對中國大陸與周邊國家的發展及經濟關係將會產生不利影響，也增加中國大陸解決臺灣問題的困難程度。²²⁰

叁、經濟影響力的改變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 30 多年來的期間，創造了繁榮與成長，使中國大陸經濟在亞洲經濟中所處的地位不斷提升，更在世界經濟中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2004 年其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產值雖僅為日本的三分之一，2009 年已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自 1990 年代以來，其 GDP 成長增速，平均幾乎達 2 位數以上，詳如下圖 4-1 中國大陸 GDP 成長率圖所示。預估 2020 到 2030 年間則很有可能追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²²¹

http://www.mod.gov.cn/affair/2011-01/06/content_4249947.htm，檢索日期：2015 年 6 月 5 日。

²¹⁹ 文馨，〈對中國威脅論之研析〉，《中共研究》，第 29 卷第 8 期（1995 年 8 月），頁 67-75。

²²⁰ Suisheng Zhao,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Behavior*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2004), p. 5.

²²¹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統計資料〉，取自《國家統計局資料庫》，<http://www.stats.gov.cn/tjsj/>，檢索日期：2013 年 10 月 1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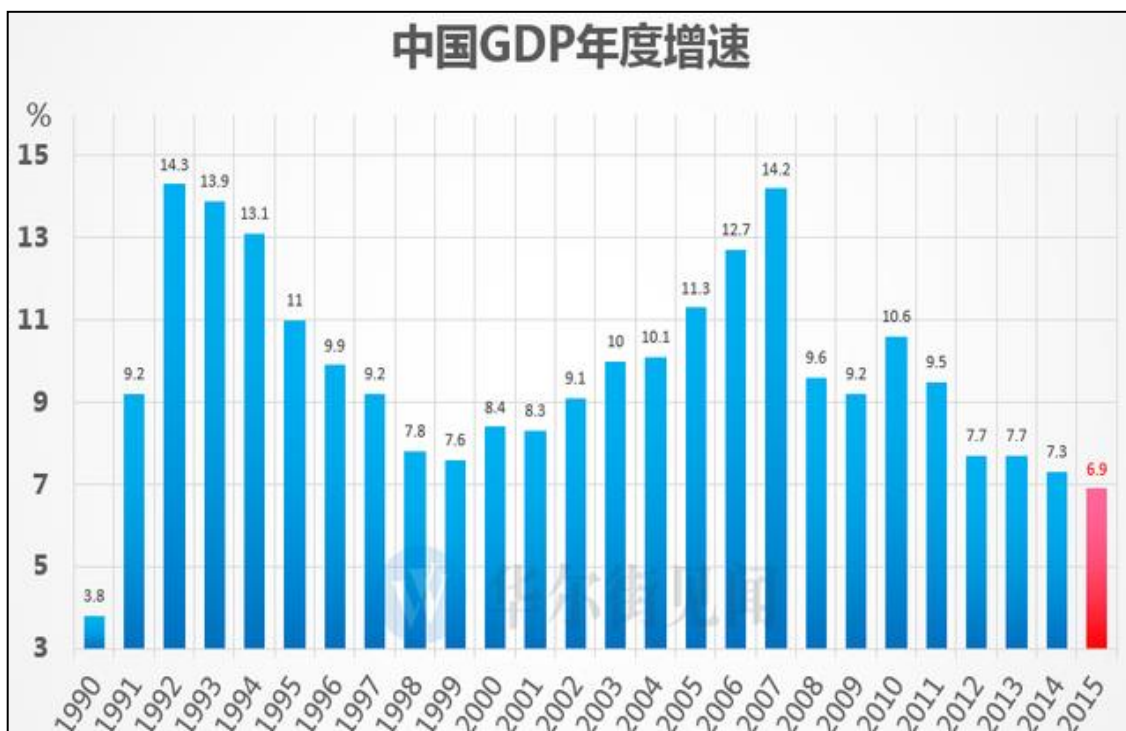


圖 4-1：中國大陸 GDP 成長率圖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統計資料〉，取自《國家統計局資料庫》，
<http://www.stats.gov.cn/tjsj/>，檢索日期：2015 年 11 月 11 日。

中國大陸經濟的成長，可說大部分建立在對外貿易之上。中國大陸近年出超日益擴大，引起與美國、歐洲摩擦。2005 年 7 月中國大陸放寬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人民幣對美元升值 2%。縱使如此，2006 年中國出超將超過 900 億到 1,000 億美元，比 2004 年的 320 億美元成長近 3 倍。但實際上，中國大陸在 2006 年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所公布的資料當中，其在 2005 年的進出口貿易部分，出超就已經突破了 1,000 億美元，而這也勢必引起中國大陸與其他貿易國之緊張，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將不會趨緩。貿易持續出超的另一效應是，中國大陸累積的外匯存底持續攀升。2005 年 8 月，中國大陸加上香港的外匯存底已達 8,379 億美元，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另外，中國大陸的外匯存底，在 2006 年 11 月，中國大陸官方也正式表示當

年 10 月底就已經突破了 1 兆美元。²²²

如果說和平崛起的論述，意指中國大陸在軍事力上對外重大的改變，那麼「和平發展」所要強調的則是中國大陸在經濟影響力的大幅變化。2004 年 5 月，「和平崛起」一詞就產生轉變，胡錦濤在海南博鰲論壇年會表達「和平發展」是中國對外的策略，強調經濟發展一詞以減少對立。²²³ 從 2003 年「和平崛起」論述出爐後不到半年，中共就逐漸以「和平發展」取代，兩者字義並無太大區別，不過「和平發展」的較溫和，不易引起猜疑。並於 2005 年 3 月，溫家寶在全國人大、政協十屆三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完整闡述「和平發展」思想。²²⁴ 自此，也確立了中國大陸對外的經濟影響力，尤其在區域經濟影響力的大幅增加。

第二節 跨洲性區域經貿政策

中國大陸除了在本身所處之亞太區域之外，其對外跨洲性的區域經貿政策，展現出中國大陸的全球經貿策略與身為大國所應負之責任作為，以下特以中國大陸對拉丁美洲之區域經貿政策為例，提出說明。

壹、對拉美之基本經濟關係

²²²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同前註。

²²³ Evan Medeiros, "China Debates Its Peaceful Rise Strategy," 22 June 2004, *YaleGlobal*, Retrieved 29 July 2015, from

<http://yaleglobal.yale.edu/content/china-debates-its-%E2%80%9Cpeaceful-rise%E2%80%9D-strategy>.

²²⁴ 新華社，〈溫家寶：堅持和平發展道路與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2005 年 3 月 5 日，取自《新華網》，

<http://www.npc.gov.cn/npc/oldarchives/dbdh/dbdh/common/zw.jsp@label=wxzlk&id=335923&pdm=3133.htm>，檢索日期：2013 年 11 月 1 日。

一、對拉美國家的經貿關係

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經濟的發展，不但使中國大陸與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往來，顯得更為重要，而且也為雙方的經濟往來提供了良好的條件。經濟合作仍是中國大陸與第三世界國家關係中的主要內容。第三世界國家有著豐富的資源、勞動力和廣闊的市場，但是缺乏資金和技術。在這種情況下，雙方的經濟合作顯得尤其重要。中國大陸在與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往來中，堅持平等互利、講求實效、形式多樣、共同發展的原則。1985年，中國大陸又提出和平友好、互相支持、平等互利、共同發展的原則。中國大陸對第三世界國家經濟中的緊迫問題也十分關注。此外，中國大陸對1982年後出現的拉美等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問題十分關注，一直同情有關國家的立場，要求合理地解決外債負擔。

中國大陸總是大聲呼喚西方國家立即停止新的貿易保護措施，消除國際貿易中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歧視性限制。中國大陸還十分重視「南南」區域合作。南南合作是一種新型的國際經濟關係。加強南南合作，走集體自力更生的道路，發展獨立自主的民族經濟，減少對發達國家的依賴程度，這是發展中國家爭取經濟繁榮，增強自身經濟實力的可靠途徑；例如，1993年10月，巴西正式提出建立南美自由貿易區的倡議，目標是建立南美自由貿易區，使這個市場上80%的貿易免除關稅。2004年12月8日第三屆南美洲國家首腦會議，主要確定了以下二個目標：第一，完善南美自由貿易區，進而達到經濟、社會和機構上的整合；²²⁵第二，成員國承諾促進地理、能源、通信等方面的一體化，商討以五年期

²²⁵ 賀雙榮，〈南美國家共同體的形成及前景〉，2005年1月18日，取自《中國拉丁美洲研究網》，<http://ilas.cass.cn/zxcg/guobie/20060530/105204.htm>，檢索日期：2012年12月18日。

間完成的 31 項、投資達 43 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工程的方案。此外，成員國還承諾加強政治及外交政策的協商，協調農業及農村發展政策，促進技術轉讓及在科學、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合作，促進企業和民間組織的交流。中國大陸對於第三世界國家之間進行的經濟合作，都給予積極的支持。

根據中國大陸的看法，拉美是世界經濟的一部分，它同世界經濟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中國歷年來十分重視與拉美國家的經濟貿易關係。中、拉雙邊經貿關係，經過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徘徊與下降，迄進入 90 年代後，開始迅速發展，經濟與科技合作初具規模。就北京而言，由於中國大陸與拉美同屬發展中地區，雙方在經濟、科技、投資和發展經驗等各方面，可以互補的地方很多，因此經濟上同拉美地區擴大經濟合作，最直接的影響，便是雙邊貿易的增加。²²⁶在政治層面上，拉美所代表的是發展中國家的力量，中國大陸藉拉美可擴大其外交活動空間，在重大的國際問題上，獲得更多的支持。中國大陸已與拉美 33 個國家和 13 個尚未獨立的地區建立了經貿體系，並與其中的 17 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還在這些國家設立了官方的經濟、商務代表機構。²²⁷ 西元 1990 年代的中、拉雙邊貿易穩步發展。

中國大陸為加強拉美關係的發展，1990 年代國家主席楊尚昆就中國與拉美國家關係制定四個準則：(一)中拉雙邊合作關係基於和平共處五原則；(二)中拉雙邊貿易關係之發展應基於平等互惠原則；(三)中拉雙方應尊重彼此之價值觀與傳統，加強合作，並促進

²²⁶ 盧后盾，〈拉丁美洲在國際經濟關係中的地位〉，《拉丁美洲研究》，第 2 期（1987 年），頁 21-41。

²²⁷ 李志祥，〈中國和拉丁美洲經貿體系的現狀與前景〉，《拉丁美洲研究》，第 1 期（1995 年），頁 20-34。

雙方之瞭解與交流；(四)中拉雙方應加強互助與協商，以建立新的國際政治與經濟秩序。²²⁸ 其次，中國大陸自 90 年代以來，對拉美的貿易往來有持續性的增加，尤其 1994 年逐年增加，從 1994 年的進出口總額 47 億美元至 1997 年的 83 億，佔中國大陸貿易額，從 1994 年的 1.3% 至 1997 年的 2.5%，三年內幾乎成長了一倍。其主要的貿易對象，均集中在如巴西、阿根廷、巴拿馬、智利、巴拉圭、墨西哥、烏拉圭、哥倫比亞等南美洲大國，中國大陸對拉美國家不只是實行其經援政策，還具有實質貿易的夥伴關係。反觀臺灣與拉美的雙邊貿易，在 1990 年代之前，雙邊貿易都比中國大陸多，但之後成長的比例卻不如中國，其主要的貿易夥伴集中在無邦交國家，這是需注意的現象。以 1996 年為例，中國大陸已與拉美 13 個國家簽署了貿易協定；同時在拉美地區建立的獨資和合資企業有 195 家，實際投資額將近 3 億美元。同時，拉美國家的企業家也到中國大陸投資，建立約 200 個投資項目，實際投資額達 3 億美元。²²⁹

中國大陸對拉美貿易有傾向特定國家且集中在幾個大國，以巴西而言，自 1980 年代以來，巴西一直是中國大陸在拉美地區最大的貿易夥伴。1990 年代後，巴西仍是中國進出口貿易量最大的貿易夥伴，並且巴西一直是保持相當大貿易順差，巴西對中國的出口項目為大豆油、金屬薄板、生鐵。對中國進口主要以石油為主。²³⁰ 中國大陸與巴西可望進一步擴大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其原因有四：(一)兩者發展水準相近，自然資源和科技成果各有優勢；(二)雙方有相同的發展意願。中國正努力發展與拉美國家之經

²²⁸ He Li, *Sino-Latin America Economic Relation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91), p. 5.

²²⁹ 行政院經濟部國貿局，《中國對外經貿研究》(總 491 期)(臺北：國貿局編，1996 年)，頁 35，未出版。

²³⁰ Eduardo Daniel Oviedo, *Las Relaciones Chino-Latinoamericanas Post-Tianamen* (La Plat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la Plata, abril 1996), p. 20.

貿關係，巴西也正積極拓展亞洲市場，這對雙方開展互利合作，提供一有利的條件；(三)雙方經貿關係正不斷向多元化方向發展，雙方科技合作已有一定的基礎；(四)基於 1993 年 11 月，中國主席江澤民正式訪問巴西後，雙方一致表態要進一步促進彼此的關係。²³¹

二、對拉美經貿發展的條件

根據中國大陸的觀點，拉美是一個自然資源豐富、工業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是一個有發展潛力的市場。此外，拉美在國際經濟、貿易和金融體系中，日益顯示出它的重要性，是中國大陸發展對外經貿聯繫與合作的重要夥伴。再者，中國大陸與拉美同屬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相近，隨著貿易往來的增加，相互間的經濟合作不斷增強。另中國大陸拓展拉美貿易原因之一，是為減少美國及對歐盟市場出口的過分依賴。且中國大陸對美國與歐盟國家貿易順差正與日遽增，因而會導致周期性的緊張與相互報復的威脅。²³² 中國大陸認為拉美的經濟資源與市場潛力可由以下各點看出：

(一) 自然資源豐富，經濟發展較快

拉美農業資源居世界首位，有多種農產品稱著於世，例如：咖啡、可可、糧食、糖、畜產品等，均在國際市場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拉美的森林資源與漁業資源也非常豐富。從中國的觀點來看，拉美地區豐富的資源和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為發展中

²³¹ 行政院經濟部國貿局，《中國對外經貿研究》(總 421 期)(臺北：國貿局編，1994 年)，頁 36，未出版。

²³² 行政院經濟部國貿局，《中國對外經貿研究》(總 404 期)(臺北：國貿局編，1993 年)，頁 33，未出版；陳玉明，〈中國與拉美地區的經貿關係發展迅速〉，《拉丁美洲研究》，第 6 期(1998 年)，頁 21-39。

拉經貿關係，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²³³

(二) 中拉經貿具有很大的互補性

中國與拉美地區經貿關係快速發展的主要原因，是雙方經濟具有很強的互補性—銅、鐵礦石、鋼材、化肥、魚粉、木材、羊毛、糧食和皮革，是拉美傳統的出口產品，而這些產品正是大陸長期進口的產品；而中國大陸產品，因技術水準適合拉美地區不高的需求，且價格較低廉，在拉美市場頗受歡迎。²³⁴

此外，關於中、拉雙邊貿易問題與挑戰，1990年代後中、拉兩方的經貿關係，獲得大幅度進展的前提下，雙方有良好的前景。雙邊的經濟發展存有以下各點有利的條件，分述如下：(一)由於國際情勢的變化以及中國大陸和拉美雙方面改革開放，中、拉經濟關係正經歷某些變化；首先，雙方都結束封閉的狀態，把對外貿易做為經濟增長的動力，廣泛參與世界經濟。雙方在90年代後的經濟呈現增長的趨勢，更保障了未來雙邊的貿易發展；²³⁵(二)拉美開放政策為發展中、拉經貿關係的動力，隨著拉美經濟的發展。對中國大陸商品的需求日益增多，其結構也有所變化；²³⁶(三)就中國大陸而言，中國有一廣大進出口基本原料與工業製成品市場，因此中、拉經濟有較強的互補性，²³⁷這是開展雙邊經貿關係的基礎；(四)雙方合作領域擴大，中、拉經貿交流形式不侷限於進出口，

²³³ 郭崇道、熊業田、李志祥，〈中拉經濟貿易體系的發展與今後設想〉，《拉丁美洲研究》，第5期（1987年），頁5-16。

²³⁴ 行政院經濟部國貿局，《中國對外經貿研究》（總423期）（臺北：國貿局編，1994年），頁43，未出版。

²³⁵ 裘援平，〈拉美的經濟開放和發展-中拉經貿關係的對策〉，《拉丁美洲研究》，第6期（1993年），頁19-27。

²³⁶ 行政院經濟部國貿局，《中國對外經貿研究》（總450期）（臺北：國貿局編，1995年），頁34，未出版。

²³⁷ 同前註，頁19。

近年來更延伸至經濟、技術合作，如貿易、投資、勞務等多方面，特別是直接設廠投資的增加，使雙方的經濟發展更為密切；(五)由於中國大陸與美國、歐盟的經貿關係，經常處於磨擦狀態，中國大陸刻意要降低對美國與歐盟的依賴度。²³⁸

貳、對拉美之外交政策考量

1980年代以後，中國大陸與拉美間關係的快速發展，除了因為中國大陸進入聯合國使國際地位提升外，另與美國關係的改善，亦對拉美與中國大陸關係的進展，是非常有利的因素。²³⁹ 西元1990年代之後，拉美國家政經情勢日趨穩定，區域經濟整合復起，惟資金、技術與人才仍有不足之處，因此轉向政經改革頗具成效的亞太國家尋求資本、技術與經驗的合作。²⁴⁰ 此時中國大陸的經濟正以兩位數字成長，其龐大市場與大好商機，和拉美國家面向太平洋發展的企圖正好契合，基本上也有利於雙方關係的進一步發展。此外，由於拉美現係臺灣邦交國集中地區，拉美國家在聯合國的仗義執言，攸關臺灣國際地位與外交生存空間，引起中國當局的嚴重關切。中國大陸有感於拉美對我國在聯合國問題方面的支持，不利於他企圖成為第三世界領袖的努力，遂積極拉攏與我國有邦交之國家，打壓我外交的生存空間，使拉美成為中國大陸外交競逐的重要戰場。

在1990年代，中國大陸獲得兩個強化與拉美國家關係的動力。²⁴¹ 首先，是1989年美、蘇兩極結構的崩潰，和1991年蘇聯

²³⁸ 行政院經濟部國貿局，《中國對外經貿研究》(總478期)(臺北：國貿局編，1997年)，頁18，未出版。

²³⁹ 張寶宇，〈淺談中拉關係在各自對外關係中的地位〉，《拉丁美洲研究》，第1期(1995年)，頁20-34。

²⁴⁰ 邱稔壤，〈世界新秩序下的拉丁美洲經濟〉，《問題與研究》，第33卷10期(1992年)，頁59-81。

²⁴¹ 張森根，〈中國和拉美國家之間的關係：現狀與前景〉，《拉丁美洲研究》，第5期(1994年)，

的解體，標示了冷戰的結束和意識形態的弱化，促使中國大陸和拉美拋棄意識形態的歧異，強調發展經濟和互相開發；其次，不論資本主義國家或社會主義國家，都努力建立或調整市場經濟。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與開放，和拉美國家經濟對外開放及參與國際分工，使經濟成為中國大陸和拉美國家關係的首要因素；而中國和拉美國家關係提升的根源，在於雙方對世界經濟中心將轉移至太平洋地區，以及對亞太地區在世界經濟發展中，所扮演角色的認同，加上中國大陸和拉美雙方經濟活力的展現，使雙方關係潛在的發展條件，得以逐漸轉化為發展的現實條件，促進中國與拉美國家關係的提升。²⁴²

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實力的增強，國際影響力上升，外交戰略走向對國際環境已甚具影響力，並是各國制定外交大戰略的國際因素。因此反映在中國大陸外交政策的重點是：維持得自由進入各主要市場的彈性、能充分獲取所需的技術與能源、避免捲入國際衝突。在策略上，中國大陸的做法，是在區域或全球層次上，建立越來越緊密的貿易與投資網絡，以貿易互賴關係的提升來降低衝突發生的可能性。是以「經濟外交」手段成為其拓展拉美外交的有效工具。在中國大陸市場經濟規模日益增大及經濟發展需求的驅動下，對外採購與貿易商機也逐漸成為中國大陸開拓拉美關係的外交工具選項之一。此外，巨額經濟援助也是中國大陸經常採用，以爭取拉美邦交國的外交手段之一。從中國大陸承諾提供多明尼克及格瑞納達的高額援助，到實現對美洲國家組織的捐款，充分展現其對拉美國家「實現承諾」的信度，進而提升拉美國家對中國的期待。

頁 38-41。

²⁴² 張寶宇，前引文，頁 22。

整體觀之，拉美對中國大陸的戰略價值主要體現在：第一、雙方均為發展中國家成員，在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以及促進世界多極化、國際關係民主化等方面之立場與訴求相近；²⁴³ 第二、拉美地區一體化組織發展蓬勃，並積極與其他國家和區域集團構建自由貿易關係，加以整合拉美各國的「美洲自由貿易區」在 2006 年啟動後，其對國際經貿格局產生之影響與效應，凸顯拉美在世界經濟舞台之重要性正逐漸上升，故爭取與彼等共同合作，可擴大中國在國際組織的奧援。拉美各國雖小，但在「一國一票」的國際組織中，數目就是力量。這也是中國於崛起後，之所以持續加強對拉美在外交方面之經營，甚而不吝金援拉美各國之原因；²⁴⁴ 因其可增益中國在聯合國、世貿組織、亞太經合組織等機制下，反制西方大國壟斷或干預性作為的支援力量。

叁、對拉美之經貿政策作為

一、全方位提升雙邊關係

中國大陸從 1978 年開始逐步調整外交政策，到了 1990 年代促使中拉關係有大幅度的發展。中國和拉美各國之間在政治、經濟貿易、科技和文化教育等領域的交往與合作日趨密切。²⁴⁵ 雙方之間的關係主要表現在：(一)雙方高層的頻繁互訪；(二)與拉美地區多邊組織及機構的關係進一步密切；(三)雙方在國際上的互相支持；(四)雙方政黨、議會及軍隊的交往；(五)加強對拉美未建交國

²⁴³ 江時學，〈中國拉美關係的三個因素〉，《瞭望新聞週刊》，第 6 期（2005 年），頁 27。

²⁴⁴ 目前拉美主要的一體化組織包括：南方共同市場（1991 年成立）、中美洲共同市場（1962 年）、加勒比共同體（1973 年）和安第斯共同體（1969 年）；主要的地區一體化協調機制與指導機構為拉美經濟一體化協會。請參閱：賀雙榮，前引文。

²⁴⁵ 張森根，〈中國和拉丁美洲國家之間的關係：現狀與前景〉，《拉丁美洲研究》，第 5 期（1994 年），頁 38。

的工作；(六)經濟科技合作等等這些方面。²⁴⁶ 經彙整三類分述說明如下。

(一)高層互訪

高層互訪中的元首外交成為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後對拉美外交的主軸。²⁴⁷ 中國大陸推動高層訪問，旨在透過領導人直接對話、交往，以減少隔閡，提升雙邊關係，並為開展經貿等各領域實質合作，創造良好政治氛圍。19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領導人則多次訪問拉美，²⁴⁸ 此舉不僅增進了友誼與合作，並且促進了雙邊關係的發展。其中1990年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對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智利和烏拉圭進行的國事訪問，是中國國家元首首次出訪拉美，影響中、拉關係深遠的和平共處五原則便是在此行中提出。1992年李鵬總理亦赴巴西參與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擴大了中國大陸在拉美和國際上的影響。²⁴⁹ 自此，中國大陸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更是在1993年後，多次出訪拉美，其1993年對古巴和巴西的訪問，從最高層加強了和這兩個拉美地區最大國家的戰略夥伴關係。1995年國家總理李鵬參訪墨西哥時，於其外交部所發表的演講中，闡述的中拉關係五項基本原則，成為日後中、拉關係發展的根據。²⁵⁰ 進入21世紀後，江澤民更於2001年4月5日至17日訪問智利等六個拉美國家。值得一提的是，江澤民當時之所以搶先在美洲國家高峰會及陳水扁總統同年5月第二度出訪

²⁴⁶ 伍楚，〈中國同拉美及加勒比地區的關係〉，《拉丁美洲研究》，第6期（1998年），頁8-11。

²⁴⁷ 元首外交，是指由一國元首或是對外政策最高的決策者直接參與外交領域上的雙邊或是多邊談判與會談，一般而言包含四種方式：元首會晤、元首直接通訊、元首訪問和代表元首的高級官員訪問。此與中華民國的高層外交相似。游蕙綾，〈中共對拉丁美洲之外交政策〉，（台北：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1999年），頁133-134。

²⁴⁸ 西元19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領導人楊尚昆、江澤民、李鵬、喬石、朱鎔基、李瑞環、胡錦濤等人先後訪問拉美，並受到高規格的熱情款待。伍楚，前引書，頁9。

²⁴⁹ 伍楚，前引書，頁9。

²⁵⁰ 王新祿，〈中拉關係的現狀和發展前景〉，《拉丁美洲研究》，第1期（1999年），頁9-21。

中南美洲之前啟程，反制美國繼續獨霸其「後院」及對臺灣外交重鎮「挖牆角」的企圖至為明顯。²⁵¹ 及至 2004 年 11 月胡錦濤赴巴西、阿根廷、智利及古巴四國展開元首外交後，國家副主席曾慶紅亦於 2005 年 1 月間出訪墨西哥等五國，²⁵² 兩者範圍涵括拉美主要國家，而同年 9 月胡錦濤再次出訪墨西哥，此均顯示高層互訪為中國對拉美經貿外交之重心之一，亦為其與拉美各國之間的經貿關係注入了新的動力。²⁵³

(二) 政黨交往

在與拉美的交往中，中國大陸認為政黨交往與政府外交、議會及人民團體之間的往來，都是中國總體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²⁵⁴ 在發展中國家中，拉美是最早產生政黨的地區，也是政黨政治發展相對完善的地區。據資料統計，在拉美 33 個獨立國家中，較為重要的政黨約有 157 個。由其指導思想和理論主張來看，它們大致可區分為四種類型：1. 社會民主主義政黨；2. 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3. 保守主義政黨；4. 共產黨等左派政黨。²⁵⁵ 中國大陸至少已經與拉美 32 個國家中，108 餘個不同類型的政黨，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聯繫，當中亦包含有無邦交國中的 24 個政黨。²⁵⁶

²⁵¹ 根據外交部統計指出，2001 年內，中國在國際間透過各種手段打壓破壞臺灣的種種事例共有 186 件之多，與往年相較並無任何減少跡象。其分類統計資料如下：否定臺灣國家主權、矮化臺灣國際定位的事項有 33 件；破壞臺灣與邦交國關係有 48 件；干預臺灣與邦交國實質交流 39 件；打壓臺灣參與國際組織與活動 21 件；阻撓臺灣高層首長出訪 14 件；拉攏、滲透分化臺灣僑社並阻撓臺灣僑務工作推行有 27 件；阻撓臺灣參與非政府國際組織有 4 件。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 <http://www.mofa.gov.tw/> (2007 年 10 月 17 日)。

²⁵² 中國國家主席曾慶紅於 2005 年 1 月 25 日至 2 月 3 日出訪墨西哥、祕魯、委內瑞拉、千里達及牙買加五國，並出席「中國與加勒比經貿合作論壇」首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

²⁵³ Drew Thompson, "China's Global Strategy for Energy, Security, and Diplomacy," *China Brief*, Jamestown Foundation, No. 5 (2005), pp. 5-21.

²⁵⁴ 政黨外交之特別有：(一) 不處理國家間、政府間的具體事務，較少受到外交體系的限制，可以同建交國與未建交國的朝野各政黨廣泛交往；(二) 交往過程中可以減少許多外交禮節，使雙方領導人可就共同關心的議題深入交換意見；(三) 可廣泛接觸各國政界上層及各部會人士。

²⁵⁵ 周余雲，〈世紀之交的拉美政黨政治〉，《拉丁美洲研究》，第 1 期 (1999 年)，頁 6-17。

²⁵⁶ 王新祿，〈拉美一體化的現狀、成果和前景〉，《拉丁美洲研究》，第 1 期 (1999 年)，頁 31-43。

這些拉美政黨絕大多數是執政黨或是主要在野黨。中國大陸與拉美邦交國的執政黨或是重要在野黨發展關係，為中國與拉美各國國家關係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思想 and 政治基礎。同時，拉美國家普遍實行多黨制，政權更替頻繁，與重要在野黨保持交往，有助於外交關係穩定持續發展，不受政局變動的影響。即便有些政黨一時無法上台執政，它們也代表著一部分的社會力量，對促進人民之間的友誼和推動國家關係的發展，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此外，中國和尚未建交的國家政黨發展友好關係，主要目的在為建立國家之間的正式經貿關係造橋鋪路。

(三) 民間友好

除了領導人頻繁的外交出訪以及政黨交往之外，民間友好交往亦是中國總體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大陸主要透過隸屬於國務院的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以及中國拉美友好協會，²⁵⁷ 來加強與非邦交國的關係並增進雙方在國際上的相互扶持。近年來這兩個組織的功能主要體現在：1. 透過民間交往，為官方外交服務，這主要是針對與非邦交國關係的發展；2. 加強同拉美友好組織的聯繫；3. 受政府委託協調管理與友好城市之關係，並且參與非政府組織。中國大陸的非政府組織工作則起步較晚，目前尚處於起步階段。²⁵⁸ 總言之，民間友好交流可以發揮官方所不能發揮的作用，是中國總體外交的一個重要組成分子。推動與非邦交國的友

²⁵⁷ 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簡稱中國大陸對外友協，成立於 1954 年。其修改後的章程表明：中國對外友協以增進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的了解和友誼，推動國際交流與合作，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宗旨。中國拉丁美洲友好協會成立於 1960 年，其成立宗旨是發展中國人民與拉美各國人民的文化交流。王宏強，〈中國對外友協在推動中拉關係方面的作用〉，《拉丁美洲研究》，第 5 期（2002 年），頁 7-21。

²⁵⁸ 中國大陸的非政府組織在 1998 年正式取得聯合國精社理事會諮商地位，2001 年 5 月聯合國才正式批准，中國大陸對外友協為聯合國經社理事會，為具專門諮商地位的非政府組織。王宏強，前引文，頁 13。

好關係，對促進日後的建交將發揮積極作用，在建立了外交關係之後，民間交流在促進雙邊關係的發展中，仍然佔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²⁵⁹

二、經貿投資及技術合作

進入 1980 年代之後，中國大陸和拉美的政經情勢都發生了巨大了變化，因而使得雙方都有了進一步加強經貿關係的要求和客觀條件，雙方貿易往來呈現持續增長的情勢。但是由於拉美區域國家遭受嚴重的債務危機，經濟停滯不前，各國紛紛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中、拉貿易受到巨大的阻力。然而，1980 年代中後期之後，拉美各國在國內實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和經濟對外開放，保持了經濟形勢的穩定，經濟出現增長的趨勢，也因此帶動了中、拉貿易。²⁶⁰

1980 年代末期至 1990 年代中期，拉美國家對外政策的重心由政治轉向經濟，一改過去的貿易保護主義，降低關稅並取消貿易壁壘，致力於經濟改革，推行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對外開放。多數拉美國家都減少了國家對經濟的直接參與，轉而較為尊重市場機制。過去不允許私人介入的部門行業，逐步對本國私人資本開放，部分也對外國資本開放。更重要的是，拉美國家調整了外資政策，修改外資法來積極吸引外國投資。在投資環境改善後，拉美重新成為外資投資的熱門地區。根據聯合國拉美經委會資料，從 1989 年起，流入拉美的資金就有大幅增加的趨勢。²⁶¹

²⁵⁹ 王宏強，前引文，頁 13。

²⁶⁰ 張新生，〈拉美經濟發展前景與中拉關係〉，《拉丁美洲研究》，第 2 期（2000 年），頁 5-14。

²⁶¹ 耕耘，〈走向 21 世紀的拉丁美洲和中拉關係的前景〉，《拉丁美洲研究》，第 5 期（1997 年），頁 11-23。

中國大陸在考慮於拉美國家投資時，更還要謹慎考慮成本問題。一般來說，拉美的勞動力成本和環保費用高於中國大陸，且拉美市場的管理規則較中國繁雜，而產業部門的配套能力又不及中國。綜合看來，中國大陸企業在拉美進行投資所出產之商品，生產成本要高於在國內之生產成本。總體來說，中國大陸和拉美國家投資關係的發展，由於受到地緣因素及雙方經濟發展水準的限制，尚難超出傳統的格局，且拉美國家與中國大陸之間存在的經濟互補性層次也並不高。更重要的是拉美國家向來以發展，與美國、西歐和本地區國家間的經貿關係為重點。從短期而言，中國大陸企業要從對拉美國家的投資中獲利，並非輕而易舉之事，但從長期看來，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雙方經濟實力增強、企業競爭力達到較高水平後，雙方交往的規模和水平，將有大幅度的提高。²⁶²

肆、對拉美之經貿發展特性

由於拉美國家在 1980 年代末、1990 年代初，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適為中國崛起之時，因而使中拉經貿合作關係更形密切。且拉美地區的豐富資源，亦使中國從能源戰略著眼，與巴西、阿根廷和智利分別簽署了鐵礦、石油和銅礦等資源開發投資協定，與委內瑞拉等石油出口國增加了貿易合作。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於 2004 年 11 月訪問拉美四國，宣布 10 年內中國將投入 1000 億美元到拉美，以協助他們發展。並提出發展中、拉關係的三大目標；其中最主要的即是「經濟上優勢互補，成為在新的起點上，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當然，中國大陸願意在拉美投入那麼多資金，主在追求他們既定的「南方外交政策」，這個政策是中國大

²⁶² 張森根，前引文，頁 40。

陸希望在國際舞台上能扮演雙重角色，也就是中國大陸既希望成為世界舞台的領導者，同時又希望被當作發展中國家看待，使的它不斷在全球各地簽署經濟合約，為其國內經濟發展融資。當然，中國大陸在拉美的投資，除了著重在包括石油、鐵礦石、銅礦、木材、農產品等大量的原物料進口之外，中國大陸更重視的是，它在拉美的投資，是否有助於其躋身於世界之林。因為中、拉經貿機制不斷擴大，促使中國大陸與里約集團、南錐共同市場以及在東亞—拉美論壇內均保持暢通的經貿合作管道。由於中國大陸已在拉美設立 300 多家企業，協議投資額逾 10 億美元，另和 16 個國家簽訂了經濟技術或經濟合作協定，並和 10 個國家簽署了投資保障協議等，²⁶³ 可瞭解中國大陸在崛起後，視拉美為其經濟上，可開發合作的巨大潛在市場。²⁶⁴ 分析中國大陸自崛起後，對拉美的經貿發展政策，呈現出六個主要特性：

其一，每當中國大陸與某超強權國家交惡時，中國大陸便會重視第三世界國家，例如 1960 年代與前蘇聯交惡，以及 1989 年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大陸便強化其對拉美國家的交往與援助數量，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大陸重視拉美國家時，其必然與某超強權國家交惡，中國大陸對拉美國家的重視，可能超出於政治考量，亦可能緣於經濟考量。事實上，中國大陸崛起後，其對拉美國家的重視，係出於經濟考量，而非完全因政治目的而來。

其二，中國大陸崛起前，其對拉美外交政策，以三個世界理論與務實經貿外交為主。早年中國大陸對拉美政策，囿於毛澤東個人對共產主義的信仰與對激進政體的偏好，中國與拉美國家外

²⁶³ 吳洪英、張新生，《現代國際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 年），頁 4-5。

²⁶⁴ 胡紅蕾，〈專家認為中國入世將中拉關係推向新的高度〉，2002 年 8 月 9 日，取自《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08/09/content_518608.htm，檢索日期：2014 年 8 月 9 日。

交關係的建立，以擴張反帝國主義與反殖民主義戰線為主。但在毛澤東逝世後，意識型態對中國政策的影響力日漸薄弱，其拉美政策開始轉向以經濟利益為主考量。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大陸之定位已轉為發展中國家，徹底揚棄由意識型態出發的第三世界理論。而自中國崛起後，其對拉美外交戰略更加積極的運用，「以邊陲包圍中心」、「以經濟誘導政治」、「以集團瓦解個體」之三管齊下。

第三，1990年代後，中國結合對外援助與對外投資，以官方資金鼓勵中國企業前往拉美設廠投資，或在受援國獲取貸款後轉貸予本國企業，以此為資金與中國大陸企業合作，顯示中國對拉美的經濟援助，已從1976年之前因意識型態而提供之援助，到其崛起後，已轉為經濟或能源利益與政治考量的對外援助。

第四，拉美國家對中國大陸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中國高層頻頻出訪，主為中國釋放利多、建立外交勢力範圍的重要工具。目前雖無直接證據顯示，中國企圖排除美國在拉美之勢力，但顯而易見的是，中國對拉美的持續經援、雙方日漸增長的貿易數字與緊密的政治關係，將使拉美國家成為中國在崛起後，提倡國際關係民主化，與未來訴諸國際體制變革的重要助力。2006年後，拉美國家尤其是左派政權在地區和國際舞台上異常活躍，展現出其對地區一體化和與中國關係的新思考。²⁶⁵ 綜觀中國大陸目前已先後與巴西、阿根廷、委內瑞拉、墨西哥建立「戰略夥伴關係」，與智利、秘魯建立「全面合作夥伴關係」，並與千里達、牙買加等國，建立不同形式的夥伴關係等發展趨勢，²⁶⁶ 顯示中國欲藉全面提升

²⁶⁵ 筆鋒，〈拉美左翼的機會與考驗〉，《亞洲週刊》，第21卷41期（2007年），頁6-7。

²⁶⁶ 李明德，《拉丁美洲和中拉關係-現在與未來》（北京：時事出版社，2001年），頁336-354。

交往層級，鞏固雙邊關係並密切與彼等在國際間互動合作，進一步形成在拉美地區的戰略依托。

第五，加強經貿領域的主動性，中國大陸已成為巴西等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且中國大陸還是僅次於美國、日本的巴拿馬運河第三大用戶。²⁶⁷ 此外，2006年10月1日，中、智共同宣布正式啟動自貿投資和服務貿易談判，為中國大陸與其他拉美國家，進行自貿協定談判開創了先例；²⁶⁸ 隨著中、智貿易協定的落實，其「骨牌效應」必將進一步促進中、拉經貿關係的發展。²⁶⁹ 由此可看出，中國與拉美從過去單純的原物料及各式商品進出口關係，已轉為「長線格局」之經貿行動，進入當地能源、礦產、森林等資源開發產業，或援助當地國家港埠、道路、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等。

第六，增進全面性交往交流，近年來，中國大陸與拉美國家交往，不再以意識形態異同及與臺灣發展邦交與否作為區隔，而更強調交往對象的全面性及手段的多元性，一方面體現在普遍發展與所有拉美國家關係，對象無論建交與否、執政黨或在野黨，均持積極接觸和交往態度。另一方面表現在加強政治往來、經貿合作之外，同時開展相互間政黨、議會、民間交流及與地區組織的聯繫。

²⁶⁷ 吳洪英、張新生，《現代國際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頁4-5；58。

²⁶⁸ 張翠容，〈拉美左翼改革新實踐〉，《亞洲週刊》，21卷41期（2007年），頁32。

²⁶⁹ 徐世澄，〈2004年拉丁美洲政治形勢〉，2005年2月1日，取自《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http://ilas.cass.cn/zxcg/zhengzhi/20060530/101704.htm>，檢索日期：2005年1月15日。

第三節 亞太區域經貿政策

相對於中國大陸在拉丁美洲的自主性、或在東亞區域經貿政策的主導性，²⁷⁰ 其在亞太區域經貿政策的主導性就顯得弱化，造成中國大陸在此區域，經貿政策主導性減弱的原因，主要基於美國的存在，與中國大陸在亞太區域的競合，以及其他亞太區域經貿特性使然。由於TPP(Transit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甫於2016年2月4日完成簽署，故美國歐巴馬總統一再宣示，TPP代表著美國仍然是全球經貿規則的制訂者，也是帶領全球經貿發展的領導者；相對的，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只是美國的追隨者。然而，在美國主導TPP之際，東亞地區的「東協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架構」(ASEAN Framework for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第11回合談判，2016年度第1次談判會議也於當年2月15-19日在汶萊召開，RCEP談判國原本宣示在去年完成談判。值得一提的是，越南原由親美派主政，因此過去多積極投入TPP談判，近來由於越南國內領導階層的結構改變，改由較為親中的領導階層主政，將促使越南更投入RCEP談判，且配合中國大陸主導的RCEP談判進程，顯見中國大陸在此區域中的主導作用。²⁷¹換言之，中國大陸對亞太區域的經貿政策，脫不開中、美競合的架構。

壹、美、中亞太區域的競合

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經濟規模擴大，國防預算逐年增加，挑戰現有的國際體制，威脅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霸權地位，使美國感到擔心，採取相對措施因應。中國大陸試圖參與制定國際規

²⁷⁰ 中國大陸在東亞區域的經貿政策將於下節次進一步闡述。

²⁷¹ 許峻賓，〈亞太區域整合不脫中美競合架構〉，2016年2月24日，取自《風傳媒》，<http://www.storm.mg/article/82774>，檢索日期：2016年2月24日。

則，提出「充份尊重各國文明發展多樣化」及「國際政經新秩序」等概念，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體制，美國為維護霸權地位，對逐漸升高的中國威脅，採取遏制策略，尤其是中國大陸對主導東亞事務的漸增實力，將美國等區外國家排除在外，爭取區域主導權的意圖十分明顯，美國已採取一系列的反制措施，特別針對中國與東協成立自由貿易區。歐巴馬總統於2008年上任後，即將戰略重心轉向亞洲，2009年7月美國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顯示美國重返東南亞的決心，²⁷² 隨於同年9月宣布加入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TPP)，美國總統歐巴馬在2011年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中，推動亞太地區一項廣泛的區域貿易協定，希望將TPP擴展到APEC所有21個會員國，美國積極主導TPP發展具全球戰略考量，目的除希望在亞洲經濟整合中扮演關鍵角色，即以加強與亞太國家的經貿合作，牽制中國大陸與此一地區日益緊密的關係，更期待以此制衡中國大陸與日俱增的影響力。²⁷³

美國總統歐巴馬於2009年上任後，便積極推動重返亞洲的地緣戰略，不單單只是宣稱自己是來自於亞太的總統，也同時因為2008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讓美國身陷經濟困境，以及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的結束，讓美國舒緩以往過度專注於中東事務，長期的忽視亞洲政經事務之推動，又同時面臨中國大陸崛起的潛在威脅，以及亞洲經濟的蓬勃發展，讓美國不得不對亞洲投注更高度的關注。重視亞太地區不僅只是基於外交安全考量而

²⁷² 李正修，〈美國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之影響及我國因應措施〉，2009年9月22日，取自《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http://www.npf.org.tw/post/3/6485>，檢索日期：2015年9月22日。

²⁷³ 吳玲君，〈跨太平洋伙伴協定的發展與影響〉，2012年6月1日，《問題與研究》(第51卷第2期)，<http://iir.nccu.edu.tw/attachments/journal/add/5/2011-1-04.pdf>，檢索日期：2015年9月22日。

已，更基於經濟利益的現實考量。尤其當中國大陸於2009年趕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英國《金融時報》在預測2017年中國大陸將會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更讓美國擔憂霸權不保。事實上，美國重返亞洲的政策企圖極明顯，正如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冠冕堂皇地說：「就是要維護和鞏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以及重返亞洲的承諾——「不僅是攸關亞洲的利益，也攸關美國的利益」，可以說一語道破。而所謂的「維護和鞏固」美國的領導地位，最終無非仍要靠軍事力量，並拉攏亞太周邊國家的區域經濟聯盟；而所謂的美國利益，除了透過軍備優勢力量創造，還必須依賴經貿實力手段。²⁷⁴

中國大陸崛起後，一直強調要和美國建立新型的大國關係，而美國則積極的施作重返亞太的戰略部署，若細究近幾年來中、美的互動圖景，我們可以赫然發現，美、中之間，這幾年不斷在跳著後現代的戰略探戈。這種北京與華盛頓之間特有的戰略探戈，剛烈與陰柔氣氛穿插並存，舞步既實還虛，既虛又實，拚搏導引與合作對話並行，張力中有浪漫，浪漫中又隱含殺伐之氣。促成美、中這種戰略探戈的現實基礎，主要有以下幾點：其一，在目前這樣的後冷戰時代，北京與華盛頓任何一方，都無法再像冷戰時期一樣，可以高舉大寫的真理標準旗幟，劃出對錯界線，結成二分式的對抗同盟；其二，在目前這樣的全球化時代，政軍經文等各向度都是環環相扣，盤根錯節連成一氣，無法再被人為的切割，不太可能進行，不管其他方面效應的單方面對抗，甚至在單方面都不敢進行，只對抗不合作或對話的行徑；其三，中、美雙方的綜合實力，都無法大到可以只一味對抗而不求合作的地

²⁷⁴ 宋鎮照，〈美國重返亞洲的企圖與策略：霸權地位保衛戰〉，2013年2月1日，《海峽評論》，<http://www.haixiainfo.com.tw/266-8657.html>，檢索日期：2015年9月22日。

步。美、中兩國在亞太經貿的關係上，雙方這種鬥而不破的競合關係更是明顯。²⁷⁵

貳、亞太區域主義的特性

一、亞太區域的開放性

亞太地區的區域合作組織，不同於歐、美區域經貿組織，不排斥區域外國家的加入，因此出現跨區域的現象，亞太區域內的區域主義採取三個標準：(一)成員開放，任何機制外的國家，只要滿足標準，便可加入貿易集團；(二)非禁止性條款，一項貿易協定，可以允許任何成員，單方面的將其互惠，自動延及非會員國；(三)開放的互惠與選擇自由化，成員可以將自由化，集中在主導的領域，不必再給非會員國優惠待遇。²⁷⁶目前多數區內國家同時是 ASEAN (東協)、APEC、「東協加三」、TPP (跨太平洋經濟伙伴協定)、NAFTA (北美自由貿易區) 的成員，其中以亞太經合會 (APEC) 就具有開放性、非制度化、鬆散性的特質，強調合作的自主性 (autonomous) 與自願性 (voluntary)，新成員國家的加入只要獲得全體成員，協商一致的接納，1989 年成立時有 12 個會員國，陸續增加為 21 個會員國，包括非亞洲地區的美、加、智、墨、秘、俄等國。2005 年召開的第一屆東亞高峰會 (East Asia Summit, EAS)，基本成員為「東協加三」，但接受印度、紐西蘭、澳洲等亞太國家參與論壇，具有開放、包容的性質。這是造成中國大陸在亞太經貿事務上，主導性降低的另一個原因。

二、亞太區域的多頭領導和多層次性

²⁷⁵ 李英明，〈鬥而不破 陸美後現代戰略探戈〉，2014 年 7 月 24 日，取自《聯合新聞網》，<http://udn.com/NEWS/OPINION/X1/8824222.shtml>，檢索日期：2014 年 7 月 24 日。

²⁷⁶ 王萍，《走向開放的區域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124。

亞太地區強權或集團，為建構有利於自身利益的區域貿易安排，爭取成為區域經濟整合的核心主導者，以確保其將來在區域的影響力與勢力範圍，形成多頭馬車發展與多層次重疊的現象，美國、中國、日本、東協等，顯然在競逐新一波東亞區域主義的主導權。首先是中國與東協聯合推動東亞主義，企圖排除美國。美國歐巴馬總統上任後，為爭取對亞太事務的主導權，積極推動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TPP)，繼續鞏固美國在亞洲地區的影響力，與中國爭奪亞洲地區的領導權。然而，中國、日本與東協亦在東亞整合的架構內，爭取主導權，東協成立區域論壇(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RF)，象徵力求以「東協方式」(the ASEAN way)的對話機制，來維持亞太區域安全，並將其倡立的東亞高峰會擴大為「東協加六」，無非冀圖主導東亞整合發展；中國大陸則另推動東北亞三國對話合作機制，向自由貿易區推進，最終連結已形成的「東協加一」自由貿易區，達成東亞區域一體化之藍圖，以對抗美國主導的 TPP，以及日本試圖倡導成立的「東亞共同體」。顯然在亞太區域，這種多層次的區域主義發展，顯示區域強權角逐的激烈。²⁷⁷ 此外，亞太地區區分為亞太主義、東亞主義及東協主義三個層次，然而在亞太主義中，又可分為 APEC 與 TPP 兩個機制，在東亞主義中，又有「東協加一」、「東協加三」、「東協加六」對話合作機制，及類似大湄公河合作開發計畫等次微區域合作計畫，形成多層次與多樣化的面貌。亞太區域不僅數量增加，而且合作的內容範圍擴大，不再侷限在經濟與安全目標，亞太區域各國所關心的問題與合作範疇，擴及到人權、民主、環境、社會、文化及非傳統安全等方面。

²⁷⁷ 江啟臣，〈亞太 vs. 東亞經濟合作：問題、觀點與展望〉，收錄江啟臣（編）《強權關係與亞太區域發展》（臺北市：中華臺北 APEC 研究中心，2000 年）頁 135-160。

三、亞太地區的亞洲制度化

代表亞太主義的 APEC，反映美國霸權力量籠罩亞太地區，但由於內部國家經濟水平差異大，當開發中國家與美加等發達國家發生利益衝突時，逐漸激發東亞地緣意識，這種「亞洲化」的區域意識在 1990 年代初就已出現，東協國家本身意識力量薄弱，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提出「東亞經濟集團」構想，雖遭美國為首的外力介入封殺，但 1995 年東協曼谷會議中，再度提出東協加三首腦會議，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激發東亞區域主義意識，當時美國等西方國家採取壁上觀態度，促使東亞主義快速興起，2000 年以來，中國推動的東北亞合作對話機制，都將美洲國家排除在外，由於區域意識的抬頭，及中國實力的壯大與崛起，亞洲化的區域整合趨勢將益加明顯。²⁷⁸ 此外，亞太地區的整合，無論是 APEC、ASEAN 或東協加三，都仍在功能性合作的階段，表現在參與國家的自願與自主的進程，因為此種鬆散型組織型態，無法有效達成目標，故使亞太區域合作，需趨向制度化發展，其中東協加三高峰會成立以來，已在外交、財政、經濟、農林、旅遊與勞動的數個領域，建立部長級合作會議機制，推動金融等相關領域的合作，東協加三已成東亞區域合作的主渠道，東協分別與中國大陸的合作，及與中、日、韓三國對話合作機制為次渠道，其中東協為軸心的東協加一自由貿易區已經實施，中、日、韓領導人也於 2012 北京峰會，決議組建東北亞自由貿易區，顯示包括東亞地區經貿的合作，逐漸步上強化制度性合作。²⁷⁹ 這種類似國際建制的亞洲制度化，也促使中國大陸主導亞太地區經貿事務的弱化。

²⁷⁸ 王庭東，〈論東亞新地區主義〉，《當代亞太》（2003 年第 1 期），頁 52-58。

²⁷⁹ 黃大慧、韓愛勇，〈東亞地區主義研究評析〉，2012 年 3 月 15 日，取自《中道網》，<http://www.zhongdaonet.com/NewsInfo.aspx?id=3267>，檢索日期：2015 年 7 月 24 日。

叁、RCEP vs. TPP

最能展現中國大陸在亞太區域對抗美國所主導經貿區域整合，以 RCEP 和 TPP 的出現最能說明。自從美國在 2009 年 11 月宣布，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第一回合全面性入會談判，進而帶動澳洲、秘魯、越南、日本等其他 APEC 會員體，相繼表達加入 TPP 的意願之後，東協繼之於 2011 年 11 月的第六屆東亞高峰會當中，提出一個關於建構涵蓋東亞地區之「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的倡議，並在翌(2012)年獲得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印度、澳洲和紐西蘭等國同意，展開組建。自此，亞太區域內的貿易及投資自由化進程，儼然呈現以東協作為主要推動力量的 RCEP (以中國大陸為首)，以及由美國所主導的 TPP (以美國為首) 兩股集團勢力，競相擴大整合的發展趨勢。由於 RCEP 與 TPP，對於貿易自由化開放程度的要求標準迥異，參與成員卻高度重疊，因此兩者間競合關係的發展，除了攸關亞太地區，在未來自由貿易機制上的路徑選擇外，亦影響美、中兩大強權在亞太地區，甚至於全球所進行之地緣政治與經濟戰略布局。雖然，2014 年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曾於博鰲亞洲論壇開幕式演講時表示，中國大陸對 TPP 持開放態度，「樂見其成」，並希望由 RCEP 能與 TPP 「並行不悖、相互促進」，也希望 RCEP 在 2015 年能夠達成協議。2013 年 7 月起日本開始參與 TPP 談判後，原本毫無意願加入 TPP 談判的中國，態度也開始鬆動，但美方的態度似乎曖昧不明，因而傳出「中美互拒，互搞小圈子」的看法，故美、中雙方在亞太區域的經貿競爭、互相較勁意涵，一直存在著。²⁸⁰

²⁸⁰ 潘維庭，〈RCEP、TPP 可「並行不悖」〉，2014 年 04 月 10 日，取自《風傳媒》，<http://www.storm.mg/article/29780>，檢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11 日。

RCEP 構想最先出自於 2011 年 2 月，在緬甸奈比多(Naypyidaw) 舉辦之第 18 屆東協經濟部長非正式會議(18th ASEAN Economic Ministers, AEM Retreat)中，並於當年(2011 年)東協峰會(ASEAN Summit)提出討論之後，2012 年 11 月第 21 屆東協峰會正式形成 RCEP，2013 年將展開談判，預計 2015 年底以前，完成首波談判後，再開放其他國家或經濟體參與。目前參與 RCEP 成員除 ASEAN 的 10 個會員國之外，尚包括中國大陸、日本、韓國、紐西蘭、澳大利亞及印度等六國，包含了東北亞、東南亞、西南亞及澳洲等區域，若以 2012 年 GDP 計算為例，RCEP 經濟規模約 21.63 兆美元，占全球 GDP 的 32%，30 多億人口占全球人口數的一半，RCEP 倘若順利完成，將成為全球最大的區域經貿組織。²⁸¹

TPP 為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的簡稱，又稱為「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2002 年，由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成員國汶萊、智利、紐西蘭及新加坡四國開始醞釀，並逐漸形成一組多邊關係的亞太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 FTAAP)，旨在促進亞太地區的貿易自由化。根據泛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第一條一款三項(Article 1.1.3)規定：「本組織支持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促進自由化進程，達成自由開放貿易之目的。」因此，TPP 所關心的核心議題，包括貿易協定、工業產品、農業、紡織、知識產權、技術性貿易壁壘、勞工以及環境等八大議題，主要目的是為了消除商品和服務的貿易關稅，以及非關稅的壁壘，簡化文書作業及海關程序，讓對外投資貿易流動，更加便利。

²⁸¹ 譚瑾瑜，〈RCEP 現況及臺灣因應之道〉，2012 年 12 月 14 日，《新浪新聞中心》，<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21214/8550112.html>，檢索日期：2012 年 12 月 31 日。

²⁸² 若以 2012 年 GDP 計算為例，TPP 經濟規模約 27.53 兆美元，占全球 GDP 的 40%。分別以中國大陸與美國為首的 RCEP 與 TPP 相關之經貿數據比較，²⁸³ 詳如下表 4-1 所示。

表 4-1：RCEP 與 TPP 相關之經貿數據比較

區域別 數據別	RCEP	TPP
區域總 GDP (占全球比率)	21.63 兆美元 (32%)	27.53 兆美元 (40%)
中國之 GDP (占區域比率)	8.23 兆美元 (32%)	
美國之 GDP (占區域比率)		15.68 兆美元 (32%)
區域出口總產值	6.50 兆美元	5.49 兆美元
中國出口產值 (占區域比率)	2.55 兆美元 (39.2%)	
美國出口產值 (占區域比率)		2.19 兆美元 (39.9%)
成員國數	16	12
重疊國家	日本、汶萊、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 澳大利亞、紐西蘭	

說明：以 2012 年數據為例。

資料來源：1. The World Bank, “Export Goods and Services (% of GDP),” *The*

²⁸² 謝明瑞，〈黃金十年與 TPP〉，2011 年 11 月 26 日，〈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政研究報告〉，<http://www.npf.org.tw/post/2/10142>，檢索日期：2012 年 12 月 31 日。

²⁸³ 沈燦宏，〈RCEP、TPP 誰與爭鋒 vs. 中國、美國誰將勝出〉(臺北：致知學術出版，2015 年)，頁 284-288。

- World Bank*, retrieved 29 July 2013, from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E.EXP.GNFS.ZS/countries>.
2. Chung-Hua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 “Table 6. Foreign Trade Values.” *Chung-Hua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 retrieved 18 January 2013, from <http://www.cier.edu.tw/cef/CEF-index-4.pdf>.
 3. DGBAS, “Statistical Tables,” *National Statistics,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retrieved 29 July 2013, from <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14616&CtNode=3564&mp=4>.
 4.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OF. (2013).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Ministry of Finance*, retrieved 29 July 2013, from <http://www.mof.gov.tw/lp.asp?ctNode=2721&CtUnit=11&BaseDS D=5&mp=62>.
 5.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國家基本資料表〉，取自《貿協全球資訊網站》，<http://www.taitraesource.com/total01.asp>，檢索日期：2012年12月31日。

然而，2015年中國大陸國家領導人習近平訪美，會見美國總統歐巴馬後，雙方都強調北京/華盛頓之間，可以克服這個歷史「魔咒」，而習近平更強調，要克服這個魔咒，必須發展雙方的新型大國關係。所謂新型大國關係，是以冷戰時期的大國關係，做為對照參數。冷戰時期的大國關係，彼此通過意識形態的操作，劃出是/非，對/錯及好/壞的二元化的界線，聲稱己方代表正義真理，把對方打成是邪僻歪道，從而進行激烈的意識形態攻防，競爭衝突遠大於妥協合作，甚至很難形成實質的合作。隨著冷戰結束，大國之間不再只是純粹的對抗或合作，而是呈現一種對抗中有合作，合作中有對抗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中，不存在純粹的你/我之分，而是呈現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織關係。在亞太區域經貿競合上，美、中兩國這種競合關係更是明顯。²⁸⁴

²⁸⁴ 李英明，〈歐習會/陸美談競合 不比拳頭硬〉，2015年9月28日，取自《聯合新聞網》，<http://udn.com/news/story/7339/1214515>，檢索日期：2015年9月29日。

自 2013 年 5 月 RCEP 展開談判以來，進度一直領先 TPP，原本可望在 2015 年年底完成談判，但後來 TPP 加快談判進度超越，並於 2015 年 10 月完成談判、取得先機，使得以中國大陸為首的 RCEP 成員國必須重新評估定位。今(2016)年初，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赴國會發表任內最後一次國情咨文，強調國際合作，談到「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直言：「有了 TPP，中國大陸不是亞太洲地區的規則制定國，而是我們美國」(With TPP, China doesn't set the rules in that region, we do.)，²⁸⁵ 就是針對由中國主導的 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而來。顯然，這更展現出了美、中在亞太地區區域經貿競合的另一面。

第四節 東亞區域經貿政策

隨著中國大陸實力快速提升，綜合國力已有顯著的提高，在國際社會舞台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中國大陸經濟崛起的事實，造成東亞地區，甚至全球經貿版圖的變動，²⁸⁶ 尤其中國大陸打破了東亞經濟發展的「雁行模式」，不但是東亞地區經濟成長的「火車頭」，更是世界經濟的發展重心。伴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大陸與全球經濟的互動，愈來愈密切，中國大陸經濟波動與政策更迭，正對全球經濟的發展，產生愈來愈大的影響；²⁸⁷ 尤其與東亞區域內國家的貿易往來密切，其經貿的互賴度愈來愈

²⁸⁵ 自由時報，〈談 TPP 歐巴馬嗆中國：亞洲規則是美國訂的〉，2016 年 1 月 13 日，取自《自由電子報》，<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570608>，檢索日期：2016 年 1 月 13 日。

²⁸⁶ 高長，《展望大陸經濟變動趨勢與全球經貿版圖消長》（台北：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2004 年），未出版。

²⁸⁷ 李向陽，〈2004—2005 年世界經濟形勢回顧與展望〉，劉國光、王洛林、李京文（編），《2005 年：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頁 320-333。

強。同時，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東亞區域經濟整合，正逐漸發展中。中國大陸對東亞合作最大的難題在於中、日、韓三國的複雜關係，三國之間因歷史、政治衝突及競爭因素，存在著沉重的包袱與情節，導致經濟合作的談判，較無明顯之進展；然而，由於中國大陸爭取區域霸權地位的動作愈來愈明顯，尤其是在東南亞國家協會上（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或簡稱東協）。因此，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快速崛起，進而提升其協商的優勢，「東協加一（ASEAN+中國）」進行的步調，明顯較「東協加三」為快。中國大陸自 1997 年「東協加三」元首高峰會開始，即積極推動與東協的經濟整合協商，會後中國大陸與東協，達成為期三年的特殊關稅減讓計畫的協議，中國大陸承諾對東協各國農產品及製造業關稅減讓，讓東協各國在貿易交流上取得優惠待遇。中國大陸在加入 WTO 後，巨大的經濟潛力持續發展，會在東亞地區的經濟融合中扮演中心角色。因此，2001 年 12 月的「東協加三」元首高峰會，中國大陸與東協達成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共識。²⁸⁸ 在東亞區域經貿政策上，中國大陸藉著加速與東協經貿整合的基礎，更隨著東協的擴大時機，即東協加六、東協加八的出現，²⁸⁹ 積極展現其在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主要影響力。例如，藉「博鰲亞洲論壇」、東協加一及東協加三等場域，提升中國大陸的經濟領導地位，並藉主辦 2008 年奧運等活動，使中國大陸在區域的影響力明顯增加。²⁹⁰

²⁸⁸ 張幼文、徐明棋，《強國經濟—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與道路》（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²⁸⁹ 東協加六，或稱為東協全面性經濟夥伴關係架構（ASEAN Framework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係指東協十國另加上中國大陸、日本、南韓、印度、紐西蘭、澳大利亞等六國；而東協加八則是在東協加六的基礎上在加上美國、俄羅斯等二國。

²⁹⁰ 黃介正，〈兩岸態勢評估(2003/2004 年)〉，袁易、嚴震生、彭慧鸞（編），《中國崛起之再省思：現實與認知》（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4 年），頁 136-142；詹滿容，《我國因應中國大陸與東協建立自由貿易區之研究》（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2004 年），未出版。

壹、對東亞區域的經貿影響

探究中國大陸在東亞區域經貿政策，以能涵蓋 ASEAN 的「東協加一」或「東協加三」，以及「中、日、韓自由貿易」，最能彰顯中國大陸在東亞區域的經貿影響力。

以「東協加一」而言，中共爲了防範美國在亞太地區，對其採取圍堵策略，因此積極拉攏周邊國家；譬如，2003 年底與東協各國簽署「南海行為準則」，平息南海主權爭議是一個具體的例子，增進東亞各國對中國大陸的信任，爭取區域的主導優勢，採取「有所作為」的策略，以尋求穩定周邊環境和抗衡美、日兩國在亞太地區的勢力，²⁹¹ 尤其「東協加一」的倡議，即是排除日、韓兩國，以取得東亞自由貿易談判的主導地位，利用經貿手段來達到政治目的，進而與日本爭奪亞洲區域經濟整合的霸權地位，提高其在全球的發言權。

以「東協加三」而言，東協加三最初的目標，在於連結中國大陸與日本的經濟力量，一方面吸引日本的資金，作為財政及發展上的支援，以分散未來再度遭遇金融危機的風險，另一方面是能夠與中國大陸這個最主要安全標的展開互動。²⁹² 因此，除經濟因素之外，東協加三還隱含安全因素，而在作法上，就是將中國納入多邊機制的範疇內，使其有進一步融入規範的機會，而這可從中、日、韓三國個別與東協之間的互動進展中看出端倪。此外，中國大陸對東協加三的考慮，係基於全球經濟區塊化的潮流，如果不積極參與區域經濟合作，尤其是建立自由貿易區，便會失去利用外商投資的資本、技術、先進市場管理的契機，而被排除在

²⁹¹ 丁樹範，《中國大趨勢：2003-2004》（台北：新新聞文化，2004 年）。

²⁹² Markus Hund, "ASEAN Plus Three: Towards a New Age of Pan-East Asian Regionalism? A Skeptic's Appraisal,"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6, No. 3 (September 2003), p. 386.

潮流之外。因此，中國大陸為了取得先機，來因應美、歐區域經濟整合，所帶來的貿易保護主義，認為建立區域的經濟合作，既能增強競爭力來抵制外來的保護主義，有助於減緩中國大陸對外貿易的衝突，進而提升在國際分工的地位。²⁹³ 事實上，在東協加三的框架下，東協與各國間，亦同步發展雙邊關係，而進展最快速的就是中國，2001年中國大陸與東協，同意十年內建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2002年即正式簽署「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定」(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ASEA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並已於2010年完成中國與東協的自由貿易區。除經濟的互動外，中國亦是東協第一波簽署「友好與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TAC)的區域外國家。只是東協與中國大陸的雙邊關係發展，使日本出現競爭意識。在此期間的日本與東協雙邊關係，都是緊隨中國的腳步，例如，日本於2003年主動要求與簽署「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定」，若非中國大陸簽署，日本對東亞自由貿易區仍將存觀望態度。²⁹⁴

以「中、日、韓FTA」而言，企圖主導東亞區域主義發展的中國大陸，除了一方面與東協合作推動「東協加一」，參加「東協加三」，另外一方面與日、韓推動三國合作對話機制，1999年中、日、韓三國領導人在東盟峰會期間，建立三國部長會議機制。2003年，中、日、韓三國共同簽署「中、日、韓推進三方合作聯合宣言」，目的是從政府層面，推動中、日、韓自貿區的建構。2004年，第六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通過「中、日、韓三國合作行動戰略」，為三國全面推進各領域合作做出具體規劃。2007年1月，第七次

²⁹³ 巫寧耕，《東亞經濟合作的道路》，梁志明（編），《亞太研究論叢第一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3-14。

²⁹⁴ 金榮勇，〈形成中的東亞共同體〉，《問題與研究》，第44卷，第3期（2005年5、6月），頁43。

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發表「聯合新聞聲明」，表達友好與合作的政治意願。同年11月，第八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在新加坡舉行。2008年12月，第一屆單獨舉行的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在日本福崗舉行，簽署並發表「三國夥伴關係聯合聲明」，確定三國合作的方向和原則。會議並通過「國際金融和經濟問題的聯合聲明」和「推動中、日、韓三國合作行動計畫」。2009年10月，第二屆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在北京舉行，日本首相鳩山提出「東亞共同體」的構想，會議並發表「中、日、韓合作十週年聯合聲明」。2012年5月在北京舉行的第五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三國領導人簽署「投資保障協定」，同意該年內正式啟動中、日、韓自由貿易區(FTA)談判。²⁹⁵

貳、對東亞區域經貿政策的作為

一、優先爭取東南亞

從經貿關係來看，東協各國對中國大陸經濟，呈現高速成長倍感威脅，尤其，中國大陸加入WTO後，成為東協對外貿易及吸引外資流入的最大競爭對手。有論者指出，東協各國與中國大陸之間的經濟發展差異性很大，且所產生的貿易衝突也十分大，²⁹⁶尤其，中國大陸與東協存在一些相互競爭性很強的產業與相關產品，使中國大陸與東協之間出現競爭不平衡的局面，增加建立自由貿易市場的困難度。中國大陸面對此一局勢，積極對外反駁「中國威脅論」，強調中國大陸經濟成長雖快，但經濟發展仍處於較低的水平，屬於發展中國家，聲明中國大陸如同世界各國一樣，將會與周邊國家加強建立友好、合作的關係，也強調中國大陸與

²⁹⁵ 元樂義，〈中日韓峰會同意年內啟動 FTA 談判〉，2012 年 5 月 14 日，取自《中時電子報》，<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501011149/112012051400073.html>，檢索日期：2015 年 5 月 14 日。

²⁹⁶ 吳建華，《東亞現代化與中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年）。

東協各國的經濟結構、產品結構不盡相同，爲了加速與東協經濟整合的進展，中國大陸積極解除東協各國對其的疑慮。²⁹⁷

中國大陸發展經濟，亟需一個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因此謀求與周邊國家改善和發展關係，睦鄰外交一直是中國大陸對外政策的主軸，同時還有戰略上的考量，中國大陸與東協建構自由貿易區，可以透過拉攏東協，來凸顯其在東亞區域的重要性，降低鄰國對「中國威脅」的疑慮與抵制，不僅可以改善與東協國家的政治外交關係，更可以順勢主導東亞事務，來與日本、美國或歐盟勢力相互抗衡。尤其對於中共東亞區域的戰略佈局更有幫助，透過善意的大國和平崛起訴求，可以讓中共勢力南向到東南亞，並延伸到印度洋，以及東出太平洋與南海，有利其海上運輸發展或海洋勢力的開拓。²⁹⁸

二、讓利與援助

東協國家認爲自己的經濟力量比不上中國大陸，開放市場可能未得其利先受其害；中國為化解東協的疑慮，促成東協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採取「讓利」策略，即中國大陸先開放市場，東協先享受進入大陸市場免關稅的利益，若干時段後，東協國家再對大陸開放。另外，提供援助方面，中國大陸為提高東協國家參與貿易自由化的合作意願，於2002年10月舉行「10+1」高峰會的同時，與東協簽署「農業合作備忘錄」，中國大陸同意提供水稻栽培、水產養殖等技術，同年12月底雙方又舉行「東協-農業合作」工作會，探討協助合作相關問題。2010年「東協加一」會議的期間，

²⁹⁷ 鄭富霖，〈「東協—中國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定」之爭端解決機制評析〉，《展望與探索》，第3卷第2期（2005年2月），頁96-102。

²⁹⁸ 曹云華、徐善寶，〈睦鄰外交政策與中國—東盟關係〉，取自《東盟頻道》，http://www.gx.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1/06/content_11595252.htm，檢索日期：2015年5月1日。

中國大陸提出128 億人民幣援助計畫，與東協國家共同籌資25億美元，修建國際鐵路，除主線由新加坡通到昆明外，另有西線通緬甸與東線通寮國。²⁹⁹

三、政治、經濟交互運用

中國大陸推動的睦鄰政策，涵蓋經濟、政治、安全、環境等各個方面，1990 年以來，中國高層官員密集前往東南亞國家訪問，1994 年7 月首次受邀參加東協區域論壇(ARF)，討論問題包括南海問題、區域安全機制等。1997年在中國與東協國家領袖會議「聯合聲明」中，承諾加強在所有領域的對話與合作，以增進瞭解和擴大互利，鞏固睦鄰互信伙伴關係。中國大陸與東協互為近鄰，對非傳統安全問題方面，存在廣泛的共同利益，咸認為需要加強地區與國際合作。2002年11月，中國大陸與東協各國領袖簽署「中國與東盟關於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言」，運用政治、經濟、外交、法律、科技等手段應付複雜的非傳統安全問題，並於2004 年中國大陸與東協國家簽署「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諒解備忘錄」。³⁰⁰

四、採取微區域主義形式的策略性合作

中國大陸積極倡導及支持東亞微區域主義(micro-regionalism)的有關計畫，認為成立東亞共同體是長程的目標，推展微區域區域，並整合到東亞區域主義的範疇。例如，1990年中、俄、北韓的「圖們江開發計畫」；1992 年與東南亞國家簽署「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計畫」；2004年與越南提出「兩廊一網」經濟區；2005年

²⁹⁹ 聯合早報，〈東協與中國關係新發展〉，《聯合早報》，2003 年10 月2 日，版2。

³⁰⁰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國與東盟關於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言〉，2002 年11 月4 日，取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1179/t10985.htm>，檢索日期：2014 年11 月4 日。

中、俄跨國經濟圈等，³⁰¹ 以及中國大陸的雲南省、泰國、寮國、緬甸等組成「黃金四角經濟合作區」；中國大陸參與「大湄公河經濟合作計畫」等。³⁰²

中國大陸爭取東亞區域事務主導權，是重組國際秩序的第一步，他憑藉強大經濟實力，推動成立東亞經貿集團，已產生磁吸效應，疏離東亞國家與美國的關係，削弱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主導東亞經濟事務是達成中國多極化戰略目標的切入點，一則亞洲金融危機後，亞洲國家相信，唯有區內團結才能渡過危機，與美、日相較，中國負責態度贏得東南亞國家的好感；另則，中國龐大經濟體發揮吸納效果，區內貿易比重升高，各國出口都高度依賴中國市場，中國大陸也有實力釋出援助，誘使區內國家參加合作機制，使中國大陸成為在東亞區域，最具影響力的行為者。2016年以來，愈演愈烈的南海爭端，雖然主要以區域安全為中、美競合的核心議題，但從太平洋美軍司令、海軍上將Harry Harris在聯邦參議院說明：中國大陸積極南海造島、武裝軍事化，是在謀求控制東亞區域的作為上，³⁰³ 間接證明了中國大陸在東亞區域，是最具經貿影響力的行為者。

³⁰¹ 楊昊，〈微型區域主義在東南亞跨域霾害治理上的挑戰與調適〉，《遠景季刊》，第7卷第3期（2006年7月），頁139-186。

³⁰² 陸建人，《東盟的今天與明天—東盟的發展趨勢及其在亞太的地位》（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9年）。

³⁰³ 黃以謙，〈中國試圖掌控東亞〉，2016年2月24日，取自《中時電子報》，<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224002881-260408>，檢索日期：2016年2月24日。

第五章 中國大陸對臺經貿政策分析

第一節 胡錦濤時期之兩岸結構變化

壹、兩岸結構不對稱

在 1950 年代中共建國之際，因中國大陸政權不穩定，而臺灣方面有美國的全力支援下，兩岸在權力結構上尚稱對稱，此一時期，中共野心勃勃的一再宣告「血洗臺灣」，自 1950 年至 1958 年的期間，中共不斷發動「八二三砲戰」、「一江山戰役」等大小戰役。1954 年臺灣與美國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美國對臺灣軍事援助增加，中共乃稍加收斂。至此，中共不但沒有能力解放臺灣，反而是臺灣方面已經做好反攻大陸的準備。³⁰⁴ 但自從蘇聯解體，原以美國、蘇聯、中共為主所形成的全球戰略關係，即產生結構性的變化，東、西兩大集團的冷戰態勢已告消泯。以往，中蘇邊境劍拔弩張的情勢，亦不復存在；整體而言，亞太地區大國軍力對峙的情勢，已趨於和緩。然而，由於美軍陸續將亞洲駐軍撤離或減縮，中國大陸隨即以擴張軍備的霸權姿態，填補此一權力的空隙，雖尚不足引發新的衝突，但卻使亞洲各國產生「中國威脅論」的疑慮。

相對的，兩岸的權力結構形勢，並未因交流頻繁而有所改變，「不放棄武力犯臺」以及「如果中共武力進犯臺灣」，一直是兩岸間唱和不休的政治語言，也是各國戰略家所關注的問題。中國大陸當然有能力以武力奪取臺灣，但是中國大陸必須付出極高的

³⁰⁴ 西元 1960 年代臺灣蔣介石總統曾策定「國光計畫」，預備俟中國大陸生產大躍進動亂之際，從廈門登陸反攻大陸。請參閱：鳳凰電視台，〈國光計畫—蔣介石擬大躍進時期反攻大陸〉，2010 年 7 月 5 日，取自《臺灣 YouTube 網》，<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Ev1K5Joe8E>，檢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30 日。

軍事勝利的代價與風險。更而甚之，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隨著中國大陸實力崛起，兩岸權力結構就開始不斷傾斜；20 餘年來，直至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主政之際，兩岸不對稱的權力對比，已成不可逆的不對稱結構，從兩岸的軍力對比，更可以看出這種不對稱的結構趨勢。胡錦濤時期兩岸權力結構的不對稱，仍承襲 2000 年 2 月 21 日，中國大陸透過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新聞辦公室發布《對台政策白皮書》，所寫明的「三個如果」——即「如果出現臺灣被以任何名義，從中國分割出去的重大事變；如果出現外國侵占臺灣；如果臺灣當局無限期地拒絕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兩岸統一問題」，中國大陸將對臺動武。³⁰⁵ 可以看出來，兩岸這種不對稱的權力結構的原因，主要來自於中國大陸欲統一臺灣的壓力。

另一方面，就臺灣的國防戰略而言，不論是既定「防衛固守，有效嚇阻」國防戰略，或是修訂的「有效嚇阻，防衛固守」的戰略，也是造成兩岸權力結構不對稱的原因之一。臺灣的國防戰略在內涵上都有「隱攻於守」的精神，意即不主動攻擊，只有遭受攻擊，才保證報復的「防禦作為」。實質上，要打破兩岸「戰爭恐怖主義」的不對稱關係，臺灣的國防戰略當然不能是被動的「只挨不打」，或消極的「防衛固守」，因為全世界沒有那一個國家的國防戰略是一味強調防守，而輕忽反擊戰力的。以臺灣目前的國力言，若與中國大陸進行軍備競賽，以求威脅與嚇阻戰力量能的均勢，自非明智之舉，但是若因以小事大，便坐待外力奧援，或一廂情願的冀求中國大陸宣布放棄武力犯臺，也是對國防戰略

³⁰⁵ 中華日報社論，〈中共裁軍—應向臺灣拋出和平橄欖枝〉，2015 年 9 月 3 日，取自《中華日報新聞網》，http://www.cdns.com.tw/news.php?n_id=16&nc_id=45892，檢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30 日。

的無知。因此，務實的面對中共軍事威脅，務實的量力而為，以維護臺、澎、金、馬既有之領土主權為國防目標，擺脫意識形態的包袱，擬定可行的、契合海島國家防衛需求的國防戰略，才是根本之圖。

表面上，「防衛固守，有效嚇阻」與「有效嚇阻，防衛固守」二者的差異，僅為字面上的順序調換，實質上，前者所呈現的較為保守、消極，亦不符合守勢戰略的理則；須知，戰史上沒有任何重大的戰爭、戰役，是不以嚇阻為先，以「不戰而屈」為首要之圖的。戰爭通常是在外交折衝失敗、嚇阻無效後才會發動，侵略者以大欺小，也是先展現「軍事實力」的威嚇，俟小國不屈不從後才揮出戰爭「鐵拳」的。就兩岸局勢言，中國大陸的「戰爭恐怖主義」下的軍事演習、導彈武射等動作，乃至於美國的「預防戰爭」策略，其實都是「嚇阻」的作為。「有效嚇阻，防衛固守」的更迭，即具有嚇阻為先的戰略思維，也因其強調「有效」，目的即不在與中國大陸做全面性的軍備競賽；從「以敵為師」的觀點看，中國人民解放軍近年來的「科技建軍」、「不對稱戰爭」的建軍思想，已落實於解放軍「二炮」的導彈部隊，技術、射殺不斷提升，以及電子戰、軍事衛星的發展，並得到明確的驗證。換言之，中國大陸的「重點建軍」走的就是「有效嚇阻」的路線。同理而言，臺灣的軍力，要能有效嚇阻，使共軍不能、不敢輕舉動武的能量，並非以幾十萬的軍隊，也不是單一的國際因素，而是臺灣軍事上「保證報復」的反擊力量，所衍生出來的巨大的、無量的戰爭風險與成本。了解北京軍情的戰略研究者都知道，北京對發動台海戰爭的策略，早已有系統性的完整研究，其所以未付諸實戰，在於疑慮臺灣對東南沿海，以迄長江口岸附近重要都

會，均具有反制報復的能力，一旦如此則其全國三分之二產值的經濟生命線，將籠罩在戰爭陰影下，而「中國市場」的誘因也將使外資卻步，這些風險與成本，將遠大於自臺灣能攫取者，此一結果自非北京所樂見。

貳、兩岸軍力對比變化

胡錦濤主政時期以來，兩岸仍延續處於「平時的戰爭」(War in peace times)狀態，「臺海中立化」的政策仍在兩岸的默契下繼續維持，雙方均以不超越臺海中線的相互克制，使臺海的軍事衝突不致發生。儘管如此，兩岸不對稱的權力結構一直持續存在。相對於中國大陸「不放棄以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的威脅，臺灣方面也務實的採取，以臺澎防衛為作戰指導的軍事戰略，所謂「備戰而不避戰，能戰而不求戰」的「最低嚇阻戰略」(The strategy of the minimum deterrent)。³⁰⁶

不可否認的，兩岸的兵力對比相當懸殊，臺灣必須面對數倍以上兵力，世界排名第二的軍事強國——中國大陸的威脅。就戰力比而言，中國大陸有壓倒性的優勢；但威脅臺海安全最大的軍事因素，並非為數 200 多萬的兵員，而是占中國大陸國防預算比例僅 15.5% 的空軍，以及占 8.6% 的海軍。距臺灣 250 海浬的大陸沿海 13 座機場，部署有 15 分鐘以內即可到達臺灣上空，包括蘇剴 27 等機型的 200 多架各式戰機，而其戰機總數達 3,000 餘架；不過，大部（主力）戰機如米格 19 等，仍須仰賴地面導航、戰管，且在天候良好的白晝，方可遂行作戰任務，其全天候及夜間作戰能力顯然不足。東海艦隊也可在 4-6 天之間進抵臺灣，而其傳統動

³⁰⁶ 蘇進強，〈兩岸軍力與台海和平〉，取自《臺灣獨立建國聯盟網》，<http://www.wufi.org.tw/>，檢索日期：2016 年 2 月 10 日。

力的潛艇，雖已老舊，但仍可有效封鎖臺海。不過，這並不表示，臺海已有立即的威脅；因為，總兵力並非戰力的等值，而戰力也不是威脅的全部，以臺灣海峽（臺海）的海、空域條件言，中國大陸不會也不能以全部兵力，投入臺海軍事衝突。³⁰⁷

再就中國大陸的意圖而言，以「廢墟臺灣」來懲罰臺灣人民，對其「統一大業」並無利益可言，而一味以武力威嚇，甚至採取「有限戰爭」，反有加速催化臺灣邁向獨立的效應；另一方面，臺海的軍事衝突，將使中共汲汲營營的「四化」，³⁰⁸ 受到嚴重的滯礙；國際上對其戰爭行為，雖未必會出兵援助臺灣，但對中共的經貿制裁將可預見。因此，臺海軍事衝突，對臺灣而言，可能產生宣布獨立或毀滅的後果，但對中國大陸言，其風險成本，也非數人頭、機艦量化對比所可計度的。總體而言，在威脅與嚇阻之間，雖非均勢的平衡，但臺海兩岸的相對戰力，也因彼此均對軍事現代化的努力，而日益提升。不過，軍事現代化不能等同於軍備競賽，軍事現代化的意涵，非僅及於增購或更新武器系統，最重要的是人員素質的提升，與制度、組織的健全，故其另一意涵為專業化、科學化，此亦意味著軍人對戰爭認知的理性化，而更能謹慎從事。

根據《國際航空雜誌》統計，中國大陸軍隊在各方面都比 20 年或 10 年前強大。預料 2016 年中國大陸將獲得更多艘 052D 型飛

³⁰⁷ 蘇進強，前引文。

³⁰⁸ 四化一指中共幹部的「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革命化」；另一指「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在此指後者。請參閱：王振輝，〈中國共產黨「十七大」及其重大議題的解讀〉，2007 年 11 月 19 日，取自《靜宜大學新聞深度分析簡訊第 129 期》，<http://web.pu.edu.tw/~gec/index1.htm>，檢索日期：2016 年 1 月 14 日；朱謙，〈剖析中共四化及其經濟前途〉，1983 年 6 月 1 日，取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http://portal.lib.ntnu.edu.tw/bitstream/77345300/18381/1/ntnulib_ja_J0101_0007_089.pdf，檢索日期：2015 年 7 月 1 日。

彈驅逐艦。大國大陸國防部才證實自主建造航空母艦計畫，中共與俄羅斯也簽署引進 24 架蘇-35 新型戰鬥機的合約。截至 2015 年底，單就世界各國空軍公布排名，中國大陸名列第三，僅次於美國和俄羅斯。該雜誌稱，美國擁有 1 萬 3 千餘架軍用飛機，俄羅斯有 3,547 架，中國有 2,942 架。2014 年，中國大陸的軍用飛機再增加 80 架。³⁰⁹ 故綜合所述，兵力總數高居世界第二位的中國大陸，與臺灣兵力的對比，顯然極為懸殊的不對稱對比，約從 3 倍到 11 倍，並有愈來愈大的趨勢。下表 5-1 係統計胡錦濤時期（2003-2012 年）兩岸國防預算對比表。

表 5-1：胡錦濤時期（2003-2012 年）兩岸國防預算對比表

年度	中國大陸(億美元)	臺灣 億台幣(億美元)	比 例
2003	230.7	2615.6(74.73)	3.1 : 1
2004	262.41	2640.8(75.45)	3.5 : 1
2005	302.0	2585.7(73.88)	4.1 : 1
2006	381.5	2524.9(72.14)	5.3 : 1
2007	449.4	3049.1(87.12)	5.2 : 1
2008	572.89	3340.1(95.43)	6.0 : 1

³⁰⁹ 陳建瑜，〈陸空軍世界第 3 動搖美霸權〉，2016 年 2 月 14 日，取自《中時電子報》，<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214000625-260301>，檢索日期：2016 年 2 月 14 日。

2009	702.76	3186.5(91.04)	7.7 : 1
2010	796.3	2974.3(84.98)	9.4 : 1
2011	915.06	2945.9(84.17)	10.9 : 1
2012	1015.5	3172.5(90.64)	11.2 : 1

- 資料來源：1. 國防部，〈中共國防預算統計〉，2014年5月20日，取自《政府資料開放平臺》，<http://data.gov.tw/node/8148>，檢索日期：2015年5月21日。
2. 主計總處，〈近十年國防預算結構統計〉，2014年5月20日，取自《政府資料開放平臺》，<http://www1.stat.gov.tw/ct.asp?xItem=15477&CtNode=4774&mp=3>，檢索日期：2015年8月20日。
3. 洪志安，〈從國防經費變動看中共文武關係〉，《黃埔學報》，第62期（2012年），頁67-80。

第二節 兩岸國內政治的變化

壹、中國大陸國內政治的變化因素

中國大陸雖已從過去的極權統治逐漸轉變為溫和的威權體制，³¹⁰ 但中國是威權國家已歷經數千年歷史，持續至今，中國大陸也沒有改變這個國家特徵。³¹¹ 事實上，這種特徵指出了中國大陸的對外政策，乃受到國內政權維持穩定，以及經濟成長持續需

³¹⁰ 姜新立，〈後社會主義中國發展轉型論〉，《東亞季刊》，第30卷第2期（1999年4月），頁1-36。

³¹¹ Weixing Chen and Yang Zhong, *Leadership in a Changing Chin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2005), p.147.

要的因素影響；換言之，中國大陸對臺灣政策的變化，不但是反映國際環境的外部變化，而且還受到二個主要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

一、經濟持續成長的需要

經濟發展的政策與需要，對中國大陸是個歷史性的轉折。自1978年以來，中國大陸即把國家戰略轉移到經濟發展，以為政權鞏固的基礎，並使一切施政作為服從這方針。對中國大陸而言，冷戰結束使安全利益從「生存安全」的單面向，轉向與「經濟安全」的雙面向，而弔詭的是生存安全的國防任務，主要在防止外來威脅，卻可能對經濟建設產生破壞。³¹² 因此，中國大陸從鄧小平之後，逐漸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他認為把經濟建設這件事做好了，中國大陸就可立於不敗之地，其他問題也就迎刃而解，包括臺灣問題在內，故中國大陸在兩岸關係上，是要配合經濟發展，來營造有利的政策環境。³¹³

隨著中國大陸從對安全利益的偏重，到與經濟利益的雙重注重，而形成對外政策的邏輯。因此，中國大陸不論對臺政策互動或談判協商，總是服從於此一對外政策總目標的邏輯。換言之，為了經濟持續成長的需要，中國大陸對外政策的邏輯或變遷，都將為兩岸關係投下重要變數；例如，中國大陸對臺政策，將由毛澤東時代的「解放臺灣」，走向鄧小平時代的「和平與發展」；再從江澤民時代的「促統」，走向胡錦濤時代的「防獨」。

³¹² 蕭朝琴，〈後冷戰時期中共對亞太地區的外交戰略〉，《共黨問題研究》，第25卷第10期（1999年10月），頁36-43。

³¹³ 于有慧，〈近期兩岸關係中的美國因素〉，《中國大陸研究》，第44卷第8期（2001年8月），頁1-21。

二、國內政權穩定的維持

中國大陸的領導體制、官僚體制等變數，在對外影響或對兩岸關係的影響上，為了維持國內政權的穩定，其變化性並不大。因為中國大陸必須以「以黨領政」、以黨國體制的「黨意」凌駕政府，與採權力集中的特性，故造成中國大陸對外政策，受到黨內權力結構穩定的影響。例如，西元2000年代初，即因中國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進入全面接班過程，才能順利處理臺灣問題，此有助於其個人威望的提升與消除接班阻力。顯然，中國大陸內部權力結構的穩定，對兩岸關係的關鍵性，與權力佈署考量的整體組織特性與情勢，是其對外關係或兩岸關係的重要參考或制約因素。中共體制的內部形勢，經常也會反應在中國大陸的國家行為或行事策略，中國大陸更加是以內部情勢與穩定發展需要，來思考與處理臺灣問題，並以之做為政權統治正當性的基礎。³¹⁴ 因此，中國大陸政經體制轉型，所衍生的內部矛盾與情勢，不論政治民主化或國企改革、職工下崗、社會治安惡化、農村問題、法輪功事件或幹部腐敗等問題，一旦中國大陸的內部矛盾尖銳，亦可能藉由對臺政策的強硬，以轉化內在矛盾與國際視聽。³¹⁵

貳、臺灣之國內政治的變化因素

一、國內執行機構的變化

自1980年代交流以來，臺灣即訂定「國統綱領」並成立「國統會」、「陸委會」、「海基會」等制度建構，來從事或處理兩岸交流等問題。這些的重要影響是受到臺海雙邊政府所重視的，

³¹⁴ 黃秋龍，〈中共第十六屆六中全會之評析〉，《展望與探索》，第4卷第11期（2006年11月），頁1-6。

³¹⁵ 張五岳、阮銘，〈兩岸關係與台海安全〉，《新世紀智庫論壇》，第9期（2000年4月），頁64-69。

因此，國內執行機構的形成、維持或消退，都會影響兩岸雙方的內、外行為模式。早期兩岸的互動模式，是以兩岸海基會與海協會的民間性質交流為主，「陸委會」的主要任務，是在限制與中國大陸的接觸而不是促進作用的。然而，隨著1990年代兩岸交流熱絡，形成所謂大陸熱開始，兩岸海基會、海協會的性質，已從成立之初的民間制度的性質，進入含有政府性質的準官方制度。因此，兩會內部組織或制度建置，既是雙邊政府內部權力為因應交流之所需，又是兩岸政府對外協商與彼此交流的主要管道。以陳長文秘書長的海基會時期為例，他就主張要與中國大陸擴大交往，並堅持只有受政府委託的領域，才受陸委會監督。自此，兩岸之間政府的交往，已有海基會、海協會取代陸委會、國臺辦之勢。

二、國內政治結構的變化

1991年12月，大陸選出的立法委員與國民大會代表全面退休。1992年的立法院增額選舉，使立法院成為民進黨制衡國民黨的舞臺，且國民黨的立委也提高在黨內的地位與權力，這都增加立法院對大陸政策的牽制與影響；³¹⁶自此，臺灣政治結構產生明顯的反對勢力，一般而言，民主臺灣的反對勢力，應包括「反對性政黨」與「反對性選民」。在「代議政治」下，前者是後者的代表。雖然「內部因素」經常只表現出反對性政黨的制衡與牽制，但其本質是反對性選民的勢力範疇。在1990年代國會全面改選後，民進黨藉著對大陸政策的質詢，達到限制執政黨對大陸政策的操作空間。

³¹⁶ Suisheng Zhao,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the 1995-1996 Crisi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02.

此外，民主化的臺灣在「選票邏輯」考量下，政治人物的兩岸政策，總是盡量體現選民的偏好。於是，臺灣國內的社會結構，就對兩岸關係起著背景性的「核可」作用，並限縮政治領導層的自主性與能力。臺灣的國內民眾，對「統獨議題」的立場相當分歧，利益團體如航運公司、泛國民黨派、旅館業者、金馬外島民眾、大企業、金融服務業、宗教團體等，就曾向政府施壓，要求「三通」及調整「戒急用忍」。因此，執政黨受「選票邏輯」制約，往往以民意作為對外政策或大陸政策的重要參考，這使內部的民意，往往成為政府對外或兩岸政策的指引與方向。自1990年代以後，臺灣不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其對外關係，尤其是大陸政策總會顧忌與瞻望民意，深怕在下次選戰，流失選票與執政地位。

叁、兩岸國內政權互動之變化

兩岸政權互動中，各方的獲勝集合(win-set)影響因素，對臺灣而言，因屬於民主制度，故最大的因素為政黨輪替與國會選舉。如果執政黨在國會中佔多數席次，則在執政黨國會多數支持下，將容易整合國內共識，產生較大的國內資源運用權力。相對的，如果執政黨在國會代表中屬於少數，基於政黨競爭原則，將遭受到在野黨多數的杯葛或牽制，在維護全民最高利益的選舉藉口下，勢必減少執政黨運用資源的權力，因而造成國內獲勝集合的限縮。因此，如果執政黨在國會中為多數席次，其所形成的國內獲勝集合，將大於執政黨在國會中為少數席次。

在胡錦濤時期，臺灣自2003年以來，執政黨立法委員在各屆國會席次中的比率，統計如表5-2所示。而從表5-2發現，自第五

屆立法委員選舉以來，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其在立法院的席次比率均過半，而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其在立法院的席次比率均未過半。

表 5-2：臺灣執政黨在各屆國會席次中的比率

立法委員選舉屆次 (任期)	執政黨	執政黨在國會的席次 比率 (是否過半)
第五屆 (2001年1月至 2004年1月)	民主進步黨	39.4%(91/231) (否)
第六屆 (2004年1月至 2008年1月)	民主進步黨	42%(100/238) (否)
第七屆 (2008年1月至 2012年1月)	民主進步黨	28.1%(36/128) (否)
	中國國民黨	67.2%(86/128) (是)
第八屆 (2012年2月至 2016年1月)	中國國民黨	54%(67/124) (是)

資料來源：立法院，〈立法委員查詢〉，《立法院全球資訊網》，
http://www.ly.gov.tw/03_leg/0301_main/legList.action，檢索日期：2015年1月10日。

而在中國大陸方面，因中國共產黨採行一黨專制政體，故無政黨輪替現象。對中國大陸而言，相較於臺灣的立法院，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中國大陸最高權力機構，集體行使國家最高權力。人民大會代表來源，主要包括「工人農人」、「少數民族」、「女性代表」、「解放軍代表」、「歸國華僑」、「臺灣省代表」和「中國共產黨代表」。其中以共產黨代表佔絕大多數，各屆「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中國大陸產黨員人數平均約佔總代表人數的70%。³¹⁷ 然而，從各屆代表對國家主席的投票，觀察其同意權均近達100%的現象理解，「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完全由共產黨所主宰。因此，對中國大陸而言，其國內獲勝集合僅由執政黨所決定，共產黨可以完全掌控在國內的政治因素上取得權力，促使中國大陸政府可以掌握國內政權。統計中國大陸胡錦濤時期，經歷了第九、十與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發現中國共產黨黨員代表在各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的比率，約在70%到72%之間，差異不大的區間變化，中國共產黨黨員代表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的比率，如下表5-3所示：

表 5-3：共產黨黨員代表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的比率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屆次（任期）	執政黨	共產黨代表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的比率
第九屆 （1998年3月至 2003年3月）	中國共產黨	71.5%(2130/2979)
第十屆 （2003年3月至 2008年3月）	中國共產黨	72.9%(2178/2984)
第十一屆 （2008年3月至 2013年3月）	中國共產黨	70.2%(2099/2987)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人民代表大會，〈文獻資料〉，《中國人民代表大會網》，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newwxzl.htm>，檢索日期：2014年2月1日。

³¹⁷ 朱光磊，《中國政府與政治》（新北市：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頁33-35。

依據胡錦濤在位時間，劃分三個時期觀察兩岸政權互動變化，發現第一時期（2003年1月-2004年5月），共產黨在全國人代中所占比率為71.5%，而臺灣執政的民進黨，在國會中代表的比率僅占39.4%至42%，因為臺灣執政黨之政權，運用能力有限，故此一時期兩岸國內資源運用的空間小，而較不利於兩岸雙方執政黨；第二時期（2004年6月-2008年5月），共產黨在全國人代中所占比率為72.9%，而臺灣執政的民進黨，在國會中代表的比率僅占42%至28.1%，此一時期臺灣執政黨政權運用能力更受限，故第二時期兩岸國內資源運用的空間，將變得更小，而不利於兩岸執政黨；第三時期（2008年6月-2012年12月），共產黨在全國人代中所占比率為70.2%，而臺灣執政的國民黨，在國會中代表的比率大幅提升過半數至67.2%至54%，此一時期臺灣執政黨政權運用能力，已經大幅提升，故兩岸國內資源運用的空間將變大，而有利於兩岸執政黨。下表5-4為中國大陸胡錦濤時期，兩岸國內政權互動變化表。

表 5-4：胡錦濤時期兩岸國內政權互動變化表

時期	兩岸執政黨在國會的比率變化		兩岸國內資源的運用能力
	中共	臺灣	
第一時期 (2003/1-2004/5)	71.5%	39.4→42%	小
第二時期 (2004/6-2008/5)	72.9%	42→28.1%	較小

第三時期 (2008/6-2012/12)	70.2%	67.2→54%	大
--------------------------	-------	----------	---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第三節 美國因素的兩岸結構認知變化

壹、美中臺三邊關係的變化

中國大陸在胡錦濤主政的期間(2003-2012年)，對美國而言，經歷了從小布希政府(George W. Bush)至歐巴馬政府(Barack Obama)的時期；而對臺灣而言，則是經歷了從陳水扁政府到馬英九政府。因此，造成在這十年期間的美(國)、中(共)、臺(灣)三邊關係，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這種變化概略以美、臺總統任期(或政黨輪替)所劃分為三個時期關係加以說明。此三個時期分別為：第一時期：2003年1月至2004年5月；第二時期：2004年6月至2008年5月；第三時期：2008年6月至2012年12月。

依據 Lowell Dittmer 戰略三角(strategy triangle)理論，³¹⁸ 他認為「正相關或負相關」的價值利益區分，可以理解三邊關係的變化，同理，美、中、臺戰略三角的類型以「朋友的朋友是我的朋友，朋友的敵人是我的敵人，敵人的敵人是我的朋友」的敵對(-1)或友好(+1)關係結構，³¹⁹ 表示各雙邊關係而形成四種戰略三角的關係結構，分別為「三邊家族結構(ménage a trois)」(3+)、「羅

³¹⁸ Lowell Dittme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 Critical Review." in Ilpyong J. Kim. ed. *The Strategic Triangle: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Paragon House Publisher Press, 1987), pp. 29-47; 初國華、張昌吉，〈戰略三角理論與臺灣的三角政治〉，《問題與研究》，第49卷第1期(2010年)，頁87-106。

³¹⁹ 羅致政，〈美國在台海兩岸互動所扮演的角色—結構平衡者〉，《美歐月刊》，第10卷第1期(1995年)，頁37-54。

曼蒂克結構(romantic)」(2+，1-)、「結婚結構(marriage)」(1+，2-)和「單位否決結構(unit-veto)」(3-)。³²⁰ 據此戰略三角的結構，存在個別國家行為者的六種優劣順序的角色排列，分別為「樞紐」(pivot) > 「朋友」(friend) > 「夥伴」(partner) > 「側翼」(wing) > 「敵人」(foe) > 「孤雛」(outcast)，由於位處於較不利的行為體，必然會有提升角色位置的動機，因而使戰略三角的結構，自然形成動態轉變的關係。³²¹ 因此，三個時期之美、中、臺三邊關係闡述如下。

一、第一時期（2003年1月至2004年5月）

第四代中國大陸領導人胡錦濤交接主政之際，美國和臺灣新政權交接已近二年，不像美國、臺灣新政權上任的前二年時期，美、中、臺三邊關係均相對友好，³²² 胡錦濤一上任後，美、中、臺三邊關係即面對陳水扁政府，已在2002年8月3日所提出：「臺灣與大陸一邊一國，要分清楚」的主張，與隨後推動「防衛性公投」的影響，³²³ 而產生變化。顯然，陳水扁總統已經改變了2000年5月20日初上任就職演說中的宣示：「不宣布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況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和國統會的問題」，亦即改變了所謂「四不一沒有」，這不但強烈激怒了對岸，使兩岸關係急轉直下，也因為臺灣單方面改變現狀，而使美國小布希總統表達對臺灣領導人的不滿

³²⁰ 包宗和，〈戰略三角角色轉變與類型變化分析—以美國與台海兩岸三角互動為例〉，摘錄自包宗和、吳玉山（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頁335-364。

³²¹ 吳玉山，〈抗衡與扞從：兩岸關係新詮〉（臺北：正中出版社，1997年），頁177-179。

³²² 西元2000年至2002年間，美中關係延續自美國柯林頓訪問中國大陸會晤江澤民以來的關係良好，而兩岸關係也因陳水扁政府剛上臺，中國大陸採「聽其言、觀其行」，而相對穩定。張榮恭，〈中共兩度聽言觀行與當前兩岸困局〉，2001年8月1日，取自《國家政策論壇第1卷第6期》，<http://old.npf.org.tw/monthly/00106/theme-142.htm>，檢索日期：2015年8月1日。

³²³ 總統府，〈總統以視訊直播方式於世界臺灣同鄉聯合會第二十九屆年會中致詞〉，2002年8月3日，取自《總統府網站》，<http://www.president.gov.tw>，檢索日期：2014年8月14日。

與不信任，造成美、臺關係面臨嚴重的考驗。³²⁴ 此一時期，相對於美、中自 1998 年美國柯林頓(William J. Clinton)總統，應邀赴中國大陸訪問以來的友善關係，美、臺與兩岸關係基本上均呈現不友善的狀況，故而形成以臺灣為「孤雛」地位的一種結婚型的戰略三角結構。

二、第二時期（2004 年 6 月至 2008 年 5 月）

胡錦濤時期之兩岸關係進入臺灣陳水扁政府繼續第二任執政後，雙方政府顯得更多的磨擦。例如，2005 年 9 月，中國大陸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在第一屆兩岸民間菁英論壇閉幕儀式聲明，強調只有在「九二共識」上，才能逐步消除橫亘在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面前的障礙，然而臺灣政府方面卻只強調「九二精神」。又如，2005 年 3 月 14 日，中國大陸針對陳水扁總統執意舉辦「防衛性公投」的一中原則之挑釁，於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宣布通過《反分裂國家法》，使得此一時期兩岸關係持續維持不友善的關係。另一方面，美、臺關係也因小布希總統對陳水扁政府的繼續不信任，而無改善的跡象。因此，此一時期不但維持與前一時期相同的結構，而且兩岸關係有更不友善的趨勢，即臺灣處於更「孤雛」地位，同時與美、中二邊不友善的戰略三角結構。

三、第三時期（2008 年 6 月至 2012 年 12 月）

2008 年臺灣總統大選後，確定第二次政黨輪替而由國民黨的馬英九政府執政後，兩岸關係大幅改善。例如，中國大陸方面即在當年的博鰲亞洲論壇中，由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會見副總統當

³²⁴ 林正義，〈臺灣防衛性公投與美國對台政策調整〉，《歐美研究》，第 3 卷第 2 期（2009 年），頁 333-388。

選人蕭萬長，雙方均同意主張「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此外，胡錦濤也在會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時表示，雙方要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之下實現兩岸協商；只要兩岸秉持建立互信、求同存異、擱置爭議、共創雙贏原則，就能夠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2009年元旦，中國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發表「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談話，總統府即予回應表示，並在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下，維持「不統、不獨、不武」的現狀，並在「以臺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原則以及「九二共識、互不否認」的基礎上，共同追求兩岸人民的和平繁榮與進步。自此，兩岸關係至胡錦濤任期結束的2012年底，已形成友善的關係。此外，此一時期美國由民主黨歐巴馬政府執政，因與臺灣馬英九政府恢復透明交往的信任，³²⁵ 故雙方也呈現相對的友善關係。因此，此一時期，美、中、臺關係呈現三邊均友善的戰略三角結構（即三邊家族型的戰略三角結構）。

綜合歸納胡錦濤時期的美、中、臺關係的變化，從結婚型→結婚型→三邊家族型轉變，而兩岸關係的變化，則從不友善→較不友善→友善轉變，如下表 5-5：胡錦濤時期的美、中、臺關係變化表所示：

³²⁵ 相較於2006年5月與2007年7月之際，陳水扁總統訪問中美洲，美國小布希政府不提供本土過境，造成所謂「迷航外較」、「過境外交」，顯見，當時美國政府對陳水扁的不信任。請參閱：中國評論通訊社，〈陳水扁迷航騙降落荷蘭〉，2007年8月13日，取自《中國評論新聞網》，<http://hk.crntt.com/doc/1004/2/8/5/100428501.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428501>，檢索日期：2015年8月15日。

表 5-5：胡錦濤時期的美、中、臺關係變化表

時間 時期劃分	時間	兩岸關係	美中臺戰略三角簡圖
第一時期	2003 年 1 月 至 2004 年 5 月	不友善	<p>美(夥伴, +1) 中(夥伴, +1) 台(孤雛, -3) 結婚型</p>
第二時期	2004 年 6 月 至 2008 年 5 月	較不友善	<p>美(夥伴, +1) 中(夥伴, +1) 台(孤雛, -3) 結婚型</p>
第六時期	2008 年 5 月 至 2012 年 12 月	友善	<p>美(朋友, +1) 中(朋友, +1) 台(朋友, +1) 三邊家族型</p>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貳、兩岸領導人對結構認知的變化

在兩岸權力結構中，美國權力是否發生作用，係依據兩岸領導人認知而發生改變。例如，自 1992 年以來，原本臺海穩定的兩岸關係，因 1995 年李登輝總統赴美國康乃爾大學訪問，以為其後

來特殊「兩國論」的基礎，³²⁶ 這使兩岸領導人，「江澤民—李登輝」認知均發生改變，造成中國大陸自 1995 年 6 月開始的文攻武嚇與飛彈試射，迫使美國派出航空母艦戰鬥群介入臺灣海峽的安全。據此，胡錦濤分別與臺灣陳水扁、馬英九總統的認知是否改變，將影響美國權力是否作用的認知結果。換言之，如果兩岸領導人認知不改變而維持現狀，因美國權力不會介入發生作用，則將維持原本兩岸權力結構的不對稱；如果兩岸領導人認知改變而企圖改變現狀，因美國權力介入發生作用，則將使美國權力支援臺灣方，使得原本兩岸權力結構的不對稱比例，發生傾斜而改變。

對第一時期（2003 年 1 月至 2004 年 5 月）胡錦濤—陳水扁的認知而言，因與 2002 年前陳水扁剛就任總統的戒慎小心態度，而胡錦濤保守的聽其言、觀其行的態度有所不同，此一時期，兩岸領導人將因企圖改變現狀而認知美國權力的介入，³²⁷ 使兩岸權力結構，從原始的約 3：1 比例（中國大陸：臺灣），轉變成約 1：17（中國大陸：美國+臺灣）。

對第二時期（2004 年 6 月至 2008 年 5 月）胡錦濤—陳水扁的認知而言，因陳水扁政府已完全脫離第一任期的戒慎小心態度，而胡錦濤也更針對臺灣領導人的態度。此一時期，兩岸關係將更加的不友善，使兩岸領導人更不滿現狀而認知美國權力的介入，同樣對認知到兩岸權力結構的改變，而從原始的約 5：1 比例（中國大陸：臺灣），轉變成約 1：13（中國大陸：美國+臺灣）。

對第三時期（2008 年 6 月至 2012 年 12 月）胡錦濤—馬英九

³²⁶ 當時李登輝總統的主權認知是「臺灣對中國」的「國家對國家」關係，這是李登輝總統於 1999 年 7 月 9 日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所提之「特殊國（state）與國（state）關係」的前身。

³²⁷ 為與前兩岸權力結構係以兩岸國防預算比例計算，美國的權力介入支援臺灣，亦以其每年的公開的國防預算計算之。

的認知而言，因八年綠色執政之後，國民黨重新取得政權，馬英九政府除了積極恢復與美國良好關係外，也與中國大陸在「九二共識」的原則之下，進行了全面性的交往，而美、中、臺戰略三角類型，則又回到三邊家族型的結構。進一步而言，相較於第二時期美、中、臺領導人認知不一致，對原結構產生對立的認知，第三時期美、中、臺領導人對「九二共識」的認知一致，故不改變原結構的認知，對此認知的一致，甚至已從對兩岸關係的影響，擴溢至東亞區域的秩序與安全上。³²⁸

換言之，第三時期之兩岸關係因重新恢復友善，使兩岸領導人對原本結構認知並未改變，而嘗試維持現狀，認為美國權力的不涉入兩岸權力對比；因此，對兩岸權力結構的認知並未改變，而仍然維持原始約 10：1 比例（中國大陸：臺灣）的權力結構。下表表 5-6 係整理胡錦濤時期，兩岸領導人（中國大陸：臺灣）對結構認知變化對比表：

表 5-6：兩岸領導人對結構認知變化對比表(中：臺)

年度	兩岸原始權力結構	美國防預算 (億美元)	是否納入 美國權力	認知改變後 的權力結構
2003	3.1：1	4047.8	是	1：17.9
2004	3.5：1	4558.5	是	1：17.6

³²⁸ 美國外交政策 2016 年全國委員會在一份《建立東亞區域秩序》報告中的結論部分，建議民進黨應該尊重過去八年來國共所建立的「政治結構」。眾所周知，美國所說的「政治結構」就是「九二共識」。請參閱：張亞中，〈東亞秩序少不了九二共識〉，2016 年 4 月 14 日，取自《中時電子報》，<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414000438-260109>，檢索日期：2016 年 4 月 14 日。

2005	4.1 : 1	4953.3	是	1 : 16.6
2006	5.3 : 1	5218.3	是	1 : 13.9
2007	5.2 : 1	5512.7	是	1 : 12.5
2008	6.0 : 1	6160.9	是	1 : 10.9
2009	7.7 : 1	6610.7	否	7.7 : 1 (不變)
2010	9.4 : 1	7191.8	否	9.4 : 1 (不變)
2011	10.9 : 1	7497.5	否	10.9 : 1 (不變)
2012	11.2 : 1	6816.8	否	11.2 : 1 (不變)

- 資料來源：1. 國防部，〈中共同防預算統計〉，2014年5月20日，取自《政府資料開放平臺》，<http://data.gov.tw/node/8148>，檢索日期：2015年5月21日。
2. 主計總處，〈近十年國防預算結構統計〉，2014年5月20日，取自《政府資料開放平臺》，<http://www1.stat.gov.tw/ct.asp?xItem=15477&CtNode=4774&mp=3>，檢索日期：2015年8月20日。
3. 洪志安，〈從國防經費變動看中共文武關係〉，《黃埔學報》，第62期(2012年)，頁67-80。
4. The World Bank, "Military expenditure (% of GDP)," *World Databank*, Retrieved 29 July 2015, from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home.aspx>.

第四節 兩岸經貿互動結果與分析

壹、兩岸經貿政策互動結果

在政治上，胡錦濤時期的對臺方針，一中大原則並無變化，基本上，中國大陸第三代領導人發表「江八點」是「和平促統」產物，但胡錦濤上台後，中國大陸對台政策強調「反獨與防獨」。換言之，胡錦濤雖然在政治上繼承了一中原則的「硬」原則，然而另一方面卻展現其做法上的「軟」作風，即反應胡式對臺風格「軟的更軟，硬的更硬」的作風。例如，胡錦濤上臺前的 2000 年 5 月，雖然繼承了中共訂立的「反分裂國家法」，欲以「法律戰」來維護「一中原則」，然而，胡上臺後，無論在「五一七」聲明或「胡四點」、「胡六點」，³²⁹ 卻未見一再強調「反分裂國家法」，這種軟作風展現出胡錦濤欲「透過經貿互動，爭取臺灣民心」等對臺政策，包括兩岸包機直航、水果免稅登陸、台商專項融資、開放來台觀光、促成青年交流等「惠臺政策」。³³⁰ 顯然，「以經促政」是胡錦濤時期對臺政策的目的，但經貿的做法上，卻與前代領導人有所不同。綜觀自 2003 年開始的胡錦濤期間，在兩岸經貿政策互動的結果上有所變化，下表 5-7 是胡錦濤時期之兩岸經貿互動的結果，發現第一時期與第二時期均僅繼承了之前的「臺港海運商談紀要」1 項的經貿政策結果，未有任何明顯的經貿政策結果出現。然而，到

³²⁹ 胡四點指的是 2005 年 3 月 4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胡錦濤在江八點之後，發表了新的對台工作的四點「絕不」，包括：第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絕不動搖；第二，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絕不放棄；第三，貫徹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的方針絕不改變；第四，反對台獨活動絕不妥協。而胡六點指的是 2008 年 12 月 31 日，胡錦濤藉在北京紀念《告臺灣同胞書》三十週年的機會，公開講話，提出了六點對台政策方針，包括：1. 恪守一個中國，增進政治互信；2. 推進經濟合作，促進共同發展；3. 弘揚中華文化，加強精神紐帶；4. 加強人員往來，擴大各界交流；5. 維護國家主權，協商對外事務；6. 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

³³⁰ 耿曙，〈經濟扭轉政治？中共惠台政策的政治影響〉，《問題與研究》，第 48 卷第 3 期（2009 年 9 月），頁 10-11。

了第三時期，卻大幅增加達成了「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等 17 項的經貿政策結果。

表 5-7：胡錦濤時期之兩岸經貿政策互動結果表

資料時間：截至 2012 年 12 月止

時 期	兩岸經貿政策結果	達成結果日期	結果項數
第一時期（含前） (2003/1-2004/5)	臺港海運商談紀要	1997 年 5 月 24 日	1
第二時期（含前） (2004/6-2008/5)	臺港海運商談紀要	1997 年 5 月 24 日	1
第三時期 (2008/6-2012/12)	海峽兩岸關於中國大陸居民赴臺灣旅遊協議	2008 年 6 月 13 日	17
	海峽兩岸包機會談紀要	2008 年 6 月 13 日	
	海峽兩岸郵政協議	2008 年 11 月 4 日	
	海峽兩岸食品安全協議	2008 年 11 月 4 日	
	海峽兩岸海運協議	2008 年 11 月 4 日	
	海峽兩岸空運協議	2008 年 11 月 4 日	
	海峽兩岸金融合作協議	2009 年 4 月 26 日	

海峽兩岸銀行業監督管理 合作瞭解備忘錄	2009年 11月16日
海峽兩岸保險業監督管理 合作瞭解備忘錄	2009年 11月16日
海峽兩岸證券及期貨業監 督管理合作瞭解備忘錄	2009年 11月16日
海峽兩岸標準計量檢驗認 證合作協議	2009年 12月22日
海峽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 合作協議	2009年 12月22日
海峽兩岸漁船船員勞務合 作協議	2009年 12月22日
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 合作協議	2010年 6月29日
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 協議	2010年 6月29日
海峽兩岸海關合作協議	2012年 8月9日
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 協議	2012年 8月9日

說明：第三時期之「海峽兩岸空運補充協議」、「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海峽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與「海峽兩岸核電安全合作協議」等政策結果，因屬補充性質或未與兩岸經貿政策直接相關，故暫不列入。

資料來源：海峽交流基金會，〈兩岸協議〉，取自《海峽交流基金會網站》，
<http://www.sef.org.tw/lp.asp?CtNode=3810&CtUnit=2083&BaseDSD=7&mp=19&nowPage=1&pagesize=15>，檢索日期：2015年4月1日。

貳、兩岸經貿政策結果分析

對於上述兩岸經貿政策互動的結果，本文嘗試從新古典現實主義的途徑進行解釋分析，同時對本文所演繹提出的三個主要命題，即(一)「中國大陸對臺之權力結構之差異愈大，兩岸愈不穩定，使中國大陸對臺經貿政策愈不利於臺灣。反之，則愈有利於臺灣。」；(二)「兩岸領導人對兩岸權力結構認知差異愈大，兩岸愈不穩定，使中國大陸對臺經貿政策愈不利於臺灣。反之，則愈有利於臺灣。」；與(三)「兩岸執政黨之國內政治交集愈小，兩岸愈不穩定，使中國大陸對臺經貿政策愈不利於臺灣。反之，則愈有利於臺灣。」等三個命題，進行檢證或對其進一步可能的修正。

然而，依據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整體架構，實有必要將三個分別的命題，做整體性的思維。首先，對上述第(一)個命題而言，其所指涉的變項，是兩岸的權力結構差距變化，它是解釋兩岸經貿政策結果最初的原始結構(以原始結構簡稱)；換言之，原始結構差距是此一命題中的核心變項。中國大陸崛起後，包括胡錦濤時期在內，兩岸權力結構，一直都是維持著極大差距的不對稱關係，即原始結構一直維持著「大」差距，並可視為一給定的因素。其次，對上述第(二)個命題而言，其所指涉的變項，是兩岸領導人對權力結構的認知變化，它是解釋兩岸經貿政策結果的第二個變項(以結構認知簡稱)，如果兩岸領導人認同原始結構，則結構認知將以「相同」註記，而如果兩岸領導人不認同原始結構，勢必將美國的權力涉入，而產生與原始結構對立的情形，此時，結構認知將以「對立」註記。再其次，對上述第(三)個命題而言，其所指涉的變項是兩岸國內資源運用能力的變化，它是解釋兩岸經貿政策結果的第三個變項(以獲勝集合簡稱)，如果兩岸國內資源運用的能力大，則獲勝集合結果將以「大」註記；反之，如果兩岸國內資源運用的能力小，

則獲勝集合結果將以「小」註記。

對上述解釋胡錦濤時期兩岸經貿政策結果的三個變項，因為第一個原始結構不對稱變項可視為給定（大），其餘二個變項可構成四種不同情境的架構類型。第一種情境，在不認同原始結構下，即在結構認知「對立」下，獲勝集合「大」時，因為兩岸動用國內資源的能力大，愈有可能造成兩岸不利的結果，故中國大陸的經貿政策將「不利」於臺灣；第二種情境，同樣在不認同原始結構下，即在結構認知「對立」下，獲勝集合「小」時，雖然兩岸動用國內資源的能力變小，但因仍存在對立的兩岸權力結構，故中國大陸的經貿政策將不會讓利或「停利」於臺灣；第三種情境，在認同原始結構下，即在結構認知「認同」下，獲勝集合「大」時，因為兩岸動用國內資源的能力大，愈有可能造成兩岸有利的結果，故中國大陸的經貿政策將讓利或「有利」於臺灣；第四種情境，同樣在認同原始結構下，即在結構認知「認同」下，獲勝集合「小」時，此時，雖然結構認知相同，但因為兩岸動用國內資源的能力變小，造成兩岸利益傾向不明的結果，故中國大陸的經貿政策也將不會讓利或「停利」於臺灣。下表 5-8 整理四種胡錦濤時期之兩岸經貿政策分析架構類型表，並依上述三個時期進一步分析說明如下。

表 5-8：胡錦濤時期之兩岸經貿政策分析架構類型表

變項 情境 類型	原始結構 不對稱	國內獲 勝集合	領導人對 結構認知	中國大陸對 臺經貿政策
第一種情境	大（給定）	大	對立	不利

第二種情境	大（給定）	小	對立	停利
第三種情境	大（給定）	大	認同	有利
第四種情境	大（給定）	小	認同	停利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一、第一時期

中國大陸胡錦濤剛上臺之初的前二年，約是臺灣首次政黨輪替的陳水扁政府第一任期的後半段，此一時期，中國大陸與臺灣的原始結構的不對稱關係約為 3：1。而在雙方領導人對權力結構的認知變化上，此一時期兩岸關係處於非友善關係，因為對原始結構的不認同而形成對立，迫使美國權力的介入，扭轉兩岸原始結構的不對稱認知，形成另一種與兩岸原始結構相反的不對稱認知，即 1：18（如上表 5-2 兩岸領導人對結構認知變化對比表所示）。另在兩岸國內資源運用能力的國內獲勝集合上，因為中國大陸共產黨在國內政權幾乎沒有變化（約 71.5%），故影響第一時期的兩岸國內獲勝集合因素為臺灣執政黨，即民進黨代表在國會的比例，觀察此一時期民進黨代表在國會的比例，係從 39.4%→42%（如上 5-5：胡錦濤時期兩岸政權互動變化表所示），並未過半。顯見，第一時期兩岸在國內獲勝集合為小，故兩岸國內資源運用能力亦相對為小。

對照上表 5-7：胡錦濤時期之兩岸經貿政策分析架構類型表，第一時期的兩岸經貿政策結果，應屬於第二種情境類型。因此，中國大陸的經貿政策將不會讓利或「停利」於臺灣。觀察此一時期兩

岸經貿政策的互動結果，除了繼承之前的「臺港海運商談紀要」一項外，中國大陸並未予臺灣方面的任何經貿政策的實質結果，即可得到印證。

二、第二時期

中國大陸對臺經貿政策的第二時期，約以臺灣陳水扁政府第二任期的四年為劃分，此一時期，中國大陸與臺灣的原始結構仍為不對稱關係約為 5：1。而在雙方領導人對權力結構的認知變化上，此一時期兩岸關係亦處於不友善的關係，也將因為對原始結構的不認同而形成對立，迫使美國權力的介入兩岸，扭轉兩岸原始結構的不對稱認知，同樣形成另一種與兩岸原始結構相反的不對稱認知，即 1：13（如上表 5-2 兩岸領導人對結構認知變化對比表所示）。而且這種與兩岸原始結構相反的不對稱認知轉變，隨著中國大陸不再「聽其言、觀其行」，陳水扁政府欲有所作為的改變現狀，而有加劇的傾向。另在兩岸國內資源運用能力的國內獲勝集合上，中國大陸共產黨在國內政權仍維持不變（約 72.9%），然而，臺灣執政黨，即民進黨代表在國會的比例，更從 42%→28.1%（如上 5-5：胡錦濤時期兩岸政權互動變化表所示），更是縮小而未過半。顯見，第二時期兩岸在國內獲勝集合更小，故兩岸國內資源運用能力亦相對更小。

對照上表 5-7：胡錦濤時期之兩岸經貿政策分析架構類型表，第二時期的兩岸經貿政策結果仍應屬於第二種情境類型。而因為兩岸國內資源運用能力更小，故中國大陸的經貿政策將更不會讓利或更「停利」於臺灣。觀察此一時期兩岸經貿政策四年來的互動結果，除了僅繼承之前的「臺港海運商談紀要」一項外，整整四年期間，

中國大陸並未予臺灣方面的任何經貿政策的實質作為，即可得到印證。

三、第三時期

中國大陸對臺經貿政策的第三時期，約以臺灣第二次政黨輪替的國民黨馬英九政府第一任期的四年為劃分，此一時期，中國大陸與臺灣的原始結構，仍為大的不對稱關係約為 10：1。而在雙方領導人對權力結構的認知上，第三時期兩岸關係大幅改善而處於友善的關係，因為對原始結構的認同，讓美國權力的暫不介入兩岸中，故同樣維持兩岸原始結構的不對稱認知，即仍 10：1（如上表 5-2 兩岸領導人對結構認知變化對比表所示）。另在兩岸國內資源運用能力的國內獲勝集合上，中國大陸共產黨在國內政權仍維持不變（約 70.2%），然而，臺灣執政黨，因以政黨輪替為國民黨且其代表在國會的比重，從 67.2%→54%（如上 5-5：胡錦濤時期兩岸政權互動變化表所示），已超過半數。顯見，第三時期兩岸在國內獲勝集合已大增，故兩岸國內資源運用能力亦相對變大。

對照上表 5-7：胡錦濤時期之兩岸經貿政策分析架構類型表，第三時期的兩岸經貿政策結果，應屬於第三種情境類型。而因為兩岸國內資源運用能力變大，並且雙方領導人認同於兩岸原始權力結構的認知，故中國大陸的經貿政策將會讓利或更「有利」於臺灣。觀察第三時期兩岸經貿政策的四年來的互動結果，總計完成了「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等十七項經貿政策的實質作為，即可得到印證。

叁、小 結

首先，從理論面看，整個胡錦濤時期，雖然兩岸均已加入世界

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但受到 WTO 組織規範的影響很小，至少，截至目前止，兩岸經貿互動未曾看到「爭端解決」、「仲裁機制」或「排除適用」等作為。³³¹ 此印證了在解釋兩岸經貿政策變化上，新古典現實主義的適用性，而非國際制度的影響。換言之，從中國大陸立場而言，以開放優惠措施吸引台商投資，其目的是將兩岸雙邊貿易視為國內貿易，符合新古典現實主義所稱，將兩岸問題（國際問題）國內化，而從臺灣立場而言，國內政權的變化，決定了兩岸雙邊貿易投資與協議的簽訂，符合新古典現實主義所稱，將國內政治問題擴散成國際化（兩岸化）。

其次，從實務面看，為了維護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與其執政權力，經濟發展優先、穩定勝過一切，已成為中國大陸對臺政策的原則，此即學界認為經濟發展與民族主義，已為中國大陸執政權力合法性的來源。³³² 據此，兩岸領導人對結構認知的改變必然會出現，這也是中國大陸對臺經貿政策結果的關鍵因素，從上述三個時期的分析結果發現，中國大陸對臺經貿政策只有「停利」或「有利」的政策，而尚不致於出現「不利或有害」的經貿政策，即可得到印證。換言之，中國大陸自鄧小平進行經濟改革後，開始逐漸褪去農業社會與共產國家的色彩，但為達成持續發展的目標，中國大陸必須進行經濟體制的改革，並逐步開放中國大陸市場。故現代化的力量與對經濟發展的需求，將影響中國大陸領導人制訂對

³³¹ 高長，《大陸經改與兩岸經貿關係（增訂版）》（臺北：五南圖書，1999年），頁84-86。

³³² 合法性（Legitimacy）實為一個相當模糊的概念，目前學界認為隨著蘇聯的瓦解與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共產主義已不再是中國執政合法性的來源，同時1980年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填補逐漸式微的共產主義，並成為消彌政治歧見的工具，故而經濟發展與民族主義實為目前中國執政權力的合法性來源。請參閱：徐斯儉，〈十六大前後中國政治改革的動向〉，收錄於丁樹範（編），《胡錦濤時代的挑戰》（臺北：新新聞，2002年），頁139；Suisheng Zhao,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5, No. 1 (2000), pp. 1-33；趙建民，《當代中共政治分析》（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頁317；高輝，《轉型中的中共社會主義》（臺北：永業出版社，2002年），頁88。

外政策時的認知改變。³³³ 胡錦濤時期，即以經濟現代化設定為最高的施政目標，在對外政策與包括對臺貿易關係方面，必須以維持經濟穩定發展為最高指導原則，甚至在某些經貿協議的互利或讓步。³³⁴

³³³ Gerald Chan,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New Zealand: Macmillan, 1999), pp. 67-68.

³³⁴ 以兩岸租稅協議為例，協議簽署後，台商在大陸處分股權的收益，大陸部分課稅將由現行的10%降為零；我方政府則維持最高稅負17%，政府的稅收由過去扣抵後的7%增至17%。請參閱：賴湘茹，〈兩岸租稅協議 大陸讓利〉，2015年4月13日，取自《中時電子報》，<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413000016-260202>，檢索日期：2015年4月13日。

第六章 結 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貢獻

本研究的核心思維，係從新古典現實主義中的研究架構建立，到中國大陸胡錦濤期間，對臺經貿政策的分析與檢證，最後期望能對中國大陸崛起的內部因素、中國大陸對區域經濟影響的外部動因，與兩岸經貿關係的細緻變化獲得進一步理解。這樣的思維脈絡，事實上係從理論層面貫穿到實務層面，因此，對於本文的研究發現與貢獻，即以此兩個層面歸納如下：

壹、在理論層面

第一，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一個國家對外交政策的解釋，不僅需要國際結構的因素，還需要國內政治的因素，雖然這種觀點已經超越了結構現實主義的解釋變項，包含了國際層次與國內層次的變項，但如何將國內、外變項予以整合，以形成一個單一的理論模式，新古典現實主義並未進一步說明。如同在本文第一章中所提出的主要三個推論，他們都是個別獨立而未予整合在一起，即一、中國大陸對美（國）或臺（灣）之權力結構之差異愈大，兩岸愈不穩定，使中國大陸對臺經貿政策愈不利於臺灣。反之，則愈有利於臺灣；二、兩岸領導人對兩岸權力結構認知差異愈大，兩岸愈不穩定，使中國大陸對臺經貿政策愈不利於臺灣。反之，則愈有利於臺灣；三、兩岸執政黨之國內政治交集愈小，兩岸愈不穩定，使中國大陸對臺經貿政策愈不利於臺灣。反之，則愈有利於臺灣。顯然，這三個推論都是從個別的角度，分別對國家經貿政策提出解釋，而尚未結合形成單一的理論模式。因此，

本文在第五章分析類型中，除了予以操作化而形成研究命題外，並嘗試予以整合而形成綜合性的理論模式，如同上表 5-7：胡錦濤時期之兩岸經貿政策分析架構類型表，比照形成國家對外經貿政策的理論模式，如下表 6-1 本研究分析架構類型表所示，這是本研究在理論層面第一個研究發現與貢獻。

表 6-1：本研究分析架構類型表

架構類型	國際結構	國內獲勝集合	領導人對結構認知	國家對外經貿政策
第一種情境	對稱或不對稱	大	對立	不利
第二種情境	對稱或不對稱	小	對立	停利
第三種情境	對稱或不對稱	大	認同	有利
第四種情境	對稱或不對稱	小	認同	停利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第二，新古典現實主義對國家外交政策的解釋，通常站在個別國家的視角予以討論，但這種視角常處於本國的單向思維，例如，他們都以本國的權力如何？或本國的國內政治如何？等視之，而忽略了目標國的因素。然而，本研究認為一國的外交政策作為的解釋，如果僅站在本國立場的單向思維將不充分，而應予同時考量目標國的互動立場，才足以完善解釋。本研究第一章中

所提出修正後，可操作性的三個精煉推論，不論是兩岸權力結構的差距、兩岸領導人對兩岸權力結構認知的差異，或是兩岸執政黨之國內政治的交集，就是一種雙向互動思維的建構。因此，嘗試提出一種雙向互動的理論模式，做為一種新的架構途徑，是本文在理論層面的第二個研究貢獻。

第三，新古典現實主義在強調國際結構因素之外，還包含了國內政治因素在內，其實，這已經隱喻了國家對外策略選擇模式中，不僅只有結構現實主義所注重的理性模式，還有其他如：官僚政治模式和組織程序模式等，而事實上，後二種模式就是國內政治所常採用的解釋模式。就國際權力結構的理性假設而言，當一個國家權力愈大時，將會制定愈有利自己而不利對方的政策，這符合本文中第一個主要推論，即中國大陸對美（國）或臺（灣）之權力結構之差異愈大，使中國大陸對臺經貿政策愈不利於臺灣。然而，這個推論在本文的解釋中卻不盡相符。進一步觀察發現，兩岸關係中因涉及「統一」的政治因素，使得權力結構的理性模式，不全然適用於兩岸關係中，換言之，隨著兩岸權力結構的差距愈大，中國大陸的經貿政策並不一定不利於臺灣。這也說明了強調權力結構的理性模式，極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而必須有所調整或修正。本研究的分析模式，已將兩岸權力結構的不對稱，雖已修訂為給定的因素，而避開了這種不適用的影響，卻也印證了理性選擇模式的限制性，而必須考量其他的政治因素才能更趨完善。因此，從不同學派之間的互動、互補與相互理解，同時吸取理性主義解釋國際關係的為什麼，與建構主義理解國際關係是什麼的優點，³³⁵ 才是廣納其他優點和兼容並蓄的理論途

³³⁵ 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96-216.

徑，這是本文在理論層面的第三個研究發現與貢獻。

貳、在實務層面

第一，從中國大陸國內政經發展歷程看，中國大陸早期由於意識形態的作祟，認為其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受害者，但隨著大陸領導人的更迭，並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穩定而快速的成長，相對大幅提升中國大陸領導人與官方的自信心，中國大陸人民認為中國已歷經百年滄桑，但現在經濟已有相當成就，故應該成為強盛的國家。而中國大陸現今之外交政策，已將自身定位為崛起中的大國，並認為中國有其特殊利益與責任，在胡錦濤在任期間，對中國大陸發展方向的相關論述，亦透露此特色。此外，從中國大陸領導階層看，就中國政治局的專業性而言，自中共十二大（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十二大）到胡錦濤開始時期的十六大的政治委員，其所具備的專業背景與教育程度正不斷提升，特別是具備經濟與專業工作背景的技術、專業官僚，或具備自然科學與經濟學科背景的政治局委員比例亦不斷上升。³³⁶ 而幕僚機構的轉變更為明顯，近年來，隨著國外留學回國人數的增加，中國大陸外交部的素質與外語能力亦隨之大幅提升，換言之，參與中國大陸外交決策幕僚的專業化程度，正在不斷提升。³³⁷

第二，從中國大陸對外不同區域的經貿政策看，發現由於經濟已為中國大陸發展的關鍵因素，其對經濟的追求為中共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故為求確保經濟發展穩定，而不在乎手段是否正

³³⁶ 趙建民、張鈞智，〈菁英循環或再生？十二大以來中共技術官僚的發展趨勢〉，《中國研究》，第46卷第2期（2006年6月），頁78-87。

³³⁷ David M. Lampton, "China's Foreign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Process: Is It Changing and Does It Matter?" in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1978-2000*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7-8.

當，此在胡錦濤時期即得到印證。胡錦濤當時強調「必須從國際政治經濟的大勢、從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局、從外交工作的大戰略和總方針，充分認識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外交工作的重要性」，即可瞭解中國推動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經貿合作及經貿外交的重要性。從十六大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者協調發展的佈局，³³⁸ 到十七大通過的「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等主張寫入中共黨章，確立了中國經濟和社會轉型的主要方向。³³⁹ 此更凸顯胡錦濤時期，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以大國姿態對世界國家，遂行「經貿外交」之政策作為。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同時中國的歷史意識、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意識形態以及民族意識等，均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現存國際社會秩序及價值體系格格不入。此外，從本文研究與相關文獻整理中發現，蘇聯垮臺後，中國大陸已成為美國在國際社會影響力最主要的挑戰者，這是本文在實務層面的第二個研究發現。

第三，從兩岸間的經貿發展與關聯性，可看出現代國際社會中，很少有政治活動，是不與經濟活動聯結在一起的，反之亦然。即使不涉及政府的干預問題，許多現代經濟活動也是政治性的，因為公司和其他政府組織或非政府組織，都試圖相互影響和控制。從純粹的經濟學或政治學意義而言，世界經濟體系和國際政治體系都是抽象的。而從國際關係的現實世界來看，大部分重要的事件既是經濟的議題，也是政治的議題。³⁴⁰ 中國大陸在胡錦濤接任鄧小平掌權後，持續推行各項經貿政策，十年來，隨著經濟

³³⁸ 方立，〈正確認識政治文明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的關係〉，2003年1月21日，取自《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BIG5/shizheng/252/9483/9487/20030121/911604.html>，檢索日期：2013年12月2日。

³³⁹ 文現深，〈胡錦濤時代全面開啟〉，《天下雜誌》，第383期（2007年10月），頁58-62。

³⁴⁰ 蘇長和譯，Robert O. Keohane 著，《霸權之後—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上海：上海人民，2001年），頁24-25。

的持續成長，已使得中國大陸政治、軍力等綜合國力大幅提升後，政治與經濟互為主客體，在兩岸間的經貿發展與關聯性更為明顯，這是本文在實務層面的第三個研究發現。

第四，隨著中國大陸總體戰略之轉變，連帶調整了其對臺灣經貿外交戰略的全方位布局。復加以二十一世紀初，臺灣自由民主意識增強，中國大陸與臺灣關係朝「促進兩岸經貿交流」的方向發展。然而，其目的是在「以經促統」或「以經為政」。顯然，中國大陸對臺經貿政策均帶有其他政治因素。尤其是胡錦濤就任以來，為宣揚其「和平崛起」的概念，對臺灣更加強以經貿政策鞏固其政治目的，媒體將此種作法稱之為「中國版的軟實力」。³⁴¹ 例如，馬英九政府期間，藉高層訪問等策略作為，並以經貿利益為誘因，致力提升與臺灣之關係。從胡錦濤時期以來，兩岸所達成的經貿政策結果，印證了中國大陸為維護其整體國家利益，將經濟現代化設定為最高的施政目標，在對外政策與包括對臺貿易關係方面，必須以維持經濟穩定發展為最高指導原則，而所必須讓步的結果。³⁴² 據此，有系統的瞭解胡錦濤時期對臺灣經貿外交政策之經過，以及更進一步理解兩岸關係的變化與更細微的發展趨勢，是本文在實務層面的第四個研究發現。

第五，一般外交政策的分析均以描述性質居多，本文對於中國大陸胡錦濤時期經貿政策結果的解釋，嘗試以「有利」、「停利」與「不利」三者作區分，其目的即在跳脫一般外交政策分析的描述性研究，選取兩岸所達成經貿政策結果的實質和數量，做宏觀

³⁴¹ Richard Lapper, "Increase of Trade Reveals Beijing's Growing Profile in Latin America," *Financial Times*, 9 March 2005, pp. 5-7.

³⁴² Suisheng Zhao,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5, No. 1 (2000), pp. 5-8.

性的比較研究。換言之，從實務上的視角，這種區分後的比較研究模式，在測量尺度上(level of measurement)上，已從單純的描述性研究，轉化成較可操作性的名目(nominal)或順序(ordinal)尺度，³⁴³ 而更能貼近事實的研究，這是本研究在實務層面第五項的研究發現與貢獻。

第二節 臺灣之策略思維與作為

一般認為，中國大陸對臺經貿政策的作為，主要受到兩岸關係的影響。然而如果深入探究則會發現，兩岸關係只是東亞政經結構中的一環，甚至只是亞太或全球政經結構中的一小部分。此外，兩岸關係也必然受到雙方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因此，在本研究的思維邏輯上，就國內政治層面與國際結構層面，提出臺灣應有之策略思維與作為。

壹、在國內政治層面

依據本研究所整合形成的四種分析架構類型中，兩岸經貿互動在胡錦濤時期計出現了二種類形，分別是第二種情境，即兩岸權力結構不對稱、兩岸領導人對此權力結構認知不認同而對立、而且兩岸國內執政黨在國會代表的比例未過半數小（即民進黨陳水扁政府第一任期的後二年與第二任期的四年），因而造成兩岸經貿政策的停利結果；以及第三種情境，即兩岸權力結構不對稱、兩岸領導人對此權力結構的認知認同、而且兩岸國內執政黨在國會代表的比例過半數大（即國民黨馬英九政府第一任期的四年），

³⁴³ 張家麟、劉佩怡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思維》（Kenneth Hoover and Todd Donovan 原著）（新北：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2000年），頁98-104。

因而造成兩岸經貿政策有利的結果。

然而，對於第一種情境、第四種情境均尚未出現，即兩岸權力結構不對稱、兩岸領導人對此權力結構認知不認同而對立、而且兩岸國內執政黨在國會代表的比例過半數大；³⁴⁴ 以及兩岸權力結構不對稱、兩岸領導人對此權力結構的認知認同、而且兩岸國內執政黨在國會代表的比例未過半數小。對於第一、四種情境，因為可能造成中國大陸對臺不利或停利的經貿政策，故如何避免這種不利或停利結果的發生，係本文提出第一個臺灣應有的策略思維與作為，換言之，如果爭取國內民意，以求得國會代表的比例過半數，是國內政黨政治的趨勢，那唯一能改變的就是兩岸領導人，對原始權力結構認知，產生認同或不對立，才能避免兩岸經貿互動中之不利結果的發生。

貳、在國際結構層面

對中國大陸而言，在其經貿力量崛起之後，站在整體中國國家戰略利益的立場，對臺灣之經貿作為，僅是東亞區域經貿的一環，或只是其亞太區域經貿佈局，甚至只是中國大陸全球經貿戰略中的一小部分，顯然，中國大陸必須面對的主要是區域大國，甚至美國的競合，而不僅僅是臺灣而已。同理推論，在國際結構的層面而言，對於兩岸經貿政策的回應，臺灣也應該不能僅針對中國大陸，同樣必須考慮到其他區域大國，甚至美國的因素，如此才能使臺灣立於不敗之地。以臺灣加入區域經貿組織為例，因為東亞和亞太區域是美、中、日三國競逐的場域，臺灣也應以此

³⁴⁴ 臺灣於 2016 年 1 月 16 日，在國內政治上出現第三次政黨輪替，由民進黨再次拿回執政權，且其在國會代表的比例占全部 113 席立委的 69 席達 61.1%，是民進黨執政時期中首次國會代表過半數，故可歸類為本文分析架構類型中的第一種情境。

區域為策略作為的選項，故中國大陸、美國與日本將是臺灣觀察的重要對象。換言之，在不考慮三個大國同時加入某一區域合作組織的情況下，而是在三個國家策略互動下，哪二個大國同時加入的區域，應是臺灣優先考慮加入的區域合作組織。因此，對臺灣而言，目前以 ASEAN+6 區域（或東協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架構，RCEP）與 TPP 區域（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是臺灣優先加入的選項，而不應只汲汲追求兩岸的經貿政策互動。

總之，臺灣為了進入某一區域合作組織，就國際結構層面而言，強調大有為政府，以提升國家經貿發展實力和資訊科技能力，或建構形成小而美的國家，集中力量於經貿體制的建立與發展，³⁴⁵提升臺灣在國際結構上的實力，應是進入某一區域合作組織的基石，也才能在政治因素影響下，抗衡中國大陸對臺採取不利的經貿作為，這是本文所提出之第二個臺灣應有的策略思維與作為。

第三節 未來研究方向

首先，處於國際體系不斷變動的歷史洪流中，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發展進程，如同主流國際關係理論之間不斷的爭辯互動著，也如同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模式與實務經驗之間的互補和持續交流。這樣的發展進程因為沒有終點，代表著社會科學理論的複雜性，因此不需要也不能夠以一種單一的理論途徑予以完全理解。換言之，為了建構一種較融合性的外交政策理論，就不得不在現

³⁴⁵ 依據 Francis Fukuyama 從「國家體制的運作的範圍」和「國家體制力量的強弱」兩個維度進行分類，小而美的國家係屬於第一象限，即國家體制的運作範圍小而國家體制力量強的分類國家。從經濟學家的觀點而言，第一象限是最佳的選擇，一方面限制國家體制功能的範圍，一方面又可發揮國家強大的效能。請參閱：閻紀宇譯，《強國論》（Francis Fukuyama 原著）（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頁 21-76。

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國內政治理論之間，或在美國學派與英國學派之間取得一種最大交集。³⁴⁶ 這種最大的交集，就是「國際結構、領導人對國際結構的認知和國內獲勝集合」，也是本研究未來對新古典現實主義之理論建構，所必須持續努力研究的方向之一。

其次，本研究整合建構的的四種分析架構類型（如上表 6-1），雖然係針對本文研究命題，進一步的檢證與修正，然而，對於案例的解釋說明，僅採用到其中第二種和第三種情境，這是受限於兩岸案例選取所致。雖然 2016 年初，臺灣之國內政權再次政黨輪替，改由民進黨執政，然符合「兩岸權力結構不對稱、兩岸領導人對此權力結構認知不認同而對立、而且兩岸國內執政黨在國會代表的比例過半數大」的第一種情境，雖然民進黨蔡英文總統並不認同「九二共識」，³⁴⁷ 然而其結果是否如架構類形中所預測，為不利的兩岸經貿政策，因為此案例時序未到，故尚待後續觀察研究與檢證。換言之，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對臺灣外交政策，係以經貿為主要的考量，即中國大陸對臺灣外交政策的重心為經貿，其目的在於維繫與臺灣關係，除維持經貿順利發展外，另在大民族主義思維的驅使下，意圖藉此完成統一臺灣，塑造歷史性之時代。然而，中國大陸新一代領導人習近平上臺，加之臺灣國內政治的變化，兩岸關係是否延續或產生變化，需要後續研究與

³⁴⁶ 美國學派與英國學派的爭辯，請參閱：Benjamin J. Cohe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許嘉，《英國學派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北京：時事出版社，2008 年）。

³⁴⁷ 中華民國第 14 任總統在就職演說中，有關兩岸關係的部份提到：「1992 年兩岸兩會秉持相互諒解、求同存異的政治思維，進行溝通協商，達成若干的共同認知與諒解，我尊重這個歷史事實。92 年之後，20 多年來雙方交流、協商所累積形成的現狀與成果，兩岸都應該共同珍惜與維護，並在這個既有的事實與政治基礎上，持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新政府會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其他相關法律，處理兩岸事務。」顯然，這種認知並不完全等同於「九二共識」。請參閱：中央社，〈蔡英文總統就職演說中英文全文〉，2016 年 5 月 20 日，取自《中央通訊社》，<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605205012-1.aspx>，檢索日期：2016 年 5 月 20 日。

檢證，這也是本文未來待研究的重點之一。

最後，也因兩岸案例選取的限制，故主觀上以三個時期的劃分，做為本文分析上的比較對照，這無非想嘗試更理解中國大陸對臺的政策作為與理解兩岸關係的細緻變化。然而，新古典現實主義絕不僅解釋兩岸關係變化之需，任何國與國之間的外交政策案例都應予適用，才能跳脫理論模式特殊性的限制，以符合理論的一般性與普遍性原則。因此，本文依據新古典現實主義所推演提出的分析架構類型，未來需要不同的分析時期，劃分與更多不同案例的檢證。

參考書目

壹、中文部分

一、書籍

- 丁學良，1994，《共產主義後與中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丁樹範，2004，《中國大趨勢：2003-2004》。臺北：新新聞文化。
- 中國共產黨，1991，《中國黨史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局。
- 王 萍，2005，《走向開放的區域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
- 王逸舟，2003，《全球政治與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
- 朱光磊，2004，《中國政府與政治》。臺北：揚智文化出版社。
- 朱言明，2000，《共產主義在中國及其變革》。臺北：黎明文化。
- 吳玉山，1997，《抗衡與扈從：兩岸關係新詮》。臺北：正中出版社。
- 吳建華，2004，《東亞現代化與中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吳洪英、張新生，2004，《現代國際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李 鵬，2007，《市場與調控—李鵬經濟日記(中)》。北京：新華出版社。
- 李明德，2001，《拉丁美洲和中拉關係-現在與未來》。北京：時事出版社。
- 沈燦宏，2015，《RCEP、TPP 誰與爭鋒 vs. 中國、美國誰將勝出》。臺北：致知學術出版。
- 周文欽，2005，《研究方法概論》。臺北：國立空中大學年。
- 周穗明，1999，《現代化：歷史、理論與反思：兼論西方左翼的現代化批判》。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 岳超源，2004，《決策理論與方法》。北京：科學出版社。
- 林碧炤，1993，《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臺北：五南圖書。
- 林毅夫，2007，《李約瑟之謎、韋伯疑問和中國的奇蹟—自宋以來的長期經濟發展》。北京：北京大學學報出版。
- 林毅夫，2009，《解讀中國經濟》。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
- 姚震宇，2008，《理性、權力與經濟繁榮：奧爾森經濟增長思想研究》。北京：上海人民。
- 徐永明、黃紀，2001，《政治分析的層次》。臺北：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
- 袁 易，2003，《中國遵循國際導彈建制的解析：一個社會建構論的觀點》。臺北：五南圖書。
- 袁 易、嚴震生、彭慧鑾，2004，《中國崛起之再省思：現實與認知》。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 馬立誠、凌志軍，1998，《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馬崇明，2003，《中國現代化進程》。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 高 長，1999，《大陸經改與兩岸經貿關係(增訂版)》。臺北：五南圖書。
- 高 輝，2002，《轉型中的中共社會主義》。臺北：永業出版社。
- 康紹邦、宮力，2006，《國際戰略新論》。北京：解放軍。
- 張幼文、徐明棋，2004，《強國經濟—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與道路》。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 張豈之、楊先材，2002，《中國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臺北：五南圖書。
- 張登及，2003，《建構中國：不確定是界中的大國定位與大國外交》。臺北：揚智文化事業。
- 張維迎，2013，《博弈與社會》。北京：北京大學。
- 許 嘉，2008，《英國學派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北京：時事出版

社。

許介麟、蕭全政、李文志，1994，《亞太經濟合作與美國的亞太戰略》。臺北：業強。

陳永發，2001，《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臺北：聯經。

陳志端、周桂銀、石斌，2006，《開放的國際社會：國際關係研究中的英國學派》。北京：北京大學。

陳佳棣，2005，《中國農民調查》。臺北：大地出版社。

陳錦華，2005，《國事憶述》。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陸建人，1999，《東盟的今天與明天—東盟的發展趨勢及其在亞太的地位》。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

趙建民，1997，《當代中共政治分析》。臺北：五南圖書。

劉 鈺、王揚宗，2002，《中國科學與科學革命：李約瑟難題及其相關問題研究論著選》。瀋陽市：遼寧教育出版社。

魏禮群，2005，《改革開放三十年見證與回顧》。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

二、期刊

于有慧，2001，〈近期兩岸關係中的美國因素〉，《中國大陸研究》，第44卷第8期(2001年8月)，頁1-21。

文 馨，1995，〈對中國威脅論之研析〉，《中共研究》，第29卷第8期(1995年8月)，頁67-75。

文現深，2007，〈胡錦濤時代全面開啟〉，《天下雜誌》，第383期(2007年10月)，頁58-62。

王宏強，2002，〈中國對外友協在推動中拉關係方面的作用〉，《拉丁美洲研究》，第5期(2002年)，頁7-21。

王庭東，2003，〈論東亞新地區主義〉，《當代亞太》(2003年第

- 1 期)，頁 52-58。
- 王新祿，1999，〈中拉關係的現狀和發展前景〉，《拉丁美洲研究》，第 1 期(1999 年)，頁 9-21。
- 王新祿，1999，〈拉美一體化的現狀、成果和前景〉，《拉丁美洲研究》，第 1 期(1999 年)，頁 31-43。
- 石之瑜，2000，〈結構現實主義國際政治學的知識脈絡〉，《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7 期(2000 年 7 月)，頁 37-53。
- 伍 楚，1998，〈中國同拉美及加勒比地區的關係〉，《拉丁美洲研究》，第 6 期(1998 年)，頁 8-11。
- 江時學，2005，〈中國拉美關係的三個因素〉，《瞭望新聞週刊》，第 6 期(2005 年)，頁 12-29。
- 李志祥，1995，〈中國和拉丁美洲經貿體系的現狀與前景〉，《拉丁美洲研究》，第 1 期(1995 年)，頁 20-34。
- 初國華、張昌吉，2010，〈戰略三角理論與臺灣的三角政治〉，《問題與研究》，第 49 卷第 1 期(2010 年)，頁 87-106。
- 周余雲，1999，〈世紀之交的拉美政黨政治〉，《拉丁美洲研究》，第 1 期(1999 年)，頁 6-17。
- 林正義，2009，〈臺灣防衛性公投與美國對台政策調整〉，《歐美研究》，第 3 卷第 2 期(2009 年)，頁 333-388。
- 邱稔壤，1992，〈世界新秩序下的拉丁美洲經濟〉，《問題與研究》，第 33 卷 10 期(1992 年)，頁 59-81。
- 金榮勇，2005，〈形成中的東亞共同體〉，《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3 期(2005 年 5、6 月)，頁 33-56。
- 姜新立，1999，〈後社會主義中國發展轉型論〉，《東亞季刊》，第 30 卷第 2 期(1999 年 4 月)，頁 1-36。
- 洪志安，2012，〈從國防經費變動看中共文武關係〉，《黃埔學報》，第 62 期(2012 年)，頁 67-80。
- 秦亞青，2001，〈國際政治的社會建構－溫特及其建構主義國際政

- 治理論》，《美歐季刊》，第 15 卷第 2 期(2001 年夏季號)，頁 231-264。
- 耕耘，1997，〈走向 21 世紀的拉丁美洲和中拉關係的前景〉，《拉丁美洲研究》，第 5 期(1997 年)，頁 11-23。
- 耿曙，2009，〈經濟扭轉政治？中共惠台政策的政治影響〉，《問題與研究》，第 48 卷第 3 期(2009 年 9 月)，頁 1-32。
- 袁易，2005，〈「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之再審視」：一個權力政治與身份政治的解析〉，《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4 期(2005 年 8 月)，頁 101-150。
- 高朗，2004，〈後冷戰時期中共外交政策之變與不變〉，《政治科學論叢》，第 21 期(2004 年 9 月)，頁 19-48。
- 張森根，1994，〈中國和拉美國家之間的關係：現狀與前景〉，《拉丁美洲研究》，第 5 期(1994 年)，頁 38-41。
- 張新生，〈拉美經濟發展前景與中拉關係〉，《拉丁美洲研究》，第 2 期(2000 年)，頁 5-14。
- 張翠容，2007，〈拉美左翼改革新實踐〉，《亞洲週刊》，21 卷 41 期(2007 年)，頁 26-37。
- 張寶宇，1995，〈淺談中拉關係在各自對外關係中的地位〉，《拉丁美洲研究》，第 1 期(1995 年)，頁 20-34。
- 莫大華，2000，〈國際關係理論大辯論研究的評析〉，《問題與研究》，第 30 卷第 12 期(2000 年 12 月)，頁 65-90。
- 郭崇道、熊業田、李志祥，1987，〈中拉經濟貿易體系的發展與今後設想〉，《拉丁美洲研究》，第 5 期(1987 年)，頁 5-16。
- 陳玉明，1998，〈中國與拉美地區的經貿關係發展迅速〉，《拉丁美洲研究》，第 6 期(1998 年)，頁 21-39。
- 陳牧民，2006，〈當和平崛起遇上臺灣問題：精英認知下的中國安全戰略〉，《中國大陸研究》，第 49 卷第 4 期(2006 年 12 月)，頁 1-21。

- 筆 鋒，2007，〈拉美左翼的機會與考驗〉，《亞洲週刊》，第 21 卷 41 期(2007 年)，頁 6-7。
- 黃秋龍，2006，〈中共第十六屆六中全會之評析〉，《展望與探索》，第 4 卷第 11 期(2006 年 11 月)，頁 1-6。
- 楊 帆，2004，〈胡溫提出「和平崛起」外交新思維〉，《中國研究月刊》(香港)，第 38 卷第 5 期(2004 年 5 月)，頁 23-26。
- 楊 昊，2006，〈微型區域主義在東南亞跨域霾害治理上的挑戰與調適〉，《遠景季刊》，第 7 卷第 3 期(2006 年 7 月)，頁 139-186。
- 楚樹龍，1999，〈冷戰後中國安全戰略思想的發展〉，《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9 期(1999 年)，頁 1-15。
- 裘援平，1993，〈拉美的經濟開放和發展-中拉經貿關係的對策〉，《拉丁美洲研究》，第 6 期(1993 年)，頁 19-27。
- 趙建民、張鈞智，2006，〈菁英循環或再生？十二大以來中共技術官僚的發展趨勢〉，《中國研究》，第 46 卷第 2 期(2006 年 6 月)，頁 78-87。
- 鄭富霖，2005，〈「東協-中國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定」之爭端解決機制評析〉，《展望與探索》，第 3 卷第 2 期(2005 年 2 月)，頁 96-102。
- 鄭端耀，2005，〈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1 期(2005 年 1、2 月)，頁 115-140。
- 盧后盾，1987，〈拉丁美洲在國際經濟關係中的地位〉，《拉丁美洲研究》，第 2 期(1987 年)，頁 21-41。
- 蕭朝琴，1999，〈後冷戰時期中共對亞太地區的外交戰略〉，《共黨問題研究》，第 25 卷第 10 期(1999 年 10 月)，頁 36-43。
- 羅致政，1995，〈美國在台海兩岸互動所扮演的角色—結構平衡者〉，《美歐月刊》，第 10 卷第 1 期(1995 年)，頁 37-54。

三、專書論文

- 包宗和，1999，〈戰略三角角色轉變與類型變化分析—以美國與台海兩岸三角互動為例〉，摘錄自包宗和、吳玉山(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臺北：五南圖書，頁 335-364。
- 江啟臣，2000，〈亞太 vs. 東亞經濟合作：問題、觀點與展望〉，收錄於江啟臣(編)《強權關係與亞太區域發展》。臺北：中華臺北 APEC 研究中心，頁 135-160。
- 巫寧耕，2004，《東亞經濟合作的道路》，收錄於梁志明(編)，《亞太研究論叢第一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3-14。
- 李向陽，2004，〈2004—2005 年世界經濟形勢回顧與展望〉，收錄於劉國光、王洛林、李京文(編)，《2005 年：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320-333。
- 徐斯儉，2002，〈十六大前後中國政治改革的動向〉，收錄於丁樹範(編)，《胡錦濤時代的挑戰》。臺北：新新聞，頁 122-159。
- 黃介正，2004，〈兩岸態勢評估(2003/2004 年)〉，收錄於袁易、嚴震生、彭慧鸞(編)，《中國崛起之再省思：現實與認知》。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頁 136-142。
- 謝復生，2000，〈理性抉擇理論的回顧與前瞻〉，收錄於何思因、吳玉山(編)，《邁入廿一世紀的政治學》。臺北：中國政治學會出版，頁 141-153。

四、譯著

- 王佳煌、潘中道、郭俊賢、黃瑋瑩譯，Lawrence Neuman 著，2002，

- 《當代社會研究法》。臺北：學富文化。
- 王德玲、蔣雪芬譯，Kenichi Ohmae 著，2001，《看不見的新大陸》。臺北：天下。
- 張家麟、劉佩怡譯，Kenneth Hoover and Todd Donovan 著，2000，《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思維》。新北：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
- 張勝軍、劉小林譯，James N. Rosenau 著，2001，《沒有政府的治理》。南昌市：江西人民出版社。
- 許曉平譯，Kenichi Ohmae 著，2002，《中國，出租中》。臺北：天下。
- 陳琇玲，John Kay 著，2005，《市場的真相：富國恆富窮人如何翻身》。臺北：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楊宇光譯，Robert Gilpin 著，2001，《全球資本主義的挑戰》。上海：上海人民。
- 溫哈溢譯，Susan Shrik 著，2008，《脆弱的強權：在中國崛起的背後》。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葉家興譯，Todd Sandler 著，2003，《經濟學與社會的對話》。臺北：先覺出版。
- 董安琪譯，Mancur Olson 著，1989，《集體行動的邏輯》。臺北：允晨文化實業。
- 董旭英、黃儀娟譯，David W. Stewart & Michael A. Kamins 著，2002，《次級資料研究法》。臺北：弘智文化。
- 潘明宏譯，Chava Frankfort Nachmias & David Nachmias 著，1999，《社會科學研究法(上冊)》。臺北：韋伯。
- 鄧方譯，2002，David M. Kreps 著，《賽局理論與經濟模型》。臺北：五南圖書。
- 閻紀宇譯，Francis Fukuyama 著，《強國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
- 蘇長和譯，Robert O. Keohane 著，2001，《霸權之後——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上海：上海人民。

鐵人雍譯，Jeffrey D. Sachs 著，2007，《終結貧窮》。臺北：臉譜出版社。

五、官方資料與報紙

行政院經濟部國貿局，1993，《中國對外經貿研究》(總 404 期)。

臺北：國貿局編，未出版。

行政院經濟部國貿局，1994，《中國對外經貿研究》(總 421 期)。

臺北：國貿局編，未出版。

行政院經濟部國貿局，1994，《中國對外經貿研究》(總 423 期)。

臺北：國貿局編，未出版。

行政院經濟部國貿局，1995，《中國對外經貿研究》(總 450 期)。

臺北：國貿局編，未出版。

行政院經濟部國貿局，1996，《中國對外經貿研究》(總 491 期)。

臺北：國貿局編，未出版。

行政院經濟部國貿局，1997，《中國對外經貿研究》(總 478 期)。

臺北：國貿局編，未出版。

高長，2004，《展望大陸經濟變動趨勢與全球經貿版圖消長》。

臺北：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未出版。

詹滿容，2004，《我國因應中國大陸與東協建立自由貿易區之研究》。臺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未出版。

聯合早報，2003 年 10 月 2 日，〈東協與中國關係新發展〉，《聯合早報》，版 2。

六、學位論文

游蕙綾，1999，〈中共對拉丁美洲之外交政策〉。臺北：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

七、網路

人民日報，2008年10月6日，〈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取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135439/8134114.html>。檢索日期：2014年4月30日。

中央社，〈蔡英文總統就職演說中英文全文〉，2016年5月20日，取自《中央通訊社》，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605205012-1.aspx>，檢索日期：2016年5月20日。

中央社，2015年6月29日，〈中共黨員人數〉，取自《中央通訊社》，
<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506290457-1.aspx>。檢索日期：2015年6月30日。

中國大陸人民代表大會，2014，〈文獻資料〉，《中國人民代表大會網》，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newwxzl.htm>。檢索日期：2014年2月1日。

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2004年2月23日，〈現代化理論〉，取自《中國網》，
http://big5.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4-02/23/content_5503322.htm，檢索日期：2015年4月30日。

中國評論通訊社，2007年8月13日，〈陳水扁迷航騙降落荷蘭〉，

- 取自《中國評論新聞網》，
<http://hk.crntt.com/doc/1004/2/8/5/100428501.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428501>。檢索日期：2015年8月15日。
- 中國評論通訊社，2010年8月24日，〈經濟規模世界第二，中國怎樣影響世界〉，取自《中國評論新聞網》，
<http://w.chinareviewagency.com/doc/1014/2/4/2/101424279.html?coluid=59&kindid=0&docid=101424279&mdate=0824095949>。檢索日期：2015年8月24日。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2年11月4日，〈中國與東盟關於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言〉，取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
<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1179/t10985.htm>。檢索日期：2014年11月4日。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13，〈統計資料〉，取自《國家統計局資料庫》，<http://www.stats.gov.cn/tjsj/>。檢索日期：2013年10月11日。
- 中華日報社論，2015年9月3日，〈中共裁軍一應向臺灣拋出和平橄欖枝〉，取自《中華日報新聞網》，
http://www.cdns.com.tw/news.php?n_id=16&nc_id=45892。檢索日期：2015年10月30日。
-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2012，〈國家基本資料表〉，取自《貿協全球資訊網站》，<http://www.taitraesource.com/total01.asp>。檢索日期：2012年12月31日。
- 中新社，2001年3月7日，〈江澤民在人大湖南團談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取自《中國網》，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lianghui/23526.htm>。檢索日期：2014年4月30日。
- 元樂義，2012年5月14日，〈中日韓峰會同意年內啟動FTA 談

- 判〉，取自《中時電子報》，
<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501011149/112012051400073.html>。檢索日期：2015 年 5 月 14 日。
- 文現深，2011 年 4 月 13 日，〈胡錦濤時代全面開啟〉，取自《天下雜誌 383 期》，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03387>。檢索日期：2015 年 3 月 10 日。
- 方立，2003，〈正確認識政治文明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的關係〉，2003 年 1 月 21 日，取自《人民網》，
<http://www.people.com.cn/BIG5/shizheng/252/9483/9487/20030121/911604.html>。檢索日期：2013 年 12 月 2 日。
- 王振輝，2007 年 11 月 19 日，〈中國共產黨「十七大」及其重大議題的解讀〉，取自《靜宜大學新聞深度分析簡訊第 129 期》，
<http://web.pu.edu.tw/~gec/index1.htm>。檢索日期：2016 年 1 月 14 日。
- 王慧明，2014，〈官僚政治下的中國社會〉，取自《亞洲文明研究院》，
<http://sohac.nenu.edu.cn/kyss/asia/dsypl/text-15/wanghm.htm>。檢索日期：2014 年 5 月 30 日。
- 主計總處，2014 年 5 月 20 日，〈近十年國防預算結構統計〉，取自《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http://www1.stat.gov.tw/ct.asp?xItem=15477&CtNode=4774&mp=3>。檢索日期：2015 年 8 月 20 日。
- 北京現代化學術研究中心，2015，〈現代化理論〉，取自《中國現代化網》，<http://www.modernization.com.cn/lilun.htm>，檢索日期：2015 年 5 月 30 日。
- 石仲泉，2012 年 11 月 21 日，〈道路、理論體系、制度的「三位一體」〉，取自《解放日報網》，

http://newspaper.jfdaily.com/jfrb/html/2012-11/21/content_923112.htm。檢索日期：2014年5月30日。

立法院，2015，〈立法委員查詢〉，《立法院全球資訊網》，
http://www.ly.gov.tw/03_leg/0301_main/legList.action。檢索日期：2015年1月10日。

朱 謙，1983年6月1日，〈剖析中共四化及其經濟前途〉，取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http://rportal.lib.ntnu.edu.tw/bitstream/77345300/18381/1/ntnolib_ja_J0101_0007_089.pdf。檢索日期：2015年7月1日。

自由時報，2016年1月13日，〈談 TPP 歐巴馬嗆中國：亞洲規則是美國訂的〉，取自《自由電子報》，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570608>。檢索日期：2016年1月13日。

吳允和，2009年08月27日，〈鄧小平頂壓力堅決支持包產到戶〉，取自《sina 全球新聞網》，
http://news.sina.com/c/sd/2009-08-27/180718525224_5.shtml。
檢索日期：2013年6月30日。

吳玲君，2012年6月1日，〈跨太平洋伙伴協定的發展與影響〉，《問題與研究》(第51卷第2期)，
<http://iir.nccu.edu.tw/attachments/journal/add/5/2011-1-04.pdf>。
檢索日期：2015年9月22日。

宋鎮照，2013年2月1日，〈美國重返亞洲的企圖與策略：霸權地位保衛戰〉，《海峽評論》，
<http://www.haixiainfo.com.tw/266-8657.html>。檢索日期：2015年9月22日。

李正修，2009年9月22日，〈美國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之影響及我國因應措施〉，取自《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http://www.npf.org.tw/post/3/6485>。檢索日期：2015

年 9 月 22 日。

李英明，2014 年 7 月 24 日，〈鬥而不破 陸美後現代戰略探戈〉，取自《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OPINION/X1/8824222.shtml>。檢索日期：2014 年 7 月 24 日。

李英明，2015 年 9 月 28 日，〈歐習會/陸美談競合 不比拳頭硬〉，取自《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story/7339/1214515>。檢索日期：2015 年 9 月 29 日。

周育仁、詹富堯，2008 年 10 月 8 日，〈從課責觀點探討內閣制下政府負責機制的設計與運作〉，取自《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http://www.npf.org.tw/post/2/4789>，檢索日期：2015 年 5 月 30 日。

周新橋、朱益上，2010 年 11 月 5 日，〈淺談江澤民對鄧小平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思想的豐富和發展〉，取自《論文下載中心》，

<http://big.hi138.com/zhengzhi/zhengzhiqita/201011/263672.asp#U7ezXvmSyCc>。檢索日期：2014 年 4 月 25 日。

林祖嘉、譚瑾瑜，2011 年 11 月 4 日，〈大陸「十二五規劃」與兩岸經貿合作契機〉，取自《財團法人國家政策基金會》，

<http://www.npf.org.tw/2/9931>。檢索日期：2016 年 1 月 15 日。

林毅夫，1998 年 11 月 1 日，〈體制改革和中國農業增長〉，取自《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http://www.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id=456>。檢索日期：2014 年 3 月 30 日。

林毅夫，2014，〈解釋李約瑟之謎的新理論〉，取自《和訊圖書網》，<http://data.book.hexun.com/chapter-3073-3-12.shtml>。檢

索日期：2014 年 3 月 24 日。

胡紅蕾，2002年8月9日，〈專家認為中國入世將中拉關係推向新的高度〉，取自《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08/09/content_518608.htm。檢索日期：2014年8月9日。

胡錦濤，2003年12月26日，〈胡錦濤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座談會的講話〉，取自《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12/26/content_1250092.htm。檢索日期：2013年10月11日。

胡錦濤，2012年11月8日，〈胡錦濤強調市場經濟體制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自《新華社》，

http://news.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08/c_113637808.htm。檢索日期：2015年12月8日。

徐世澄，2005年2月1日，〈2004年拉丁美洲政治形勢〉，取自《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

<http://ilas.cass.cn/zxcg/zhengzhi/20060530/101704.htm>。檢索日期：2005年1月15日。

海峽交流基金會，2011年1月5日，〈兩岸協議〉，取自《海峽交流基金會網站》，

<http://www.sef.org.tw/lp.asp?CtNode=3810&CtUnit=2083&BaseDSD=7&mp=19&nowPage=1&pagesize=15>。檢索日期：2012年4月1日。

高長，2005年12月1日，〈從中共「『十一五規劃』建議」看大陸經濟發展政策方向〉，取自《大陸台商經貿網》，

<http://www.chinabiz.org.tw/News/GetJournalShow?pid=162&catid=174&gid=97&id=1429>。檢索日期：2015年12月1日。

高策、李志紅，2014，〈楊振寧論中國傳統文化與科學技術〉，取自《國際在線》，

<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3601/2004/09/14/342@2996>

[18.htm](#)。檢索日期：2014年3月24日。

國防部，2014年5月20日，〈中共國防預算統計〉，取自《政府資料開放平臺》，<http://data.gov.tw/node/8148>。檢索日期：2015年5月21日。

張亞中，2016年4月14日，〈東亞秩序少不了九二共識〉，取自《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414000438-260109>。檢索日期：2016年4月14日。

張榮恭，2001年8月1日，〈中共兩度聽言觀行與當前兩岸困局〉，取自《國家政策論壇第1卷第6期》，
<http://old.npf.org.tw/monthly/00106/theme-142.htm>。檢索日期：2015年8月1日。

曹云華、徐善寶，2015，〈睦鄰外交政策與中國—東盟關係〉，取自《東盟頻道》，
http://www.gx.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1/06/content_11595252.htm。檢索日期：2015年5月1日。

曹應旺，2014，〈周恩來與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取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5843/75873/5167876.html>。檢索日期：2014年4月30日。

許峻賓，2016年2月24日，〈亞太區域整合不脫中美競合架構〉，取自《風傳媒》，<http://www.storm.mg/article/82774>。檢索日期：2016年2月24日。

陳述，2013年9月6日，〈江澤民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http://www.wxyjs.org.cn/dhgjzyldryj_558/201207/t20120712_17005.htm。檢索日期：2015年12月6日。

陳建瑜，2016年2月14日，〈陸空軍世界第3動搖美霸權〉，

取自《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214000625-26030>

1。檢索日期：2016年2月14日。

賀雙榮，2005年1月18日，〈南美國家共同體的形成及前景〉，取自《中國拉丁美洲研究網》，

<http://ilas.cass.cn/zxcg/guobie/20060530/105204.htm>。檢索日

期：2012年12月18日。

黃大慧、韓愛勇，2012年3月15日，〈東亞地區主義研究評析〉，取自《中道網》，

<http://www.zhongdaonet.com/NewsInfo.aspx?id=3267>。檢索日

期：2015年7月24日。

黃以謙，2016年2月24日，〈中國試圖掌控東亞〉，取自《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224002881-2604>

[08](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224002881-260408)。檢索日期：2016年2月24日。

新華社，2002年11月8日，〈江澤民報告第四部分：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取自《中國網》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archive/229783.htm>。檢索日

期：2014年4月30日。

新華社，2004年12月1日，取自《2004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

http://www.mod.gov.cn/affair/2011-01/06/content_4249947.htm

。檢索日期：2015年6月5日。

新華社，2004年5月17日，〈國台辦就當前兩岸關係問題發表聲明〉，取自《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taiwan/2004-05/17/content_1472605.](http://news.xinhuanet.com/taiwan/2004-05/17/content_1472605.htm)

[htm](http://news.xinhuanet.com/taiwan/2004-05/17/content_1472605.htm)。檢索日期：2014年8月24日。

新華社，2005年10月18日，〈十一五規劃綱要〉，取自《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6-01/16/content_4057926.htm。檢索日期：2015年11月1日。

新華社，2005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取自《中國共產黨》，<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9/65414/4429220.html>。檢索日期：2014年4月30日。

新華社，2005年3月14日，〈受權發佈：《反分裂國家法》全文〉，取自《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3/14/content_2694168.htm。檢索日期：2014年8月24日。

新華社，2005年3月5日，〈溫家寶：堅持和平發展道路與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取自《新華網》，<http://www.npc.gov.cn/npc/oldarchives/dbdh/dbdh/common/zw.jsp@label=wxzlk&id=335923&pdm=3133.htm>。檢索日期：2013年11月1日。

新華社，2011年3月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取自《新華網》，http://big5.news.cn/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11-03/28/c_121239866.htm。檢索日期：2016年1月15日。

新餘市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2010年4月29日，〈明代著名科學家宋應星《天工開物》〉，取自《華夏經緯網》<http://big5.huaxia.com/jxxy/zjxy/whmr/2010/04/1865036.html>。檢索日期：2013年6月1日。

楊東海，2013年7月8日，〈鄧小平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3)〉，取自《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n/2013/0708/c85037-22119887-3.html>。檢索日期：2014年4月30日。

- 溫家寶，2003年12月11日，〈把目光投向中國〉，取自《人民網》，
<http://www.people.com.cn/BIG5/shehui/1061/2241298.html>。檢
索日期：2013年10月11日。
- 經濟日報社論，2016年1月27日，〈中國的雷曼時刻到了
嗎〉，取自《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story/7338/1468959>。檢索日期：2016
年1月27日。
- 鳳凰電視台，2010年7月5日，〈國光計劃—蔣介石擬大躍進時期
反攻大陸〉，取自《臺灣 YouTube 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Ev1K5Joe8E>。檢索日期：
2015年10月30日。
- 潘維庭，2014年04月10日，〈RCEP、TPP可「並行不悖」〉，
取自《風傳媒》，<http://www.storm.mg/article/29780>。檢索日
期：2015年10月11日。
- 黎敏，2011年5月18日，〈陳炳德：中國無意挑戰美國軍力〉，
取自《BBC 中文網》，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1/05/110519_us
china_military_taiwan.shtml](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1/05/110519_us_china_military_taiwan.shtml)。檢索日期：2012年5月21日。
- 賴湘茹，2015，〈兩岸租稅協議 大陸讓利〉，2015年4月13日，
取自《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413000016-26020
2](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413000016-260202)。檢索日期：2015年4月13日。
- 總統府，2002年8月3日，〈總統以視訊直播方式於世界臺灣同
鄉聯合會第二十九屆年會中致詞〉，取自《總統府網站》，
<http://www.president.gov.tw>。檢索日期：2014年8月14日。
- 謝明瑞，2011年11月26日，〈黃金十年與 TPP〉，取自《財團法
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政研究報告》，

<http://www.npf.org.tw/post/2/10142>。檢索日期：2012年12月31日。

鍾詠翔，2015年7月27日，〈憂政府出手仍難救市 滬股狂跌8.5%〉，取自《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story/4/1082027>。檢索日期：2015年8月24日。

藍孝威、陳柏廷，2016年3月6日，〈陸十三五規畫二十年翻五倍 GDP 上看 90 兆〉，取自《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306000258-260102>。檢索日期：2016年3月6日。

魏寶強，2012年10月31日，〈探析近代中國科技落後的原因〉，取自《人民教育出版社》，

http://www.pep.com.cn/rjwk/bmls/bmls2012/068/lszh_1_1/201210/t20121031_1142195.htm。檢索日期：2013年6月3日。

譚瑾瑜，2012年12月14日，〈RCEP現況及臺灣因應之道〉，取自《新浪新聞中心》，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21214/8550112.html>。檢索日期：2012年12月31日。

蘇進強，2016，〈兩岸軍力與台海和平〉，取自《臺灣獨立建國聯盟網》，<http://www.wufi.org.tw/>。檢索日期：2016年2月10日。

龔建文，2013年11月19日，〈中國農村改革30年：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新農村建設〉，取自《鳳凰網圖書》，

http://book.ifeng.com/shupingzhoukan/special/duyao113/wenzhang/detail_2013_11/19/31388757_0.shtml。檢索日期：2014年4月24日。

貳、西文部分

(I) Books

- Baldwin, David A., 1993,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urton, John W., 1972, *World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zan, Barry, 1993,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uzan, Barry,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1993,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amilleri, Joseph A., 2003, *Regionalism in the New Asia-Pacific Order*. Northampton,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Press.
- Chan, Gerald, 1999,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New Zealand: Macmillan.
- Chen, Weixing and Yang Zhong, 2005, *Leadership in a Changing Chin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 Christensen, Thomas J., 1996,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ohen, Benjamin J., 2008,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 Press.
- Das, Dilip K., 2004, *Regionalism in Global Trade*.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Press.
- Gadzey, Anthony Tuo-kofi, 199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wer: Hegemony Liberaliz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Ltd.
- Gilpin, Robert, 1981,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ray, Christine, 2004,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Use of For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as, Ernst B., 1958,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1950-57*.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senclever, Andreas, 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 2004,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llis, Martin and Steve Smith, 1990,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untington, Samuel P., 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Keohane, Robert O., 1984,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eohane, Robert O., 1986,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eohane, Robert O., 1989,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Kindleberger, Charles, 1974,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ing, Gary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1994,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ampton, David M., 2001,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1978 –2000*.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rner, Daniel, 1958,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England: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Press.
- Levy, Marion J. Jr., 1969, *Moderniz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Societies: A Setting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i, He, 1991, *Sino-Latin America Economic Relation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 Lieberthal, Kenneth, 2003,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Press.
- Milner, Helen V., 1997, *Interests, Institutions, and Informati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 University Press.
- Morrow, James D., 1994, *Game Theory for Political Scientist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orgenthau, Hans Joachim, 1973,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5th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Press.
- Nathan, Andrew J., 1990, *China's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Organski, A. F. K. and Jacek Kugler, 1980,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Oviedo, Eduardo Daniel, 1996, *Las Relaciones Chino-Latinoamericanas Post-Tianamen*. La Plat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la Plata, abril 1996.
- Parsons, Talcott, 1964,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 Rostow, Walt W., 1960,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urke, John T., 2003,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n the World Stage*. New York: McGraw-Hill Companies Press.
- Snyder, Jack, 1991,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pence, Jonathan D., 1991,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Press.
- Strange, Susan, 1996,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Charles, 1975,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altz, Kenneth N., 1959,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Press.
- Watson, Joel, 2002, *Strategy: An Introduction to Game Theory*.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 Press.
- Wendt, Alexander,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Young, H. Peyton, 1994, *Negotiating Analysis*. Ann Arbor, Minnesota: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Young, Oran R., 1989,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uilding Regimes f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Young, Oran R., 1998, *Creating Regimes: Arctic Accords and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Zakaria, Fareed, 1998,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Zhao, Suisheng, 2004,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Behavior*.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Press.
- Zhao, Suisheng, 2005,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the 1995~1996 Crisi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II) Periodicals

- Aggarwal, Vinod K. and Min Gyo Koo, 2005, "Beyond Network Power? The Dynamics of Form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8, No. 2 (June 2005), pp. 189-216.
- Bo, Zhiyue, 2005, "Political Succession and Elite Politics in Twenty-First Century China: Toward a Perspective of Power Balancing," *Issues and Studies*, Vol. 41 No. 1 (March 2005), pp. 162-217.
- Byman, Daniel and Kenneth Pollack, 2001, "Let Us Now Praise Great

- Man: Bringing the Statesman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 (Spring 2001), pp. 107-146.
- Cai, Kevin G., 199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in Northeast Asia: A Unique and Dynamic Pattern.” *East Asia: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Vol. 17, No. 2 (Summer 1999), pp. 6-46.
- Gilpin, Robert, 1971, “The Politics of Trans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5, No. 3,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Summer 1971), pp. 398-419.
- Gourevitch, Peter, 1978,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2, No. 4 (Autumn 1978), pp. 881-912.
- Hasenclever, Andreas 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 2000, “Integrat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6, No. 1 (January 2000), pp. 3-33.
- Harvie, Charles and Hyun-Hoo Lee, 2002, “New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How Does It Relate to the 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Vol. 19, No. 2 (August 2002), pp. 123-140.
- Heisbourg, Francois, 2003, “A Work in Progress: The Bush Doctrine and Its Consequence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6, No. 2 (Spring 2003), pp. 73-88.
- Hund, Markus, 2003, “ASEAN Plus Three: Towards a New Age of Pan-East Asian Regionalism? A Skeptic’s Appraisal,”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6, No. 3 (September 2003), pp. 383-417.
- Huntington, Samuel P., 1965,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 Decay,” *World Politics*, Vol. 17, No. 3 (April 1965), pp. 386-430.
- Ikenberry, G. John, 2002, “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2), pp. 44-60.
- Kaufman, Robert G., 1994, “A Two-Level Interaction: Structure, Stable Liberal Democracy, and U.S. Grand Strategy,” *Security Studies*, Vol. 3, No. 4 (Summer 1994), pp. 678-717.
- Keohane, Robert O., 1988,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No. 4 (December 1988), pp. 379-396.
- Krasner, Stephen D., 1976,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Vol. 28, No. 3 (April 1976), pp. 317-347.
- Labs, Eric J., 1997, “Beyond Victory: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Expansion of War Arm,”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4 (Summer 1997), pp. 1-49.
- Lake, David A., 1993, “Leadership, Hegemony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Naked Emperor or Tattered Monarch with Potential?”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7 (December 1993), pp. 459-489.
- Mansfield, Edward D. and Helen V. Milner, 1999, “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3, No. 3 (Summer 1999), pp. 589-627.
- Marchand, Marianne H., Morten Boas and Timothy M. Shaw, 199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ew Regionalisms.” *The World Quarterly*, Vol. 20, No. 5 (October 1999), pp. 897-910.
- Martin, Lisa L., 1992, “Interest, Power, and Multilateralism.”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4 (Autumn 1992), pp. 765-792.
- Miller, Benjamin, 1992, "Explaining Great Power Cooperation in Conflict Management," *World Politics*, Vol. 45, No. 1 (October 1992), pp. 1-46.
- Monten, Jonathan, 2005, "The Roots of the Bush Doctrine: Power, Nationalism, and Democracy Promotion in U.S.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4 (Spring 2005), pp. 112-156.
- Nye, Joseph S., 1987, "Nuclear Learning and U.S.-Soviet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3 (Summer 1987), pp. 371-402.
- Pei, Minxin, 2006, "The Dark Side of China's Rise," *Foreign Policy* (March/April 2006), pp. 32-40.
- Putnam, Robert D., 1988,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Summer 1988), pp. 427-460.
- Ravenhill, John, 2010, "The 'New East Asian Regionalism': A Political Domino Effec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7, No. 2 (May 2010), pp. 178-208.
- Rose, Gideon, 1998,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October 1998), pp. 144-172.
- Ruggie, John Gerard, 1998,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Autumn 1998), pp. 855-885.
- Schweller, Randall L., 2004,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2 (Fall 2004), pp.159-201.
- Simon, Herbert A., 1955, “A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 *The Quarterly of Economics*, Vol. 9, No. 1 (February 1955), pp. 99-118.
- Singer, David J., 1960, “International Conflict: Three Levels of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 12, No. 3 (April 1960), pp. 453-461.
- _____, 1961, “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14, No. 1 (October 1961), pp. 77-92.
- Snidal, Duncan, 1985, “The Limits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9, No. 4 (Autumn 1985), pp. 579-614.
- Stein, Arthur A., 1982, “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 Regimes in an Anarchic Wor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International Regimes (Spring 1982), pp. 299-324.
- Stein, Arthur A., 1984, “The Hegemony’s Dilemma: Great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8, No. 2 (Spring 1984), pp. 355-386.
- Sterling-Folker, Jennifer, 1997, “Realist Environment, Liberal Process, and Domestic-Level Variable,” Vol. 41, No. 1,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March 1997), pp. 1-25.
- Thompson, Drew, 2005, “China’s Global Strategy for Energy, Security, and Diplomacy,” *China Brief*, Jamestown Foundation, No. 5 (2005), pp. 5-21.
- Waltz, Kenneth N., 2000,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Summer 2000), pp. 5-41.
- Wendt, Alexander, 1992,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No.2 (Spring 1992), pp. 391-425.
- Yongnian, Zheng, 2000, "The Politics of Power Succession in Post-Deng China,"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8 No. 1 (June 2000), pp. 13-32.
- Zhao, Suisheng, 2000,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5, No. 1 (2000), 5-33.

(III) Papers in Books

- Bhagwati, J., 1995, "U.S. Trade Policy: The Infatuation with Free Trade Areas," in J. Bhagwati and A. O. Krueger, eds. *The Dangerous Drift to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pp. 1-18. Washington, D.C.: The AEI Press.
- Dittmer, Lowell, 1987,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 Critical Review," in Ilpyong J. Kim. ed. *The Strategic Triangle: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pp. 29-47. New York: Paragon House Publisher Press.
- Evangelista, Matthew, 1997, "Domestic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Change," in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ed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hapter 8.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Evans, Peter B., 1993, "Building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to

-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olitics: Reflections and Projections,” in Peter B. Evans, Harold K. Jacobson, and Robert D. Putnam, eds. *Double-Edged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 pp. 397-430. London: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 Haas, Peter M., 2002,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the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in Volker Rittberger and Peter Mayer, eds,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 pp. 168-20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ggard, Stephan, 199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Americas,” in Edward D. Mansfield & Helen V. Milner,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pp. 20-4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urrell, Andrew, 2002,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Study of Regimes: A Reflective Approach,” in Volker Rittberger and Peter Mayer, eds.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 pp. 49-7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onsson, Christer, 2002, “Cognitive Factors in Explaining Regime Dynamics,” in Volker Rittberger and Peter Mayer, eds.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 pp. 202-22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hler, Miles, 1999, “Rationa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Peter J. Katzenstein, Robert O. Keohane, and Stephen D. Krasner, eds, *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pp. 279-302.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 Keohane, Robert O. and Helen V. Milner, 1996,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Introduction,” in Robert O. Keohane and

- Helen V. Milner, ed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pp. 3-2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eohane, Robert O., 1988,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Structural Realism and Beyond," in Paul R. Viotti and Mark V. Kauppi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Pluralism, Globalism, and Beyond*, pp. 158-203. Boston, MA: Prentice Hall Press.
- Keohane, Robert O., 2002,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Toward a European-American Research Programme," in Volker Rittberger and Peter Mayer, eds.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 pp. 23-4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rauss, Ellis S., 1993, "U.S.-Japan Negotiations on Construction and Semiconductors, 1985-1955," in Peter B. Evans, Harold K. Jacobson, and Robert D. Putnam, eds., *Double-Edged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 pp. 265-299. California: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 Kugler, Jacek Douglas Kugler and Ronald L. Tammen, 1980, "Chapter 1: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Ronald L. Tammen et al. eds.,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pp. 1-60.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mpton, David M., 2001, "China's Foreign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Process: Is It Changing and Does It Matter?" in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1978~2000*, pp. 1-38.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vine, Steven I., 1982, *China in Asia: The PRC as a Regional Power*, in Harry Harding, e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 pp.

- 107-145.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Mansfield, Edward D. and Helen V. Milner, 199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An Overview," in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pp. 1-1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earsheimer, John, 1995,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 Michal E. Brown et al., eds., *The Perils of 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p. 79-129. Cambridge: MIT Press.
- Mearsheimer, John, 1995,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Michael E. Brown,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The Perils of 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p. 332-376.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 Moravcsik, Andrew, 1993, "Integrating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in Peter B. Evans, Harold K. Jacobson, and Robert D. Putnam, eds. *Double-Edged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 pp. 3-42. London: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 Ruggie, John Gerard, 1986,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Polity,"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pp. 131-1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chweller, Randall L., 2003, "The Progressiveness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ppraising the Field*, pp. 311-348.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 Snidal, Duncan, 1986, "The Gam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Kenneth A. Oye, ed.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pp. 25-57.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Zurn, Michael, 2002, "Bringing the Image (Back) in About the Domestic Source of Regime Formation," in Volker Rittberger and Peter Mayer, eds.,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 pp. 282-31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V) Newspapers

Lapper, Richard, 2005, "Increase of Trade Reveals Beijing's Growing Profile in Latin America," *Financial Times*, 9 March 2005, pp. 5-7.

(V) Internet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OF., 2013,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Ministry of Finance*, Retrieved 29 July 2013, from <http://www.mof.gov.tw/lp.asp?ctNode=2721&CtUnit=11&BaseDSD=5&mp=62>.

DGBAS, 2013, "Statistical Tables," *National Statistics,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Retrieved 29 July 2013, from <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14616&CtNode=3564&mp=4>.

Hettne, Björn and Fredrik Söderbaum, 1998, "The New Regionalism Approach," *Politeia*, Vol. 17, No. 3, retrieved 22 December 2015, from <http://www.unisa.ac.za/default.asp?Cmd=ViewContent&Content>

ID=7194.

Ianchovichina, Elena and Susanna Lundstrom, 2009, "Inclusive Growth Analytics: Framework and Application,"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4851, retrieved 22 December 2014, from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410472##.

Medeiros, Evan, 2004, "China Debates Its Peaceful Rise Strategy," 22 June 2004, *YaleGlobal*, Retrieved 29 July 2015, from

<http://yaleglobal.yale.edu/content/china-debates-its-%E2%80%9Cpeaceful-rise%E2%80%9D-strategy>.

Rose, Carol M., 2010, "Game Stories," *Faculty Scholarship Series*, Paper 1728(2010), Retrieved 22 December 2015, from

http://digitalcommons.law.yale.edu/fss_papers/172.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2013,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 *European Commission*, retrieved 29 October 2015, from,

http://ec.europa.eu/trade/policy/in-focus/ttip/#what_is_ttip.

The World Bank, 2013, "Export Goods and Services (% of GDP)," *The World Bank*, Retrieved 29 July 2013, from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E.EXP.GNFS.ZS/countries>.

The World Bank, 2015, "Military expenditure (% of GDP)," *World Databank*, Retrieved 29 July 2015, from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home.aspx>.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6,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6," 23 May 2006,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trieved 29 July 2015, from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pdfs/China%20Report%202006.pdf>.

WTO, 2016,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1 February 2016,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retrieved 1 March 2016, from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region_e/region_e.htm.